

#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第八卷第二期 2014 年 7 月

## ◎ 研究論文

個人、父母、以及學校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關係之探究 / 呂文惠

論科學與教育：一個批判的角度 / 王振輝

從分裂到統一：德國家庭政策的轉型與啟示 / 陳素梅

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模型之研究：以莫拉克颱風屏東縣中繼屋居民為例 / 何華欽、趙善如、張麗珠、柯旻伶、麥漢倫

光明之路：台灣偏鄉單親母親脫離貧窮的非營利組織策略初探 / 吳文炎、周江杰

杜修蘭「逆女」小說中的母女關係 / 房智慧

漢譯佛典《普曜經》敘事結構分析 / 王晴慧

阻礙大學生通過必修服務學習課程成因之探討：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發展歷程與反思 / 羅淑真、廖淑娟、蕭至邦

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應用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領域閱讀教學之行動研究 / 吳俊憲、吳錦惠、胡惠珊

從服務使用者的觀點探討「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社工專業」之協同合作關係 / 張秀玉

非營利組織和政府間的社會創新與合作：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行動研究 / 紀金山

志願服務評鑑：以嘉義縣為例 / 呂朝賢、鄭春良

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 出版

## 《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編輯委員會

- 發行人 唐傳義（靜宜大學校長）
- 總編輯 林克敬（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 執行編輯 郭俊巖（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 編輯助理 謝文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社工員）  
賴秦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博士生）
- 編輯委員 王香蘋（弘光科技大學護理系教授）  
王德睦（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王迺宇（靜宜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林海清（中臺科技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兼任教授）  
郭俊巖（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彭瑞金（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教授）
- 出版者 靜宜大學
- 地址 (43301)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 7 段 200 號
- 電話 04-26328001 # 17001~17002
- E-mail pu20600@pu.edu.tw
- 網址 <http://www.huso.pu.edu.tw/puchess/index.htm>

本期售價：新台幣 600 元；美金 20 元整。

ISSN 2223-7461

# 目 錄

---

## 研究論文

個人、父母、以及學校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關係之探究 / 呂文惠.....	1
論科學與教育：一個批判的角度 / 王振輝.....	29
從分裂到統一：德國家庭政策的轉型與啟示 / 陳素梅...	57
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模型之研究：以莫拉克颱風屏東縣中繼屋居民為例 / 何華欽、趙善如、張麗珠、柯旻伶、麥漢倫.....	101
光明之路：台灣偏鄉單親母親脫離貧窮的非營利組織策略初探 / 吳文炎、周江杰.....	141
杜修蘭「逆女」小說中的母女關係 / 房智慧.....	169
漢譯佛典《普曜經》敘事結構分析 / 王晴慧.....	209
阻礙大學生通過必修服務學習課程成因之探討：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發展歷程與反思 / 羅淑真、廖淑娟、蕭至邦..	253
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應用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領域閱讀教學之行動研究 / 吳俊憲、吳錦惠、胡惠珊.....	283
從服務使用者的觀點探討「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社工專業」之協同合作關係 / 張秀玉.....	317
非營利組織和政府間的社會創新與合作：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行動研究 / 紀金山.....	355
志願服務評鑑：以嘉義縣為例 / 呂朝賢、鄭春良.....	401



# **Providence Studies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8, No.2, July 2014**

## **© Research Articles**

How Personal Factors, Parents, and School can Explain for th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 / Wen-Hui Lu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 Chen-Hui Wang

From Division to Reunification :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Policy in Germany and it's Lesson / Su-Mei Chen

Study on the Life Adaption of the Citizens in the Temporary Housing after Disasters — Take the Citizens in the Pintung Temporary Housing after Typhoon Morakot as an Example / Hua-Chin Ho, Shan-Ru Chao, Li-Chu Chang, Ming-Ling Ko, Han Lun Mai

Path to bright: From Taiwan Township single mothers' experience to explo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trategy / Wen-Yen Wu, Chiang-Chieh, Chou

The Mother-Daughter Conflicts in Du Xiu-Lan's Ni Nü / Chih-Hui Fang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alysis of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 《Pu-Yao-Jing》 / Chin-Hui Wang

A Study on Obstructio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A Reflection on Asia University Service Learning Development Process / Shu-chen Lo, Shu-chuan Liao, Chih-Bang Hsiao

Applying for Mandarin Chinese Area Reading Instruction in Second Grade at A Primary School / Chun-Hsien Wu, Chin-Hui Wu, Hui-Shan Hu

Explor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and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Perspectives from the service user / Hsiu-Yu Chang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Research on the Incubation Center of Communities of Taichung / Chin-Shan Chi

Volunteering Evaluation: ChiaYi County as an Example / Chao-Hsien Leu, Chun-Liang Cheng

## 研究論文

# 個人、父母、以及學校與學生數學學習 成就關係之探究\*

呂文惠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副教授

---

收稿日期：2014 年 1 月 3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2 月 17 日。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修改意見。作者於 2014 年 8 月 1 日升等教授。

## 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是從發展生態系統的觀點來探討個人特質、家庭因素、及學校因素如何解釋數學學習成就的個別差異。在本研究中，個人特質包含個人認知能力、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以及數學學習態度；家庭因素是指父母的教育程度；學校因素則是指城鄉差異。106 位來自台灣中部地區某縣轄市二所分處於市區與郊區的國小六年級學生參與本研究。結果顯示二校學生數學學習成就及父母教育程度有顯著差異，但在一般認知能力、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以學習態度則無顯著差異。逐步類別迴歸的結果顯示一般智能、學校、父親學歷、及學習態度最能解釋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個別差異。研究者據此提出教育及研究上的建議。

**關鍵字：**城鄉差異、數學教育、自我效能、學習態度、認知能力

# **How Personal Factors, Parents, and School can Explain for the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

Wen-Hui Lu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s tried to explore how the personal traits, family factors, and school factors could explain for the variances i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 The personal traits included the cognitive abilities, self-efficacy in mathematics, and learning attitudes toward mathematics. Family factors referred to parents' education levels. School factors referred to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A total of 106 sixth graders from two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same city participated in the study. One of the schools located in the urban area, and the other located in suburban are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school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 and parents' education levels (both father and mother). However, the two groups did not differ in cognitive ability, self-efficacy, or learning attitudes. Results of stepwise categorical regressions showed that cognitive ability, school factor, fathers' education levels, and learning attitude could explain for the variances in mathematic achievements. Educational and practical 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based on the results.

**Keywords:**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suburban areas, mathematics education, self-efficacy, learning attitudes

## 壹、緒論

近年來不論是在臺灣各級升學考試或學生學科能力測驗中，學者普遍發現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顯著的城鄉差距（例尤淑純、蔡玉瑟，1998；張芳全，2008）。駱明慶（2002）研究 1954-2000 年台灣大學學生的背景資料，發現來自台北市的比例遠高於台北市在臺灣的人口比例，而來自台東縣者則低於其人口比例，而來自台北市大安區者的比例最高。張芳全（2008）以臺灣學生參加 2003 年 TIMSS 數學測試結果為例，發現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上有顯著的城鄉差距，城市區域的國中生的數學分數顯著地高於鄉下地區的學生。這些研究在在顯示在臺灣，學生的學習成就的確有城鄉差距存在。然而學習成就的城鄉差距究竟是來自學生本身的差異、父母教育程度的差異、或者是學校本身的差異，值得我們探究。

數學是科學之母，是學習更高深的科學知識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也是很多專門技術工作的基礎能力，更是在現代社會中獲得好職業的關鍵能力之一（Ramdass & Zimmermann, 2008）。因此，數學成就不但與學生日後的學業成就有關，也和其生涯發展有關。部分學者認為相較於語言藝術等學科，數學是較不受學生家庭文化資產影響的學科（Lareau & Weininger, 2003），亦即相較於英文等學科，數學的學習應該較不受學生所處區域文化資源的影響。儘管如此，張芳全（2008）分析 TIMSS 的測試結果，發現在台灣，都市地區學校的學生表現顯著地較偏遠地區學生佳，顯示數學學習成就仍有城鄉差距。若能瞭解數學學習成就城鄉差距的原因，應有助於擬定方針改善此一現象，讓城鄉的學生都能立足於同樣的起點上來競爭。由於造成學習成就城鄉個別差異的因素很多，可能是由於學生認知能力或學習態度的差異，或是家庭因素造成，也有可能來自學校對教師教學支援的差異，或者來自教師教學能力的差異。本研究以中部

地區某縣轄市的二所分處於市中心及郊區的小學為例，探究學生個人能力、學習態度與動機、父母教育程度、及學校差異等因素與數學學習成就間的關係。

## 貳、文獻探討

若欲充分瞭解造成數學學習成就城鄉差異的可能因素，需先瞭解目前學生學習成就城鄉差異的現況，並從影響學生學習成就的相關因素去探究城鄉差距可能的原因。Bronfenbrenner (1974) 從生態系統的角度提出影響人類發展是個人與週遭環境互動（近側歷程），受到其所處的環境的影響（中層系統），並在整個社會架構（外層系統）下表現出來的結果。所謂的近側歷程包含個人的家庭及同儕，而中層系統則包括了社區、學校、個人工作環境等，而外層系統則是指整體的大環境，包含社會、國家、及至世界趨勢（Bronfenbrenner, 1974; Bronfenbrenner & Evans, 2000）。因此，個別差異是同時受到個人因素與學生生活環境因素互動的影響，並在社會整體觀點定義下的結果。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試圖從學生個人特質、家庭背景、以及學校環境等因素，依據目前社會環境的定義，探究國小學生數學學習成就城鄉差異的可能原因。由於兒童居住社區與其所就讀學校的學區在大部情形下是重疊的，且兒童較無法正確描述其所處社區特質，故本研究不探究社區因素。

### 一、學習成就存在城鄉差異

教育的公平性是基本人權之一，也是世界各國所追求的。所謂教育的公平性包含輸入的均等，強調入學機會的均等；過程的均等，強調教育經費、學校建築及設備、教師編制等學生接受教育過程的均等；以及結果的均等（胡夢鯨，

1994, 1995; 陳麗珠, 2007; 甄曉蘭, 2007)。胡夢鯨以縣市為單位, 比較臺灣各縣市中小學校舍、校地、學校圖書資源、教師學歷、教育經費等的差異, 結果發現各地區中小學的軟硬體設施上, 城鄉略有不同。一般而言, 屬於都市地區(包含直轄市及省轄市)的學校其校地、校舍均較小, 但是學校的設備、圖書資源、教師員額、及教師學歷均較高。另外, 都市與偏鄉地區的教師素質也可能不同。近年來, 由於少子女化之故, 各縣市政府都控管學校正式教師的員額, 遇有教師缺額時, 往往以代理或代課教師取代之, 部分學校因無法聘到具有教師資格的教師, 甚至聘請大學畢業未具教師資格者擔任代理或代課教師, 這個情形在偏鄉地區尤其嚴重(呂文惠, 2012)。從這個結果看來, 位於郊區的學校可提供學生較大的活動空間, 但在與教師教學有關的資源上卻少於位於都市地區的學校。而這也顯現在學生學習成就的城鄉差距上。

在臺灣, 數學學習成城鄉差距極為明顯。張芳全(2008)分析 2003 年 TIMSS 各國測驗的結果, 結果發現在臺灣, 越是住在鄉區的學生, 其數學學習成就越差, 在 50 萬人以上都市區的受訪者, 平均分數是 569.9, 而在 3000 人以下鄉區學生的平均分數則是 500.5, 二組差距近 70 分。而張芳全(2009)進一步分析臺灣學生科學成就(包括數學及理化)城鄉差異的可能原因, 結果發現在臺灣, 城鄉地區不論學生父母的教育程度、學生享有的文化資本、科學資源、課後補習均有顯著差異, 而學生所報告的教師上課方式也有顯著的城鄉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學生的自我期望也有顯著的城鄉差異。張芳全進一步利用多元迴歸的方式瞭解影響城市及鄉村地區學生科學成就的可能因素, 結果發現在城市地區, 顯著的預測因素有文化資本、自我期望、以及個人興趣; 而在鄉村地區則是文化資本、自我期望、個人興趣、教師示範、以及理化作業, 其中教師示範與理化作業量都是負相關。從這二份研究中, 我們可以發現在臺灣, 數學學習成就的確有城鄉差異, 而除了學生的學習成就外, 城鄉間的教師教學方式、父母對

子女教育的投入、以及學生的自我期望也有顯著差異，因此無法釐清造成城鄉學生學習成就的因素為何。

其它研究者也發現類似的數學學習成就城鄉差異。尤淑純、蔡玉瑟（1998）邀請了中部地區市中心及鄉村各二個學校每校各 18 名五年級學生接受數學及國語學習成就測驗，並且評量受試者的智能、父母教養態度、學生學習行為及人格等相關特質因素。結果發現，受訪的學生數學及國語學習成就有顯著的城鄉差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都市地區，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間並沒有顯著差異，而在鄉村地區，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兒童其數學學習成就顯著地高於家庭社經地位中等及低者。儘管如此，在他們的研究中，鄉村高社經地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仍顯著地低於都市低社經地位的學生。另外，多元逐步迴歸的結果顯示預測都市兒童及鄉下兒童數學學習成就的因素不同。在都市地區，預測變項有成就動機、學校關係、個人價值意識、以及對自己人格特質的態度。而在鄉下地區則是對外界接納的態度、社會技能、以及性別。其中，不論在都市地區或鄉下地區，家庭社經地位都不是顯著的預測變項。

## 二、父母社經地位與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關

從上述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發現數學學習成就的確有城鄉差異，但是若是要把城鄉差異的原因完全歸因於城鄉間教師教學或學校設備差異所引起，未免有失公允。甄曉蘭（2007）透過問卷調查及座談會的方式，探究偏遠國中所遭遇的教育機會不均等的問題。結果發現，偏遠國中大多處於經濟、文化、交通等多重條件不利的情況。而參與座談會的校長們也反映偏遠國中師資流動率高、代課教師比率偏高、而學習能力較佳或家長較重視教育的學生，大多會轉出到較市區的國中，而轉入的學生是較有學習有問題者。由此觀之，學習成

就城鄉差距的可能原因有學校本身資源不足（如學校設備、教師不足、或教師本身教學能力不足）以及學生本身原本就是學習弱勢（家長教育投入較低、學生本身學習動機不足、認知能力較差...等）二大類可能的因素。

儘管市區及鄉村的學校間可能因為資源不均造成教師教學上的差異，但我們也不要忽略了，不同的學區有與該學區所在區域的次文化，且居住地區與家長的社經地位有密切的關聯。不同的次文化的價值觀及家長的社經地位都可能與學生的學習成就有關（Lareau & Wieninger, 2003）。張芳全（2009）的研究也指出在臺灣城鄉間家長對學生所提供的文化資本及科學資源有顯著的城鄉差距。Rangvid（2007）調查丹麥地區 PISA 成就測驗結果，發現即便在學校各方條件相同的情形下，不同學校間的學生學習成就差異仍然存在，而且與家長的背景有關，來自移民家庭的學生，學業成就較差。Flere and Lavrič（2005）調查蘇俄學生的學習成就，發現其與家長的學歷及職業有極強的相關。儘管部分學者認為語文、社會、藝術等學生與學生家庭的社經地位及文化刺激較有關，而數學是較需要技術的學科與學生家庭文化刺激較無關（DiMaggio, 1978；Lareau & Wieninger, 2003），Burnett & Farkas（2009）研究 9-14 歲的學生數學學習成就與其家境的關係，發現在控制了學生個人能力差異因素之後，學生家庭的貧窮程度，與其數學學習就有中度但顯著的負相關。研究者普遍發現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程度（concerted cultivation）與子女的學習成就有關（張芳全，2006；Bodovski & Farkas, 2008；Cheadel, 2008, 2009）。Cheadel（2009）甚至發現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程度與子女幼稚園入學時的一般常識測驗成績有關，但是對其入學後在一般常識的發展則無顯著相關。相反的，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程度與其子女入學後數學學習成就的進步程度則有顯著的相關（Cheadle, 2008）。在 Cheadel（2008, 2009）的研究中，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程度是指父母對子女學校活動的參與度（如是否出席家長會、參與學校家長團體等）、父

母對子女課後學習活動的安排(如安排夏令營)以及父母所提供的學習資源(如書本量)。從上述研究看來,城鄉之間學習成就的差異也有可能是來自學生家庭背景因素的差異。

研究發現臺灣城鄉間學生父母的教育投入程度、父母本身的學歷及社經地位均有顯著的城鄉差距(尤淑純、蔡玉瑟,1998;張芳全,2009),張芳全(2008)分析2003年TIMSS各國測驗的結果,結果發現在台灣城市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顯著高於鄉下地區學生。而張芳全(2009)進一步分析臺灣學生科學成就(包括數學及理化)城鄉差異的可能原因,結果發現在臺灣,城鄉地區不論學生父母的教育程度、學生享有的文化資本、科學資源、課後補習均有顯著差異,而學生所報告的教師上課方式也有顯著的城鄉差異,值得注意的是學生的自我期望也有顯著的城鄉差異。其它學者也發現類似的數學學習成就城鄉差異。尤淑純與蔡玉瑟(1998)邀請了中部地區市中心及鄉村各二個學校每校各18名五年級學生接受數學及國語學習成就測驗,並且評量受試者的智能、父母教養態度、學生學習行為及人格等相關特質因素。結果發現,學生的數學及國語學習成就有顯著的城鄉差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都市地區,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間並沒有顯著差異,而在鄉村地區,家庭社經地位高的兒童其數學學習成就顯著地高於家庭社經地位中等及低者。儘管如此,在他們的研究中,鄉村高社經地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仍顯著地低於都市低社經地位的學生。

張芳全(2008,2009)及尤淑純、蔡玉瑟(1998)的研究都是探究不同地區的學生間的數學學習成就城鄉差異。但不同地區可能涉及縣市政府教育經費投入的差異,從親子天下雜誌(2012)教育力調查的結果可以發現,各縣市在中小學教育上投入的重點不同,因此,本研究將探究在同一縣市,城鄉學校間的學生其父母教育程度的差異是否可以解釋其數學學習成就的差異。

### 三、學習成就與個人認知能力、學習動機、與學習態度有關

除學校因素及家長因素外，本研究亦探討個人因素與學生數學學習成就間的關係。研究者探究的個人因素包含一般智能、數學學習自我效能、以及數學學習態度。

學習成就與個人的一般智能及認知能力有關。研究者普遍發現個人的認知能力與學習成就有密切的關聯性，認知因素包括注意力、知覺因素、記憶力、先備知識、策略應用等（Case, 1991; Mayer, 1987）。而與數學學習成就有關的認知能力則包含注意力、記憶力、以及一般推理能力（呂文惠，2001；孫扶志，1996；Geary, Bow-Thomas, & Yao, 1992; Ginsburg, 1997; Hegarty, Mayer, & Monk, 1995; Jordan & Montani, 1997; Mayer, 1987；Miller & Mercer, 1997; Naglieri & Gottling, 1997; Rivera, 1997）。一般認為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的結果較不受語言及文化的影響（Anastasi, 1990），由於本研究主要是探究二所分處於城市與郊區的學校，考量學生家庭背景不同，因此研究者蒐集學生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的結果為學生一般認知能力的指標。

另一個和個人學習成就有關的因素是學習動機（Bandura, 1977; 1997; Chen & Zimmerman, 2007; Schiefele & Csikszentmihalyi, 1995; Schunk, 1984, 2000）。學習動機是指個人所感受到的學習需求以及個人為求得更好的學習成就而做的努力。影響個人學習動機的因素很多，可能來自個人所設立的學習目標（Covington, 2000; Schunk, 1991）、過去學習的經驗（Bandura, 1977; 1997）、與他人的利誘或勸說（Bandura, 1977, 1997; Covington & Müeller, 2001; Weiner, 1980）。總合來說，學習動機是促發個人從事一項學習任務的動力來源。

Bandura（1977, 1997）認為個人會從自己過去的經驗、觀察別人的經驗、他人的利誘與勸說、再結合自己當時的身心狀況，判斷自己從事一項任務時是

否可以有效地成功解決該任務，再決定要不要努力，這就是所謂的自我效能感。因此，學生對數學的自我效能判斷受到其過去的數學學習成就、重要他人（同儕、兄姊或父母）的數學學習成就、教師或父母是否鼓勵學生努力學習數學、以及個人特質的影響。而因為數學學習自我效能的判斷會影響學生是否會努力用功學習，以及其面對數學困難問題時是否願意繼續努力（Schunk, 1991, 2000），故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應與數學學習成就有關。Zuffianò, Alessandri, Gerbino, Kanacri, Di Giunta, Milioni and Caprara（2013）在學期開始時調查一群 8 年級學生對學業的自我效能感，結果發現在控制前一學期學業成就、家庭社經地位、以及性別等因素後，學期初的自我效能感仍能預測學生期末學業成就的個別差異。另外，研究者也發現數學解題自我效能判斷會影響其解題及自我訂正策略的應用（Ramdass & Zimmerman, 2008）。在張芳全（2009）的研究中，發現城鄉學生的自我期望有顯著的城鄉差距，而在鄉村學校學生對科學學習的興趣可以顯著的預測其科學學習成就。從這些研究結果，我們都可以發現學生對數學學習的自我效能感與其數學學習成就有關。

另一個與學習成就有關的個人心理因素是學習態度。態度是指人們對一事物喜歡或不喜歡的傾向，通常伴隨著趨近或逃避的傾向（Gawronski, 2007; Krosnick, Judd, & Wittenbrink, 2005），而人類的行為與其態度有關（Ajzen, 2005; Ajzen & Fishbein, 2005）。研究指出學習態度較正向的學生，往往比較會主動學習，而其學習效果也較好（Al-Bustan, 2009）。而 Petscher（2010）統整分析了 32 個研究報告，結果發現學生對閱讀的態度與其閱讀成就間呈正向的中等相關，即閱讀態度越正向者其閱讀成就也越高。而本研究即同時探討學生對數學的喜好態度是否可以有效地預測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在國小高年級階段的數學開始趨向抽象且困難，教育部（1998）的調查也發現，隨著年級增加，討厭數學的學生比例也隨之增加，在國小 6 年級約有一半的學生表示數學是其最不

喜歡的課程。也就是說隨著年級增加，學生對數學抱持負面態度的比例也增加，而本研究將探究對數學的態度是否能解釋數學學習成就。

從上述文獻中，我們可以發現現影響學生數學成就的因素包括學校、父母教育程度、個人智能、自我效能感、以及學習態度。本研究將利用類別迴歸分析探討當這些因素一起考量時，哪些因素可以有效地解釋國小六年級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

##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探究學校因素、家長教育程度、及學生個人因素如何能解釋數學學習成就的個別差異。受試者是來自二所分處於中部地區某縣轄市市中心及市郊的國小六年級學生。受試者、研究工具、及研究過程分述如下。

### 一、受試者

本研究共有 107 位國小 6 年級的學生參與，此二所學校六年級數學課本均使用同一家出版社所出版之教科書，其中甲校位於市中心，乙校位於縣轄市郊區。甲校設立約 20 年，在研究當時全校共有 31 個班級，現在則有 38 班，屬增班中的學校；乙校設立 40 餘年，在研究當時全校共有 8 個班級，除五、六年級外，其餘各年級都只有一班，現在則是各年級一班的學校。其中甲校受試者有 63 人（男生 28 人，女生 35 人），乙校則有 44 人（男生 22 人，女生 22 人）。表 1 是甲乙二校學生父母教育程度分布情形，其中甲校有一名學生沒有父母教育程度的資料。從表 1 可以看出甲校學生的父母教育程度均較乙校高，卡方檢定結果顯示二校學生父母教育程度的分布有顯著差異（父： $\chi^2 = 17.53, df = 4, p < .01$ ；母： $\chi^2 = 10.16, df = 4, p < .01$ ）。

表 1：甲乙二校學生父母教育程度分布情形

	父親			母親		
	甲校	乙校	總和	甲校	乙校	總和
小學	0	4	4	2	6	8
國中	5	13	18	6	11	17
高中職	33	20	53	33	18	51
大專	20	6	26	18	7	25
研究所以上	4	1	5	3	2	5
	62	44	106	62	44	106

## 二、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以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馮觀富，1986）的成績做為學生一般智能的指標，以柯氏國民小學數學科五年級成就測驗（柯平順、林敏慧，1994）測量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並以自編的量表評量學生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以及數學學習態度。

### （一）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

本測驗又稱為「瑞文氏黑白圖形補充測驗」，學生需根據已顯示的圖形之間的關係推論，選出適當的圖形。本測驗普遍被認為可以測量非語文智能，測驗共有 60 題，滿分 60 分（馮觀富，1986），研究者從學校輔導室取得學生受測的結果。由於二校學生受測時間不同，故以學生的百分等級（PR）值做為其得分。

### （二）柯氏國民小學數學科五年級成就測驗

由於本研究是在上學期實施，故施以五年級程度的數學成就測驗。本測驗系依據民國 80 年的數學科新課程標準的單元目標和內容設計而成，故本測驗所評估的數學能力相當的廣，包括三大領域「概念」、「運算」、「應用」與五大內容「數與計算」、「量與實測」、「圖形與空間」、「統計圖表」、「數量關係」。共有 117 題，其中是非題有 33 題，選擇題 41 題，填充題 43 題。本測驗經甲、乙二校任課教師評估，確認內容未超出其國小五年級數學上課範圍，故未修改題目，

但因於另一所學校預試時發現本測驗題目數過多，學生不易完成，故刪減其中預試時鑑別度較低的題目，保留其中 41 題選擇題及 43 題填充題。原測驗間隔 2 週的重測信度為 0.78、折半信度為 0.93、Chronbach's Alpha 係數為 0.96，與在校數學成績的效標關聯效度係數為 0.56（柯平順、林敏慧，1994），預試的結果顯示研究者修訂的版本 Chronbach's Alpha 係數為.915，顯示本測驗有不錯的信、效度。

### （三）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量表

本量表共有 13 題，由研究者自編。其中有 7 題是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請學生自評其對自己數學成就的信心及是否願意努力學習數學（例如：我相信我在以後國中時，數學也可以拿到很好的成績）。另外 6 題是數學學習態度，由受試者評量對數學的評價及喜好等（例如：數學是現代人都要學好的科目），所有題目都是李克特 5 點量表，研究者計算受試者的題項平均分數，故最高分是 5 分，最低分為 1 分。量表內容經二位教育專長的大學教授提供意見，並由國小教師審查其文字是否適合國小學生的理解程度，故具有內容效度。此二量表的 Chronbach's alpha 係數分別是.853 及.854 顯示有不錯的信度。

## 三、研究流程

本研究所有測驗及量表都是利用上課時間施測，由班級導師施測，採團體施測。柯氏國民小學數學科五年級成就測驗施測時間約 90 分鐘。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量表是在柯氏國民小學數學科五年級成就測驗施測後 1 個月由學生填寫，學生填寫時間約 5 分鐘。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及家長教育程度等資料則由學校提供。

##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探究學校因素、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個人因素（認知能力、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如何能解釋個人數學學習成就。研究者首先將分析二所學校間學生在數學成就測驗、認知能力、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若二校學生間有顯著差異，則研究者將進一步以邏輯斯迴歸分析個人因素、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學校因素如何能解釋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差異。

### 一、二校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認知能力、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

研究者首先計算二校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結果如表 2 所示，從表 2 可以看出甲校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較乙校學生高，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二校間的差異達顯著水準（不假設變異數相等， $t=5.70$ ,  $df=65.88$ ,  $p < .01$ ），位於市中心的甲校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顯著地高於位於郊區的乙校學生，顯示數學學習成就城鄉差異存在，這個結果與張芳全（2008）及尤淑純、蔡玉瑟（1998）的研究結果相符。

由於二校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差異，研究者進一步分析二校學生在認知能力（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是否有顯著差異。由於學生的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結果是百分等級，不能計算平均值，故呈現其分佈情形。表 3 是二校學生在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的百分等級各級距的分布情形，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二組學生的百分等級分布沒有顯著差異。二校學生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的結果如表 2 所示，從

表 2 可以看出甲校學生在數學學習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的平均值都較乙校高、但是單一樣本 t 檢定的結果顯示差異都未達顯著水準。

表 2：二校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數學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得分情形

	甲校 N=63		乙校 N=44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數學學習成就	56.29	11.10	38.94	17.91
數學自我效能感	2.99	.75	2.76	.76
數學學習態度	3.23	.87	2.98	.86

這個結果顯示甲校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顯著高於乙校學生，而二校學生的認知能力、數學自我效能感、及數學學習態度都沒有顯著差異。另外，我們可以從表 1 發現，甲校學生父母的教育程度較乙校高。因此，甲乙二校學童間數學能力的差異是否是因為父母教育程度差異所致？或者與甲、乙二校的學校環境因素有關呢？當學校、父母、及學生個人因素一起考量時，哪些因素可以有效地解釋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的個別差異？研究者進一步以類別迴歸分析探究之。

表 3：二校學生在瑞文氏非文字推理測驗百分等級分布情形

百分等級	甲校	乙校	總和
1-9	3	1	4
10-19	5	2	7
20-29	4	8	12
30-39	6	6	12
40-49	4	2	6
50-59	8	2	10
60-69	5	3	8
70-79	8	5	13
80-89	6	4	10
90-99	13	10	23

二、個人因素、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學校因素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差異的解釋力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 Bronfenbrenner (1974) 的發展生態系統的觀點來探討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學校因素對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解釋力。由於本研究中的學校因素是類別變項，學生認知能力與父母教育程度是次序變項，而數學學習成就、數學自我效能感、以及數學學習態度則是數值變項，研究者分三個步驟進行類別迴歸分析的方式來探究逐步加入不同層次的因素後，各變項對數學學習成就解釋力的變化情形。研究者首先計算各變項與數學學習成就的相關情形。由於學生認知能力與父母教育程度是次序變項，故研究者利用無母數相關係數 Spearman rho，計算這些變項與數學學習成就的相關，結果如表 4 所示。從表 4 我們可以看出，父母教育程度、學生數學自我效能感、以及數學學習態度都與數學學習成就有顯著相關。

表 4：個人認知能力、數學自我效能、數學學習態度、父親教育程度、母親教育程度與數學學習成就的相關

	認知能力	數學自我效能	數學學習態度	父親教育程度	母親教育程度
相關係數	.575**	.311**	.410**	.490**	.412**
個數	105	107	107	106	106

研究者分三個步驟進行迴歸分析，探究個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學校因素對個人數學學習成就差異的解釋情形。在步驟一，研究者輸入認知能力、數學自我效能感、以及數學學習態度等三個個人因素。在步驟二，則加入父親教育程度及母親教育程度等家庭因素。最後，在步驟三，研究者又加入了學校因素。結果如表 5 所示，從表 5 可以發現，認知能力、數學自我效能感、以及數學學習態度等三個個人因素一起考量時，可以解釋數學學習個別差異 43.3%的

變異量，但只有認知能力及數學學習態度的  $\beta$  係數顯著地不等於 0，也就是說當認知能力、數學自我效能及數學學習態度一起考量時，只有認知能力及數學學習態度可以有效解釋數學學習成就個別差異的變項，數學自我效能感的個別差異則不重要。

在步驟二，研究者加入家庭因素－父親及母親的教育程度。從表 5 我們可以發現，當加入父、母親的教育程度後，對數學學習成就變異量的解釋力從 43.3% 增加到 54.3%，增加了 11%，而個人因素中的認知能力及數學學習態度仍可有效地解釋數學學習成就的個別差異，而家庭因素中，父親的教育程度比母親的教育程度更能有效預測學生的數學學習成就差異。在步驟三，研究者又加入了學校因素，結果發現，加入學校因素後，可解釋數學學習成就的變異量增加至 67.1%、但只剩認知能力與學校因素二者的  $\beta$  值顯著地不等於 0，數學學習態度的解釋效果則是趨向顯著 ( $p=.07$ )。

表 5：逐步類別迴歸的結果

	輸入的變項	Beta	分配	重要性	df	F	R 平方
步驟一	認知能力	.55		.78	9	66.69**	.433
	數學自我效能	.00		.00	1	.00	
	學數學學習態度	.24		.22	1	5.10*	
步驟二	認知能力	.47		.53	9	47.28**	.543
	數學自我效能	-.03		-.01	1	.05	
	學數學學習態度	.20		.15	1	4.26*	
	父親教育程度	.28		.26	3	8.63**	
	母親教育程度	.11		.07	2	.79	
步驟三	認知能力	.52		.45	10	51.16**	.671
	數學自我效能	-.06		-.03	1	.39	
	學數學學習態度	.19		.11	1	3.44	
	父親教育程度	.17		.12	3	2.09	
	母親教育程度	.07		.04	3	.30	
	學校	.42		.30	1	27.01*	
最終模式	認知能力	.52		.45	11	61.52**	.667
	學數學學習態度	.15		.09	1	3.98*	
	父親教育程度	.21		.16	3	9.88**	
	學校	.42		.30	1	27.46**	

由於在步驟一及步驟二，數學學習態度及父親教育程度的 beta 值都顯著地不等於 0，研究者想知道若只有輸入認知能力、數學學習態度、父親教育程度、以及學校等四個變項，與輸入全部變項是否有顯著差別，結果如表 5 的最終模式所示。我們可以發現，若只輸入認知能力、數學學習態度、父親教育程度、以及學校等四個變項，R 平方值從.671 降至.667，等於只減少 0.6%對數學學習成就變異量的解釋力，而這四個變項的 beta 值都顯著地不等於 0，因此研究接受最終模式。從這些變項對預測數學學習成就的重要性來看，認知能力最高，其次是學校因素，而數學學習態度則是這 4 個因素中較不重要的。

##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探究二所分處於市中心及郊區的小學，其高年級學生在數學學習成就及其它可能因素的差異情形，並且從發展生態系統的觀點（Bronfenbrenner, 1974），探討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及學校因素如何能解釋國小高年級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差異。研究的結果發現位於市區的學校的學生其數學學習成就顯著地高於郊區學校的學生，而且市區學校學生的父母教育程度也較郊區學校學生高。但是，二校學生在認知能力分佈、數學學習自我效能與數學態度的差異並沒有到達顯著水準，顯示數學學習成就的城鄉差異的確存在。

研究者進一步以類別迴歸的方式探究，個人認知能力、數學自我效能感、數學學習態度、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學校因素如何解釋學童數學學習成就的個別差異。結果發現最重要的四個因素依序是個人認知能力、學校、父親教育程度、及數學學習態度。在這些因素中，學習態度可能是影響數學學習成就個別差異的原因，也可能是數學學習成就影響的結果。教育部（1998）調查發現國小5年級開始，不喜歡數學的學生比例開始增加，在本研究中，二校學生數學學習態度平均值都在3.0左右，未顯著高於3.0，這個結果顯示學生的數學學習態度並未明顯地偏傾向正面。這可能是因為隨著年級增高，數學內容越來越難，使得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漸減，而學生對數學學習態度的高低也與其數學學習成就有關，態度越正面者，數學學習成就越好。

雖然在一般家庭中，母親跟孩子的互動較父親多。但本研究卻發現同時考量父母教育程度時，父親的教育程度比母親的教育程度更能有效解釋學生數學學習成就的個別差異。推論其原因可能是在台灣大部分的家庭中，父親通常是家中經濟主要負責人。因此，父親的教育程度可能影響其所從事的工作及家庭收入，進而影響家庭對孩子的教育投入。一般而言，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程

度可以解釋其子女入學後數學學習成就的進步程度 (Cheadle, 2008)。但因為本研究未調查父母教育投入狀況，後續研究者應可繼續探討父母教育程度與其教育投入對子女數學學習成就的影響。

本研究顯示，即便考量家長教育程度的差異，學校因素對解釋數學學習成就個別差異仍然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甚至高過父親的教育程度。由於本研究中二所學校使用的教材相同，故研究者推論造成學生學習成就差異的學校因素有可能是肇因於教師教學差異。由於學生個人的認知能力及父親教育程度都不是教育主管機關所能控制的，只有學校的品質是教育主管機關可以把關的。教育主管機關或學校方面若要提升偏鄉地區學童的數學學習成就，減少城鄉差異，建議宜加強教師的教學知能，除加強教師的教學能力外，更應強化教師對學生學習背景及特質的瞭解，並據以擬定適合的教學策略。

另外，父親的教育程度可能與家庭的經濟狀況及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投入程度有關，但因本研究未探究二校學生父母對其教育的投入情形，故無法進一步釐清父母教育投入的影響。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探究。

本研究從發展生態系統的觀點 (Bronfenbrenner, 1974)，並利用類別迴歸的方式，發現學生認知能力、父親教育程度、學校因素及數學學習態度可以有效地解釋數學學習成就，並提出教育上的建議供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參考。但因本校是以中部地區單一縣市的二所國小為對象，若欲應用至其它教育階段別或其它地區時，應考量其限制。

## 參考書目

- 尤淑純與蔡玉瑟（1998）。城鄉 兒童學習成就及其相關因素之比較研究，**國立臺中師院學報**。12，55-101。
- 呂文惠（2001）。國小數學學習低成就學童組型分析暨數學能力發展研究。國科會結案報告。
- 呂文惠（2012）。少子化更需要保障教育品質。**教育評論月刊**。1（5），49-50。
- 柯平順、林敏慧（1994）。柯氏國民小學數學科成就測驗系列。台北:中國行為科學社。
- 胡夢鯨（1994）。臺灣地區城鄉國民中學教育資源差異之比較。**國立中正大學學報**。5（1），89-116。
- 胡夢鯨（1995）。臺灣地區城鄉國民小學教育資源分配之比較。**國立中正大學學報**。6（1），1-35。
- 孫扶志（1996）。認知解題策略對國小數學低成就學童文字題解題能力之實驗研究。**測驗統計年刊**。4（12），71-124。
- 張芳全（2006）。影響數學成就因素在結構方程式模型檢定:以 2003 年台灣國二生 TIMSS 資料為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19（2），163-196。
- 張芳全（2008）。數學成就的城鄉差距探討：以 TIMSS 2003 為例。**國民教育**。48（6），22-29。
- 張芳全（2009）。臺灣城鄉學生的科學成就差異分析。**國民教育**。50（1），96-106。
- 教育部（1998）。台灣地區中等以下各級學校學生學習及生活概況調查報告。教育部統計處。
- 陳麗珠（2007）。論資源分配與教育機會均等之關係：以國民教育為例。**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3（3），33-53。

- 馮觀富（1986）。**瑞文氏智力測驗指導手冊**。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
- 甄曉蘭（2007）。偏遠國中教育機會不均等問題與相關教育政策初探。**教育研究集刊**。53（3），1-35。
- 駱明慶（2002）。誰是臺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113-147。
- Ajzen, I. & Fishbein, M.（2005）。The influence of attitudes on behaviors. In Albarracin, D., Johnson, B. T., & Zanna, M. P.（Eds）。*Handbook of Attitudes*（pp.173-222）。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Ajzen, I.（2005）。*Attitudes, Personality and Behavior*.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UK） Limited.
- Al-Bustan, S.（2009）。Investigating students attitudes and preferences toward learning English at Kuwait University.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43（2），454-463.
- Anastasi, A.（1988）。*Psychological Testing*. New York: Macmillan.
- Bandura, A.（1977）。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191-215.
- Bandura, A.（1997）。*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New York: Freeman.
- Bodovski, K., & Farkas, G.（2008）。“Concerted cultivation” and unequal achievement in elementary schoo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3），903-919.
- Bronfenbrenner, U.（1974）。Developmental research, public policy, and the ecology of childhood. *Child Development*, 45, 1-5.
- Bronfenbrenner, U., & Evans, G.（2000）。Developmental science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emerging questions, theoretical models, research design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Social Development*, 9（1），115-125.

- Burnett, K., & Farkas, G. (2009). Poverty and family structure effects on children's mathematics achievement: Estimates from random and fixed effects models.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6 (2) , 297-318.
- Cheadle, J. (2009) . Parent educational investment and children's general knowledge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 (2) , 477-491.
- Cheadle, J. E. (2008) . Educational investment, family context, and children's math and reading growth from kindergarten through the third grad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81, 1-31.
- Chen, P., & Zimmerman, B. (2007) .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study on the accuracy of self-efficacy beliefs of middle-school mathematics stud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Education*, 75 (3) , 221.
- Covington, M. (2000) . Goal theory, motivation, and school achievement: An integrative review.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1 (1) , 171-200.
- Covington, M., & Müeller, K. (2001) . Intrinsic versus extrinsic motivation: an approach/avoidance reformul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Review*, 13 (2) , 157-176.
- Dimaggio, P. (1978) . Making inequality: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high school tracking (book) . *Social Forces*, 56 (4) , 1274-1275.
- Flere, S., & Lavrič, M. (2005) . Social inequity and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Slovenia. *Educational Studies*, 31 (4) , 449-464.
- Gawronski, B. (2007) . Attitude can be measured! But what is an attitude? *Social Cognition*, 25 (5) , 573-581.
- Geary, D. C., Bow-Thomas, C. C., & Yao, Y. (1992) . Counting knowledge and skill in cognitive addition: a comparison of normal and mathematically

- disabled childre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54, 372-391.
- Ginsburg, H. P. (1997). Mathematics learning disabilities: a view fro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30, 20-33.
- Hegarty, M., Mayer, R. E., & Monk, C. A. (1995). Comprehension of arithmetic word problems: a comparison of 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problem solver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7, 18-32.
- Jordan, N. C. & Montani, T. O. (1997). Cognitive arithmetic and problem solving: a comparis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fic and general mathematics difficultie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30, 624-634.
- Krosnick, J. A., Judd, C. M., & Wittenbrink, B. (2005). The measure of attitude. In In Albarracin, D., Johnson, B. T., & Zanna, M. P. (eds). *Handbook of Attitudes*, pp 21-30.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 Lareau, A., & Weininger, E. (2003). Cultural capital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 critical assessment. *Theory & Society*, 32 (5/6), 567-606.
- Mayer, R. E. (1987).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ognitive Approach*. London: Little, Brown.
- Miller, S. P. & Mercer, C. D. (1997). Educational aspects of mathematics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30, 47-56.
- Naglieri, J. A. & Gottling, S. H. (1997). Mathematics instruction and PASS cognitive processes: an intervention study.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30, 513-520.
- Petscher, Y. (2010).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 attitudes towards reading and achievement in reading. *Journal of Research In*

*Reading*, 33 (4) , 335-355.

Ramdass, D., & Zimmerman, B. (2008). Effects of self-correction strategy training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self-efficacy, self-evaluation and mathematics division learning. *Journal of Advanced Academics*, 20 (1) , 18-41.

Rangvid, B. (2007). Sources of immigrants' underachievement: results from pisa - copenhagen. *Education Economics*, 15 (3) , 293-326.  
doi:10.1080/09645290701273558.

Rivera, D. P. (1997).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d students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series. *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 30, 2-19.

Schiefele, U., & Csikszentmihalyi, M. (1995). Motivation and ability as factors in mathematics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26 (2) , 163-81.

Schunk, D. (1984). Enhancing self-efficacy and achievement through rewards and goals: motivational and informational effects.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8 (1) , 29-34.

Schunk, D. (1991). Self-efficacy and academic motivation.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 26 (3/4) , 207-231.

Schunk, D. (2000). Coming to terms with motivation constructs.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5 (1) , 116-119.

Weiner, M. (1980). The effects of incentive and control over outcomes upon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12(2), 347-354.

Zuffianò, A., Alessandri, J., Gerbino, M., Kanacri, B. P. L., Di Giunta, L., Milioni,

M. & Caprara, G. V. (2013). Academic achievement: The unique contribution of self-efficacy beliefs in self-regulated learning beyond intelligenc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elf-esteem.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3, 158-162.



## 研究論文

# 論科學與教育：一個批判的角度<sup>\*</sup>

王振輝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

收稿日期：2013年11月2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5月13日。

<sup>\*</sup>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 中文摘要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科學與技術的發明使得經濟發展欣欣向榮，相對地，也加速了社會的變遷，傳統價值與習俗在科學衝擊之下，幾乎崩潰殆盡；這其中，科學對教育的影響更是深遠，科學與教育似是連體嬰，怎麼分也分不開，科學不僅是學校教育成敗的關鍵，在許多統治者看來，這兩者甚至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競爭力。本文嚐試從批判理論來反省科學，尤其是教育制度裡的科學態度—實證主義。

**關鍵字：**科學、教育、實證主義、意識形態、批判理論

# **On Science and Education: A Critical Perspective**

**Chen-Hui Wang**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 **Abstract**

Human's science and tech invention mak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iving sinc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changes also accelerated relatively. Traditional value and customs almost crash out under science's impacting. And the effect of science on education more is far-reach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joined friendly. Science is not only the key of school education, but also is related to entire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many rulers' poin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reflect on science from critical theory, especially scientific attitude in the education system --positivism.

**Keywords:** Science, education, positivism, ideology, critical theory

## 壹、前言

在網路上鍵入「現代教育」四個字，首先出現在網頁的是「百度百科」告訴我們：「現代教育的核心是科學教育。教育的內容是科學的，教育的方法也是科學的」。<sup>1</sup>事實是，現在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對科學已經到了盲目崇拜的地步了，用「精確的(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教育問題被奉為金科玉律，如果誰要研究教育教學，必然要用歸納研究的方法和統計學的知識。

在當代，教育與科學似是連體嬰，怎麼分也分不開，它不僅是學校教育成敗的關鍵，這兩者甚至關係到整個國家的競爭力，例如以下的報導：

根據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最新研究報告，去年全球最具創新能力的經濟體，正是遭到金融海嘯吞噬的冰島。而亞洲地區最具創新力的經濟體是香港，排名第三。台灣排名全球第25。

依照歐洲工商管理學院與印度工業聯合會（CII）調查的2010年度「全球創新指數」（GII），美國從原本的冠軍地位掉到第11名。香港則取代原本亞洲居冠的新加坡，成為亞洲第一。新加坡今年排名全球第七。

這項調查依照專利件數、科學期刊發行量、研發支出比重、教育程度以及創新能力如何支撐社會福利、競爭力與經濟成長的各項要素，綜合給出分數與排名。

美國排名在本年度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基礎教育水準不佳（全球第22）、科技基礎建設不佳（全球第22）以及出口與就業狀況不佳（全球第24）。

相對地，本年度居冠的冰島儘管因金融海嘯而在商業技能上排名不佳，但在教育以及科技基礎建設上表現良好，整體公共建設品質更是全球最佳。<sup>2</sup>

---

<sup>1</sup> [baike.baidu.com/view/714911.htm](http://baike.baidu.com/view/714911.htm)

<sup>2</sup> 記者陳家齊，〈全球創新力 冰島第一 台灣全球第25〉，《經濟日報》（台北），2010年

觀看裡頭所指的專利件數、科學期刊、研發、教育、創新、競爭力和經濟成長…幾乎都離不開科學和教育。

難道我們學校教育的成敗、國家國際競爭力的成長真的離不開科學嗎？本文嚐試從批判理論來反省科學，尤其是教育制度裡的科學態度—實證主義。

## 貳、批判理論對現代性的反思

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科學技術的發明與進展使得經濟發展欣欣向榮，相對地，社會變遷也加速，傳統價值與習俗在現代化衝擊之下，幾乎崩潰殆盡；時至今日，有許多思想家對這樣的發展提出他們的憂心和反省，「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是其中之一。

批判理論是一種致力於高度科技化與工業化社會批判的理論。這種理論要求在總體上認識和理解社會生活、全面把握社會發展的歷史與未來。

「批判理論」此術語來自於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於1937年所發表的〈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一文，在該文中，霍克海默對「理論」下了一個定義：哲學與科學同源，但自笛卡兒起，哲學開始效法笛卡兒，即通過歸納演繹，把握世界秩序，「對於科學家，理論即某個大問題的命題總匯」，命題越簡潔，理論越完善。然而無論形式多完美，理論永遠只是假設，一旦它阻礙歷史發展，理論家就要對它加以改造。一切資產階級理論，無不夢想成為普世真理，譬如胡塞爾《邏輯哲學》，便將現代哲學歸結為「完整體系、統一推理」；社會學領域中，涂爾幹、韋伯的權威研究，也反映一種系統化科學追求。霍克海默認為，由於資本主義科技

進步，使理論日益抽象化，甚至化約為一種「純數學符號系統」。由此可見：科學原本偏執，我思（*cogito*）一貫狂妄。霍克海默指出，傳統理論的弊端於是完全暴露為：1.理論家迷信科學邏輯，排斥社會歷史。其孤立見解與狹隘認識，不斷被「提升為普遍範疇、世界精神、永恆的邏各斯（*logos*）」；2.順應資本主義發展，傳統理論一手標榜科學中立，一手征服自然、操縱經濟；3.晚期資本主義階段，傳統理論作為一種生產力、生產工具，乃至文化資本，對於社會現狀的鞏固有其重要的貢獻，乃至凝結為「物質化的意識形態」，即以一種精巧的「非歷史方式」，抵制社會變革、維護資本秩序。霍克海默認為，對傳統理論的批判，就必須落實在歷史進程中社會整體（*social totality*），包括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等脈絡上；資本主義號稱平等、自由、民主，社會批判理論的任務就是要透視事物的世界、穿透物底下的人，並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的假象。<sup>3</sup>

一般說來，批判理論有時也稱為批判的社會理論（*critical social theory*），有廣義與狹義兩種。狹義的批判理論是指法蘭克福（*The Frankfurt School*）的社會理論；而廣義的批判理論則包括：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研究等。它們都或多或少地具有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背景，具有理論批判的基本性格。<sup>4</sup>本文採廣義的批判理論觀點，但是，由於作者認為，批判理論從一開始以來的焦點乃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曾改變，因此，本文將有時也稱它為「社會批判理論」，在論述過程中也以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為主，其他流派的批判理論為輔。

<sup>3</sup>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 1972(68).曹衛東譯，〈傳統理論與批判理論〉，載曹衛東編，《霍克海默集》，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

<sup>4</sup> 金元浦，〈批判理論的再興—新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及其理論〉，《國外理論動態》2003年第10期。

整體而言，批判理論源起於對西方社會「現代性」(modernity)的反思。他們是接續著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胡塞爾等人對人文社會的運作提出「現代性的危機」的思想脈絡，流露出深刻的人文關懷；特別是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歐洲人文思想的衝擊，更進一步讓他們對傳統理性主義的進步史觀產生了強烈的質疑，也逼迫人們必須反思啟蒙運動以來所高舉的理性大纛。192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運用現代性與社會理論間的辯證，社會批判理論逐漸成形。縱使這些當代思想家以悲觀的論述檢視世界，然思潮隨著時空脈絡而漸進成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刺激下，社會批判理論各家的思想更加波瀾壯闊，蔚為當代思想奇觀。

當代批判理論的崛起乃是從各方面反思現代性及其結果。

首先是對傳統理論的反思，霍克海默就以為傳統理論活動特點「不管是像在歷史學和其他具體的描述性學科裏那樣，問題在於綜合大量資料並獲得普遍規律，學者特有的主動性（即理論活動）都是接受、改造實際知識，使它合理化」。<sup>5</sup>霍克海默看來，傳統理論是產生於現存社會制度並把現存社會制度作為自然的、永恆的東西接受下來的理論，它以維護現存社會制度為宗旨。它在對歷史事件加以解釋時，以為與操縱物理自然過程相似，都要求積累一大批知識，甚至是一套經過整理的假說提供的知識。由於積累知識的需要，理論的概念總會被絕對化，變成了具體化的意識形態範疇，而理論的批判功能卻因此與它絕緣了。<sup>6</sup>

在這個意義上，批判理論乃是對傳統理論的一種反動。

其次，批判理論源自於對當代社會發展的反思。霍克海默認為，社會批判

<sup>5</sup>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 1972(68).

<sup>6</sup> 論文網收集整理，〈「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www.66wen.com](http://www.66wen.com)

理論乃獨立於現存社會制度之外，把現存社會制度理解為一個系統的過程。在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批判中破壞一切既定的、事實的東西，證實它們的不真實性，從而加以否定，他說：「批判理論關注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它不在於揭示某些社會弊病，並提出救世良方，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現存社會結構的組織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絕承認現存社會結構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適宜的和富有價值的因素。<sup>7</sup>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批判理論乃是對當代社會的絕對否定。

第三，批判理論源自於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反思。社會批判理論的架構來自於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的理論，初始為研究馬克思主義，鼓勵階級鬥爭以求改變與解放。但西方勞工階級對資本主義抗爭的失敗，使得批判理論者包括法蘭克福學派霍克海默、阿多諾（H. Adorno）、馬庫色（H. Marcuse）、哈伯馬斯（J. Habermas）等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紛紛援引精神分析學、存在主義與當時的文化理論為馬克思主義作修正與補充；他們發現，傳統馬克思主義過於傾向社會結構「決定論」，社會批判理論者對這種機械論的、經濟決定的馬克思主義不滿意，認為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太過度用決定論的角度詮釋馬克思，未能對人的心理結構作深層分析，忽略人在社會中主觀意識的自主力量，因為影響個人思想意識的社會因素不只是經濟，而是文化。<sup>8</sup>也因為社會批判理論的重心在文化，所以有時亦被稱之為文化批判理論。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批判理論乃是當代條件下的新馬克思主義。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的是，批判理論雖然強調必須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理性進行反思，有些人如阿多諾甚至以否定的辯證觀點對現代性予以否定，然而，

---

<sup>7</sup> Max Horkheimer,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 1972(68).

<sup>8</sup> 李瑋宸，〈批判模式-Giroux之課程理論〉，引自《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www.nhu.edu.tw/~society/e-j/54/54-13.htm](http://www.nhu.edu.tw/~society/e-j/54/54-13.htm)

整體來說，他們仍然對理性有所期待，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即為明證，即便是阿多諾都還希冀「非辯證結構」的主體之自覺；換言之，他們認為，解決現代性危機的答案還是在於擁有可能性的「主體」，這展現在他們對文化的寄望上；社會批判理論由於反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特別強調文化面向的重要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就高揚了「主體」的地位，這也是社會批判理論對社會學非常重要的貢獻，如雷策爾（George Ritzer）古德曼（Douglas Goodman）就強調，社會批判理論著眼於主體性的探討，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化層面與個體的社會生活的「主體主觀性要素」—這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的黑格爾根源，部分學者強調，馬克思早期的作品顯露出此特性—這也使得批判理論著重於文化上層建築，而非經濟基礎建築。<sup>9</sup>

就批判理論而言，文化上層建築或許就是當代社會危機的解答了。

## 參、批判理論對科學意識型態的批判

法蘭克福學派是當代西方的一種社會哲學流派，這個學派積極關心社會理論問題和從事社會改造活動，特別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ideology)進行批判分析。它由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的領導成員在20世紀30-40年代初發展起來，最主要的成員有前述的霍克海默以及阿多諾、馬庫色、哈伯馬斯等人，儘管成員之間對文化社會的觀點並不是非常一致，但大多數主張對當代的社會文化進行反思與批判。

在哲學思想傳統上，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了青年黑格爾派施蒂納（M. Stirner）等人的傳統，並且受到叔本華（A. Schopenhauer）、尼采（Friedrich Wilhelm

---

<sup>9</sup> George Ritzer & Douglas Goodman, 柯朝欽、鄭祖邦譯，《社會學理論》(上)，台北，巨流出版社，2007年，第八章：各式各樣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Nietzsche) 和狄爾泰的非理性思想影響，他們也接受新康德主義、韋伯的「文化批判」和社會學思想的洗禮，採用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異化概念和盧卡奇 (Gyorgy Lukacs) 的「物化」(reification) 思想，<sup>10</sup>提出和建構了一套獨特的批判理論，旨在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統治的意識形態進行「徹底批判」。

在《否定的辯證法》(1966)一書中，阿多諾賦予「否定的辯證法」以否定任何肯定事物的普遍否定性的地位，認為它是一切可能的社會認識之基本原理，從而在哲學上為法蘭克福學派確定了認識論根據。<sup>11</sup>

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在歷史哲學、社會理論和社會認識上都與現代社會學具有緊密關係，它的社會理論觀點被看作是批判的社會學。作為一種社會理論觀點的批判理論，本身就是「工業社會」理論的一種特殊形式，其中包含著一個現代人如何看待這個社會以及如何行動的具體綱領。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論涉及意識形態的起源、形成和社會功能等諸多知識社會學問題，它本身又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知識社會學體系，並對當代有影響的知識社會學家曼海姆的觀點產生了影響。作為一種社會認識方法論，批判理論繼承了德國人文科學的精神傳統，它從創立之日起，就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社會學中占主

<sup>10</sup> 「物化」(德文中的 *Verdinglichung*) 這個概念是盧卡奇從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 (Commodity Fetishism) 理論發展出來的。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中的過程，在其中人類之間的關係 (即人類在市場裡商業交換的相遇)，顯得像是事物之間的關係 (因此人類之間的關係變成由似乎內含於所交換的商品裡的性質 (交換價值) 來支配)，這就是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概念。對盧卡奇而言，這種翻轉呈現在一切社會關係裡 (而非僅是經濟關係裡)，「物化指的是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轉化成物與物之間的關係」，例如在逐漸理性化與官僚化的社會裡，人際關係中那些有品質的、獨特的與主觀的部分都喪失了，因為現在是根據官僚與管理者的純粹量化考慮來治理。Georg Luka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1. Andrew Edger and Peter Sedgwick(eds.) *Key Concept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 NY: Routledge. 1999, pp.323-333.

<sup>11</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elte Schriften*, Bd. 6, Suhrkamp Verlag. 1997. 趙海峰著，《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張亮，〈時間川流中的“否定的辯證法”——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的歷史性注釋〉，載於《現代哲學》2002年第2期。

導地位的實證主義方法論。

在這些基本原理中，批判理論同社會理論，歸根究底把認識批判和文化批判看成一體兩面；它既提出了總體性的理論認識的要求，同時又從根本上否定了這種認識的可能性。阿多諾認為，「否定的辯證法」包含著對「虛假事物」的「肯定」陳述，包含著對人與自然的實在關係以及對歷史進程的「肯定」陳述。這樣，客觀的技術決定論的宿命觀點與主觀的唯意志論的自由觀點之間的二難抉擇便被引申為社會的辯證法。與實證主義社會理論針鋒相對，法蘭克福學派主張文化社會的批判理論，推崇批判，強調整合性研究。<sup>12</sup>

於是批判理論首先就針對影響對當代社會頗深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或科技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提出他們的反思。

韋伯將數學形式等自然科學範疇所具有的量化與預測等理性計算的手段，用於檢測生產力高度發展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人們自身的行為及後果是否合理的過程，叫做「工具理性」。其含義具體說，即通過實踐的途徑確認工具（手段）的有用性，從而追求物的最大價值的功效，為人的某種功利的實現服務。<sup>13</sup>在操作上，我們可以把「工具理性」視為一種科技理性的思維，它以既定目標（**Given Goal**）為主，行為處事以目標導向操作（**Goal-oriented Operation**）為原則，凡是與目標追求無關的其它因素應予以去除不加考慮，重視達到目標最有利的方方法，工具性的行為把手段關聯於目的，把技術關聯於目標，不去思考這些目標本身是否合理公正。這是一種源自當代社會生活的特定思維方式，因為在當代社會中，由於科學技術的發達，人類在工、商業生產活動中大量使用各種科學技術，由於科技的應用成就了利益的極大化，故應促成科學的相關技術全面地

<sup>12</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elte Schriften*, Bd. 6, Suhrkamp Verlag . 1997.

<sup>13</sup> 尼格爾·多德，陶傳進譯，《社會理論與現代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運用，於是，科技的發展不只在產業的運作上扮演有力的配角，在當代社會中，它更成為了發展的靈魂，支配著工業、商業的成長步伐。推動整個工具理性的發展的是科學技術的不斷推陳出新，所以有時我們也將它稱為「科技理性」。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在《啟蒙的辯證》中首先就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在當代社會中，理性已經被逐出道德與法律領域，因為當宗教一形而上世界觀的崩潰時，一切規範標準在唯一保留下來的科學權威面前都信譽掃地了，最後甚至連科學已經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同化了。<sup>14</sup>霍克海默語重心長地說：

啟蒙哲學以理性的名義攻擊宗教，其最終結果是，它所征服的不是教會，而是形而上學和客觀的理性概念本身，而這卻是它自己的一切努力的力量源泉。最後，理性作為把握事物的真正自然的機構，作為確定我們生活的主導原則的機構被看作是過時了。思辨和形而上學同義，形而上學與神話、信仰同義。人們會說，從古希臘開始直到今天的理性和啟蒙的歷史已經導致這樣一種狀況，理性這個詞本身受到了懷疑，並同時，顯示了某種神話的本質。<sup>15</sup>

馬庫色認為，因科技的發達與廣泛應用，在促進人類生活的種種進步的同時，「這些進步的成就對意識形態的控告或辯護都採取無所謂的態度；在它們的法庭面前，合理性的『虛假的意識』成了真正的意識」。<sup>16</sup>這種發達工業社會的產物，隨著科技的不斷高度發達，人們同強制他們接受的存在狀況愈來愈一致，並從中獲得了生命的發展和種種需要的滿足，表面上，這似乎是人的主體性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上，「這種實在構成了更為異化（alienation）的階段」；<sup>17</sup>工藝與科技的高度發展所造成的異化，即使人們在勞動中成為機器的附屬物，也

---

<sup>14</sup>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的辯證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

<sup>15</sup>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Fisher verlag, Frankfurt ammain, 1991, s.39.

<sup>16</sup>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p.11.

<sup>17</sup> Ibid.

使他們在生活中成了他們所需要的物的工具，「人們在自己的商品中認出了自己；他們在自己的汽車、高傳真的音響設備、疊層式的住宅和廚房設備中發現了自己的靈魂。」<sup>18</sup>

在馬庫色，現代科學技術中那種安身立命的東西，實質上就是科技理性。它雖然拓展了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和提高了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但人們的精神卻相應地萎縮了。人並沒有由此獲得解放，相反，它製造了一個使人對自然的統治和人被社會奴役同步增長的世界。這種科技理性也就是一種工具理性，它是操縱性的，最後必定導致手段目的化的結果。

在哲學上，阿多諾也在歐洲的形而上學傳統中找到技術統治的原型（Urform），他認為：「啟蒙運動從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形而上學的遺產中卻發現了某種古老的力量，並且對普遍的真理要求頂禮膜拜」；<sup>19</sup>他又說：「塵世的、歷史的東西是與傳統形而上學當作先驗性來強調的東西相關聯的」。<sup>20</sup>所以，現代性的本質在於，形而上學的目標成為了統治的工具，或者直接成為了統治權力本身。

阿多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進一步把認識論觀點與社會歷史觀點融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種激進的批判主義觀點，即科學和技術在現代工業社會中是一種「統治」和「意識形態」，它通過支配自然界而實現對人的支配。因此，要在工業社會和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制度內拯救人的精神價值是毫無希望的。<sup>21</sup>

不過，這並不是說阿多諾贊成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後現代主義對形而上學的批判過程中，首當其衝的是近代的主體性範疇，學者將這些批判概括為一句

<sup>18</sup> Ibid. p.9.

<sup>19</sup>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的辯證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

<sup>20</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elte Schriften*, Bd. 6, Suhrkamp Verlag . 1997., S. 354.

<sup>21</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elte Schriften*, Bd. 6, Suhrkamp Verlag . 1997. S. 320.

話，那就是「主體已死」。<sup>22</sup>這是繼尼采宣佈「上帝已死」之後的又一個深深震撼著形而上學基礎的口號。在宣佈了主體的死亡之後，當代社會也就進入了某種「無主體」的狀態。儘管否定辯證法對近代主體性哲學的批判之激烈程度並不亞於後現代主義，但「無主體」的狀態對阿多諾而言卻是無法想像的。在阿多諾看來，主體與客體乃是所有辯證法賴以展開的「非辯證結構」。<sup>23</sup>易言之，雖然阿多諾一再強調，要在工業社會中拯救人的靈魂是毫無希望的，但他還是始終在主體身上看到一絲微弱的光。

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理論家，還分析了現代文化對人類的影響。他們認為，目的理性或者工具理性逐漸消解了文化的批判與反思之功能。文化變成了純粹的消遣，失去了批判性特徵。阿多諾指出，文化特別是大眾文化，存在著以下嚴重的弊端：一是呈現商品化趨勢，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二是文化生產的

---

<sup>22</sup> 這是法國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從對權力的透視，進一步理解到「主體已死」的觀點。傅柯認為權力不單是一種遏制性的力量，因為權力也可以去創造和生產的，這往往是透過主體(subjectivity)的建構而實施的，而且這種權力往往更有效。傅柯相信「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體。……主體是在被奴役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在這意義上他宣告「主體已死」！所以「個人不是一個被權力的實施抓牢的預先給定的實體。其身份和特性是權力關係對身體、運動、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產物。」「個人是權力的運載工具，也是權力的主要效應，而不是權力實施的對象」。「恰好是一種理性化的過程構成了一個或多個主體。我把主體化稱為一種程序，通過這種程序，我們獲得了一個主體的構成。」因此傅柯催促我們去「拒絕接受我們自己[的身分]」我們應該拒絕現代社會加諸於我們身上的身分，它們都是壓迫性的，例如我們應該抗拒人文科學所宣告的「真理」、將我們主體化的現代政府形式和甚至似乎是自主的自我界定。我們要去提倡新的主體性形式。見福柯，嚴鋒譯，《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1997年，頁209、233、119。以及Michel Foucault, "The Subject and Power." *Afterword to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y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2, p.216.

<sup>23</sup> Theodor W. Adorno,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elte Schriften*, Bd. 6, Suhrkamp Verlag. 1997. S. 176阿多諾雖然抨擊當代社會的主體的非同一性，但主體性的殘餘仍在阿多諾的思想中揮之不去。經由客體優先性的提出，阿多諾並無意要取消主體；反而他視承認並尊重客體的優先性為達成主體與客體和解的前提。就像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指出的，對主體的鄉愁仍瀰漫在阿多諾的作品中，主體的範疇仍毫未被批判。Jean-François Lyotard, "Adorno come diavolo" in: *Intensitäten*, Berlin: Merve, 1978, s.46.36。

標準化、齊一化，扼殺了個性；三是文化逐漸演變成一種支配力量，具有了強制性。文化愈來愈屈從於工具理性的需要，以致於完全成為了一個「文化產業」，成為了即時滿足的工具。現代文化禁錮了人們的想像力，束縛了人的反思能力。在這種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在組織管理中也逐漸喪失了個人的主見和思考，變得越來越隨波逐流，沒有責任感，耽於聲色之滿足。<sup>24</sup>

哈伯馬斯深刻揭示了科技理性對人進行控制的表現形式，這種科學主義與客觀主義甚至進一步演變為「科學的政治觀」；所謂的科學的政治觀指的是，科學知識能夠客觀地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科學主義和科學的政治觀，實質上就是科技理性開始毫無限制地僭越到政治系統並進而侵入生活世界的具體體現。

當科技理性侵入了生活世界之後，科技理性就已經變異為現代的意識形態，它幾乎已成為我們判斷事物的準則，在日常生活中、在重要判斷裡、在政府決策中、在各種辯論中、在教科書上，它以各種樣態與形貌出現；霍克海默指出：「理性越失去力量，它就越容易受到意識形態和蠱惑人心的宣傳的支配。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人們也要遵循理性的原則，但是按照理性的原則在意識形態的支配下，甚至可以為農奴制度的合理性辯護」，<sup>25</sup>講的真是一針見血。

哈伯馬斯則從另一個側面來描繪科技理性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

一方面，與以前所有的意識形態比較起來，技術統治的意識是『更少具有意識形態性的』，因為它並不具有一種只顯現為掩蔽利益實現的不透明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作為今日佔統治地位的，更細緻的背景意識形態（Hintergrundideologie），使科學成了比舊的意識形態類型更難以抗拒的，更具

<sup>24</sup> T.Adorno ,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1.

<sup>25</sup>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Fisher verlag, Frankfurt ammain, 1991, s.45.

深遠影響的偶像。<sup>26</sup>

但是，哈伯馬斯認為，物的世界與人的世界是根本相異的。科技理性只適用於物的世界，如果強行將其擴張到整個世界，就勢必導致科技理性的獨斷和強制。

不過，哈伯馬斯認為，儘管這種悲劇發生了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但人類並不是束手無策了。哈伯馬斯面對這樣的困境引入「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來重建理性概念，以此抗衡並涵化「科技理性」。

溝通理性是哈伯馬斯的溝通行動理論的基石。溝通理性與以滿足個人欲望為目的的工具理性根本不同，它強調相互理解和溝通，強調批判和反思。溝通理性發生在日常生活領域，通過溝通行為表現出來，具有語言性、互主體性、程序性、開放性、可批判性等特點。溝通理性的提出，既是由於批判工具理性的普遍化，也是為了回應現代性危機，哈伯馬斯期望藉此能建構一個能全面統攝自然、社會和人的具有廣泛說服力的理論。

## 肆、批判理論對實證主義文化的批判

實證主義在二十世紀80年代風靡全世界，當時台灣學界深受影響，尤其是在殷海光的引介下，教育界無不奉為圭臬，以為講學、研究的準則，很多人並視之為人文社會領域的「科學」救星。<sup>27</sup>即便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台灣教育界對實證主義仍有莫名的崇拜，如學者仍認為實證主義「使我們有能力預測和控制學校歷程，經由一些資訊獲得支配法則，以使操縱某些變項，而獲得最

---

<sup>26</sup> 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89 (1968). pp.88-89.

<sup>27</sup> 章清語，《殷海光》，台北：東大，1996年，頁254。

佳的成果」。<sup>28</sup>社會批判理論即針對流行於當代社會科學領域的實證主義文化進行批判。

當代實證主義文化在學校教育上的表現形式為極力崇拜科學的科學主義（scientism）以及認定人有能力認識外在客觀世界的客觀主義（objectivism）。

科學主義是近代西方社會自然科學繁榮的產物，它的內涵豐富而複雜。雖然不同的研究者對科學主義表述的側重點不同，但其觀點大體都認同科學是處於至尊的地位，可以用來獲得真實可靠的知識。科學主義崇尚理性思維，信奉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相信科學和科學方法可以推廣至一切領域。並認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同其它自然物件一樣受自然規律的支配，任何事物原則上都不能存在於科學說明之外。總之，科學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科學崇拜，唯科學至上。受這種科學主義理性思維的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教育研究中的教學設計在美國的軍事與工業培訓中開始萌芽，隨後在美國著名的心理學家桑代克（E. L. Thorndike）、史金納（B. F. Skinner）等人的心理學實驗中發展起來。這一時期的學校教育以史金納的程式教學設計為主流，他認為教育學習就是一種「刺激—反應」的心理聯結，因而教育的主要任務就是促進這種聯結的產生，設計一個完整的、有次序、可控制的教育過程有利於知識的習得。基於這一思路，斯金納設計出了程式教學機器，把教學內容分成許多小單元，通過不斷強化引導學生一步一步地學習知識要點，從而完成整個教學內容的學習，達到預期的效果。可以看出，教學設計從一開始就與線性的、可預測、可控制的科學主義客觀認識論緊密相連。<sup>29</sup>

最近幾十年來，美國心理學家加涅（R. M. Gañe）在行為主義的基礎上，

<sup>28</sup> 陳國彥，《社會領域課程與教學》，台北，學富文化，2001年，頁167。

<sup>29</sup> 張燕麗、辛繼湘，〈科學主義教學設計方法論的反思〉，《教育與現代化》2009年第1期。

指出人的認識不是由外界刺激直接給予的，而是外界刺激和認知主體內部心理相互作用的結果，進而提出了認知資訊加工模式。加涅認為學習發生的條件有兩個：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並認為學習進行的內部心理過程和外部教學事件是相對應的。教育就是安排外部條件，促進學習內部過程，從而形成學生學習的內部動機。而且，不同的學習任務對應內外不同的學習條件。<sup>30</sup>根據這種觀點，教育設計的主要任務被認為是合理安排可靠的外部條件，以支持、激發和促進學習者內部條件的完善。圍繞這個核心思想進行的教學設計包括一系列的過程，具體步驟如下：（1）分析學習者特徵，（2）確定教學目標，（3）進行教學內容分析，（4）選擇和運用教學策略，（5）開發和選擇教學媒體，（6）進行形成性評量和總結性評量。<sup>31</sup>

至於客觀主義，依學者的見解，由於客觀主義認為世界是客觀存在的，這個客觀世界獨立於人之外，是不受人類經驗所支配、不以人類意志而轉移的，但是它可以為人們所認識。人類通過其思維來反映客觀現實，從而獲得客觀世界的意義，這種意義(即知識)根植於客觀世界，是客觀的、相對穩定的。這種知識的真偽存在客觀的判斷標準，即這種知識是否為真取決於其是否與客觀現實相符。正因為如此，客觀主義假定知識是可以通過教師或技術傳遞給學習者並被學習者獲得的，它因而強調知識的傳遞與接受，主張通過結構化的教學內容、授受式的教學方式以及單向式資訊傳遞手段等來設計教學活動。<sup>32</sup>

對於這樣的實證主義文化，批判理論有其獨到的批判。

事實上，對於實證主義社會科學的質疑是各種批判理論的核心特點，而幾

---

<sup>30</sup>加涅，布裡格斯，韋傑著·皮連生譯，《教學設計原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6。

<sup>31</sup>烏美娜·《教學設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頁53。

<sup>32</sup>張廣兵，〈教學設計範式重構：客觀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融合〉，《教書育人》2010年第6期。

乎所有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也都把對當代社會文化批判的矛頭指向了實證主義。

事實上是自啟蒙運動以來，實證主義的傾向逐漸在社會理論中占統治地位，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就明確認為，社會學應該成為一門「社會物理學」，它像自然科學描述「自然規律」一樣描述所謂「社會法則」(social law)。在社會批判理論看來，這種觀點把「社會現實」凍結為「本體論的冰塊」，把資本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sexism)以及對於自然的統治等模式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與必然的。<sup>33</sup>

批判理論者批判了實證主義的兩個預設：實證主義者相信透過一套科學方法可以用來研究所有的研究領域，這套科學方法是以物理學為所有其他學科確定性與精確性的標準，另外，實證主義者相信知識是內在中立的，這反過來造成「科學不應該為特定的社會行動辯護」。批判理論認為，前者實證主義將社會生活物化了，他們忽略的對「行動者」的注意，實證主義把人化約成「受到『自然力量』的被動實體」，對於知識中立的預設，他們認為，實證主義過度強調形式理性，卻未對目的本身從事相同的理性判斷，造成了政治的保守性。第三，社會批判理論對當代社會學的發展也有所不滿，認為當代社會學過於保守並且偏向科學主義，忽略的個體與社會的互動，這將使社會學無法「對政治變化提出有意義的回應」，當代的社會學理論在此情況下，不但沒有變成批判的工具或更新的酵素，反而變成了整合既存社會的一部分。<sup>34</sup>

批判理論稟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否定的傳統，批判實證主義的形而上學歷史觀，把歷史描述為可能性的領域。歷史雖然受過去與現在的制約，但不

---

<sup>33</sup> 金元浦，〈批判理論的再興—新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及其理論〉，《國外理論動態》2003年第10期。

<sup>34</sup> George Ritzer & Douglas Goodman，柯朝欽、鄭祖邦譯，《社會學理論》(上)第八章，台北，巨流出版社，2007年，頁394-395。

受過去與現在的支配。解放的基礎是人們對於歷史性的意識，而對於歷史性的意識即對於統治的非永恆性的意識。

霍克海默認為，實證主義將經驗科學看成是人類知識的惟一形態和最恰當的表述，這是一種徹頭徹尾的霸權表現。他指出，實證主義具有三個根本缺陷：1.人在實證主義的經驗研究中變成了物，人的主體性喪失殆盡。2.割裂事實與價值的聯繫，導致了知識與興趣、理智與情感的分裂。3.實證主義的經驗科學所揭示的世界只能是一種死板的、無意義的世界。<sup>35</sup>

阿多諾批判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的方法論，他認為不能將自然科學的模式移植到社會上來，實證主義本質上起到了為現實辯護的作用。在《啟蒙的辯證法》一書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自啟蒙運動以來整個理性進步過程已墮入實證主義思維模式的深淵，在現代工業社會中理性已經變成為奴役而不是為自由服務。據此，他們判定無論「高級」文化還是通俗文化都在執行著同樣的意識形態功能。這樣，在批判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時，法蘭克福學派進一步走上了對整個「意識形態的批判」。<sup>36</sup>

傳統的結構功能論從理論上的實證主義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立場出發把現代社會視為有機的整體。針對這一點，弗洛姆（Erich Fromm）在《健全的社會》和馬庫色對現代工業社會的論述中都指出，現代社會不是一個健全的機體，而是一個病態的機體，為此，不能把偏離這一社會的規範、標準的行為視為反常現象，反之應看成比病態社會標準更為正常和健康的現象。據此，他們指出西方社會學必須正視「價值重估」的問題。批判理論在詰問社會學將事實與價值分離即「價值中立」時，把反對實證主義發展到斷言現代科學技術是一切剝削、

---

<sup>35</sup> 陳蓓潔，〈霍克海默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及其存在論基礎〉，載《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卷第6期。李雋，〈霍克海默的社會批判理論及其思特色〉，《理論探索》2005年第6期。

<sup>36</sup>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啟蒙的辯證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4。

壓迫和奴役的最深刻根源，把反對自由主義推進到左派激進主義和極端主義的立場，充分表現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價值取向。<sup>37</sup>

哈伯馬斯批判實證主義時指出，實證主義文化為當代社會同時引發兩種合併症——科學主義與客觀主義，所謂的「科學主義」就是把自然科學知識看成是一種最客觀的知識典範，社會研究及其所有的知識都應以自然科學為楷模，易言之，「科學相信自己，認為我們可以不將科學視為諸種可能知識中的一種，而是直接將科學與知識同等視之」，也因為如此的心態科學知識跨越於其他知識之上，其他種知識被視為不平等對待，這時知識論被簡化為科學哲學，而科學哲學則成為科學方法論，完全忽視認識主體的能力；而客觀主義則是將世界當做是一個客觀自存的結構，其所包含的都是一些事實以及事實與事實之間的規律性關係，而科學知識所要描繪的就是這種事實的結構，因次真理成為命題與事實之間的相符合，然而這樣的思考卻無法透視科學研究的對象或者事實構成的問題，而將事實給絕對化。<sup>38</sup>

## 伍、台灣教育的科學危機

現代人動不動就把「科學」掛在嘴邊，認為科學無所不能，事實上，大約從十八世紀開始，歐洲就瀰漫著這種科學萬能觀，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對科學的崇拜似乎不減反增，這不僅表現在我們周遭的生活中，科學及其應用無所不在，也表現在當前的教育內容中，科學是教育的核心價值。

<sup>37</sup> 埃利希·弗洛姆，歐陽謙譯，《健全的社會》，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n, 1964.

<sup>38</sup> 吳坤銓，〈哈伯馬斯與學校教育〉《教師之友》1997年第38期，頁9-13。

科學很重要，但也不必到崇拜的地步，我們知道科學關係到國家的發展，但國家發展的好壞也不必然都繫於科學，特別在教育中，科學應有什麼樣恰當的分量以及教育者對科學應有何態度，更關係國家對科學是否過度依賴的重要關鍵。

我們都知道，德國是世界上科學發明最好的國家之一，德國的科學工藝也是深受人們信賴的產品，然而，正是在這樣的國家裡，在德國土生土長的法蘭克福學派對科學意識形態的反思才更具說服力。簡言之，科學並非無所不能，人們也不能對它過度依賴。

特別是在教育領域中，台灣學界深受實證主義的影響，當前教育中的各式各樣的評鑑都是此一科學教育思維下的產物。在各種評鑑中，第一要務便是確立一些能力指標，而這些能力指標的共同特徵便是；可量化。於是，課程需要評鑑，教學需要評鑑，教師需要評鑑，系所要評鑑，學校要校務評鑑，教務要評鑑，學務也要評鑑……評鑑無所不在，評鑑也無所不能，根據教育部的資料，大學總共需要接受的評鑑有三十幾項；我們教育彷彿評鑑就可解決所有的問題。例如最新一期《評鑑雙月刊》裡所指出的：

為追求高等的教學卓越發展，各國多以具體手段加強學校的教學績效，如從系統的觀點進行評鑑校院課程的績效(如各國持續改善的規範)，或者從過程(如申請ISO9002的品保系列標準認證)或學生學習的觀點著手(如國際工程教育認證系統或商管教育認證等)。此均彰顯出在新世紀中培育具有全球視野之高競爭力的學生，已成為各國高等教育突顯教育競爭力之努力方向。<sup>39</sup>

在編輯部所寫的〈確保優質學習環境建立從系所專業到整體校務發展的大學評鑑制度〉一文中，高教評鑑中心道出評鑑的本質內涵即：「結合『全面品質

---

<sup>39</sup> 林尚平，〈論技專校院所評鑑與國際專業教育認證機制〉，《評鑑雙月刊》2010年1月第23期，則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頁30。

管理』的概念，導入系所評鑑實施的認可機制，…我國的大學評鑑制度能以『品質保證』為依歸」。<sup>40</sup>這裡便把教育當作商品生產機制一般在管控所謂的「品質」。把學生當作產品、商品在生產、管控，這不只是在物化學生，而且事實上就走進哈伯馬斯所批判的實證主義在當代社會的合併症——科學主義與客觀主義，並且也是現象學宗師胡塞爾所說的造成歐洲科學危機的根源，即物理學的客觀主義及其演變形式實證主義。<sup>41</sup>

以上是過去幾年在台灣各大學裡捲起無數風雲的系所評鑑。從2009年下半年開始，教育部又開始預告於民國101年要在全國進行所謂「校務評鑑」，在評鑑原設計人王保進教授所寫的文章中，開宗明義便點出：「高等教育全球化、國際化及市場化已成為當前高等教育發展之重要趨勢」。在評鑑項目一：「學校自我定位」中，他再次強調：

學校自我定位在確保大學校院能確認本身之優勢、劣勢、轉機與危機，說明學校發展方向及重點特色，界定學校之自我定位，進而擬定校務發展計劃，再依據校務發展計劃，開設適當系所及學程，並訂定學生之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以符合教育國際化與市場化之趨勢，強化學校競爭力。<sup>42</sup>

這裡依然指出大學的「市場化」、「國際化」趨勢的不可違逆，「市場化」、「國際化」儼然是傳說中萬惡的罪魁「藏鏡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是用評鑑-懲罰的方式來迫使大學教育走向市場化。

另一方面，教育部也用獎勵的方式來鼓勵大學迎向市場化；在教育部官網上查到教育部有關「大學教學卓越計劃」，教育部解釋它的緣起：

<sup>40</sup>編輯部，〈確保優質學習環境建立從系所專業到整體校務發展的大學評鑑制度〉，《評鑑雙月刊》2010年1月第23期，則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頁8。

<sup>41</sup>曹典順，〈胡塞爾後期現象學方法簡論〉，《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一期。

<sup>42</sup>王保進，〈以「整體學校評鑑」(whole school evaluation)為精神之大學校務評鑑〉，《評鑑雙月刊》2010年1月第23期，則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頁20-21。

教育產出人才與企業期待不符，不在於科系專業是否配合產業，而是大學教育是否教導學生就業的核心能力。因此，教學內容及方法必須能促進學生的就業力，大學教育應開始注重學生的就業面需求，例如加強產學合作、提早實習等等。雖然大學無須為企業量身訂作產出人力，但在大學教育普及化發展的趨勢下，人才之培育應符合社會所需。<sup>43</sup>

實際上，在1980年代之後，美國就開始進行以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自由選校以及私立、營利導向學校的基礎，亦是在雷根與布希總統任內形成的，並在《公元兩千年的美國教育法案》當中，彰顯市場導向。當時他們之所以以市場導向進行教育改革，其最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認為政府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二是，認為由於國家的專賣獨佔缺乏市場競爭，是學校品質低落的主要原因。因此他們主張引進市場競爭的觀念，刺激學校間的競爭，並用以帶動教育革新。在美國教育改革中，市場機制受到相當的重視，因為市場機制同時可以解決經濟競爭力的危機以及國家沉重的負荷，也就是說，強調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一方面將可增進學校的效能，而市場導向的教育改革在另一方面也減少國家在教育中的投入，朝向分權的方向，以消費者偏好的選擇作為依據，形成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主導教育。簡單地說，教育改革的市場化，就是將企業經營的利潤與效率原則應用在教育，這便是強調市場競爭在教育中的重要，政府將不再運用管制和提供資源的方式來改革學校教育，而是透過市場力量來革新學校教育。<sup>44</sup>

學校教育走上市場化就是科技理性思維下的產物，因為，惟有用「市場」

---

<sup>43</sup> 引自教育部網站〈第二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http://www.edu.tw/files/list/B0039/附件-2第二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980312-.pdf>

<sup>44</sup> 李敦義，〈市場化理論分析及對台灣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啟示〉，《教育研究資訊》2000年8卷6期，頁62-88。

來檢驗學校教育才能直接地、客觀地看到它的辦學成效，在此，「市場」代表的是可計算的「量」，「市場」代表著評量的客觀性，「市場」代表著實用取向，「市場」代表了顧客導向，「市場」代表教育必須取悅迎合企業，「市場」代表著學生的核心能力指標，「市場」更代表著學生與他人的「競爭力」，「市場」也代表了國家生產和競爭力的提昇；簡言之，以市場化來檢驗學校教育純粹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同時也是實證主義的邏輯。在教育市場化的同時，我們也把學生商品化了。而這也正是批判理論學者所憂心的結果。

## 陸、結論

胡塞爾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警告歐洲有了科學危機，<sup>45</sup>百年來，西方各國致力在反省科學，特別在我們的普及教育體系中的科學內涵，可是在我們的教育中，主管全國教育的教育部卻似深恐我們的教育不夠科學，一再透過各種評鑑引導教育走上「科學」這條路，彷彿教育之中除了科學之外別無餘物。

在此一思維定勢底下，台灣學校教育走上市場化，用「市場」來檢驗學校教育及其辦學成效，在此，「市場」就是用來測量教育的「科學」指標；要言之，以市場化來檢驗學校教育純粹是資本主義的邏輯，同時也是實證主義的邏輯。台灣這種教育發展實在令人對國家的未來深感憂心。

---

<sup>45</sup> Edmund Husserl, translated by David Carr,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 參考書目

曹衛東編（2004）。《霍克海默集》。上海：遠東出版社。

George Ritzer & Douglas Goodman原著，柯朝欽、鄭祖邦譯（2007）。《社會學理論》（上）。台北，巨流出版社。

加涅、布裡格斯、韋傑原著，皮連生等譯（1999）。《教學設計原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尼格爾·多德原著，陶傳進譯（2000）。《社會理論與現代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烏美娜（1994）。《教學設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埃利希·弗洛姆原著，歐陽謙譯（1988）。《健全的社會》。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陳國彥（2001）。《社會領域課程與教學》。台北，學富文化。

章清語（1996）。《殷海光》。台北：東大。

福柯原著，嚴鋒譯（1997）。《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

霍克海默、阿道爾諾原著，渠敬東、曹衛東譯（2003）。《啟蒙的辯證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保進（2010）。〈以「整體學校評鑑」(whole school evaluation)為精神之大學校務評鑑〉。《評鑑雙月刊》，23，21-25。台北：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

林尚平（2010）。〈論技專校院系所評鑑與國際專業教育認證機制〉。《評鑑雙月刊》，23，30-33。台北：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

吳坤銓（1997）。〈哈伯馬斯與學校教育〉。《教師之友》，38，9-13。

李敦義（2000）。〈市場化理論分析及對台灣中小學教育改革的啟示〉。《教育研究資訊》，8（6），62-88。

- 曹典順（2006）。〈胡塞爾後期現象學方法簡論〉。《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8。
- 張燕麗、辛繼湘（2009）。〈科學主義教學設計的方法論反思〉。《教育與現代化》，1，18-23。
- 張亮（2002）。〈時間川流中的"否定的辯證法"--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的歷史性注釋〉。《現代哲學》，2，41-48。
- 張廣兵（2010）。〈教學設計範式重構：客觀主義與建構主義的融合〉。《教書育人》，6，43-45。
- 陳家齊（2010）。〈全球創新力 冰島第一 台灣全球第25〉。《經濟日報》(台北)，2010/3/6。
- 陳蓓潔（2005）。〈霍克海默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及其存在論基礎〉。《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6），30-34。
- 李雋（2005）。〈霍克海默的社會批判理論及其思想特色〉。《理論探索》，6，25-30。
- 編輯部（2010）。〈確保優質學習環境建立從系所專業到整體校務發展的大學評鑑制度〉。《評鑑雙月刊》，23，8-8。台北：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出版。
- Horkheimer, M. (1972). "Traditional and critical Theory".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The Seabury Pr.
- Horkheimer, M. (1991).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6, Fisher verlag, Frankfurt ammain.
- Marcuse, H. (1964). *One-dimensional Man*. Bosto: Beaconn.
- LuKacs, G. (1971). *History and class consiousnes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Andrew Edger and Peter Sedgwick(eds.)(1999). *Key Concept in Cultural Theory*.

London & NY: Routledge.

Adorno, T. W. (1997). *Negative Dialektik*, in *Gesamelte Schriften*, Bd. 6, Suhrkamp Verlag.

Foucault, M.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Afterword to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by Hubert L. Dreyfus and Paul Rabinow.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Adorno, T. W. (1991). *The Culture Industry: 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Jean-François Lyotard, J. F. (1978). "Adorno come diavolo" in: *Intensität.*, Berlin: Merve.

Habermas, J. (1989/1968).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 網路資料：

趙海峰（2003）。《阿多諾“否定的辯證法”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網址：[baike.baidu.com/view/714911.htm](http://baike.baidu.com/view/714911.htm)

論文網收集整理，〈「社會批判理論」是「批判」的終結〉，[www.66wen.com](http://www.66wen.com)

金元浦（2003）。〈批判理論的再興—新一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家及其理論〉。《國外理論動態》，10，324-331。網址：  
<http://www.sociology2010.cass.cn/upload/2014/06/d20140615212321403.pdf>

李瑋宸（2006）。〈批判模式-Giroux之課程理論〉，引自《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

網址：[www.nhu.edu.tw/~society/e-j/54/54-13.htm](http://www.nhu.edu.tw/~society/e-j/54/54-13.htm)

教育部網站。〈第二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http://www.edu.tw/files/list/B0039/>

附件-2第二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980312-.pdf

## 研究論文

# 從分裂到統一：德國家庭政策的轉型與 啟示<sup>\*</sup>

陳素梅

國立東華大學社會學系暨碩士班助理教授

---

收稿日期：2013 年 10 月 17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5 月 13 日。

<sup>\*</sup>本研究感謝行政院科技部（國科會）的補助。研究計畫編號：NSC 98-2410-H-259-041-MY2。同時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 中文摘要

德國統一以前，前西德與前東德在各自的意識形態下，有著截然不同的家庭政策。前西德家庭政策支持「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是非常典型的「高度男性養家模式（strong breadwinner model）」。前東德則主張勞動不分性別，是「雙薪家庭模式（dual-earner model）」。兩德統一以後，德東德西家庭政策一致統一在保守政府下。這些年來隨著德國人口老化的壓力，以及紅綠聯盟取代保守的科爾（Kohl）政府開始執政，這種保守的家庭政策才在 1998 年開始有較明顯的轉型。本論文以文獻研究法，整理戰後迄今德國家庭政策的發展。首先分述前東西德的意識形態與家庭政策屬性；其次整理兩德在戰後到兩德統一、統一後直到 1998 年政黨輪替，最後一個時期是從 1998 年以後施洛德（Schroeder）主導的紅綠聯盟到 2005 年迄今主政的梅克爾（Merkel）政府以來德國家庭政策的發展。透過上述三個時期家庭政策的整理，除了發現德國家庭政策從「高度的男性養家模式」轉型為「雙薪家庭模式」的發展外，也想透過觀察德國各種政策措施的應用、組合與改變，了解不同政策工具（instruments）的政策用意，為國內政策之參考。

**關鍵字：**西德家庭政策、東德家庭政策、德國家庭政策改革、男性養家模式、雙薪家庭模式

# **From Division to Reunification :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Policy in Germany and it's Lesson**

Su-Mei Che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ssistant Professor

## **Abstract**

Before the German Reunification, two kinds of paradigms of family policy could be observed in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FRG; West-Germany) and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 East-Germany). In FRG the paradigm of family policy is the “strong male breadwinner model” under the ideology of welfare capitalism; in GDR, the “dual-earner model” under the ideology of socialism. Since the German Reunification, the family policy is ruled under the conservative party. The fertility rate in Germany has been stagnated in a very low level. The problem of the aged society forced the German government to reflect the conservative family polic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family policy under the Kohl Regime hasn't changed much until 1998. Since 1998 Red-Green Coalition has begun to reform the family policy. This method of this research is literary research. First, the 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policy in GRD and FRG will be introduced. After that, three periods of time will be observed: from the time after World War II to German Reunification; from German Reunification to 1998; from 1998 to recent years. From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re is a clear paradigm shift from “strong male breadwinner model” to “dual-earner model”. In this analysis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instruments of the family policy can be observed. Furthermore, the policy of Taiwan might can learn from the German experience.

**Keywords: family policy in GDR, family policy in FRG, reform of family policy in Germany, male breadwinner model, dual-earner model**

## 壹、前言：家庭政策重要性的提升

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類型中，德國往往被視為保守型社會福利國家的代表。德國的保守特徵，除了在其社會福利設計中保留了以職業為主軸所造成社會地位差異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元素就在於以政策措施支持傳統家庭模式，也就是「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性別分工。德國的社會福利設計從二次大戰以來就以保險、稅賦、各種生育相關政策，來支持傳統家庭「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在國家、企業與工会的協調下，為了使一般勞工階級能夠享有家庭主婦式婚姻（Hausfrauenehe），建立了以男性全職勞工領取家庭薪資（family wage），享有典型勞動條件（Normale Arbeitsverhaeltnis）並且兼顧家庭成員福祉的社會安全制度（陳素梅，2014）。因此，Jane Lewis & Ilona Ostner（1994）把德國的家庭政策模式定位為是「高度的男性養家模式」（strong male breadwinner model）。

德國這種「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開始受到質疑，尤其受到女性主義者的批判。當時德國社會同時也經歷了種種社會變遷，如家庭組成模式的多元化、婦女教育水準提高、個人主義盛行等，同時德國生育率下降的趨勢從 1968 年學生運動後更為明顯。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男性養家模式的基礎開始動搖（Beckmann, 2008; Kaufmann, 1997），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單身家戶及無子女現象（Kinderlosigkeit）有增無減（Baecker et al., 2010），德國政治決策者才開始正視少子女化的問題以及婦女社會角色改變的事實。也因此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德國政府雖然致力於削減福利項目，卻對於支持家庭需要的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有增無減。本論文主要觀察德國家庭政策中直接與性別分工、生育及托育等相關措施，簡述如下。

一、就經濟面向上，大致項目包括：

(一) 家庭給付制度：包含產假津貼、育兒津貼、母職／父職／親職假津貼等。

(二) 家庭稅賦上的優惠：如夫妻所得分攤申報所得稅 (Ehegattensplitting)、扶養子女扣除額 (Kinderfreibetrag) 等。

二、就受雇員工因生育子女可申請之長假，如：

(一) 產假：提供員工因分娩所休的假，一般包括產前與產後休假。

(二) 育嬰(兒)假／母職／父職／親職假：指接續產假，從孩子出生到一定年齡內，父母為親自照顧幼兒可提出的休假申請。有稱為育嬰(兒)假、親職假，限女性申請者稱為母職假；為促進性別平等，只能父親申請者為父職假或父親月。

三、托育制度的建構：對不同年齡層的子代，例如對三歲以下、三歲到六歲，以及小學以上的未成年子代，提供托兒、後續各階段的教育，以及種種休閒活動安排之類的日間服務。

本論文以文獻研究法，分析整理書籍、論文、統計資料以及報章雜誌等文獻，試圖回顧德國從二次大戰後到近年家庭政策的發展。除了想找出德國家庭政策發展的軌跡外，也藉介紹前東德的家庭政策，增補一點國內對社會主義下家庭政策的文獻。此外，透過前東、西德家庭政策的發展與比較，觀察其實施特定家庭福利措施的政策意涵，也可以提供國內制訂相關家庭福利措施的參考。

主要論述分成三個時期進行觀察：

首先，戰後到兩德統一，從兩德分裂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兩地區家庭政策發展；

其次，兩德统一到 1998 年，除了介紹這段期間的家庭政策外，也會特別觀察德東地區受到德國保守家庭政策治理所受到的衝擊；

最後，觀察 1998 年開始經過由施若德（Schroeder）擔任總理的紅綠聯盟政府到近年梅克爾（Merkel）執政所推出的各項家庭政策改革後所代表的意義。

筆者選擇 1998 年為分界點主要是因為在紅綠聯盟執政以後，德國的家庭政策才有比較明顯轉變使然。本論文的研究目的除了整理德國家庭政策的歷史發展外，也期望在尋求這個發展軌跡的同時，也可以觀察不同福利措施的政策意涵，或可做為台灣的參考。

## 貳、兩德的意識形態與家庭政策屬性

要談兩德分裂時的家庭政策，必須探究其意識形態。在此之前納粹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家庭主婦婚姻制度雖然在廿世紀初的德國即有法令規定（Kaufmann, 1997; 2002），然而一直到納粹政權才深入德國社會。納粹強調家庭主婦及母親的社會角色，把母職視為婦女服務國家及種族延續的義務，至於男性除了生物上繁衍的功能外，並不需要有太多為人父的社會角色（Czarnowski, 1991）。基於優生學，納粹政權強烈介入家庭生活，以種族繁衍的角度要求婦女做適婚篩檢（Eheeingungstest），未能通過篩檢者必須強制節育（Zwangssterilisationen）。對納粹來說，這種家庭主婦式婚姻的生物意義遠大於社會意義。納粹實施優生學政策的歷史記憶，使戰後西德政府視人口政策為禁忌，但傳統家庭性別分工繼續貫徹於西德社會；然而東德則拒絕這種保守的家庭主婦式婚姻，致力於解放婦女。

就意識形態而言，前西德政府為資本主義制度，尊重市場經濟、保護家庭的私領域與私有財產；前東德政府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由國家主導教育、資源分配與生產計畫，主張勞動力不分性別，揚棄傳統家庭性別分工，因此兩德各自採行了截然不同的家庭政策。

## 一、前西德的意識形態與保守的家庭政策

二次大戰後，前西德政府一方面以納粹為戒，一方面與前東德政府的社會主義路線做區隔，不介入家庭這個私領域。惟有在家庭政策上，支持有合法婚姻關係的（marriage-based）男性養家（male-breadwinner）家庭模式。這種家庭政策的屬性多半由於戰後基督教聯合黨：基督教民主黨（CDU）基督教社會黨（CSU）長期執政，受到天主教教義的影響，重視保守的傳統家庭主義與親屬原則。

基於上述種種意識形態的影響，再加上政府及勞資雙方對於政治理念有著一定程度的共識，願意共同支持合法婚姻（marriage-based）下男性養家模式，使男性全職勞工可以賺取足以養家的家庭薪資（family wage），家庭主婦及未成年子女也可經由全職工作的丈夫／父親，取得相應的社會保險保障、政府提供的相關津貼，建立男女平等但互異的社會角色（Gleichstellung in der Differenz）（Pfau-Effinger, 2000）。此外，在所得稅申報時，也准許夫妻可以平均分攤所得（Ehegattensplitting），讓所得高的一方可以把所得分攤到低的一方，合法避稅，以此形成租稅誘因，鼓勵婦女留在家中，以家務勞動與教養子女為生活重心。

在天主教意識形態影響下，德國的社會福利重視家庭主義（familism），親屬原則（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為福利給付賦與資格的基準（welfare state entitlement），例如，夫妻、父母、親子關係（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德國法令明文規定，法定夫／妻以及父母／子女，終生對彼此有照顧的義務。一方面是當時個人主義還未盛行，一般人仍抱持集體主義的態度，相信權利來自義務，而義務優先於個人權利；另一方面，當初立法的目的在於保護沒有工

作的妻子及婚生子女免於受丈夫或父親的棄養之害。受到這種家庭主義的影響造成西德在政策上會支持傳統家庭，同時強化夫妻／父母對家庭的權利與責任。

整體來說，前西德的家庭政策，除了以家庭薪資維持家庭經濟生活外，家庭主婦及婚生子女也能透過從事全職工作的丈夫取得社會保險的保障。此外，為了加強女性留在家中，無償提供照顧家庭及教養子女的誘因，前西德的家庭政策偏重提供稅賦上的減免，並輔以家庭相關的移轉性支出來支持家庭，如育兒津貼等。也因此，政府較不傾向於提供家庭幼兒托育等服務。前西德這種建立在性別分工的家庭政策會強化妻子對丈夫在經濟上與福利上的依賴，與前東德的家庭政策迥然不同。

## 二、前東德的意識形態與社會主義式家庭政策

德東地區受社會主義影響，也有意與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切割，拒絕保守的家庭主婦形象。在揚棄私有財產制的同時，也使婦女從布爾喬亞的家庭制度中的家奴地位、從對丈夫經濟依賴中解放出來。

前東德《憲法》定訂男女平權。婦女加入勞動生產時，是解放與平權的表徵（Kaufmann, 2006）。為實踐平權，婦女跟男人一樣都得參與社會生產，取得經濟獨立。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不論男女都是社會重要的勞動力，每個人都權工作，也有義務工作。對社會主義制度來說，勞工的權利並不具有資本福利國家那種失業時給予生存保障的權利。勞動並沒有權利義務之分，只要是勞動人口就有權利也義務勞動，失業不工作是不被允許的（Schrader, 1995）。

為了使婦女能生育子女、有經濟獨立、不依賴先生，前東德的政府與工作單位取代傳統資本主義社會中先生及父親養家的角色，成為前東德婦女經濟上重要的支持來源。由於家庭內，父母大半終生從事全職工作，婚姻與家庭受到

國家的保護（Beckmann, 2008）。政府提供兒童照顧及其他服務來支持家庭，可謂是供給國家（provider state）。國家取代過去家庭功能，同時扮演親職以及養家者的角色，由於取消了私有財產制，資產形式的傳統家庭模式也被超越，教養下一代是公共的任務（Kaufmann, 2006）。由於女性同時是勞動者也是母親，為了解決婦女全職工作，又得生養子女的問題，前東德政府逐漸擴充適合各種年齡子女的托兒與教育服務，建立各種育樂活動中心，提供學童寒暑假期間的休閒活動。如此不但能依照社會主義教義養育下一代，同時也能使婦女安心工作。整個社會服務就是針對育有子女的雙薪家庭的需求來步局的（Fuhrmann, 2005）。前東德政府以政策立法支持子女教育及母職負擔，保障婦女的權利，使婦女免於經濟上依賴男性伴侶。在稅賦上也是以個別徵收（Individualbesteuerung）為原則（Beckmann, 2008）。因此，前東德的母親及孩子的工作與生活相當程度依賴國家及工作單位的支持。不像前西德家庭政策會強化婦女及孩子對工作養家的丈夫／父親的依賴。

### 參、兩德統一前，前西德與前東德家庭政策比較

在本節討論兩德統一以前家庭政策比較中，會把時期概分為（一）戰後到一九七〇年代；（二）一九七〇年代到兩德統一兩大時期。以一九七〇年代作分野一方面是因為戰後嬰兒潮到一九七〇年代正好是成家立業的階段，另一方面兩德在一九七〇年代，尤其是全球經濟大恐慌時期，生育率明顯下降。對於這種改變兩德的政府後續反應也不同，因此在分析上以一九七〇年代作為階段性的分野。

## 一、前西德

### （一）戰後到一九七〇年代社會與家庭政策的發展

前西德的家庭政策是建立在布爾喬亞那種家庭主婦式婚姻之上，支持男性養家模式（Male breadwinner model）。早在廿世紀初，這種家庭主婦式婚姻有法令依據（Kaufmann, 1997; 2002）。戰後成立家庭部（Familienministerium）並非為了達成特定的政策目標，而是為了表示國家對於家庭與合法婚姻的重視（Peil, 1996）。

1949 年為減輕傳統家庭的負擔以提供稅賦減免的方式為主要政策工具。如申報所得稅時，夫妻所得分攤申報（Ehegattensplitting），有利於家庭主婦式婚姻或婦女只在外兼職的家庭合法避稅。此外還有扶養子女免稅扣除額（Kinderfreibetrag）以確保子女最低生活保障。此外，也增設育兒津貼（Kindergeld）來支持多子女家庭。

最早發放育兒津貼的政府可回溯到第三帝國時期，目的在促進生育（Fischer, 2008）。二次大戰以後，由基督教聯合黨與自由民主黨（FDP）執政。在第一任總理阿德瑙爾（Adenauer）的領導下，再度開始發放育兒津貼（Kindergeld）。

由於 1954 年，男性從事全職工作者，其領取的家庭薪資是以扶養妻子及兩小孩為基準使然（Kaufmann, 1997）。因此當年的育兒津貼規定從第三胎婚生子才能開始請領，目的在減輕多子女家庭的經濟負擔。由於前西德家庭政策本來就在支持合法的傳統家庭主婦式婚姻，因此兒童托育服務非常有限。

在二次大戰剛結束期間，由於戰爭期間許多婦女取代男丁則投入生產行列，婦女就業並不罕見。Opielka（2002）指出，家庭主婦式婚姻模式對於當時職業婦女有其吸引力，因為婦女只要專注於社會分工下的家庭領域。尤其對於

那些在戰爭時期從事生產工作的婦女而言，經過戰爭那段動亂與毀滅期，婦女也想從家庭世界中重拾個人生活的正常與穩定性（Kolinsky, 1989）。再者家庭主婦式婚姻與男性勞工賺取家庭薪資的設計具有減少低階層婦女就業與家庭的雙重負擔（Kaufmann, 2002）。換言之，這樣的安排合乎當時文化價值，也受到婦女的支持。

此外，保守的西德社會存在著一種「文化家庭主義（cultural familism）」（Huinink, 2002），普遍認為孩子在三歲以前應該由母親親自照顧。有三歲以下子女的母親仍全職工作並不被大多數人接受，認為是社會底層的行徑。因此西德已婚婦女一旦有了子女大半都會暫時離職或完全放棄工作（Pfau-Effinger, 2000）。對於選擇暫時離職的母親，保守政府在 1951 年實施《保護母親法》（Mutterschutzgesetz），明訂職業婦女懷孕期間不得值夜班，不可被解雇。從分娩前 6 周到分娩後 6 周不准工作，這段離職 12 周期間，工作權受到保障，也能領取所得相關的給付。

一九五〇及一九六〇年代堪稱婚姻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Marriage）（Kuijsten, 2002）。因此，在戰後到一九六〇年代的西德社會中，建立在家庭主婦婚姻上的傳統家庭模式，不論在政治方針上或是在社會實踐上都居於主流地位。即使在前西德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勞動力非常缺乏，因而急需婦女投入勞動市場時，前西德政府也只支持公部門及其他經濟領域為婦女增設兼職工作，以為婦女能兼顧子女教養的工作（Auth, 2002）。

然而，這種保守的家庭觀念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開始產生動搖。自由化、民主化、國民所得提高、中產階級增加、社會安全制度穩固，再加上婦女教育水準的提高，年輕世代正經歷著一種從集體主體轉向追求自我實現的價值變遷（Klages, 1998）。開放的性別關係，高漲的個人主義使過去那種為家庭及生兒育女犧牲奉獻的傳統婦女角色受到質疑（陳素梅，2014）。1968 年以來，女權

運動者主張只有透過全職工作，婦女才能獲得解放。

面對這種改變，思想保守的政治決策者依然抱持著傳統家庭政策，對於職業婦女生育相關的福利措施只是把原本 12 周有「產假津貼」(Mutterschaftsgeld) 的產假 (Mutterschaftsurlaub) 延長為 14 周。

隨著社會與文化價值的變遷，再加上避孕方法的普及，前西德社會在 1968 年以後，生育率明顯下降，德國一般稱之為「避孕藥轉折」(Pillenknick)(Dienel, 2007)。再加上一九七〇年代經濟大恐慌與就業市場的改變，生育率再度下降。以德國聯邦統計處公佈的資料來看，1970 年婦女生育率還有 2.02，到了 1975 降到 1.44。

## (二) 一九七〇年代到兩德統一時期

前西德政府家庭政策的保守觀念即使在社民黨 (SPD) 這個偏向社會主義立場的政黨執政期間 (1969-1982) 亦然可見一斑。社民黨政府雖然主張男女平權，但面對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提高的現象卻顯現出矛盾的政策立場。尤其在一九七〇年代西德社會同時存在失業率提高、婦女就業意願提升、生育率下降的現象，社民黨政府並沒有像同期北歐國家那樣以擴建托育機構、創造婦女就業機會的方式回應，反而跟保守政黨一樣，想透過財稅及津貼的工具，期望婦女放棄工作。觀念保守的政客沒有察覺到文化價值的轉變，也因此錯失了支持婦女就業、擴建托育機構的時機。此外，因為納粹德國強調日耳曼人優良血統，實施優生政策所造成的負面經驗，使得前西德主政者大半避而不談人口政策。直到一九八〇年代基督教民主黨才打破政治禁忌，提出人口議題。然而在家庭政策上，保守的科爾 (Kohl) 政府並沒有做出太大幅度的變革。

回顧在一九七〇年代到兩德統一以前，前西德政府為照顧傳統家庭、鼓勵生育所使用的政策工具 (instrument) 大致分類整理如下：

第一在租稅上，著重在夫妻所得可分攤再報稅的合法節稅措施（Ehegattinsplitting）以及扶養子女免稅扣除額（Kinderfreibetrag）的提升。這兩者尤其有利於高所得的傳統家庭主婦式婚姻。只是前者的節稅優惠，不論夫妻有無子女皆適用，並無助於提高生育率。至於扶養子女免稅扣除額基本上是保守-自由政府家庭政策的核心工具（Muench, 1990），社民黨並不支持。雖然一九七〇年代被社民黨刪除後，1982 年保守政府執政就重新恢復。當 1985 年生育率降到歷史新低 1.28 時，保守政黨更於 1986 年把每名子女的免稅扣除額從 221 歐元大幅提高到 1,270 歐元。由於前西德稅制採累進稅率，因此子女免稅扣除額的措施產生分配不均的效果，高所得家庭從中獲取的利益較多（Daly, 2000）。而所得偏低家庭則無從獲得租稅利益。因此，保守政府又針對這些無法獲得稅賦優惠的家庭給予補充育兒津貼（supplemental child allowance），也就是下面要介紹的現金給付措施。

第二種，現金給付的措施，以育兒津貼為主。在 1970 年育兒津貼本來是為減輕多子女家庭的育兒負擔而設，從第二胎才可以申請，有所得調查。因此，社會民主黨為首的政府在 1975 年進行育兒津貼改革（Kindergeldreform）。第一步便是完全刪減所得稅中扶養子女扣除額。從第一胎就可以申請育兒津貼，取消所得調查。育兒津貼的額度自實施以來大致都呈增加的趨勢（Gelach, 2004; Bleses & Seeleib-Kaiser, 2004）。一方面支持多子女家庭，一方面也試圖透過提高津貼，鼓勵生育。後來保守政府恢復扶養子女扣除額的同時也繼續發給育兒津貼（Kindergeld）。不過，為了控制政府支出，除了第一胎為普遍給付的育兒津貼外，對申請第二胎及第三胎以上子女之育兒津貼之家庭，需經過所得調查（Bleses & Seeleib-Kaiser, 2004）。科爾政府常常並且育兒津貼與扶養子女免稅扣除額，這種複雜的稅賦加上津貼的制度一直到 1996 年才得以簡化（Bleses & Seeleib-Kaiser, 2004）。

第三在支持受雇員工為養育子女申請有給付親職假 (paid leave) 的權利方面，西德政府雖然不想鼓勵婦女就業，但面對職業婦女增加的現象，1979 年終於引進了只准職業婦女申請的母職假 (Mutterschaftsurlaub, maternity leave) 與母職津貼 (Mutterschaftsgeld, maternity leave benefit)。同時保障申請的職業婦女法定的健保、失業、年金保險年資，以及工作保障 (Vornmoor, 2003)。一開始唯有受雇的職業婦女才權利請領母職假／津貼，自營業者及家庭主婦不在此列 (Auth, 2002)。

1986 年科爾政府改革母職假，以「育兒假」(Erziehungsurlaub, parental leave) 及「育嬰假津貼」(Erziehungsgeld, parental benefit)，也可稱為親職假與親職津貼，取代原有的母職假與母職津貼。由於只要法定夫妻雙方皆在職，父親或母親都有權在孩子出生後向公司申請最長 10 個月的育兒假。扶養子女的時間可以併入年金年資 (child-rearing credits)。就其象徵意義來看，一方面承認婦女照顧子女的社會貢獻，另一方面也是科爾政府修正「男性養家模式」的開始。不過，保守政府把最初 6 個月的親職津貼改為普遍式給付，不論有無工作之父母皆可請領，使職業婦女與家庭主婦都有權利取得親職津貼。在此依然可以看到保守政府保護家庭主婦式婚姻的企圖。從第七個月以後 4 個月的育兒津貼改為所得相關，有所得調查的選擇式津貼。1989 年再次修定親職假，准許父母兼職，但每周不得超過 18 個小時 (Muench, 1990; Beckmann, 2008)。

整體而言，戰後到兩德統一以前，前西德的家庭政策以稅賦及移轉性所得為主要工具，對建立在合法婚姻關係上的傳統家庭予以保護。育兒假雖然規定在職的父親也有權申請，似乎具有改革「男性養家模式」的企圖，但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一方面基於文化家庭主義的壓力，另一方面基於家庭經濟的需求，實施結果多半還是婦女離職，回家照顧幼兒。再加上，前西德設置托育機構的目的是基於三歲以上兒童教育之需要，並非為了協助婦女就業，也缺乏三

歲以下幼兒的托育機構。因此整體托育系統並不利於母親就業。就科爾政府這段時期的生育率來看，1985 年生育率降到最低點 1.28，後來生育率雖然略為提高，但到了 1990 年也只到 1.45。

介紹完戰後到兩德統一階段前西德的發展後，接下來觀察同一時期前東德家庭政策如何推展。

## 二、前東德

### （一）戰後到一九七〇年代

前東德政府受到蘇俄社會主義的影響，揚棄布爾喬亞階級男女性別分工的家庭模式。為了使婦女從家庭中解放，婦女終生從事全職工作是權利，也是義務，從而使婦女經濟獨立，不再依賴丈夫。在社會主義政策下，婦女是工作者也是母親。政府及其工作單位是婦女經濟上重要的支持來源，取代傳統資本主義社會中先生及父親的角色。儘管如此，在前東德，全職工作的婦女平均薪資仍然低於男性同事，只是透過教育與工作資格的取得，使得婦女有機會爭取到跟男人一樣的薪資與晉升機會。企業也願意提供婦女在職訓練的機會，以增加勞動力。以婦女勞動參與率來看，1950 年前東德大約有 52% 婦女就業，到了 1975 年婦女勞動參與率達 85%。一九七〇年代起，前東德男女在教育程度與專業資格取得上相近（Merkel, 1994）。

由於男女都從事全職工作，因此前東德的家庭類型以「雙薪家庭模式」為主。雖然前東德在 1964 年政府基於男女平權的考量，立法規定子女教育與家務是夫妻雙方共同的責任，不過在生活實踐中，婦女依然仍是家庭的主要照顧者，不過夫妻雙方家庭勞務的分工比前西德平均。一九六〇年代前西德大概只有 35.9% 的男性會分擔家務。在前東德則有 72.8%。不過，前東德男性每周大約只

花 7 個小時幫忙家務，再加上，早期前東德政府只提供職業婦女幾天「家事假」（Haushaltstag）以便整理家務。家務，尤其是子女照顧工作基本上還是由婦女承擔。也許出於家庭與工作的雙重負擔（Beckmann, 2008），也許也出於避孕方法的普遍化，再加上經濟大恐慌的衝擊，前東德生育率，跟前西德一樣，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現下降的趨勢，從 1970 年的 2.23 降到 1975 的 1.54。

## （二）一九七〇年代到兩德統一

跟前西德政府不同的是，前東德政府為了恢復家庭再生產的功能，於 1972 年把家庭政策與社會政策視為政策規畫的重點項目（Herden & Muenz, 1998），以減輕婦女同時擔任勞動者與母親的負擔。於是針對不同族群與問題而產生的相應政策於一九七〇年代展開。

如針對特定的族群問題，如學生媽媽（student-mothers）提出特別專案，協助兼顧就學與育兒，同時也避免婦女因接受高等教育而延遲生育的問題；又例如隨著非婚生子問題的出現，前東德政府努力防止非婚生子遭到社會烙印，確保所有新生兒都能獲得同樣的社會照顧，順利成長。

跟前西德政府一樣，前東德也為生育子女者提供現金給付。在生育相關的有給休假方面，一樣也提供產假（Schwangerschafts- und Wochenurlaub）等。1976 年開始對於生育第二胎的婦女提供「育嬰年」（Babyjahr）及其他津貼服務，以提高生育率。不過，前東德政府當初育嬰假只准母親申請，可見婦女扮演著照顧者的角色（Schaeffgen, 2000）。男性家務與子女照顧參與依然有限。以 1974-1985 年為例，平時會參與家務勞動男性從 26.4% 提高到 30.1%，會參與子女教養工作的男性則從 24.1% 只提高到 25.8%（Manz & Winkler, 1988）。換言之，前東德婦女家務與照顧工作的減輕主要來自政府提供的服務。

前東德政府尤其致力於建立普遍而優惠的托育照顧服務。首先提供婦女 20 周以上的小嬰兒照顧服務，使婦女早日重返就業市場（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由此也可以看出，德東婦女沒有像德西婦女那種文化家庭主義的包袱。

其次，前東德政府為支持婦女從事全職工作，托育機構相當普遍。針對三歲以下幼兒提供的托兒機構的覆蓋率約為 80%，幼稚園的覆蓋率為 95%，小學安親班則為 80%。為配合一般全職工作上下班時間，托兒所及幼稚園開放時間 6:00 – 18:00。必要時，周六也可破例提供服務。小學上課時間雖類似前西德，只有半天班，同時也有寒暑假，但政府會在這些學童不必上課的期間提供安親服務，只收取微薄的餐點費用（Beckmann, 2008）。除了慷慨補助孩子的衣食、養育與休閒娛樂外，前東德政府也增加對學童及學生的經濟補助。

經過一九七〇年代所推動的一連串的政策下，前東德婦女的生育率逐漸提高，從 1975 年的 1.54 提高到 1980 年的 1.94，接下來的 1981 年及 1982 年也都維持在 1.85 及 1.86 的水準。只是擴張家庭政策的同時，也排擠其他社會弱勢團體，在金錢及服務的提供上的資源，引起社會不滿，支持生育政策受到抨擊。隨著社會不滿的提高，出生率也開始緩步下降。雖然前東德政府於 1986 年開始准許婦女（依然只限母親）在生育第一胎時就可以申請長達一年有給的育嬰假，並且宣傳三個孩子恰恰好家庭圖像，並且以延長生育第三胎的婦女的有給的母職假到 18 個月，以支持並鼓勵多子女家庭。然而效果不彰，當年育齡婦女平均生育率依然只有 1.70。到了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那年，前東德的生育率也只有 1.57。

兩德統一以前，前東德政府大約負擔了 80% 養育孩子的成本（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其中包括各種直接的補助、公立兒童照顧服務的支出、假日休閒設施以及其他為單親媽媽所提供的種種金錢及物質上的支持。在前東德的家庭政策下，一九八〇年代，前東德有 80% 婦女不但從事全職工作，

而且至少生育一名子女（Schulz, 1998），經濟相當獨立，不必依賴男性伴侶。此外，大半婦女生育後會申請 1 年的親職假（Leitner, 2005）。1989 年以前東德婦女的勞動參與率達到 89%。當時男性的勞動參與率為 98%（Beckmann, 2008）。此外，雖然在前東德社會婦女依然為主要的照顧工作者，前東德政府並未試圖以政策改變男性對照顧工作的態度，然而兩性在家務勞動的分配上比前西德平均。

總結來說，前東德家庭政策對協調家庭與工作的努力是一種「組合的安排」（Kombinations-Arrangement）：夫妻全職工作，政府提供完善的托育照顧與服務，協助婦女做好家事勞務及子女照顧工作。兩德統一後，儘管家庭政策已然轉為德西保守政策，德東地區仍有許多婦女試圖維持前東德的生活模式（Pfau-Effinger, 2000）。

### 三、兩德統一前的社會發展

#### （一）前西德：婦女終生無生育子女現象增加

1970 到 1990 年間，除了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外，低結婚率以及晚婚的現象，伴隨著離婚率增加的趨勢。同時，30-34 歲的已婚婦女的就業率從 39% 增加到 58%。不過，育有兩個以上子女的母親大約只有 1/3 參與勞動市場。在 45-49 歲這個年齡層的已婚婦女，就業率則從 41% 提高到 61%。就上述不同年齡婦女勞動參與率變化來推測，在前西德社會中，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婦女並不普遍。Kaufmann 指出，隨著 1957 及 1972 老人年金改革後，生育小孩已不具保障老年生活的重要性。數據顯示前西德在 1958 年出生的婦女有 23% 終身沒有生育子女，這個趨勢還會增加。以未婚比例來看，1950-1955 出生的世代，未婚比例從 10% 升到 18%，同時同居的伴侶大多未生育子女。在歐盟國家中，德國

單身家戶 (Singelhaushalt) 占總家戶比例之高，堪居歐盟首位 (Kaufmann, 1997; 2002)。上述現象顯現，前西德國社會，育有子女的家戶跟沒有子女的家戶逐漸呈現兩極化。

## **(二) 前東德：80%婦女全職工作，且至少生育一名子女**

兩德統一以前，前東德婦女生育率普遍高於前西德。1980 年，前東德婦女生育率就從 1975 年的 1.54 提高到 1.94。雖然，生育率不久後又些許下降，但依然高於前西德的生育率。而且 1989 年婦女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齡為 23 歲 (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此外，前東德婦女終生未生育子女的現象 (Kinderlosigkeit) 不像前西德那樣嚴重，據 Wendt 的觀察，在前東德社會，子女與婚姻乃是正常的存在 (Normalexistenz) (Wendt, 1997)。一九八〇年代，80%前東德婦女從事全職工作，而且至少生育一名子女。因此，前東德在 1989 兩德統一前雖然出生率不算高，為 1.57，但原因在於婦女生育的子女數減少，並不存在前西德那種婦女終生未生育子女增加的趨勢。即使如此 1.57 的生育率仍高於前西德同年 1.39 的水準。

## **肆、兩德統一到 1998 的家庭政策與社會發展**

兩德統一的喜悅使得保守自由政府得以繼續掌握政權，並且將德西各種政策與制度全部植入前東德地區。不過，前東德的生育率在兩德統一後，由於經濟、社會及政治，尤其家庭政策的鉅變，從 1990 的 1.52 急遽下降到 1994 年的 0.77 的最低水準，緩慢上升，一直 1998 紅綠聯盟執政後才較有起色。德西地區統一前後的生育率倒是沒有太大幅度的波動，1990 為 1.45，之後持續在 1.3-1.4 的低水準間擺盪。

保守的科爾政府依然偏好以稅賦及津貼做為家庭政策主要的工具。除了扶養子女扣除額及一般的育兒津貼外，另外還有為所得較低家庭而設補充式的育兒津貼（supplemental child allowance），形成一種複雜的稅賦加上津貼的制度。實施結果，除了少數高所得家庭外，大部分家庭取得每月給付的育兒津貼（Dingeldey, 2001）。1997 年保守政府繼續提高了育兒津貼及扶養子女免稅扣除額（Bleses & Seeleib-Kaiser, 2004）。

此外，在科爾政府（1982-1998）統治以來，在職的雙親可請的育嬰假（Erziehungsurlaub）從最長 10 個月延長為最長 3 年，不過，有給付的育嬰假最多 2 年，第 3 年並沒有給付。1992 年，無婚姻關係的父親終於也有權利申請育兒假。此外增設照顧假，以便在職父母照顧（12 歲以下）生病的子女。

育嬰假雖然提高了父母就業與家庭責任的相容性。問題是，期滿後，還需要相應數量的托育機構來照顧孩童。儘管 1992-1996 德國政府大約增加了 600,000 托育的機會（Baecker et al., 2010），但相應於孩童數字，托育機構的覆蓋率依然偏低。此外，德東德西兩地有極大的差異（Beckmann, 2008; 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德東地區由於社會主義時期建立的基礎，3 歲以上兒童托育機構覆蓋率普遍高於德西地區，這種差異在 3 歲以下幼兒的托育照顧方面更為明顯，以德西 Baden-Wuerttemberg 及 Bavaria 為例，其幼兒托育機構只佔 2% 的覆蓋率，而德東的 Brandenburg 卻達 79%（BMFSFJ, 2003）。一九九〇年代末期保守政府開始在原本只有半天班的小學增設課後輔導，以改善學童照顧服務。但這依然無法解決德國婦女就業與家庭照顧的衝突。

再者，育嬰假看似支持家庭內兩性平權，實質上是針對母親而設（Opielka, 2002）。父親雖有權申請，但誘因有限，畢竟育嬰津貼不高，光靠這點津貼並不足以養活一個家庭，仍需要一份主要收入。由於男性勞動薪資普遍高於女性，因此，依然需要父親賺取的那份家庭薪資。因此最後往往由對薪資微薄的或兼

職的婦女申請育嬰假 (Kolbe, 2002)。後來，科爾政府基於財政考量，增設排富條款，使得能獲得全額給付者又更少了。問卷調查也顯示，95%的父親，不分德東、德西，都表示他們不會申請育嬰假 (Beckmann, 2001)。Beckmann (2008) 指出，在育嬰假等政策實施之際，正值前西德出生率下降，失業率上升的時期。政治與經濟部門試圖使家庭政策與就業政策結合在一起。因此育嬰假的設計原本希望職業婦女為育兒中斷工作 (Opielka, 2002)，使父母重新回到男女社會分工下，母親領取育兒津貼，父親領取工作薪資。也因此，育嬰津貼不論有無工作母親皆有權領取。再者，保守政府把育嬰假從 1986 年的 10 個月，到 1989 年改為 15 個月，1990 更延長為 18 個月，依 1993 年的規定，最長可達 3 年，其中前兩年為有給付的育兒假。這種延長母親離職期間的作法，就可以看出該政策最終目的在使婦女留在家中，畢竟婦女離職愈久，愈難重回職場 (Deutscher Bundestag, 2008)。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托育機構，也使得母親想同時兼顧家庭與工作更是難上加難。隨著社會價值變遷、婦女勞動參與意願的提高，以及德國就業市場結構轉變，次級勞動市場擴大的結果，愈來愈多婦女或出於個人事業的追求或迫於家庭經濟壓力必須出外工作，德國政府這種保守的家庭政策，未能有效解決家庭與工作的衝突，恐怕無助於提高婦女的生育率。

回顧科爾政府長達 16 年 (1982-1998) 的家庭政策，雖然歷經了兩德統一的過程，也看到生育率下降的現象，然而，其偏好傳統家庭內兩性社會分工的基本立場並沒有太大的改變。Hausen (2000) 回顧德國廿世紀家庭政策的發展後指出，儘管從廿世紀初期，布爾喬亞的家庭模式廣為德國民眾所接受，然而這種傳統男女性別分工的秩序越來越陷入困境。德國政府透過各種家庭政策的措施，終究希望婦女能以「自然賦與的母親」角色為志業。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隨著婦女勞動參與意願的提高，德國保守的家庭政策與其說是支持家庭，促進男性參與家庭事務的措施，無寧說是種種促進職業婦女兼顧家庭與工作的政

策。在保守政黨長達 16 年，歷經兩德統一階段的執政期間（1982-1998），家庭政策的改革有限。不過科爾政府把婦女養育子女的時間加計到婦女年金的年資中，終於使婦女不再依附丈夫以取得福利，算是轉型的開始。一直到 1998 年紅綠聯盟取得政權，德國的家庭政策才開始比較明顯地轉型(transformation)。

## 伍、1998 到近年德國的家庭政策

在兩德統一以前社會主義的前東德政府負擔了近 80%養育與教育子女的成本(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為各年齡孩子所提供多樣性服務，支持母親全職工作。保守主義的前西德政府並不重視托育服務，而是以移轉性支出及稅賦等財稅移轉的方式，以鼓勵婦女留在家庭。

統一後的德國，基本上維持保守的家庭政策路線，托育服務機構的投資依然不足，且不同邦(Laender)覆蓋率差異極大。以 2001 年德國政府支出為例，據估計德國政府大概負擔了 46%養育孩子的成本(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不少學者批評德國這種多給錢，少給服務的家庭政策沒有效率(Ristau 2005; Ruerup & Gruesco, 2003; Gruesco & Ruerup, 2005)。然而，對德國保守的政治決策者而言，個別家庭租稅與津貼的措施比興建托育機構容易過關。因為後者代表鼓勵婦女就業，從而子女養育責任從家庭轉移到國家(Beckmann, 2008)。因此保守的基民黨的家庭政策著重以逐年提高育兒津貼及扶養子女免稅扣除額為兩個主要工具。例如，育兒津貼在 2010 的給付給第一胎的津貼是 1990 年的 7 倍強。子女免稅扣除額在 2010 年為 1990 年的 2.8 倍，此外還有個別子女托育及教育費用的特別扣除額，可以看出，即使家庭政策在廿一世紀以來的變革，稅賦工具在德國家庭政策依然具有重要地位。

從政府支出來看，德國在 1995-2001 年在「婚姻與家庭」範疇下的政府支出增加了 GDP 的 0.8%。德國聯邦銀行資料顯示，1992-1999 年間，德國在家庭方面的政府支出平均每年增加 4%，使 1999 年達到 150 億歐元，大約佔德國該年 GDP 的 7.6%（Bleses & Seeleib-Kaiser, 2004）。可見德國對家庭相關政策的投入提升，而施若德政府的支出又高於科爾政府時期。

1990 年後德國家庭政策改革壓力加重，一方面出於兩德統一的衝擊，另一方面則是歐盟要求會員國應兼顧家庭與職業婦女的需求，以「就業友善」（employment -friendly）為目標。兩德統一、歐盟整合，再加上德國社會長期生育率偏低的事實，迫使德國政府必須改革舊有家庭政策模式，提高出生率及婦女勞動參與率。但改革幅度並不大，直到了 1998 社會民主黨（紅色）與綠黨（綠色）組成的紅綠聯盟（Roet-Gruen Regierung）取得執政權後，德國的家庭政策才加速從「男性養家模式」轉型為「雙薪家庭模式」配合國家的兒童托育（Doppelversorgermodell mit staatlicher Kinderbetreuung）（Opielka, 2002）。

從 1998 到近年德國政治歷經了施若德（Schroeder）內閣（1998-2005）及梅克爾（Merkel）內閣（2005-2012）兩段政府統治期，因此本節將分成施若德政府及梅克爾政府兩小節進行分析。

## 一、施若德政府（1998-2005）

施若德主導的紅綠聯盟政府尤其重視人口老化及失業所造成的問題，隨著保守政府的結束，德國家庭政策開始從支持「男性養家」模式轉型為「雙薪家庭」模式，並且把孩子視為國家未來發展的資產，欲解決雙薪家庭就業與育兒的問題，以提高生育率。紅綠聯盟一方面延續舊有政策提高育兒津貼及扶養子女免稅扣除額；另一方面則是改革育兒假。

2001 年紅綠聯盟把「育嬰假」(Erziehungsurlaub)改名為「親職時間」(Elternzeit)，用以強調為人父母視為人類生命週期中的一個責任難鉅並具社會貢獻階段，並非度假(Urlaub)，並且承認養育子女的親職時間應併入計算年金年資。至於津貼仍保留「育嬰假津貼」(Erziehungsgeld)一詞，依薪資水準而有所差異。此外，為兼顧親職與工作的維繫「親職時間」申請者有權利要求在原公司(有 15 個工作人員以上的企業)兼職，每周最多 30 小時。「親職時間」依然可最長 3 年(第三年沒津貼)，在孩子 8 歲以前，父母都有權視孩子成長的需要分段申請。只是為鼓勵父母早日回到職場，親職時間較短者，會提高育嬰津貼。

2001 年紅綠聯盟政府大概在與家庭相關的事務上支出 180 億歐元，約佔德國 GDP 的 9%。其中 1/3 仍是家庭相關的租稅政策，2/3 是則是為家庭而支付的移轉性支出(Leitner, Ostner & Schmitt, 2008)。我們從 2001 及 2002 年全德的生育率為 1.349 及 1.341，只比 2000 年的 1.378 高一點，可見靠移轉性支出，缺乏托育設的家庭政策成效有限。顯然多給錢，少給服務的家庭政策並無法有效提高生育率(Ristau 2005; Ruerup & Gruesco, 2003; Gruesco & Ruerup, 2005)。有鑑於此，2004 紅綠聯盟通過《擴建日間托育法》(Tagesbetreuungsbaugesetz)，每年花 1.5 億歐元擴建各種日間托育機構以及保育人員，以增加全德各地各年齡孩童托育與教育機構的服務。

德國托育機構大概分三種：照顧 3 歲以下孩童托兒所(Krippenplaetze)、3-6 歲孩童念的幼稚園(Kindergartenplaetze)以及學校在上課前，以及半天班下課後，提供小學生(15 歲不等)寫作業的場所。茲以 1994, 1998 以及 2002 年托育機構的覆蓋率全德安親班(Hortplaetze)覆蓋率(小學生到 15 歲之學童，但也有不少以 10-12 歲為上限)如下表：

表 1：德國各年齡層子女托育機構的覆蓋率

	1994	1998	2002
全德托兒所（Krippenplaetze）覆蓋率（3 歲以下）	6.3%	7.0%	8.5%
德西地區	2.2%	2.8%	2.7%
德東地區	41.3%	36.3%	36.9%
全德幼稚園（Kindergartenplaetze）覆蓋率（3-6 歲）	77.2%	89.5%	89.8%
德西地區	73.0%	86.8%	88.1%
德東地區	96.2%	111.8%	105.0%
全德安親班（Hortplaetze）覆蓋率（小學生到 15 歲，但也有不少以 10-12 歲為上限）	17.2%	16.0%	14.2%
德西地區	5.1%	6.1%	6.4%
德東地區	58.2%	68.3%	67.6%

資料來源：Beckmann, 2008, p.202.

從表 1 可以看出，1990 兩德統一以來，至 2002 年，德東德西地區在子女托育機構分布上，依然有著明顯的差距。德東地區各年齡層托育機構的覆蓋率者高於德西地區。尤其德西地區在 3 歲以下幼童托育機構比例極低。

因此，2004 紅綠聯盟通過《擴建日間托育法》（Tagesbetreuungsausbaugesetz）擴建各種日間托育機構以及保育人員。尤其要能因應德西地區對 3 歲以下幼童的托育需求。這樣的投資顯示德國家庭政策擬透過托育機構，使婦女同時兼顧家庭照顧與工作，一改過去男性養家模式下，期望婦女安於家庭主婦的角色。

自 2005 年實施《擴建日間托育法》開始，十個月以來，德西地區每 10 個 3 歲以下的幼兒就有 1 個可以能夠申請到公立托兒所或請到有國家認證的日間保母。德東地區幼兒托育覆蓋率也提高到 39.8%，全德國針對 3 歲以下幼童所

設的公立托育機構達 13.7%，跟上面表 1 的數據相比，可謂成效卓著（Beckmann, 2008）。

Leitner, Ostner 與 Schmitt（2008）指出，紅綠聯盟政策改革的意義在於：

- （一）視兒童教育為對兒童潛在能力的投資（Investing in the potential of every child）：過去德國幼稚園教育目的只在於協助兒童學習社交往來的能力。如今則透過遊戲希望能達到幼年認知教育（educare）的目的，因而擴張兒童照顧服務。
- （二）減少兒童貧窮的問題，由於德國過去的家庭政策，使得婦女勞動參與率偏低，隨著兩性關係不穩定，使得貧窮女性化問題連在造成了貧窮兒少化的現象。因此，紅綠聯盟的家庭政策希望父母進入職場，除了對低收入家庭給予補助外，也希望透過公立兒童照顧服務使母親減輕照顧責任，增加母親全職／兼職的工作的機會，進而有助於社會保險及維持家庭生活水準。
- （三）支持父母在工作及家庭責任中達到平衡：減少工時（part-time）的工作權利配合親職時間（Elterzeit）設計，同時鼓勵為父母彈性就業，暫時離開工作崗位，使父親參與子女照顧工作。

由於紅綠聯盟對低生育率問題的關注，因此在他們執政時，儘管公共支出及健保、年金及失業等項目的社會支出逐步減少或至少不增加，但在推動家庭支持的措施方面卻提供較多的財政支持（Bleses & Seeleib-Kaiser, 2004）。

整體而言，1998 年以來，施若德政府家庭政策主軸在為各年齡層的孩子建立全天候托育機構，同時把育嬰假津貼提高到具有薪資替代的功能（Lohnersatzfunktion），目的在提高男性請親職假，履行父職的意願（SPD-Parteivorstand, 2001）。Opielka（2002）認為，這種政策概念類似於北歐及前東德的家庭政策。不過，施若德執政期，紅綠聯盟推動的家庭政策，准

許兼職上班，結合彈性工時的設計、配合國家托育服務，同時鼓勵父親請父職假，促進性別平權的作法，更傾向北歐模式。

從下表出生率統計可以看出 1998-2005 年紅綠聯盟的家庭政策在德東地區有較明顯的成效。

**表 2：1997-2005 年德國出生率統計**

西元	德西地區	德東地區	兩德統一後德國全國
1997	1.441	1.039	1.369
1998	1.413	1.087	1.355
1999	1.406	1.148	1.361
2000	1.413	1.214	1.378
2001	1.382	1.231	1.349
2002	1.371	1.238	1.341
2003	1.364	1.264	1.340
2004	1.372	1.307	1.355
2005	1.355	1.295	1.340

資料來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s（2013b）

## 二、梅克爾（Merkel）擔任總理期間（2005-迄今）

在梅克爾執政時期執政黨大約分成三種組合：（一）2005-2009：保守的基督教聯合黨與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Grosse Koalition）；（二）2009-2013：自 2009 年底開始，大聯合政府解組，基督教政黨改與自由民主黨共同執政；（三）2013-迄今：2013 年德國大選結果，梅克爾得以繼續擔任總理。基民黨重新與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以下依時序概述其家庭政策：

2005 年保守的基督教聯合黨與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Grosse Koalition），基本上是延續紅綠聯盟時期的政策路線，以解決婦女就業與育兒

的兩難，期望能提高生育率。保守的基督教聯合黨所以在家庭政策改革上讓步，除了低生育率問題對未來社會發展造成的潛在壓力外，這些參與決策的女政治人物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Beckmann, 2008）。

大聯合政府時期的改革主要是 2007 年把「育嬰假津貼」（Erziehungsgeld）更名為「親職津貼」（Elterngeld），強調雙親（Eltern）的重要。親職津貼與離職前的所得相關，給付相對慷慨，最高可達每月 1,800 歐元，相當於七萬多台幣。在時間及津貼的給付上以 12 個月為基礎，彈性調整。例如，為鼓勵在職的父母雙方都能各別履行親職，只要父母各別請假，其中一方至少申請了 2 個月的「親職時間」（Elternzeit），則准予獲得 14 個月有給付的親職時間。如果父母選擇同時請假，則親職津貼只給付 7 個月。如果要把親職時間延長為兩倍，則津貼減半。每周 30 小時的兼職規定保留，不過，親職津貼會隨兼職所得減少。至於沒有工作在家照顧新生兒的父親或母親也可以領取每月 300 歐元的親職津貼。

大聯合政府上述縮短離職時間，提高親職津貼的政策，訴求的主要對象是高學歷且高所得的職業婦女（BMFSFJ, 2004; Ruerup & Gruescu, 2003; Ostner, 2009）。因為研究發現，德國最沒有生育意願的族群是高學歷者（Baecker et al. 2010），事實也證明越來越多學院出身的婦女（female academics）晚婚或是不生（Wirth, 2004）。因此，這個政策方案帶有揀選支持生育主義（selective pronatalism）的色彩（Knijn & Ostner, 2008）。

梅克爾主導的大聯合政府縮短「親職時間」的期限，准許兼職形式在原工作單位上班，並以所得相關的「親職津貼」提高高薪的雙薪家庭生育子女的誘因。同時擴建三歲以下托育機構做為配套措施，家庭政策延續了紅綠聯盟的方向。

自 2009 年底開始，大聯合政府解組，基督教政黨改與自由民主黨共同執

政。梅克爾在 2010 年的就職演說中表示還會繼續建設托育設施。然而，梅克爾這個任期的保守自由政府的家庭政策顯示出不少政策矛盾的地方。例如，提高夫妻所得均分申報額（Ehegattensplitting）、子女扶養特別扣除額與育兒津貼，只取悅高所得的傳統保守家庭，卻不必然能鼓勵生育，更無法解決育兒與工作的兩難。保守自由政府也不重親改善公立托育問題、提高親職津貼等政策措施（der Tagesspiegel, 2013），只是以托育金（Betreuungsgeld）方式補貼父母托育費用。整體來說，2009 以來，保守自由政府依然是回到過去偏重現金給付、少提供托育服務的保守路線。

一直到 2012 年，梅克爾政府終於願意正視婦女就業與子女托育問題，提出了十點計畫以推動更好的子女托育服務（10-Punkte-Programm fuer mehr gute Betreuung），除了增建托育設施、協助各托育機構提升托育照顧品質外，也以補助金的方式鼓勵企業為員工提供子女托育服務（BMFSFJ, 2013a）。2013 年 3 月根據德國官方政策評估結果，德國的父母對於子女托育政策總算第一次表示滿意（BMFSFJ, 2013b）。不過，德國學界與輿論界都批評過去的 4 年白白延誤了家庭政策改革的行程（Ruhenstroth-Bauer, 2013）。

2013 年大選結果，梅克爾繼續執政，除了維持原有種種家庭相關的現金給付或財稅優惠外，也承諾要繼續增加托育等設施。根據德國家庭、老人、婦女與青少年部（Bundesministerium fue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簡稱 BMFSFJ）在官方網站公佈的資料顯示，德國直到在 2014 年仍會提供 54 億歐元預算，繼續建設三歲以下幼兒的托育設施，目標要提供大約 81 萬個托育機會給民眾。這個規模高於各邦及地方調查得出的 78 萬托育需求。此外也會繼續致力於提升服務品質（BMFSFJ, 2013b）。

德國保守的家庭政經過兩德統一的衝擊、紅綠聯盟的改革，以及大聯盟政府的政策延續，逐漸轉而支持婦女就業。筆者認為這種改變形式上接近前東德

模式，但從重視兩性平權的觀點來看，更趨近於北歐家庭政策模式。因為，前東德的家庭政策只是以國家及企業的支持，減輕母親工作時間及照顧負擔為主，並不特別促進父親參與育兒工作。但德國現有家庭政策除了視子女為社會未來的人力資產，賦予個別權利外，也儘量保持性別中立，視父親及母親同為工作者與照顧者。以減少工作時間，提供托育服務的方式，使父母既能同時工作，也能共同照顧孩子。

這樣的政策改革成效如何呢？參照下表3所呈現的近年來德國重大變革年代前後出生率的統計可見一斑。前東德的生育率在兩德統一後，由於經濟、社會及政治，尤其家庭政策的鉅變，從1990年的1.518急遽下降到1994年的0.772的最低水準，一直1998年紅綠聯盟執政後才逐漸有起色，直到2012年生育率回復到1.454。德西地區從兩德統一迄今的生育率沒有太大幅度的波動，1990為1.45，之後持續在1.3-1.4的低水準間擺盪，2012年為1.371。不過，經過紅綠聯盟的改革，德東地區的出生率已略高於德西地區了，這除了歸因於德東人民重新適應了兩德統一後的新秩序外，家庭政策改革後趨近於前東德模式應該也是德東地區生育率回復的因素之一。

表 3：1990-2012 年德國育齡婦女生育率

西元	全德	德西地區	德東地區
1990	1.454	1.450	1.518
1991	1.332	1.422	0.977
1992	1.292	1.402	0.830
1993	1.278	1.393	0.775
1994	1.243	1.347	0.772
1995	1.249	1.339	0.838
1996	1.316	1.396	0.948
1997	1.369	1.441	1.039
1998	1.355	1.413	1.087
1999	1.361	1.406	1.148
2000	1.378	1.413	1.214
2005	1.340	1.355	1.295
2010	1.393	1.385	1.459
2011（人口普查前）	1.364	1.357	1.433
2011（人口普查後）	1.387	1.376	1.459
2012	1.378	1.371	1.454

資料來源：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s（2014）

## 陸、德國家庭政策的轉型對台灣家庭政策的啟示

對於德國家庭政策的轉型，Ostner（1998）提出「照養的雙親」規範（die Norm der sorgenden Eltern）逐漸取代「養家者-丈夫」（Ernaeher-Ehemann）。Opelka（2002）則稱之為由「男性養家婚姻模式」（Vorsorgerehemodell）轉為「雙薪家庭模式配合國家兒童托育服務」（Doppelversorgermodell mit staatlicher

Kinderbetreuung)。Bleses 及 Seeleib-Kaiser (2004) 觀察德國戰後以來家庭政策的改變，指出，德國近年來開始以「家庭取向的社會政策」(family-oriented social policies)，取代過去以男性「薪資勞動者為中心的社會政策」(wage earner-centred social policies)。上述說法雖然不同，但指涉都類似從支持「高度的男性養家模式」(strong breadwinner model) 轉型為鼓勵夫妻全職工作的「雙薪家庭模式」(dual-earner model) 的概念。

Bleses & Seeleib-Kaiser 強調，德國家庭政策的改革使得家庭政策不再像過去一樣，附屬於其他社會政策之下，而是福利國家活動的中心。新的移轉性給付不再導源自男性做為養家者 (Breadwinner) 所賦予的權利，而是只要育有子女或提供家庭服務時就可以個別取得。儘管如此，舊的男性養家模式並沒有完全退場，因為社會保險給付與資格取得的方式，或是無助於鼓勵生育的夫妻所得均分申報額的減稅的設計依然存在 (Bleses & Seeleib-Kaiser, 2004)。隨著德國人口老化與低生育率的社會發展，迫使德國保守的家庭政策進行改革，改革方向趨向北歐模式，重視男女平權並支持職業婦女兼顧子女照顧工作，對前東德人民來說，這樣的家庭政策更貼近原東德社會的雙薪家庭制度。

只是從下圖 1「德國 1952-2012 年育齡婦女生育率發展圖」來看，比較前東德及前西德的出生率走勢可以看出，前東德「雙薪家庭模式」以國家及企業支持提供職業婦女托育的服務的家庭政策，確實比前西德「高度男性養家模式」偏好現金給付，少提供托育服務的家庭政策，似乎更能有效提高生育率。再觀察兩德統一後，德西生育率維持低檔，德東則因面臨經濟、政治以及社會生活的鉅變而急遽下降。一直到紅綠聯盟於 1998 年推動家庭政策改革，生育率遽降的德東地區才有明顯回復的趨勢，這應該跟新政策與原東德家庭政策相近有關。不過，就全德生育率來看也只有微幅上升，主要是德西地區生育率一直停

滯不前。2013 年德國的出生率之低依然居歐盟國家之首（Zeit Online, 2013），以及歐盟區生育意願調查，德國意願也是最低（der Spiegel online, 2013）。



究其原因，文中曾經提到德西社會存在著一種「文化家庭主義」（cultural familism）的保守風氣，德西婦女在孩子 3 歲以前傾向親自照顧（Huinink, 2002），如果她們非得把幼兒交付托育的話，多半私下找可以信任的臨時保母或登記有案的保母（Hank & Kreyenfeld, 2002）。如果選擇就業而不親自照顧幼兒的母親，就必需找出理由向他人解釋（der Spiegel online, 2011）會被鄰里甚至親人視為不負責任，甚至冠上烏鴉媽媽（raven mother）的標籤（中時電子時，

2013)。從德國統計處 2013 年公佈的研究報告，德東地區三歲以下兒童的托育率為 49.6%，德西地區為 24.2%，是德西地區的兩倍（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s, 2013a），也可以看出德西文化的影響。換言之，當保守的德西地區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提高時，這種文化家庭主義會造成職業婦女工作與育兒的衝突，進而抑制德西婦女的生育意願。

2013 年未來議題基金會（Stiftung fuer Zukunftsfragen, 2013）曾針對德國兩千多名十四歲以上有效樣本做過生育意願調查，結果發現，除了 67%受訪者認為育兒本高外，60%受訪者寧願享受一個人的獨立自由，57%認為事業優於成家，54%表示由於家庭與事業的兩難，值得注意的是，經過德國政府多年的努力，仍有 45%的受訪者認為缺乏公立兒童托育機構，其中德西人佔 63%，德東人只有 40%，這也反映出前述兒童托育機構的覆蓋率在德東地區有較高。南德日報（Sueddeutsche Zeitung, 2013）總結德國出生率過低，肇因於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使德國人不敢成家，以及育兒成本過高。顯見，雖然到 2014 年，德國政府發放給父母及子女各項租稅及福利給付都比 1960 年提高了四到六倍有餘（Bild, 2014），似乎鼓勵生育，除了現有各項租稅與津貼，並建立更多地方性公立托育機構外，還需要更多方面的努力。

反觀台灣社會，生育率之低已多年名列世界前茅。根據內政部（2014）的統計資料，臺灣育齡婦女的生育率從 1984 年開始就低於人口替代率降到 1.880，之後逐年下降，至 2010 年降到谷底，只有 0.895，2011 年雖微幅上升到 1.065，再經過 2012 龍年的推升達到 1.27 後，於 2013 又降回 1.065。

比起德國政府，尤其德國從 1998 年開始，積極推動鼓勵生育政策，投入可觀的人力及財力，以提高育兒各項津貼、建全地方托育服務、支持兩性平權，再加上德國各種福利保障等等，台灣政府的鼓勵生育政策相形見绌。舉凡租稅上提供子女免稅扣除額以及教育托育特別扣除額、勞保的育嬰留職停薪假，以

及內政部兒童局規劃相關的社福措施，如，托育津貼、發放幼兒教育券，滿五歲就讀私立托兒所或幼稚園的補助金等，無論就所提供的各項給付或服務項目、給付時間與金額等等來看，台灣政府推動的家庭相關政策顯得相對零碎，缺乏全面的配套。再觀察台灣社會經濟的環境，育齡人口長期感受到國內種種問題，如青年失業、實質薪資所得下降、高物價、高房價、高工作壓力、高流動性，再加上國內子女托育及教育成本高、個人主義與享樂主義抬頭，以及未來的不確定性等等不利結婚生子的環境氛圍，想提高國內生育率實有待多方面的努力。

## 參考書目

中時電子報 (2013)。德國少子化危機。2013.01.09. 資料檢索日期：2013. 12. 1.

網址：[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01/122013010600351.htm](http://news.chinatimes.com/world/11050401/122013010600351.htm)。

內政部 (2014)。育齡婦女生育率。資料檢索日期：2014.06.30.網址：

<http://sowf.moi.gov.tw/stat/year/y02-04.xls>。

陳素梅 (2014)。經濟政策、勞動市場政策與家庭政策做為國家整體基本政策方針的分析—以德國模式的成功與失敗為例。《靜宜人文科學學報》，8 (1)，297-335。

Auth, D. (2002). *Wandel im Schnecken tempo. Arbeitszeitpolitik und Geschlechtergleichheit im deutschen Wohlfahrtsstaat*. Opladen.

Baecker, G., Naegele, G., Bispinck, R., Hofemann, K. & Neubauer, J. (2010). *Sozialpolitik und soziale Lage in Deutschland*, Band 1 & 2. Wiesbaden.

Beckmann, P. (2001). Neue Väter braucht das Land. *IAB Werkstattbericht* 6/2001. Nuernberg: Institut fue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forschung, 1-11.

Beckmann, S. (2008). *Geteilte Arbeit? Maenner und care-Regime in Schweden,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Muenster.

Bild (2014). Milliardengrab Familienpolitik(2014.02.02)資料檢索日期：2014.06.30.  
網 址：<http://www.bild.de/politik/inland/familie/milliardengrab-familienpolitik-34497084.bild.html>.

Bleses, P. & Seeleib-Kaiser, M.(2004). *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rman Welfare State*. Hampshire, New York.

BMFSFJ (2003). *Die Familie im Spiegel der amtlichen Statistik*, 3. erweiterte Neuauflage, erstellt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Statistischen Bundesamt, Stand

Januar 2003. (Berlin: Bundesministerium fue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2003)

BMFSFJ (2004). *Bevoelkerungsorientierte Familienpolitik- ein Wachstums Faktor*. Strategiepapier. Berlin: Bundesministerium fuer Familie, Senioren, Frauen und Jugend, BDI und IW.

BMFSFJ (2013a). Meilensteine- Stand August 2013. .資料檢索日期：2013.12.09.  
<http://www.bmfsfj.de/RedaktionBMFSFJ/Internetredaktion/Pdf-Anlagen/meilensteine-bmfsfj,property=pdf,bereich=bmfsfj,sprache=de,rwb=true.pdf>.

BMFSFJ (2013b). Gute Betreuung. . 資料檢索日期：2013.12.09.  
<http://www.familien-wegweiser.de/wegweiser/stichwortverzeichnis,did=93874.html>.

Czarnowski, G. (1991). *Das kontrollierte Paar. Ehe und Sexualpolitik im Nationalsozialismus*. Weinheim-Basel.

Daly, M. (2000). *The Gender Division of Welfare: The Impact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Welfare States*. Cambridge.

Der Tagesspiegel (2013). Betreuung für Angela Merkel gesucht (2013.10.01). 資料檢索日期：2013. 12. 1. 網址 :<http://www.tagesspiegel.de/meinung/familienpolitik-betreuung-fuer-angela-merkel-gesucht/8875058.html>.

Der Spiegel online (2011). Familienpolitik: Warum Deutschland keine Lust auf Kinder hat. *Der Spiegel online*. 資料檢索日期：2013. 12. 15.網址：  
<http://www.spiegel.de/politik/ausland/familienpolitik-warum-deutschland-keine-lust-auf-kinder-hat-a-771169.html>.

Der Spiegel online. (2013). EU-Vergleich:Deutsche wollen am wenigsten Kinder. (2013. 11. 20.). 資料檢索日期：2013. 12. 1. 網址：<http://www.spiegel.de/>

gesundheit/schwangerschaft/statistik-deutschland-hat-niedrigste-geburtenrate-in-der-eu-a-934659.html.

Dienel, Ch.(2007). *Bevoelkerungspolitik in Deutschland*. Berlin-Institut. fuer Weltbevoelkerung und globale Entwicklung.

Dingeldey, I. (2001). Familienbesteuerung in Deutschland: Kritische Bilanz und Reformperspektiven, In A. Truger (ed.). *Rot-Gruene Steuerreformen in Deutschland. Eine Zwischenbilanz* (pp. 201-117). Marburg.

Deutscher Bundestag (2008). *Berichte ueber die Auswirkung des Bundeselterngeld und Elterzeitgesetzes sowie ueber die gegebenenfalls notwendige Weiterentwicklung*. Drucksache 16/10770. Berlin.

Fischer, A. (2008). Kinderarmut verhindern – aber richtig! Zur Rolle des Kindergeldes bei der Bekaempfung der Armut von Familien mit Kindern. *Standpunkte*, 4:2008, Berlin. 資料檢索日期：2010. 4. 10. 網址：  
[http://www.bundesstiftung-rosa-luxemburg.de/fileadmin/rls\\_uploads/pdfs/Standpunkte\\_0804.pdf](http://www.bundesstiftung-rosa-luxemburg.de/fileadmin/rls_uploads/pdfs/Standpunkte_0804.pdf).

Fuhrmann, N. (2005). *Geschlechterpolitik im Prozess der europaeischen Integration*. Wiesbaden.

Gelach, I. (2004). *Familienpolitik*, Wiesbaden.

Gruesco, S. & Ruerup, B. (2005). Nachhaltige Familienpolitik,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23-24 (6. Juni 2005), 3-6.

Hank, K. & Kreyenfeld, M. (2002).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Child Care and Transition to Motherhood in Western Germany*. DIW Discussion Paper, 290. Berlin: Deutsches Institut fuer Wirtschaftsforschung.

Hausen, K. (2000). Arbeit und Geschlecht. In J. Kocka & C. Offe (eds.), *Geschichte*

*und Zukunft der Arbeit*, Frankfurt/M, New York.

Herden, R.-E. & Muenz, R. (1998), Bevoelkerung. In B. Schäfers & W. Zapf (ed.).

*Handwörterbuch zur Gesellschaft Deutschlands* (pp.71-85).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Huinink, J. (2002). Polarisierung der Familienentwicklung in europaeischen

Laendern im Vergleich. In N. F. Schneider & H. Matthias-Bleck (eds.),

*Elterschaft heute. Gesellschaftliche Rahmenbedingungen und individuelle Gestaltungsaufgaben* (Zeitschrift fuer Familienforschung. Sonderheft 2, 49-73).

Opladen.

Kaufmann, F.-X. (1997). *Die Herausforderungen des Sozialstaates*, Frankfurt/M.

Kaufmann, F.-X. (2002). *Sozialpolitik und Sozialstaat – Soziologische Analysen*.

Opladen.

Kaufmann, F.-X.(2006)，施世駿（譯）。《比較福利國家-國際比較中的德國社會國》。台北。

Klages, H. (1998). Werte und Wertewandel. In B. Schäfers & W. Zapf (eds.),

*Handwörterbuch zur Gesellschaft Deutschlands* (pp. 698-709).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Kniji, T. & Ostner, I. (2008). The ‘meaning’ of children in Dutch and Germany family Policy.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Kolbe, W. (2002). *Elternschaft im Wohlfahrtsstaat. Schweden und die bundesrepublik im Vergleich 1945-2000*. Frankfurt a. M.

Kolinsky, E. (1989). *Women in West Germany. Life, Work and Politics*, Oxford.

Kuijsten, A. (2002).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Forms of Private Life in the 1980s.

In F.-X. Kaufmann, A. Kuijsten, H.-J. Schulze & K.-P. Strohmeier (eds.), *Family*

*Life and Family Policies in Europe, Vol.2. Problems and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xford.

Leitner, S. (2005). Kind und Karriere fuer alle? Geschlechts- und schichtspezifisches Effekte rot-gruener Familienpolitik. *Blaetter fue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 Politik.* 50(8), 958-964.

Leitner, S., Ostner, I. & Schmitt, Ch. (2008). Family Policies in Germany. Ilona Ostner, Christoph Schmitt (eds.), *Family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Family Change: The Nordic Countr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iesbaden.

Lewis, J. & Ostner, I. (1994). Gender and the Evolution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ies. ZeS-Arbeitspapier Nr.4/1994. Bremen.

Manz, G. & Winkler, G. (eds.)(1988).*Sozialpolitik.* Berlin.

Merkel, I. (1994). Leitbilder und Lebensweisen von Frauen in der DDR, In H. Kaelble. et al. (eds.), *Sozialgeschichte der DDR.* Stuttgart.

Muench, U. (1990). *Familienpolitik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assnahmen, Defizite, Organisation familienpolitischer Staatstaetigkeit.* Freiburg.

Opielka, M. (2002). Familie und Beruf. Eine deutsche Geschicht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H. B 22-23/2002, 資料檢索日期：2009. 12. 27. 網址：  
[http://www.bpb.de/publikationen/98DK3M,0,0,Familie\\_und\\_Beruf\\_Eine\\_deutsche\\_Geschichte.html](http://www.bpb.de/publikationen/98DK3M,0,0,Familie_und_Beruf_Eine_deutsche_Geschichte.html).

Ostner, I. (1998). Frauen. In B. Schäfers & W. Zapf (eds.). *Handwörterbuch zur Gesellschaft Deutschlands* (pp. 210-221).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Bonn.

Ostner, I. (2009). Abschied vom Maternalismus? Zur sozialpolitischen

- Neujustierung des verhaeltnisses zwischen Familie und gesellschaft im » konservativen » deutschen Wohlfahrtsstaat. In H. Obinger & E. Rieger (eds.). *Wohlfahrtsstaatlichkeit in entwickelten Demokratien – Herausforderung, Reformen und Perspecktiven. Festschrift fuer Stephan Leibfried* (pp. 319-346). Frankfurt/M, New York.
- Peil, I. (1996). *Akzeptanz familienpolitischer Massnahm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 Ost-West Vegleich. Materialien zur Bevoelkerungswissenschaft*, Heft 85, Bundesinstitut fuer Bevoelkerungsforschung.
- Pfau-Effinger, B. (2000). *Kultur- und Frauenerwerbstaetigkeit in Europa. Theorie und Empirie des internationalen Vergleichs*, Opladen.
- Ristau, M. (2005). Der oekonomische Charme der Familie,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23-24 (6. Juni 2005), 16-22.
- Ruerup, B. & Gruesco, S. (2003). Familienpolitik im Interesse einer Aktiven Bevoelkerungsentwicklung. Gutachten. Berlin: BMfFSFJ.
- Ruhenstroth-Bauer, P. (2013). Neustart für die Familienpolitik (2013.08.09). 資料  
檢索日期：2011. 02. 23. 網址：http://www.freitag.de/autoren/geld-und-glueck/  
neustart-fuer-die-familienpolitik.
- Schaefgen, K. (2000). *Die Verdopplung der Ungleichheit. Sozialstruktur und Geschlechterverhaeltnis in der Bundesreplublik und in de DDR*. Opladen.
- Schrader, C. (1995). *Die Transformation des russischen Individualarbeitsrechts*. Dissertaton, FU Berlin.
- SPD-Parteivorstand (2001). Kinder-Familie-Zukunft. Antrag F1,  
SPD-Bundesparteitag Nuernberg, November 2001, Berlin.
- Stiftung fuer Zukunftsfragen (2013). Kein Geld und keine Karriere: Weshalb die

Deutschen keine Kinder bekommen (2013. 08.01) 資料檢索日期：2014. 06. 30.

網址：<http://www.stiftungfuerzukunftsfragen.de/de/newsletter-forschung-aktuell/248.html>

Sueddeutsche Zeitung (2013). Kinder kriegen? Viel zu teuer. 1. August 2013.

*Sueddeutsche Zeitung*. 資料檢索日期：2014. 06.30. 網址：  
<http://www.sueddeutsche.de/leben/umfrage-zur-geburtenrate-kinderkriegen-viele-n-zu-teuer-1.1736331>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s (2013a). Kindertagsbetreuung regional 2013:

Ein Vergleich aller 402 Kreise in Deutschland. 資料檢索日期：2013.12.13. 網址：  
<https://www.destatis.de/DE/Publikationen/Thematisch/Soziales/KinderJugendhilfe/KindertagesbetreuungRegional.html>.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s (2013b). Zusammengefasste geburtenziffer

nach Kalenderjahren. 資料檢索日期：2013. 12. 17. 網址：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Bevoelkerung/Geburten/Tabellen/Geburtenziffer.html>.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s (2013c). Zusammengefasste Geburtenziffer

der Kalenderjahre. 資料檢索日期：2013. 12. 13. 網址：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Bevoelkerung/\\_Grafik/GeburtenzifferKalenderjahre.html](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Bevoelkerung/_Grafik/GeburtenzifferKalenderjahre.html).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Deutschlands (2014). Zusammengefasste Geburtenziffer

der Kalenderjahre. 資料檢索日期：2014. 05. 15. 網址：  
<https://www.destatis.de/DE/ZahlenFakten/GesellschaftStaat/Bevoelkerung/Geburten/Tabellen/GeburtenZiffer.html>.

- Schulz, G. (1998). Soziale Sicherung von Frauen und Familien. In: Hockerts, H. G. (ed.), *Drei Wege deutscher Sozialstaatlichkeit. NS-Diktatur; Bundesrepublik und DDR im Vergleich* (pp. 117-149). Muenschen: Oldenbourg.
- Vornmoor, A. (2003). Genderkonstruktionen und Leitbilder (west-)deutscher Familienpolitik von der Nachkriegszeit bis in die Gegenwart. *femina politica*. As. Jg. H.1/2003.
- Wendt, H. (1997). The Forme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the Standardized Family, In Franz-Xaver Kaufmann. et al. (eds.). *Family Life and Family Policies in Europe: Structures and Trends in the 1980s*. Oxford.
- Wirth, H. (2004). Zunehmende Tendenz zu spaeteren Geburten und Kinderlosigkeit bei Akademikerinnen. *Informationsdienst Soziale Indikatoren (ISI)* 32, 1-6.
- Zeit Online (2013). Deutschland hat die niedrigste Geburtenrate in der EU. 2013. 11. 20. 資料檢索日期：2013. 12. 17. 網址： <http://www.zeit.de/gesellschaft/zeitgeschehen/2013-11/eu/eurostat-geburtenrate-deutschland>.



## 研究論文

# 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模型 之研究：以莫拉克颱風屏東縣中繼屋居 民為例<sup>\*</sup>

何華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

趙善如<sup>\*\*</sup>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

張麗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柯旻伶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

麥漢倫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學生

---

收稿日期：2014 年 2 月 17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5 月 14 日。

<sup>\*</sup>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sup>\*\*</sup>通訊作者：趙善如，[shanchao@mail.npust.edu.tw](mailto:shanchao@mail.npust.edu.tw)。聯絡電話（公）：（08）7703202 轉 7735。

##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在建構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之模型，探討中繼屋居民的復原力對其生活適應之影響，以及進一步從資源保存理論，比較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造成工作收入流失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模型之差異。本研究透過結構式問卷調查，共獲得有效研究樣本 159 人，並運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進行模型建構。研究結果發現，研究樣本的復原力正向顯著的影響生活適應（標準化係數為 0.86）。另外，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造成工作收入居民其生活適應模型之間是存在著一些差異，像是因災造成工作收入流失者復原力對生活適應的正向顯著影響程度，是低於工作收入沒有流失（標準化係數為  $0.81 < 0.89$ ）；工作收入有流失者復原力中個人特質—樂觀、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之程度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但家庭支持是高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因災造成工作收入流失者生活適應中心理和諧表現程度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但所表現出社會和諧程度是高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

**關鍵字：**生活適應、復原力、資源流失、臺灣原住民

# **Study on the Life Adaption of the Citizens in the Temporary Housing after Disasters — Take the Citizens in the Pintung Temporary Housing after Typhoon Morakot as an Example**

**Hua-Chin Ho**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National Pin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Ru Chao**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National Pin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Chu Chang**

Assistant Professor ,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National Pin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g-Ling Ko**

Graduate students ,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National Pin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n Lun Mai**

Undergraduate ,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National Pin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construct the model of the life adaption of the citizens in the temporary housing after disasters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heir resilience toward their life adaption. What is more,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fe adaption model of the temporary-housing citizens whose family members lose job income and that of

the temporary-housing citizens whose family members do not lose job income is compared. The structural questionnaire is applied in this study and 159 valid study samples are obtained. Besides,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is applied in the model constru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study samples positively influences their life adaption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0.86) .

What is more, there does exist som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life adaption model of the temporary-housing citizens whose family members lose job income and that of the temporary-housing citizens whose family members do not lose job income because of disasters. For example,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resilience of the former toward the life adaption is less than that of the latter (the standardized coefficients  $0.81 < 0.89$ ) . Besides, some personal attributes of the former such as optimism and endurance of frustration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latter, but family support a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latter. As for the life adaption, the former have lower psychological harmony than the latter. Nevertheless, the former have higher social harmony than the latter.

**Keywords: life adaptation, resilience, resources loss**

## 壹、前言

2009 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台灣南部，其中屏東縣原鄉部落，像是霧台鄉、三地門鄉、來義鄉、泰武鄉、牡丹鄉等，因受到大水沖刷，原有的房舍不堪居住，或是原所居住社區已成為危險警戒區域無法居住，而面臨遷村（屏東縣災後重建委員會，2011）。因此，在結束緊急安置之後，屏東縣政府成立了四處中繼屋<sup>1</sup>，進行中短期的安置，一方面使受災居民能穩定生活，一方面等待遷村確認，永久屋建造完畢。換言之，居住在中繼屋的受災居民通常是受災情形較為嚴重，可能無法回原有的住所或是社區。因此，在等待永久屋建造完畢、遷住永久屋的過程，實有必要進一步探討其生活適應（adaptation）情形，作為後續提供相關服務之參考。

無論災難對社會、社區或個人家庭帶來多少的損失與傷害，在災難過後受災居民所期待莫過於能儘快回到常態生活，並且能夠有良好的生活適應。所謂良好的生活適應係指個體為能滿足其生理的、社會的與心理的各種需求，透過不同的方法與協助，適當的解決問題，使個體的內在與環境能夠維持和諧的平衡關係（Lazarus, 1976; 簡茂發，1986）。故換言之，災難過後，受災居民能夠藉由不同的方法與協助，使自己與外在環境維持和諧關係，是他們追求的目標，也是災後重建關注的議題。生活適應是一個多層面的生活經驗之概念（鄭麗珍，2001），並且因應個體的生活狀況，其生活適應層面會有所不同（Rathus & Nevid, 1995; 高玉玲、王如華、白璐、黃碧桃，2000）。在本研究中考量受災居民的生活重心是在個人內心心理，以及與外在社會環境的調適，故在此將生活適應主要分成心理和諧、與社會的和諧二個層面。

---

<sup>1</sup>屏東榮譽國民之家、龍泉 298 旅營區、屏東潮州忠誠營區、高士托兒所

近幾年來從受災居民的復原力 (resilience) 概念，來討論災後的生活重建與生活適應，已經成為重要的趨勢，如在 2005 年的 World Conference on Disaster Reduction (WCDR) 確認，復原力概念進入災難領域的討論，可以被視為對災難反應另一種新文化之誕生；還有，Norris, Tracy 和 Galea (2009) 長期追蹤受到 1999 年墨西哥嚴重水災、2001 年美國 921 恐怖事件影響的社區居民之復原力與後續生活之關係。原因是在災後重建過程，如果是將焦點放在受災居民的創傷經驗或是症狀，是會阻礙其生活調適，以及重建工作的進行 (Walsh, 2007)；而強調健康因應導向的復原力，則是運用個體本身所擁有的保護因子來因應所面臨的困難，使個體生活適應更佳 (Walsh, 2007；蔡素妙，2002)。所以，本研究之重點即是以復原力概念為自變項，受災居民的生活適應為依變項，運用結構方程式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建構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的生活適應之模型。相關的研究指出 (Tusai & Dyer, 2004；曾文志，2006)，個體所擁有的保護因子是存在個人、家庭、外在環境三個層面，故在本研究亦採此分類。還有，本研究樣本是以屏東縣原住民為主，考量復原力是存在著種族—文化 (ethno-cultural) 之架構下 (Rajkumar, Premkuma & Tharyan, 2008)，故建構復原力之面向時，亦將原住民的生活情境、文化特質納入考量。此外，根據資源保存理論，個體間資源流失之差異，其生活調適亦會有所不同 (Hobfoll, 1989)。所以，也進一步比較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造成工作收入流失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模型否存在著明顯之差異。

根據屏東縣災後重建委員會 (2011) 的統計，截至 2010 年 4 月 5 日，本研究正式資料收集開始，四處中繼屋仍有 384 戶，共 1133 人；其中 18 歲以上者有 843 人，18 歲以下者為 290 人。但由於高士托兒所人數較少 (僅有 12 戶，18 歲以上者 25 人，18 歲以下者 9 人)，且多數者白天都到平地工作。因此，本研究是以其他三處中繼屋為研究區域範圍。因為，本研究區域是侷限在屏東

縣境內，並且主要研究樣本是以排灣族、魯凱族原住民為主，故研究結果的外在推論性是受到限制。

## 貳、文獻探討

### 一、生活適應之意涵

對於生活適應的討論，不同的理論之詮釋不儘相同。精神分析論是從個體人格中的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間的平衡來說明；社會學習論是強調學習歷程，並認為適應是個人與其環境之交互作用；人本論認為適應乃是個體自我實現之歷程；認知論則指出適應是個體的認知結構或基模因應而主動改變的心理歷程（朱敬先，1992；張春興，1994）。過去，也有學者相繼對生活適應意涵提出界定。Arkoff（1968）認為生活適應是個體與其環境的交互作用，個體不斷在滿足自己的需求時，個體與環境之間會不斷的調整，以求兩者間達到和諧狀態。Lazarus（1976）提出的是，適應是一種成功的適當行為，協助個體達成環境的要求或克服來自個人內部的壓力，使其能在內外環境間維持和諧關係。楊國樞（1983）認為適應是個人努力調整自己以適存在於環境中，並改變環境以配合自己的需求，達成個人與環境間的和諧狀態。簡茂發（1986）指出適應是結果也是歷程，個人為滿足基本需求，在現實環境中適當的解決困難，朝向自我實現，且力求與環境的和諧。王以仁、林淑玲與駱芳美（2006）更具體的說明，適應是個人與自身、他人及外在環境互動取得和諧的歷程，個人可能主動改變自己或調適內在心理狀態，可能改變環境，也可二者均改變，以保持與環境的和諧關係。綜合上述，可得知生活適應是個體為滿足其需求，透過個人心理調適、環境改變，來維持個體與自己、他人及外在環境的和諧狀態。

生活適應是個體與自己、他人、外在環境維持和諧之狀態，基本上生活適應也就是一個包涵多層面經驗之概念（鄭麗珍，2001），並且多層面經驗之內涵是會隨個體的生命發展階段或是現實生活處境之差異而有所不同。鄭麗珍（2001）在進行家庭結構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研究時，是依青少年的發展任務將生活適應分成六個層面：社會適應、功課與遊戲調適、生活目標、不適應感、器官自卑感、神經質。黃素惠與徐偉培（2008）在探討新移民子女行為困擾與生活適應時，將生活適應分成四個層面：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學校適應、人際適應。丁榮轟（2006）在以出獄者為研究對象進行進修教育對其生活適應研究時，是將生活適應分成五個層面：個人適應、家庭適應、工作適應、情緒適應、社會適應。Powdthavee（2009）在研究脊椎神經損傷病人出院後的生活適應時，是把焦點放在環境的改變、時間的重新安排、日常活動經驗。

對於災後居住在中繼屋的居民而言，現實生活的重心是在個人內在心理的調適，以及因災後生活環境的改變而必須重新調整與外在社會之關係。因此，本研究是將災後居住在中繼屋的居民之生活適應分成二個生活經驗層面：心理和諧、社會和諧。Walsh（2003, 2006）、李維庭（2000）提到受災居民若是生活適應良好者，在心理層面通常是能夠接受災後的自己，將創傷失落經驗意義化，以及能夠尋找積極正向的展望；Tedeschi 和 Calhoun（1996）表示受災居民若是可以接受他們曾經經驗災害帶來的創傷，並且在心靈上會更提昇，其心理的適應是呈現較佳的狀態。故，本研究中心理和諧層面係指，個體在災難過後能夠珍惜可能有所不同的自己。另外，鍾思嘉（1999）、吳英璋（2000）認為災後生活適應不佳者，在社會層面對外界是質疑與不信任的、猜疑助人者的動機，以及停止與他人的社交；相反的，若是生活適應良好者，則是願意接受他人的協助與安慰，感受到社會是友善的。故，本研究中社會和諧層面主要係指可以感受到社會是友善的，且願意與外在環境互動。

## 二、復原力、資源流失與生活適應

### （一）復原力與生活適應

個體對災難事件發生之反應，不完全是崩潰、瓦解的，其同時也可能引發其學習和復原力（Mancini & Bonanno, 2006），故在災難事件後的生活重建過程中，必須善用個體的復原力，並且與他們一起工作。所謂復原力（resilience），是個體遭受逆境、創傷或是巨大壓力，使其處於不利環境中，猶能與環境互動而發展出保護機制，重獲自我控制能力，有良好的生活適應（Patterson, 2002; Walsh, 2002; 蕭文，2001）。換言之，復原力是個體面對逆境或是潛在性創傷情況下，還能夠使個體維持正向與良好適應之特質、能力、資源（Luthar, Cicchetti, & Becker, 2000）；或個體在面對生理、心理或是環境的危機因子，會有保護因子的出現，來抵抗危機因子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能有良好的適應（Kaplan, Tuener, Norman, Stillson, 1996）。所以，復原力的概念包括了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個體必須暴露於重大逆境，二是即使在逆境中個體還是能維持正向的調適（Luthar et al., 2000）。同時，基本上復原力一詞也被廣泛的用來形容一個人具有的優質特點或特質，以及擁有能夠成功適應環境改變的能力（Olsson, Bond, Burns, Vella-Brodrick, Sawyer, 2003; Richardson, 2002）。

近年來，在個體發展的文獻中，復原力經常以「保護因子」這詞來討論。因為，復原力好像是一個保護因子，能夠緩和個體對壓力情境的反應，或是補償危機的負面衝擊，使個體能產生良好的適應（曾文志，2006；常欣怡、宋麗玉，2007）。另外，Tusai 和 Dyer（2004）從全人觀點考量，認為復原力是危險因子與個人、家庭或環境的保護因子相互影響與平衡的過程，其內涵是需依不同生命階段或危險因子而有所不同。因此，探討不同的逆境或壓力，因為情境或是對象的差異，可能會有不同的保護因子（沈瓊桃，2010）。Garmezy（1985）

曾以暴露於壓力事件下卻能展現能力的兒童為研究對象，瞭解這些可抗壓兒童有哪些因素幫助他們展現能力，統合出三種保護因子：第一種保護因子是兒童自主、自尊、正面社會導向的人格特徵；第二種保護因子是家庭具有凝聚力、溫暖；第三種保護因子則為外在支持系統可以鼓勵與增強兒童因應逆境的力量。Werner 和 Smith (1992, 2001) 亦從有關高風險家庭兒童復原的相關研究中發現三種類別的保護因子：個人保護因子、家庭保護因子、社區保護因子。Fergusson 和 Lynsky (1996) 針對青少年復原力進行討論，亦將分成三個層面：個人特質、家庭、社區環境。常欣怡與宋麗玉 (2007) 針對國內青少年復原力之相關研究進行回饋與分析後發現，青少年的保護因子可分兩個層面，在個人層面包括了正向自我價值、抒解情緒壓力、社交能力等個人特質；在外在支持層面包括了家庭的支持與期待，以及來自同儕與學校老師的支持。基本上，也是包括個人、家庭、外在環境等三類保護因子。

曾文志 (2006) 透過統合分析 1970 年至 2004 年相關復原力保護因子研究後得知，個人復原力型態的保護因子橫跨個人、家庭以及外在系統層面。研究結果呼應了生態理論 (Bronfenbrenner, 1977) 所強調的，存在於大系統 (社會組織)、外在系統 (社區鄰里)、中系統 (家庭) 以及個體等巢狀生態層面的因子會經常變動與交互影響，並形塑個體的適應歷程。另外，面對多樣化的危機時，外在環境支持的保護因子反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及家庭與社區之間的緊密互動或社區凝聚，可能在無形中建立起一股不可忽視的保護能量，可以提供逆境中的個體適當的資源與適時的援助，而這股能量的建立，不能單靠家庭的主動，還往往需要外在系統充分建立豐富的資源與系統性的整合服務。

在有關災難經驗中個體復原力之研究，蔡素妙 (2002) 曾以九二一受創家庭為研究對象探究其復原力，研究結果發現復原力保護因子亦是分成三個層面，一是個人的心理層面，如正向積極的思考與行動、性格樂觀、性格堅毅；

二是家庭正向恆定層面，如家人之間的情感連結、良好的溝通、穩定的家庭經濟；三是家庭外部環境資源，如穩定的物理支持、社會支持力量、社會文化。古文苑（2002）以九二一地震後接受安置的老人為研究對象進行生活調適之研究，研究結果發現影響原因可分成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兩個層面。在內在因素層面，有本身的個性、價值觀、賦予災難事件的意義；在外在因素層面，有社會支持、良好的環境、多元的學習機會、適當的活動參與等。根據上述，在本研究中的復原力保護因子之內涵，是依生態理論觀點，分成個人特質、家庭支持、外在環境資源三個層面。

另外，復原力存在著種族—文化（ethno-cultural）之架構（Rajkumar et al., 2008），也就是復原力與社區居民生活情境脈絡、文化特色與價值有著明顯的關係。Marsella 和 Christopher（2004）就明確的指出，在災難重建過程中對於種族文化特有的信念與策略應給予正向、積極的回應。Clauss-Ehlers（2004）提出的以文化為焦點的復原適應模式（the culturally-focused resilient adaptation model），也明確的指出，個人處理壓力是一個動態、互動的過程，這過程中結合了社會環境中的文化背景與文化價值。Clauss-Ehlers, Yang 和 Chen（2006）的研究指出，情境脈絡因素會影響青少年復原力的發展，其中討論的焦點主要是放在文化的影響。Clauss-Ehlers（2008）針對女性大學生進行復原力發展與文化／種族之間關係探究時發現，文化的背景與經驗確實影響了復原力的發展，也證實了文化對於復原力與因應能力是有意義的。Kayser, Wind 和 Shanka（2008）進一步討論，在災難地區若要強化或支持社區居民的復原力，必須注意跨文化的情境脈絡，尤其應是以個人主義或是以集體主義為基礎來評量社會功能，其結果是有所不同的。

本研究 159 個有效樣本中，155 個樣本是居住在屏東縣部落中的排灣族、魯凱族原住民。基本上，他們的生活情境有其特定的文化情境脈絡。在個人與

世界的關係方面，原住民文化的特點是與大自然共融的靈性意識，人應敬畏自然的神祉；並且是活在當下的存在意識，天性樂觀（王增勇，2002）。Stevenson（1996）曾經在區分傳統原住民與西方科學知識的世界觀特徵時特別提到，傳統原住民面對問題的態度是以耐心等待，因為其相信問題終將解決。陳芬苓與徐菁莘（2008）、黑帶巴彥（2002）的研究曾指出，原住民的生命觀念中，人生而為自然界的產物，所以面對人生中所遭遇的任何快樂與悲傷、幸福或是不幸，認為是自然界的一種「習慣」，也就是生命循環的正常結果，是要坦然接受，故挫折忍受力較高。在人與社會關係方面，是呈現高度的集體意識，像是以家庭及社區為依歸的自我認同，強調互相依賴與共同照顧的社會倫理（王增勇，2002）；並且互助是一種生活方式，同時助人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萬育維、曾梅玲、鄭惠美，2009）。本研究樣本中的魯凱族是以家宅、家氏為親族關係發展的基本要素；排灣族是以家宅系統為基礎發展一個互助的親屬網絡（王嵩山，2001）。根據復原力是存在著種族—文化（ethno-cultural）之架構，上述原住民生活情境之文化脈絡，可能與其復原力的呈現有著某種程度之關聯。

因此，本研究在個人特質層面，除了考量個人特質保護因子有其相對重要性之外（Cicchetti & Tucker, 1994），還考量研究樣本本身的文化背景，特別區分成兩個因子—樂觀、挫折忍受力。樂觀係指一種預期可能會有好結果之態度傾向（Scheier & Carver, 1985），具有緩衝壓力的作用（Lightsey, 1994；毛國楠，1995）。挫折忍受力是一種積極、正向的心理構念，在面對困難時能有足夠的自我控制去面對，並且願意繼續堅持的傾向，以及可以容忍需求的延宕滿足，承受精神的打擊（Rathus & Nevid, 1995；Wiebe, 1991）。在家庭支持層面，則指親友之間有良好溝通、穩定家庭關係，呈現互助的親屬網絡之情形，通常家庭支持可以提供個體情感的安慰與鼓勵或建議，回應所面臨的困境（李素菁，2002）。至於，在外在環境資源層面，主要依據居住在中繼屋居民重要生

活需求為主軸—健康需求、子女教育需求，瞭解目前的居住環境能夠滿足家庭成員健康需求，以及子女教育需求之情形。外在環境資源對於個體或家庭而言，是一股不可忽視的能量，可以提供在逆境中適時的援助（曾文志，2006）。

## （二）資源流失與生活適應

根據資源保存理論，一個人的生活壓力的發生，是因為資源有流失的威脅或確實發生了流失（Hobfoll, 1989）。這樣的概念，近年來被運用來探討災難與心理病狀、災難與因應行為等議題（Hobfoll, 1998；Freedy, Salsdin, Kilpatrick, Resnick, & Saunders, 1994；O' Neill, Evans, Bussman, & Strandberg, 1999；Smith & Freedy, 2000；Arata, Picou, Johnson, & McNally, 2000；謝孟晃，2003；許文耀，2003）。所謂資源，係指對於個體生存有直接或是間接影響的事物，依據與個體生存影響關係遠近可以分成三類：初級資源（primary resources），是指那些直接與生存有關的事物，包括足夠的食物、衣物、房屋、應付環境的支配能力；次級資源（secondary resources），是間接作用於初級資源，包括社會支持、婚姻關係、希望和樂觀；三級資源（tertiary resources），是指那些與初級或次級資源有象徵性關係之事務，包括了豪宅、名車等可顯示社會地位等事物（Hobfoll, 1998）。另外，依據資源屬性又可分成四類（Hobfoll, Dunahoo, & Monnier, 1995）：一是物質資源，如房屋、運輸工具、衣物；二是個人資源，如領導能力、職業技巧、自尊、希望；三是條件資源，如健康、職業、婚姻；四是能量資源，如金錢、信用和知識。基本上，與個體生存有直接相關的資源，或是對個體而言是相對重要的資源流失時，對個體的影響較大。此外，個體資源流失之情形不同，所採取的因應方式也會有所不同，像是資源流失愈多者，比較容易停留在負向情緒中，並且採被動、自我挫敗的因應方式（Hobfoll, 1998）。

Freedy, Shaw, Jarrell 和 Masters（1992）的研究指出，資源流失對災民心理

困頓的影響最大；O' Neill et al. (1999) 研究發現，當災民資源流失愈多，也會出現愈多的心理困頓。Holahan, Moos, Holahan 和 Cronkite (1999) 進行長達 10 年的縱貫性研究發現，資源的流失容易造成個體的不適應。Arata et al. (2000) 進一步指出，條件資源流失愈多時，則災民愈容易採用逃避式的因應行為。Blaze 和 Shwalb (2009) 在 Katrina 颶風過後，針對有接受安置與沒有接受安置的高中生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資源流失能有效的預測研究樣本的內心創傷，以及創傷後心理壓力。謝孟晃 (2003) 的研究指出，個人資源的流失愈多時，如領導能力、職業技巧、自尊，則主動式的問題解決方式出現的機率愈低。許文耀 (2003) 的研究也同樣發現，資源流失愈多的人，愈傾向使用否認或逃脫等逃避式因應；以及尤其當個人特質及能力的流失愈多時，愈採用消極式的因應方式。

由上述可知，資源的流失情況不同，可能引發不同的因應方式，也可能進一步影響其生活適應。在此情況下，本研究選擇了與研究對象生存有直接相關的資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是否流失為控制變項，進一步比較，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資源流失與沒有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兩者生活適應模型是否存在著明顯的差異；以及若有差異存在，則也進一步探討兩個模型差異之處，作為未來協助有工作收入流失者與沒有作流失者生活適應之參考。

## 參、研究方法

###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綜合相關文獻與研究目的，提出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1），其中研究樣本復原力為預測變項，生活適應為依變項，來探討研究樣本復原力對其

生活適應的影響。另外，考量災後居民的生活適應可能因資源流失情形不同而存在著差異，故進一步分析家庭成員因災有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兩組研究樣本生活適應模型之差異。因此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1：研究樣本復原力對其生活適應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

假設2：家庭成員因災有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兩組研究樣本生活適應模型有明顯之差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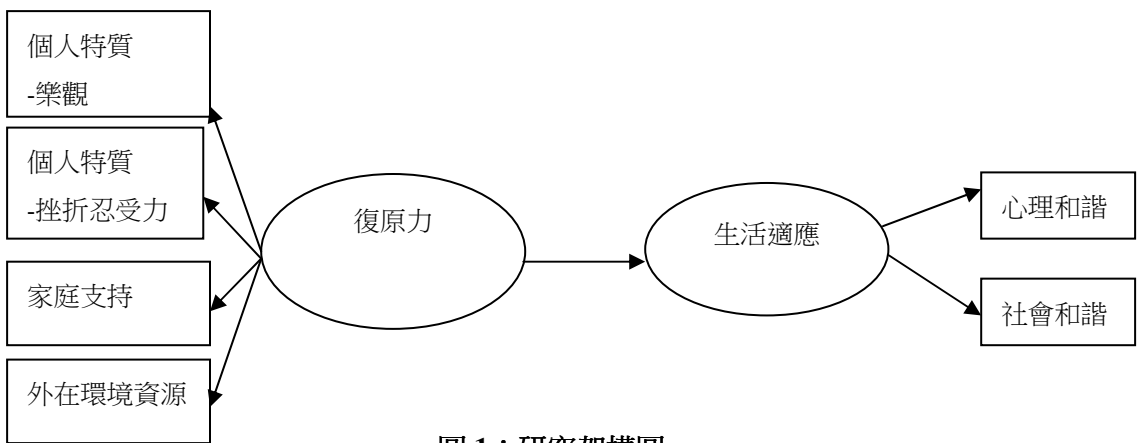


圖 1：研究架構圖

##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工具是研究者自編的「災後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與復原力之問卷」共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生活適應，其理論基礎主要是以 Arkoff (1968)、Lazarus (1976)、楊國樞 (1983)、簡茂發 (1986) 為主；第二部分為復原力，其理論基礎是以 Walsh (2002)、Tusai 和 Dyer (2004)、Werner 和 Sminth (1982, 1992, 2001)、Garmezy (1985)、曾文志 (2006)、蔡素妙 (2002) 等人的看法為依據；第三部分是個人基本資料與資源流失，其理論基礎為 Hobfoll (1998) 提出的資源保存理論。生活適應、復原力此二個部分的測量是

採 Likert 五等尺度的量表方式進行；而個人基本資料與資源流失是屬事實問項。

### 三、研究樣本與資料收集

災後居民的安置依時間長短可分成緊急安置（以 1 周—2 個月為原則）、中短期或是中繼安置（以 2 個月—6 個月為原則）、長期或是永久安置（確定無法返家者）等三種。本研究主要是以莫拉克颱風過後屏東縣進住中繼安置之居民為研究對象，也就是此居民因颱風造成原有住家或社區不宜居住、正等待永久性住宅的安排者。所以，此居民是在災害中受損較為嚴重的一群。屏東縣在莫拉克颱風中成立的中繼屋共有四處，截至 2010 年 4 月仍有 1133 人，共 384 戶。考量當時高士托兒所只剩下 34 人，人數偏少，且多數者都到平地工作，故僅針對其他三處進行調查，三處總人數是 1009 人，共 372 戶。此外，考量 18 歲以下者身心發展尚未完全成熟，故是以年滿 18 歲者為研究對象，截至 2010 年 4 月是 818 人（扣除高士托兒所）。

表 1：屏東縣重建區安置收容所開設統計表

收容場所	收容人數/戶數	18 歲以上	18 歲以下	有效樣本
屏東榮譽國民之家	320/134	224	96	58
298 旅龍泉營區	359/119	261	98	59
屏東潮州忠誠營區	420 /119	333	87	42
高士托兒所	34/12	25	9	0
合計	1133/384	843	290	159

（資料來源：屏東縣災後重建委員會，2011）

問卷收集資料時間從 2010 年 5 月至 6 月底，受訪者是透過中繼屋管理單位工作人員的介紹與媒合。為避免受訪者感受到來自中繼屋管理單位工作人員的壓力，收集資料的程序是本研究訪員與中繼屋管理單位工作人員一同到受訪者居住處，工作人員說明大致的研究目的與介紹本研究訪員之後就離去，就由本研究訪員詳細說明研究目的，並徵求受訪者同意後，進行一對一結構式訪談，或是識字能力佳之受訪者自行填寫。由於，有些中繼屋居民不願意接受訪問，有些則是時間上難以搭配，最後共獲得有效樣本 159 位。

研究樣本中男性 54 人(34.0%)，女性 105 人(66.0%)，年齡層集中在 41-64 歲(57, 35.8%)、26-40 歲(47, 29.6%)；教育程度是以高中職或以上為多數(67, 42.1%)，其次是國小或不識字(60, 37.7%)。研究樣本幾乎全都是原住民者，占有 155 人(97.5%)，其中是以排灣族與魯凱族<sup>2</sup>為主，原居住鄉鎮是以三地門鄉(60, 37.7%)與霧台鄉(57, 35.8%)為多數，其次是來義鄉(27, 17.0%)；宗教信仰是以基督教為主(109, 68.6%)，其次是天主教(32, 20.1%)；因災影響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方面，沒有流失者(84, 52.8%)與有流失者(75, 47.2%)約占各半。

#### 四、資料分析

本文主要是以 AMOS 17.0 統計軟體作為分析工具，採用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依研究假設分成二個步驟加以分析：(一) 檢定研究樣本生活適應結構模型之適合度及潛在關係；(二) 比較因災家庭成

---

<sup>2</sup>根據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9)的統計資料，屏東原住民人口數有 52511 人，其中排灣族 43790 人，佔 83.39%，魯凱族 5421 人，佔 10.32%，是屏東縣境內原住民人口數排名第一、第二。也因此本研究樣本是以排灣族、魯凱族為主。

員有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兩組研究樣本生活適應結構模型潛在關係之差異。

## 五、研究倫理與研究限制

雖然災難事件提供了相關學者研究的機會，但同時也提供了挑戰，即是在進行與災難事件受災者相關的研究中一定會遇到倫理的議題。Knack, Chen, Williams 和 Jensen-Campbell (2006)、Newman 和 Kaloupek (2004) 就提到，在進行災難研究時，主題的焦點最好是放在促進受災者幸福感；對資料的詮釋應注意到災難事件的本質、社區的文化，不可將研究結果做擴大的解釋；對研究參與者清楚的說明研究目的，並且不可以誇大參與研究能夠具有治療性效果。所以，研究者在進行研究時，把研究焦點放在正向的復原力與生活適應，特別留意不對研究結果擴大解釋，以及向研究對象清楚說明研究目的，並獲得同意後再進行訪談。

本文僅初步的建構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之模型，驗證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的復原力對其生活適應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以及進一步驗證因災害有工作收入流失者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兩組模型存在著顯著差異。雖然，研究結果對災後居民生活適應的了解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不過所建構模型完整性仍有限。

## 肆、研究發現

### 一、研究樣本的生活適應模型

有關模型適合度的評鑑，依 Bagozzi 和 Yi (1988) 的看法，主要從基本的適合標準 (preliminary fit criteria)、整體模型適合度 (overall model fit) 及模型內在結構適合度 (fit of internal structure of model) 三方面來評鑑，其中整體模型適合度是在評鑑外在品質適配標準，模型內在結構適合度是在評鑑內在品質適配標準。故，在本研究中除考慮模型的外在品質之外，同時也考量模型的內在品質。

#### (一) 基本適合度評鑑

Bagozzi 和 Yi (1988) 認為較重要的模型基本適合標準有以下幾項：1. 不能有負的誤差變異數、或者在任何模型建構中存在著無意義的誤差變異。2. 誤差變異必須達 0.05 之顯著水準。3. 標準化係數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1。4. 因素負荷量不能太低 (低於.50) 或太高 (高於.95)。

依據 Bagozzi 和 Yi (1988) 的標準，首先發現模型都沒有負的誤差變異，誤差變異也都達到 0.05 之顯著水準。其次在「標準化係數的絕對值不能太接近 1」的規準上，發現模型之估計參數之間相關的絕對值大都沒有太接近 1，表示模型之界定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請見表 2)。另外，由圖 2 得知因素負荷量沒有低於 0.50，也沒有高於 0.95。所以，上述檢定的結果，顯示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有相當良好的建構效度。

表 2：模型基本適合度評鑑之參數估計表

變項名稱	非標準化參數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參數
復原力				
個人特質-樂觀	1.000	-	-	0.62
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	1.05	0.149	7.051***	0.74
家庭支持	1.30	0.182	7.192***	0.73
外在環境資源	1.10	0.155	7.065***	0.73
生活適應				
心理和諧	1.000	-	-	0.72
社會和諧	0.94	0.120	7.835***	0.79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二) 整體模型適合度

本研究根據 Byrne (1989) 的建議，以絕對適合指標、相對適合指標、在簡效適合指標之整體適合指標作為因果模式適合度評鑑。由表 3 及圖 2 顯示本文的模式分析中，卡方值未達顯著 ( $p=0.392$ )，且卡方值除以 df 值為 1.054，符合模式適合度評鑑標準值。整體模式中，絕對適合指標之 GFI 為 0.983、RMSEA 為 0.019，均達模式評鑑標準；其次在相對適合指標之 NFI 為 0.976、CFI 為 0.999、IFI 為 0.999、RFI 為 0.955，都超過接受值 0.90，意謂著模式整體表現相當優秀；再從簡效適合指標來看模式是否具備簡效性，PNFI 為 0.520、PGFI 為 0.374，僅 PGFI 稍低於接受值 0.5，顯示本模式尚可被接受，並具有一定的簡效性。綜合上述，三類型指標顯示此模式的適合度可被接受，因此可以進一步檢驗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信效度。

表 3：模式適合度指標考驗（總體模型）

適合度考驗指標	接受值	模式指標值	考驗結果
絕對適合指標（Absolute fit measures）			
自由度		8	
$\chi^2$ 值（p 值）	$p > 0.05$	8.436 ( $p = 0.392$ )	接受
適合度指數（GFI）	$\geq 0.9$	0.983	接受
漸進誤差均方根（RMSEA）	$\leq 0.1$	0.019	接受
相對適合指標（Relative fit measures）			
規範適合指標（NFI）	$\geq 0.9$	0.976	接受
比較適合指標（CFI）	$\geq 0.9$	0.999	接受
增值適合指標（IFI）	$\geq 0.9$	0.999	接受
相對適合指標（RFI）	$\geq 0.9$	0.955	接受
適合度考驗指標	接受值	模式指標值	考驗結果
簡效適合指標（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簡效規範適合指標（PNFI）	$\geq 0.5$	0.520	接受
簡效良性適合指標（PGFI）	$\geq 0.5$	0.374	不接受
卡方值自由度比（ $\chi^2/df$ ）	$< 3$	1.054	接受

group=Group number 1

Chi square = 8.436

df = 8 norm-chi=1.054

p = .392

agfi=.954 gfi=.983

rmsea=.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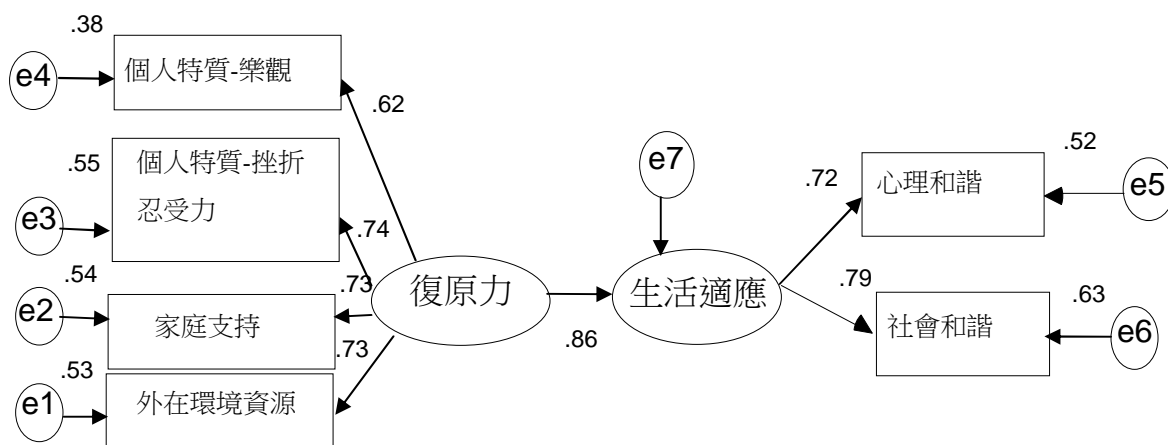


圖 2：研究樣本復原力與生活適應結構模式圖（總體模型）

### （三）模型內在結構適合度

在表 4 中，模型中六個觀察指標的個別信度，全都高於.50 的標準，此結果顯示這六個觀察指標測量誤差並不是很大，都在合理的範圍內。兩個潛在變項的組成信度依序為 0.799 和 0.727，兩個變項皆符合「需達.60 以上」的評鑑標準。最後，修正模型「生活適應」的變異抽取量為 0.571，符合「需達.50 以上」的評鑑標準。上述結果顯示本研究所使用的測量工具有相當良好的信度，但同時潛在變項「復原力」的抽取變異量卻有稍低於 0.5 的標準，顯示模型與資料的適合度上仍差強人意。

表4：模型內在結構適合度評鑑

變項	因素負荷量	潛在變項的 組成信度	平均變異 抽取量
復原力		0.799	0.499
個人特質—樂觀	0.62		
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	0.74		
家庭支持	0.73		
外在環境資源	0.73		
生活適應		0.727	0.571
心理和諧	0.72		
社會和諧	0.79		

（四）研究假設檢定

有關「假設 1：研究樣本復原力對其生活適應有顯著性的正向影響。」之檢定，由圖 2 可知此研究假設是成立，也就是研究樣本的復原力對生活適應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標準係數為 0.86）。所以，研究樣本的個人特質愈樂觀、挫折忍受愈高，以及家庭支持與外在環境資源愈多時，其生活適應情況愈好。故，若能強化研究樣本的復原力，則有助於生活適應之情況。

二、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生活適應模型之比較

本節利用多群組模式分析，將模型分成因災家庭成員有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做比較，透過巢型模式（nested model comparison）比較，結果如表 5。巢型模式比較是基於假設未設限模式為真的情況，兩組在各種巢型模式比較下，是否有顯著差異。經過測量模式（measurement weights）、結構模式（structural weights）、結構共變異（structural covariances）的巢型模式比較，

皆有顯著差異，顯示此兩組的生活適應模型有顯著不同。所以，「假設 2：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兩組研究樣本生活適應之模型有明顯之差異」獲得成立。

表5：多群組模式分析之巢型模式比較

模式	自由度	CMIN	p
測量模式	4	11.923*	.018
結構模式	5	12.635*	.027
結構共變異	6	13.352*	.038

\* $p < 0.05$

### （一）復原力比較

在復原力方面，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研究樣本在模型中的個人特質—樂觀保護因子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標準化係數  $0.51 < 0.68$ ），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標準化係數  $0.61 < 0.81$ ）；但相反的，家庭支持保護因子是高於沒有工作收入者（標準化係數  $0.83 > 0.67$ ）；另外，外在環境資源兩者之間是沒有差別的（標準化係數  $0.73 = 0.73$ ）。會有此結果，與所流失的資源之屬性—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是屬於初級資源(Hobfoll, 1998)，與研究樣本的生存有緊密關係。當個人生存受到了威脅時，若是要維持較佳的生活適應，則個人特質中的樂觀與挫折忍受力的能量較有限，而必須依靠家人的支持。

### （二）生活適應比較

在生活適應方面，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者，其個人心理和諧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標準化係數  $0.58 < 0.87$ ）。會有此結果，可以進一步確認重要資源的流失，會影響一個人較容易以負面的角度來看待自己。Wells, Hobfoll 和 Lavin (1999)的研究結果即指出，資源流失者是較容易出現負面情

緒；Kessler, Turner 和 House (1988)的研究也指出，失業者對自己較容易出現負面看法；Blaze 和 Shwalb (2009) 指出資源流失能夠有效的預測個體的內心創傷與壓力。但是，因災而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者，其社會和諧是高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標準化係數  $0.87 < 0.76$ ）。此研究結果反應出，有工作收入流失因而獲得較多外在環境資源協助者，會以較正向的態度來評價外在社會環境給予的對待，而感受到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是較友善。

### （三）生活適應模型比較

在整體模型方面，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研究樣本復原力對其生活適應的正向影響程度，是低於因災後沒有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流失研究樣本（標準化係數  $0.81 < 0.89$ ）。此現象的產生可說明災民生活適應與資源流失之間有密切的關係。在災難中有資源流失者，尤其是與個體生存有關資源流失，其復原力對其生活適應之作用，相較於沒有資源流失者是弱的。此結果除了驗證了資源保持理論之觀點，即是個體資源流失之情形不同，所採取的因應方式也會有所不同之外（Hobfoll, 1998）；同時，也提醒著復原力此四個保護因子對有具體工作收入流失者的生活適應是較為有限，因此若要協助其能儘快有較佳的生活適應，還需要尋求其他可能重要的影響因素。

## 伍、結論

### 一、結論與討論

#### （一）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之模型

研究結果發現，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的復原力—個人特質—樂觀、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家庭支持、外在環境資源，對其生活適應有正向顯著影響。

此研究結果驗證了，在重大逆境中復原力的保護因子能夠緩和個體對壓力情境的反應，補償危機的負面衝擊，進而使個體能夠有良好的適應之論點或是相關研究結果（Patterson, 2002；Walsh, 2002；Tusai & Dyer, 2004；曾文志，2006；蔡素妙，2002；古文苑，2002；蕭文，2001）。

在圖 2 生活適應總模型中也發現，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對研究樣本生活適應的影響力最強，其次是家庭支持也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這樣的研究結果，某種程度呼應了復原力存在著種族—文化（ethno-cultural）之架構（Rajkumar et al., 2008）。首先，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對研究樣本生活適應的影響力最強，很重要的原因是與原住民面對問題的態度有關。傳統原住民面對問題的態度是以耐心等待，因為其相信問題終將解決（Stevenson, 1996）；原住民的生命觀念中，人生而為自然界的產物，所以面對人生中所遭遇的任何幸福或是不幸，認為是自然界的一種「習慣」，不需極力對抗，而是坦然接受與面對（陳芬苓、徐菁莘，2008；黑帶巴彥，2002）。其次，在原住民的文化中親屬或親族間相互照顧確實是生活中重要的支持來源，並且也是協助問題解決的重要系統。例如，強調家人互相依賴與共同照顧的社會倫理（王增勇，2002）；互助與助人是一種生活方式（萬育維等人，2009）。本研究樣本中的魯凱族與排灣族本來就生活在一個互助的親屬網絡（王嵩山，2001），尤其居住在部落的魯凱族人常以「全聚落都是親戚」指稱聚落成員可藉由家屋間的（親屬）關聯或聯姻關係加以連結，所以生活中的食物可共享、金錢互有往來、代為照顧生病的家人，或者彼此間的「換工」是「應當做的事」（鄭瑋寧，2000）。所以，在以生活文化脈絡為基礎的架構下，善用原住民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家人之間的相互支持是有助於災後生活之調適。

另外，值得討論的是外在環境資源之影響意義。確實面對多樣化的危機時，外在環境資源保護因子是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在本研究中，外在環境

資源與家庭支持對研究樣本生活適應有著同樣的重要性。所以，當自然災害的出現威脅時，社會環境必須要有一個提供緩衝的支持的安全機制，讓他們在面對這些自然災害（以及衍生其他災害）時可以尋求一些協助與庇護，或者減低這個災害給予的直接衝擊（鍾宛君，2011）。至於，外在環境資源保護因子之建立，往往是需要外在系統充分建立起豐富的資源與系統性的整合服務（曾文志，2006），以及外在環境資源系統要發揮其預期效益，必須是堅實有力、速度快、有效的解決問題（Zobel, 2011）。

因此，若能強化或建置災後居民在中繼屋居民的復原力，像是建立樂觀態度、強化挫折忍受力、加強家庭支持、建置外在環境資源系統，是有助生活適應。只是當中繼屋居民是原住民（或是屬於魯凱或是排灣族的原住民時），是要看重其個人本身的挫折忍受力之特質，尊重其解決問題的態度；必須瞭解親屬間既有的互助網絡，透過相關的服務輸送鞏固互助網絡，使其能發揮預期之效果。

## （二）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生活適應模型之比較

研究結果發現，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者與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的生活適應模型存在一些差異。在復原力方面，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研究樣本在模型中的個人特質—樂觀保護因子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個人特質—挫折忍受力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但相反的，家庭支持保護因子是高於沒有工作收入者。在生活適應方面，有工作收入流失者的心理和諧是低於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但社會和諧是高於沒有工作收入者。整體模型方面，有工作收入流失者復原力對生活適應正向影響程度是較沒有工作收入流失者低。此結果驗證了資源保存理論中資源流失的情形不同，因應方式與生活適應情況也會有所差異（Hobfoll, 1998; Arata et al., 2000; Blaze & Shwalb, 2009；

謝孟晃，2003；許文耀，2003）。所以，雖然都是災後居住在中繼屋等待遷村（或是永久屋）的居民，但是會因為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情況不同，其復原力的展現、生活適應狀況，以及復原力對生活適應之影響會有所差異。因此，災後重建工作的相關評估必須強化對於資源流失議題之關注，並且根據資源流失情形給予適時的協助。

另外，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流失者的心理和諧較沒有流失者低，也就是財務資本的流失會對自我有比較負向的看法。此研究結果也呼應目前在災難重建中逐漸被討論的議題—經濟性復原（*economic resilience*）（Rose, 2007）。經濟性復原強調的是，如果可以使受災災民能夠儘快恢復經濟上的資本，如獲得適當的經濟協助、回到原有的工作崗位、找到合適的工作，可以減少在災難過後的失落感。也因此，災難過後的經濟補助、協助就業、創造適當的就業機會，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不過，經濟補助是一時的、非常態性的；相形之下，協助就業、創造適當的就業機會，可以創造受災居民有穩定、長期收入。故，在災後重建過程，協助就業或是創造就業機會，使受災居民獲得適當的經濟資源，是有助於其生活適應。

還有，值得討論的是有關「樂觀」、「挫折忍受力」保護因子的作用。在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有流失者模式中，呈現出的個人特質—樂觀、挫折忍受力的程度，是低於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沒有流失者模型；但是家庭支持是高於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沒有流失者模型。此意味著，雖然個人特質—樂觀、挫折忍受力此保護因子是具有緩衝壓力的效果，但似乎當個體有具體物質/金錢資源流失時，效益就有減弱之現象。相形之下，家庭支持保護因子之效益對有具體物質/金錢資源者來得高。因此，在災後重建過程中，面對有財務資源流失者，不能只是一味的期待他們要樂觀、看開一點，是必須透過相關服務來強化家庭支持，使其能夠獲得適時的安慰與照顧。

## 二、建議

- (一) 根據種族—文化 (ethno-cultural) 架構之概念，善用及強化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的復原力，提昇其生活適應。研究結果證實，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之復原力對於其生活適應有正向影響，並且對以原住民為主的中繼屋居民而言，個人本身的挫折忍受力、家庭支持此兩個保護因子之效應相對較大。故，要看重其個人本身的挫折忍受力之特質，善用親屬間既有的互助網絡。
- (二) 建立堅實有力的外在環境資源系統，作為中繼屋居民面對災後生活重建的緩衝支持系統。研究結果發現，外在環境資源保護因子對中繼屋居民的生活適應也有相當程度的正向效益，故對於相關資源相對薄弱的中繼屋，宜建置資源豐富且具整合性之外在環境資源系統。
- (三) 加強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的資源流失之評估，作為提供相關服務方案之參考。研究結果證實，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的生活適應模型，與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沒有流失者模型之間有明顯的差異存在，包括復原力四個保護因子的展現程度、生活適應情形。可見，資源流失情況不同，其復原力、生活適應情形也會有所差異。故，建議提供相關服務方案之前，應加強對受災居民不同種類資源流失之評估。尤其針對有工作收入流失者，應該積極強調經濟性復原，如此可以減少他們在災難過後的失落感，儘快投入災後重建。因為，工作收入與個體生存有密切關係，若沒有立即的解決，則容易停留在負向情緒中，影響重建工作的進行。
- (四) 針對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者，應善用其家庭支持保護因子之效能服務。研究結果發現，因災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者之家庭支

持程度，是明顯的高於因災沒有造成家庭成員工作收入者。可見，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流失，即家庭財物資本流失，家庭支持保護因子對其生活適應具有重要的影響力。所以，除了積極進行經濟性復原之外，還必須持續透過相關家庭服務，來強化家庭成員工作收入有流失者之家庭支持，進而提昇其生活適應。

（五）對後續研究之建議。雖然，本研究災後居住在中繼屋居民生活適應模型基本適合度、整體模型適合度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唯模型內在結構適合度中「復原力」的抽取變異量卻稍低於 0.5 的標準，故此模型之適合度有其限制。故，建議未來後續研究可以以本研究結果為基礎，建構更佳的測量工具。另外，本研究僅初步建構災後居住中繼屋居民的生活適應之模型，驗證受災居民的復原力對其生活適應有顯著正向影響，以及進一步比較家庭成員工作收入因災是否造成流失兩者模型之差異，但所建構模型完整性仍有限。故，建議未來可增加不同的預測變項，或是其它屬性資源流失與是否為控制變項，提昇受災居民生活適應模型的完整度。此外，研究結果發現，家庭成員因災造成工作收入流失者生活適應模型中，個人特質—樂觀和挫折忍受力、家庭支持、外在環境資源等四個保護因子，對其生活適應的正向影響是低於沒有流失者，此意味著影響著家庭成員因災造成工作流失者生活適應可能還存在其他重要因素，故建議後續相關研究可朝此方面做更深入的探究。

## 參考書目

- 丁榮轟（2006）。〈我國犯罪矯正機構實施空中大學矯正教育對出獄人生活適應之研究〉，《犯罪學期刊》，1: 73-112。
- 毛國楠（1995）。《教師人格特質、自我效能、對壓力的評估因應方式與工作調適及身心健康研究報告》。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 王以仁、林淑玲、駱芳美（2006）。《心理衛生與適應（二版）》。台北：心理。
- 王嵩山（2001）。《臺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台北：聯經。
- 王增勇（2002）。〈原住民社會工作與福利服務〉，呂寶靜（編），《社會工作與台灣社會》，頁 309-347。台北：巨流。
- 古文苑（2002）。《災難後老人安置與調適歷程之探討—以埔里菩提長青村為例》。暨南國際大學成人與繼續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朱敬先（1992）。《健康心理學》。台北：五南。
-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2009）。〈屏東縣原住民人口數統計資料〉。上網日期：2011 年 04 月 28 日，取自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網頁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Detail.html?CID=940F9579765AC6A0&DID=3E651750B400646718E9EF7E50763AFF>。
- 吳英璋（2000）。〈心理的復（重）建與心靈的復（重）建〉。「九二一震災心理復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
- 李素菁（2002）。《青少年家庭支持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以台中市立國中生為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學系碩士論文。
- 李維庭（2000）。〈經歷九二一：災民安置所的心理重建經驗〉，《應用心理研究》，6: 213-250。
- 沈瓊桃（2010）。〈暴力的童年、堅韌的青年：目睹婚暴暨受虐青年復原力之探

討》，《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27: 115-160。

屏東縣災後重建委員會(2011)。<〈重建服務中心及災民收容所〉。上網日期: 2011

年5月1日，取自屏東縣災後重建委員會網頁 <http://88flood.pthg.gov.tw/>。

高玉玲、王如華、白璐、黃碧桃(2000)。<〈先天性心臟病學童手術後生活適應之探討〉，《護理雜誌》，47: 43-53。

常欣怡、宋麗玉(2007)。<〈青少年復原力概念與相關研究之探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7: 171-192。

張春興(1994)。<《現代心理學》。台北：東華。

許文耀(2003)。<〈九二一地震後災民的資源變化與心理症狀間的關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6: 1-19。

陳玉華、伊慶春、呂玉瑕(2000)。<〈婦女家庭地位之研究：以家庭決策模式為例〉，《台灣社會學刊》，24: 1-58。

陳芬苓、徐菁苹(2008)。<〈心與靈的健康觀與疾病觀—以現代泰雅族原住民為例〉，《台灣衛誌》，27: 411-420。

曾文志(2006)。<〈復原力保護因子效果概化之統合分析〉，《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諮商輔導學報—高師輔導所刊》，14: 1-35。

黃素惠、徐偉培(2008)。<〈新竹市新移民子女行為困擾與生活適應之研究〉，《教育暨外國語文學報》，7: 1-18。

黑帶巴彥(2002)。<《泰雅人的生活型態探源——一個泰雅人的現身說法》。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楊國樞(1983)。<《現代社會的心理適應》。台北：巨流。

萬育維、曾梅玲、鄭惠美(2009)。<〈從部落工作經驗建構原住民社會工作教育的內涵〉，《社區發展季刊》，127: 89-98。

蔡素妙(2002)。<〈家庭的意義:大學生的家庭概念調查〉，《中華輔導學報》，11:

167-189。

鄭瑋寧（2000）。《人、家屋與親屬：以 Taromak 魯凱人為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麗珍（2001）。〈家庭結構與青少年的生活適應之研究—以台北市為例〉，《台大社工學刊》，5: 197-270。

蕭文（2001年3月）。《復原力的概念及在輔導上的應用》。「新加坡華人輔導知能研討會」，新加坡。

謝孟晃（2003）。《探討九二一地震後資源流失與因應行為對居民災後身心症狀的影響》。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宛君（2011）。《自然災害、遷移選擇與社會環境影響—以雲林縣古坑鄉為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鍾思嘉（1999）。〈存在失落：一個大學生災後心理輔導的課題〉，《輔導季刊》，35(3):37-39。

簡茂發（1986）。〈大學生適應問題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28: 1-90。

Arata, C. M., Picou, J. S., Johnson, G. D., & McNally, T. S. (2000). Coping with technological disaster: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model to the Exxon Valdez oil spill.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3*(1): 23-39.

Arkoff, A. (1968). *Adjustment and mental health*. New York: McGraw Hill.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6*(1): 74-94.

Blaze, J. T. & Shwalb, D. W. (2009). Resource loss and relocation: A follow-up study of adolescents two year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 and policy, 1*: 312-322.

- Bronfenbrenner, U. (1977). Toward an experimental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merican Psychologist*, 32: 513-531.
- Byrne, B. M. (1989). A primer of LISREL: Basic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 model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Cicchetti, D., & Tucker, D. (1994). Development and self-regulatory structures of the mind.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6: 533-549.
- Clauss-Ehlers, C. S. (2004). Re-inventing resilience: A model of “culturally-focused resilient adaptation”. In C.S. Clauss-Ehlers & M. D. Weist (Eds.), *Community planning to foster resilience in children* (pp. 27-41). New York, NY: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Clauss-Ehlers, C. S. (2008). Sociocultural factors, resilience, and coping: Support for a culturally sensitive measure of resilience.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9: 197-212.
- Clauss-Ehlers, C.S., Yang, Y. T., & Chen, W. (2006). Resilience from childhood stressors: The role of cultural resilience, ethnic identity, and gender identity. *Journal of Infant,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otherapy*, 5(1): 124-138.
- Fergusson, D., & Lynskey, M. (1996). Adolescent resiliency to family adversity. *Journal of Child Psychiatry*, 37(3): 281-292.
- Freeddy, J. R., Salsdin, M. E., Kilpatrick, D. G., Resnick, H. S., & Saunders, B. E. (1994). Understanding acut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following natural disaster.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7(2): 257-273.
- Freeddy, J. R., Shaw, D. L., Jarrell, M. P., & Masters, C. R. (1992). Towards and understanding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of natural disasters: An application of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stress model.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5:

441-454.

Garmezy, N. (1985). Stress resistant children: The search for protective factors. In J. Stevenson (Eds.). *Rec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pp. 213-233). Oxford: Pergamon Press.

Hobfoll, S. E. (1989).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 new attempt at conceptualizing stres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3): 513-524.

Hobfoll, S. E. (1998). *Stress, culture, and community: The psych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tress*. New York: Plenum Press.

Hobfoll, S. E., Dunahoo, C. A., & Monnier, J. (1995).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and traumatic stress. In J. R. Freedy & S. E. Hobfoll (Eds.), *Traumatic stres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pp. 29-47). New York: Plenum Press.

Holahan, C. J., Moos, R. H., Holahan, C. K., & Cronkite, R. C. (1999). Resource loss, resource gain,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10-year mode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620-629.

Kaplan, C. P., Tuener, S. Norman, E. & Stillson, K. (1996). Promoting resilience strategies: A modified consultation model. *Social work in education*, 18(3): 158-168.

Kayser, K., Wind, L. & Shankar, R. A. (2008). Disaster relief within a collectivistic context.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34: 87-98.

Kessler, Ronald C., Turner, J. B., & House, J. S. (1988). Effects of unemployment on health in a community survey: Main, modifying, and mediating effect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4: 69-85.

Knack, J. M., Chen, Z., Williams, K. D., & Jensen-Campbell, L. A. (2006).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studying disaster survivors. *Analyses of social*

*issues and public policy*, 6: 175-189.

La Gaipa, J. J. (1990).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informal support systems. Dans S. Duck & R. C. Silver (Ed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support* (pp. 122-158). London: Sage.

Lazarus, R. S. (1976). *Patterns of adjustment* (3rd ed.). New York: Mc Gram-Hill.

Lightsey, O. R. (1994). Positive automatic cognitions as moderators of the negative life event-dysphoria relationship.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18: 353-365.

Luthar, S. S., Cicchetti, D. & Becker, B. (2000). 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 A critical evaluation and guidelines for future work. *Child Development*, 71(3): 543-562.

Mancini, A. D., & Bonanno G. A. (2006).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potential trauma: clinical practices and illustrations.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62: 971-985.

Marsella, A. J., & Christopher, M. A. (2004). Ethnocultural considerations in disasters: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issues, and direction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7(30): 521-539.

Newman, E., & Kaloupek, D. G. (2004).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participating in trauma-focused research studie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7: 383-394.

Norris, F. H., Tracy, M. & Galea S. (2009). Looking for resilience: Understanding the longitudinal.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8: 2190-2198.

O' Neill, H. K., Evans, B. A., Bussman, M. D., & Strandberg, D. K. (1999). Psychological distress during the red river flood: Predictive utility of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model.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Review*, 7(2): 159-169.

Olsson C. A., Bond, L., Burns, J. M., Vella-Brodrick, D. A., & Sawyer, S. M. (2003).

- Dolescent resilience: A concept 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6: 1-11.
- Patterson, J. M. (2002). Integratin family resilience and family stress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349-360.
- Powdthavee, N. (2009). What happens to people before and after disability? Focusing effects, lead effects, and adapt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of lif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9: 1834-1844.
- Rajkumar, A. P., Premkumar, T. S., & Tharyan, P. (2008). Coping with the Asian tsunami: Perspectives from Tamil Nadu, India on the determinants of in the face of adversit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7: 844-853.
- Rathus, S. A., & Nevid J. S. (1995). *Adjustment and growth: Psychology and the challenges of life*, (6th ed.). New York: Holt, Rinehert and Winston, Inc.
- Richardson, G. E. (2002). The metatheory of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y.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58(3): 307-321.
- Rose, A. (2007). Economic resilience to disasters: Multidisciplinary origins and contextual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hazards: Human and social dimensions* 7(4): 383-98.
- Scheier, M. F., & Carver C. S. (1985). Optimism, coping, and health: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lized outcome expectancies. *Health Psychology*, 4: 219-247.
- Smith, B. W., & Freedy, J. R. (2000). Psychosocial resources loss as a mediator of the effects of flood exposure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symptoms.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13(2): 349-357.
- Stevenson, M. G. (1996). Indigenous knowledge in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rctic*, 49: 278-291.

-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6). The 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 measuring the positive legacy of trauma.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9: 455-471.
- Thompson, A. M. (1995). Latent cosmopolitan and local orientation among rural emergency service volunteer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4(2): 103-115.
- Tusai, K. & Dyer, J. ( 2004) . Resilience :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construct. *Holist nursing practice*, 18(1): 3-8.
- Walsh, F. (2002). A family resilience framework: innovative practice applications. *Families Relations*, 51: 130-137.
- Walsh, F. (2003). Family resilience: A framework for clinical practice. *Family Process*, 42:1-13.
- Walsh, F. (2006). A middle school dilemma : dealing with I don't care. *American Secondary Education*, 35(1): 5-15.
- Walsh, F. (2007). Traumatic loss and major disaster: Strengthening family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Family Process*, 46(2): 207-227.
- Wells, J. D., Hobfoll, S. E., & Lavin, J. (1999). When it rains, it pours: The greater impact of resource loss compared to gain on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5: 1172-1184.
- Werner, E. E., & Smith, R. S. (1992). *Overcoming the odds: High risk children from birth to adulthoo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 Werner, E. E., & Smith, R. S. (2001). *Journeys from childhood to midlife: Risk,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 Wiebe, D. J. (1991). Hardiness and stress moderation: A test of proposed

mechanis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1): 89-99.

Zobel, W. (2011). Representing perceived tradeoffs in defining disaster resilience.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50: 394-403.



研究論文

# 光明之路：台灣偏鄉單親母親脫離貧窮 的非營利組織策略初探<sup>\*</sup>

吳文炎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副執行長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研究生

周江杰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外展專員

---

收稿日期：2014 年 4 月 16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5 月 24 日。

<sup>\*</sup>本文初稿曾在 2014 年 3 月 22 日發表於「兩岸三地高峰論壇暨學術研討會」，感謝與會專家學者提供意見，同時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 中文摘要

台灣研究指出在偏鄉、女性單親家庭、教育程度低落及戶內依賴人口過多，是導致落入貧窮（poverty）的各項因素。然有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研究指出男性戶長之貧戶在獲得社會救助後其「貧窮惡化」的機率比女性戶長之貧戶高。女性戶長即便沒有能力翻轉貧戶身分，但相較男性戶長其福利依賴的情況較輕微。這樣的分析結果與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十一年來在台灣偏鄉從事補救教學，鼓勵並培訓社區內單親媽媽成為課輔老師所展現出來的充權（empowerment）工作經驗相符。本研究先提出博幼基金會散布台灣偏鄉與社區民眾合作成立課輔中心的策略發展為經，再針對單親媽媽成為課輔老師的生命經驗進行半結構式訪談為緯，藉此研析此一非營利組織之「同村教養」經營策略究竟如何協助偏鄉單親母親家庭（mother-only families）成員自喪偶或離婚的狀態中逐步復原。研究發現博幼基金會所採取的「同村教養」經營策略，長遠目標是協助位處偏鄉的單親母親成為一個典型工作受僱者（typical employee），一方面除能解決經濟上的需求；另一方面亦能處理單親媽媽工作與孩子教養無法兼顧的問題；最後也重要的是，當課輔老師是偏鄉的單親媽媽時，與母親共同學習的氛圍亦增加了單親母親與其孩子間交互正面回饋力量的機會，為下一代埋下脫離貧窮的希望種籽。

**關鍵字：**貧窮、單親家庭、補救教學、課輔老師、台灣原住民

# **Path to bright: From Taiwan Township single mothers' experience to explor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trategy**

**Wen-Yen Wu**

Deputy Executive Manager, Boyo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Graduate students ,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Child Youth

Welfare , Providence University

**Chiang-Chieh Chou**

Research Associate, Boyo Social Welfare Foundation.

## **Abstract**

Taiwan studies indicate female single parent families, low levels of education and households rely on overpopulation is leading to poverty. Welfare dependency studies showed that 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in access to social assistance to families with their "poverty" than female-headed families with high probability. Female heads of household poverty even without the ability to flip, but compared to 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of their welfare dependency is relatively minor. The analysis experience consistently with the boyo social welfare fund for 11 years engage in remedial instruction, single mother, encouraged and trained in the community to become secondary teachers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first made Boyo Foundation spread Taiwan partial Township and cooperated with community people established Center. Second, interviewed single mother's life experience to become teacher . by "Raising with village" strategy how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ssists mother-only families members since widowed or divorce in the gradually recovery. Research found Boyo Foundation "Raising with village" strategy, long-term target made single mother a typical worker, while settled economic needs; also could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Last but not the least, when teacher is single mother, learning

with mother also adds opportunities between single mo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for positive feedback.

**Keywords: poverty, single parents, remedial instruction, secondary teachers**

## 壹、問題的提出

自資本主義發展以來，在經濟生活中強調個人稟賦與區域發展的優勝劣敗競爭法則，很自然的在經濟上開始出現相對弱勢與強勢的發展。就個人層次上，因為個人的條件能力不管先天、後天無法完全趨同一致因此可能導致所得上的差距；或另一方面就區域發展的層次上，各區域在全球化經濟發展下所衍生的勞動結構改變問題。對於相對弱勢者，貧窮（poverty）這個源自十八世紀歐美國家的概念，在世界各個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區域、不同的時間裡就像是個揮不去的夢魘。

即便全世界的學術界皆針對貧窮進行研究，各個國家內不管是國家介入，或是社會力的自我延伸，不乏各種協助落入貧窮處境弱勢者服務的方案與具體行動，但是我們仍然必須很嚴肅的指出：時至今日，貧窮的議題不僅從未離我們遠去，而且還越來越靠近。即便是在已開發經濟的現代國家中，一位日本社會學者一邊在協助貧困者，一邊追蹤這些人陷入貧困的過程發現：今天陷入貧困的人，並不是代代貧困的。相反的往往都是來自「曾經不貧困」的家庭（湯淺誠，2010）。這種溜滑梯的社會就是當今個人面對人生重要轉折中所身處的環境，若沒有完善的機制透過適當的社會工作介入，當一個人不幸往下墜時，過程中恐怕沒有任何阻礙。

當代的社會工作除了針對需要救助的對象提供個人或團體工作的援助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工作途徑就是透過社區內的經營，就近提供服務對象足夠的社會支持力量（林萬億，2013）。但近二十年來就台灣實務上的發展來看，針對個人面對貧窮時的直接福利資源分配工作，就順序上來說仍然還是排在最前頭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這樣的工作最直接且同時最容易立即幫助到極需協助的經濟弱勢族群。然而，我們所需要的社會機制除了這些立即處遇貧窮的救助工

作之外，另一方面協助陷入貧窮漩渦者脫離貧窮的動態工作也應獲得相當程度的關注。這種需要透過長期累積及事後追蹤的工作內容，筆者認為惟有透過紮根社區始能達成。

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以下簡稱博幼基金會）成立於 2002 年，主要的工作內容雖然從事的是在學學童補救教學的課業輔導工作，然以組織名稱與初期工作人員的專業來看基金會所從事的工作範圍較偏向社會福利工作。若以服務對象與範圍而言，博幼基金會鎖定偏鄉<sup>1</sup>貧窮的孩子進行補救教學工作，除長期以來偏鄉孩子的學習成效情況較為低落外，另一方面是由基金會所設置的中心據點，在各偏遠鄉鎮提供具有專職工作人員的服務藉以開展偏鄉的社區工作。相對於社會救助與福利資源的分配工作而言，在偏遠的鄉鎮進行課業輔導，是一項極耗費人力資源的任務。由於學童多數在戶籍地接受國民教育，距離往往令能夠提供服務的城市師資力有未逮，因此於社區內招募課輔老師便成為博幼基金會進行課輔的重要工作。

在招募課輔老師的過程中，博幼基金會並沒有特別要求課輔老師的條件與學歷，我們期待課輔老師是來自當地、居住在課業輔導據點附近的社區人士。因此各個中心勢必也會招募到或因離婚、或因喪偶的單親媽媽。尤其是位居偏鄉的課輔中心，這些單親家庭的孩子通常也是博幼基金會提供課輔服務的孩子。當單親家庭的女性戶長與身邊的孩子同樣在進行國小數學與基礎英文課程的練習時，彼此的互動就成為一幅非常有趣的畫面。這個在原來日常生活脈絡之外的互動，增添了單親母親與孩子彼此增能(empowerment)的機會。縱使歐美

---

<sup>1</sup> 由博幼基金會成立的課輔中心自南投縣信義鄉、埔里鎮開始，目前計有宜蘭縣大同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橫山鄉、竹東鎮、台中市沙鹿區、雲林縣口湖鄉、屏東縣潮州鎮、澎湖縣湖西鄉，共十一個中心據點。其中符合內政部偏遠地區定義：人口密度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五分之一之鄉鎮市；或距離直轄市、縣市政府所在地七點五公里以上之離島者，計有南投縣信義鄉、宜蘭縣大同鄉、新竹縣尖石鄉、五峰鄉、雲林縣口湖鄉、澎湖縣湖西鄉，共計六個據點。

國家在 70 年代開始進行的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Pearce,1978; McLanahan & Garfinkel, 1989）研究現象，雖然也在台灣底層的社會同樣上演著（張清富，1992a），不過在課輔據點那個當下的畫面中卻未感覺到絲毫苦澀。即便在台灣單親低收入戶中的孩子確實是家庭支出增加的重心（張國偉，2009），然而孩子就算是這些戶長們的負擔，或許也該是一種最「甜蜜的負擔」吧！綜合以上，本文最核心的研究問題為：博幼基金會招募社區內課輔老師的「同村教養」策略，如何轉化貧窮家庭中的孩子成為偏鄉單親母親脫離貧窮的力量？

為接近本文的提問，本文將逐一回答下列二個問題：

- 一、博幼基金會如何形成在台灣偏遠地區招募社區內課輔老師的「同村教養」策略？
- 二、身為單親母親的課輔老師如何在這樣的策略下進行其單親的復原歷程？

## 貳、文獻回顧

長期以來各國針對貧窮的研究可以大致區別為五個理論觀點（Volser，1996：161-165；王永慈，2005）：一、個人態度或動機的解釋；二、貧窮文化（The culture of Poverty）；三、人力資本論；四、與勞動市場有關的論點；五、福利依賴與工作反誘因的觀點。其中在台灣實證論述最早的是貧窮文化的觀點，這個觀點受到美國人類學者 Lewis（2004）詳細探討墨西哥及波多黎各窮人的生活方式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但廖榮利與鄭為元（1982）的研究發現，就整體而言台灣的窮人仍相當重視兒女教養的問題，因此窮人的價值與態度並不會經由家庭的社會化功能而代代相傳。這個發現雖然並未針對家庭結構（如單

親與否)的區別進行更細緻說明,但也確實回應在貧窮文化論中無法充分說明的問題:這些貧窮文化的特質究竟是導致貧窮的原因還是貧窮所帶來的結果。

學界開始注意到家庭婚姻類別與依賴人口比率為致貧因素,基本上是從貧窮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這個論點出發的。伴隨著一連串實證研究,Pearce(1978)的研究指出婦女貧窮率高於男性的現象。不管是投入家庭的全職家庭主婦或是在就業的全職婦女其收入皆低於男性,女性在人力資本及與勞動市場相關論點上皆呈現較弱勢的地位(Lewis & Piachaud, 1992)。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McLanahan & Garfinkel(1989)進一步提出「家庭破裂」是家庭落入貧窮困境的主要因素,因為其中「女性單親家庭」(mother-only families)比「男性單親家庭」(father-only families)更容易落入貧窮的困境。由於女性缺乏較佳的工作經驗,加上勞力市場的結構以及需要照顧小孩等因素,都使得「女性單親家庭」(mother-only families)即便獲得社會福利的協助,其生活情況仍然非常貧困。除了以人力資源與勞動市場有關的角度外,西方學界開始在破裂的家庭中進一步分析依賴人口與就業人口的比重問題,結果顯示若家中所得人口負擔越重那麼落入貧窮的機會也就越大(Schiller, 1984)。若再結合美國種族因素的研究,Felty(1991)發現貧窮率往往隨著黑人戶內人口及幼年依賴比的升高而逐步增加,家庭戶內依賴人口比例和種族同時成為對於美國社會中致貧現象具有顯著效果的因素。

台灣在接受西方學界刺激後開始對貧窮女性化下女性單親家庭的各項命題進行論證。不同於貧窮文化的研究,國內學者陸續發現台灣與西方同樣的結果:單親家庭落入貧窮的機率比其它的家庭型態更高(張清富, 1992b; 呂朝賢, 1995、1996; 薛承泰, 2000),其中女性單親家庭又比男性單親家庭更容易落入貧窮的困境(童小珠, 1992; 李安妮, 1998; 張國偉, 2009)。若進一步分析致貧因素,家中依賴人口數目或是相對全部人口的比例,不管是以官方貧窮線或

是相對貧窮線來看皆具有顯著效果（朱雲鵬，1984；薛承泰，2000；張嘉玲、黃素滿，2013）。針對弱勢族群上，台灣針對原住民貧窮問題的研究則多歸因於人力資本與勞動市場有關的論點，孫健忠、萬育維與王增勇（2001）的研究指出：由於原住民教育程度較低，能夠從事的工作在山地鄉以務農、臨時工最多；都市原住民則多從事次級勞動市場類型工作，往往導致工作不穩定或面臨集體失業的困境。但原住民貧窮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城市與偏鄉在都市化程度的差別亦顯示多數居住在偏遠鄉鎮的原住民可能在居住的位置上就已經落入相對的弱勢（張清富，1992a）。再加上原住民單親家庭的比例及原住民女性單親家庭的比例又比全國平均數來得高（張玉珠、楊嘉琳，2003），這種種包含城鄉差距、人力資本、勞動市場、家戶特徵等因素似乎都讓身處困境的偏鄉女性單親戶長見不到光明。

若我們用一個解釋性的角度來詮釋上述在台灣的實證研究，是利用數據資料在理論上進行假設的檢測，藉以尋找社會中形成貧窮的因素。其基本的看法是若吾人對於本土貧窮的樣貌處於一無所知的狀態，不管是政府或是有志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行動者（actor）都不可能提出解決問題的有效策略。但是，張嘉玲、黃素滿（2013）根據內政部近十年來三次低收入生活狀況調查資料，包含第一款（重貧）、第二款貧戶、第三款（輕貧）等三款類別之貧戶進行動態分析的研究發現，「戶內依賴人數」愈多不僅提高貧戶落入第一款重貧機率，同時，「戶內依賴人數」愈多也是加重的重要特質之一。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低收入戶中「男性戶長」家庭在獲得社會救助後其「貧窮惡化」的機率比「女性戶長」的貧戶要高。顯然女性戶長在接受社會救助之後，縱使仍然無力翻轉脫離貧戶地位，但是努力維持住家庭經濟狀況的機會使其維持住「貧窮不變」的機率是比較高的。這樣的結果和前述在台灣有關「貧窮女性化」的一連串實證研究有些微在推論上的悖離。既然男性在台灣社會中擁有較佳的脫貧條件，顯然

在落入貧戶後應該有較大的機率往「貧窮改善」發展才是，但這樣的現象不僅沒有發生，其貧窮惡化情況還甚至比女性戶長機率高。其中，有個連結在這份實證資料中還是非常模糊的，即「戶內依賴人口」雖然確實是造成貧窮惡化機率越高的主要特性，但究竟這個變項對於男性戶長與女性戶長是否有差異卻不得而知？

在前述分析戶內依賴人口的研究中，往往將依賴人口放在被照顧者的角色上。才會推論當戶內依賴人口數越多時，陷入貧窮的機率就越大。但是對於身處貧窮漩渦裡的個人而言，若透過另外一種研究途徑，企圖再現身處貧窮困境的研究對象。頓時，依賴人口就不僅僅只是依賴人口了。張英陣、彭淑華（1996），透過優勢觀點（*strengths perspective*）的途徑指出，對於低收入戶單親家庭，尤其是女性單親家庭而言，經濟匱乏雖然是最主要的關注焦點，但「子女」卻是這些單親家庭能夠維持下來最大的動力，而年紀較長的子女也是單親母親的精神支柱。周大堯（2006）亦發現單親的婦女脫貧歷程中不僅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其個人也需要具備協助自身適應的內在資源，在該研究中挑選的所有脫貧婦女的對象發現：「子女」是其共同具有的內在復原因子。胡韶玲、孫世維（2008）認為低收入戶女性單親家庭中，女性單親戶長在調適與適應的過程中，除了政府和社會的各種福利資源支持外，更重要的是母親身邊那一份不可忽視的支持力量。其文章採取優勢觀點指出四位單親時間超過五年以上且獨自撫養至少一位未滿十八歲子女的低收入戶母親如何在她們的單親復原歷程：生存煎熬期、努力面對期、接納開展期三個階段中透過與子女互動的過程，回饋給母親與子女產生充權（*empowerment*）、韌性（*resilience*）等力量內涵。

很顯然地，在單親低收入戶家庭的實際生活世界裡，要解決貧窮問題不能僅靠政府規劃社會福利資源、建構資源分配機制就能達成。我們仍然期待接受社會救助的家庭可以在其所居住的社區內部獲得社會機制的支持，讓貧窮惡化

的循環得以停止。王若蘋（2013）針對貧窮議題提出了具體的「社區諮商」作為，依據「增強權能理論」觀點，強調社區工作的重點是要讓案主自視為是個有能力、有價值的人。然而，這份工作往往需要長時間的投入，因為協助的不僅僅是個人，更是整個家庭、整個社區，若沒有社區自身力量的投入與滋生，恐怕只是另一個美麗虛無的藍圖。況且，對於單親婦女而言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子女照顧與工作無法兼顧的問題（馬淑蓉等，2013）。若沒有社區內的機制協助單親婦女解決托兒問題，這群既為了生活要打拚，又需要照顧依賴人口子女的單親媽媽，要如何從親子的互動之間產生正面的力量呢？因此，原來鎖定協助孩子補救教學的博幼基金會充份運用非營利組織的合產（Coproductio）（江明修，1997，1999；陳恆鈞，2002；Osborne, 2000）。在既有的組織使命之下，採取締結社區民眾共同參與的「同村教養」合作策略，不僅提供在偏鄉的單親媽媽經濟上援助，同時又解決學童課業落後的問題，十分值得探究。

## 參、研究方法與限制

針對主要的研究問題，本個案研究（case study）按研究上的分類較接近探索性的研究（Tellis, 1997），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主要目的是為了解發生什麼事（what）。由於探索性個案研究的本質，研究者可能會先搜集資料、進行觀察，然後才會發展出具體的研究問題。經過筆者實際的參與，本文最核心的研究問題為：博幼基金會招募社區內課輔老師的「同村教養」策略，如何使偏鄉單親母親將原來被視為依賴人口的孩子，轉化成為脫離貧窮的力量？

為了開展研究問題，我們需要先從此個案中汲取歷史過程做為前期研究（pilot study）。為回答博幼基金會如何形成在台灣偏遠地區招募當地社區內課

輔老師的策略，本文採取次級資料分析的研究方法，並配合筆者實際參與其中的生命經驗整理，對社區內課輔老師所服務的博幼基金會過去 11 年策略發展的脈絡進行初步的認識與理解。

其次，為了回答身為單親母親的課輔老師如何在這樣的策略下進行其單親的復原歷程，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法（semi-structured interview）協助筆者不僅針對研究問題收集資料，同時在不刻意營造的自然情境下，令受訪者充分表達內心的意見以協助研究者產生新的想法與觀念（畢恆達，2008；Neuman, 2002）。本文受訪者在接受訪談之後，再由研究者進行訪談記錄的整理。

在受訪對象選取上，係透過博幼基金會的課輔老師資料，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的方式選取六位符合研究條件的代表性樣本（如下表一）。這六位單親課輔老師在擔任博幼基金會偏遠地區課輔老師的同時，只要自己的孩子年齡符合基金會服務學童的範圍，就皆會共同參與課輔中心的運作，其差別僅是媽媽是課輔老師，而孩子是學生。由於基金會的課輔運作模式是採取能力分組，因此在課輔中心內進行補救教學的學童都有機會和媽媽在同一個班上互動。

最後，針對單親媽媽復原歷程過後，令其脫離貧窮的契機為何？則是在檢視完當下博幼基金會在偏鄉執行課輔模式中最核心的「同村教養」策略下，配合訪談課輔老師針對自身與孩子在課輔中心互動問題的回應，再進一步檢視這群單親的課輔老師在未來生命中的規劃是否有受到博幼基金會發展策略的影響。

表 1：偏鄉單親媽媽課輔老師研究樣本（匿名處理）

受訪者	阿紅	小如	小欣	阿蘭	阿意	小惠
居住地	南投縣 信義鄉	新竹縣 尖石鄉	新竹縣 尖石鄉	新竹縣 尖石鄉	新竹縣 尖石鄉	南投縣 信義鄉
職業	工地保全	博幼基金會 正職人員	廚工	自營商	自營商	鄉公所 約聘
教育程度	高中(職)肄	專科肄	高中(職)肄	國中	專科	高中(職)肄
單親原因	離婚	喪偶	離婚	喪偶	離婚	離婚
原住民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低收入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子女數	2	6	2	5	3	1
子女年齡	8-12	10-16	14-16	8-16	9-12	14
子女參加課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課輔老師年資	2 年	4 年課輔老師 2 年正職人員	7 年	7 年	4 年	7 年
課輔老師 教學年級	高年級	七、八、九年級	中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中年級

本文針對偏鄉單親課輔老師在博幼基金會所選擇的「同村教養」策略下，透過媽媽與孩子在學業功課上的互動進行復原的探索性研究。然而，筆者目前所能選取到符合本文條件的個案僅限於偏鄉原住民的部落，未能擴及至偏鄉但非原住民部落的中心，對於樣本的豐富性是一大限制。而訪談過程中部分課輔老師係採取自我回憶式的回溯性研究方法，若僅能依靠受訪者自身經驗的回憶，對於本文所期待呈現的實在(reality)或許仍有落差。

## 肆、研究發現與建議

博幼基金會主要服務對象是針對弱勢家庭裡頭學習落後的孩子進行補救教學的課輔工作，基金會從來沒有設計任何方案針對女性單親家庭（mother-only families）進行服務。會和偏鄉裡頭和單親媽媽接觸，完全是因為偏鄉的單親媽媽不管是喪偶或離婚都帶著自己的孩子待在或回到媽媽的原生地。雖然博幼基

金會以弱勢家庭的認定與否提供在單親家庭成長的孩子服務；但在不斷調整與變動的經營策略下，「同村教養」的課輔發展策略是將這群單親媽媽視為合作的伙伴而非社會福利工作的案主。

## 一、博幼基金會在偏鄉「同村教養」的策略發展過程

博幼基金會自民國 2003 年 1 月開始在南投縣信義鄉提供弱勢學童免費課業輔導，2006 年 8 月增加新竹縣尖石鄉及五峰鄉，時至今日已經 11 個年頭。協助弱勢者脫離弱勢一直都是社會工作的目標，在師資缺乏的偏遠地區要執行課業輔導是一件難度很高的工程。原因是住在偏遠地區的居民普遍教育水準較都會區低，同時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造成就業人口向都市集中，偏遠地區青壯人口大量外移，尤其是能力越好，越容易外移。結果就是留在偏遠地區的居民普遍就業能力不佳，年齡結構趨向兩極，大多是老人與小孩，或是沒有辦法到外地工作的婦女。而且因為地處偏遠，交通不便，因此也很少外地人移居或進入偏遠地區工作，偏遠地區就算連學校也經常徵不到合格教師。

住在裡面的居民教育水準普遍不高，外面的人又不願意進去，學校老師白天已經上一整天的課了，也沒有多餘的心力在課後繼續教課輔，可是課輔工作又需要大量師資才能推動，怎麼辦呢？博幼基金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進入偏遠地區執行課輔工作。既然外面的人進不來，那就只能找當地人：男人大多數去外地工作；老人要訓練很困難；小孩就是學生；因此只剩下婦女了。雖然學歷與能力不好，但是至少比較有時間，而且到外地工作的機率也較低，因此若以長期來看，未必不是好人選。

博幼基金會為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開始招募當地的婦女出來擔任課輔老師，但是初期因為基金會的編制都是社工人員，並非教師，沒有教學的專業，

因此無法培訓這些課輔媽媽。雖然課輔可以穩定進行，但是學生的進步一直無法跟上以大學生為課輔老師的地區。早在 2007 年的董事會在檢討信義中心的學習成效不彰時，就有董事提出既然是因為課輔媽媽的教學能力不佳，導致學童學習成就無法達到預期的進步，那就應該針對問題解決，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增聘專業英文師資進入部落培訓社區課輔老師，這樣最能直接解決問題。

但是，在會議上並沒有獲得大部分董事的支持，考量的點主要是因為經費會大幅增加，同時是否已經確定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調整來解決這個問題。因此，在這個問題又延宕了一年多之後，這位董事最後說服了董事長與大部分董事，從 2008 年 9 月開始試辦增聘英文老師進駐部落，說服的主要原因是當所有能檢討的都檢討了，能調整的都調整了，但是問題依舊存在，最後執行單位死心了，棄械投降了，確定最終影響課輔成效的關鍵因素就是師資問題。若博幼基金會執行課輔的目的就是要讓參加課輔的學童學業能夠進步，只要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做再多都是白費工夫，都是浪費！這位董事曾說：「信義鄉一年花七百萬做課輔，可是沒有成效，我願意一年花一千四百萬，我就是要課輔有成效。在部落做課輔就像是在燒錢，但是我要燒完之後可以看到效果！」

英文的成效是差距最大的科目，而且信義中心有些部落沒有社區課輔媽媽可以上英文，有課輔老師可以上英文的部落成效也不好。以 94 學年度（2005.09-2006.08）的成果來比較，埔里中心服務 125 位國小學童，而信義鄉服務 331 位國小學童，但是信義中心可以上英文的學童只有 210 位，只有 63%，埔里中心國小學童全部都可以上英文；同時學童一學期的進步狀況，埔里中心有五成以上學童可以進步 8 階(課)，而信義中心卻只有二成的學童可以進步 3 階(課)以上(如表 3)。

年度	重要事件	工作人員	課程內容	教材教法
2003	埔里、信義課輔開始（城鎮集中式、部落分散式課輔）；埔里上半年僅收國中學童；下半年下收小六學童。信義只收國小學童	社工員--要做所有的事情。	英語、數學（但信義僅有數學）	英數按學校版本進度；下半年英文改使用「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分級教學
2004	埔里下收小五學童		英語、數學及閱讀（但信義僅有數學、閱讀）	數學使用功文式數學--依程度分級教學，進行前測、過程檢測
2005				
2006	埔里下收小四學童；增加尖石、五峰及竹東課輔中心	新中心改聘用教學背景；舊有中心要求社工必須具備教學專長	英語、數學及閱讀（但信義及部分尖石五峰部落僅有數學、閱讀）	自編數學練習本；自編英文補充教材（偏坊間兒美形式）
2007	埔里下收小三學童；增加沙鹿課輔中心；接受永齡委託教材研發	沙鹿課輔師資與靜宜大學師培中心合作		改採自編之英文補充教材，最後考量各地課輔老師能力不一，仍使用敘述簡單之「專門替中國人寫的英文課本」
2008	信義嘗試培訓部落課輔媽媽的英語；部落進用專職老師，讓升上國中學童得以繼續課輔	信義進用教學輔導員；教學與社工分流、兩專業分工合作	英語、數學及閱讀（但信義及部分尖石五峰部落僅有數學、閱讀）	
2009	全面培訓部落課輔媽媽英語及數學	社工人員專業能力提昇	英語、數學及閱讀	數學確定以"四則代數"為補救重點；閱讀嘗試採用"引領思維"教學法；英文自編教學手冊、增加短文閱讀
2010	教材朝"平民化"發展，讓部落課輔老師(或一般家長)易使用，無需繁複多時的培訓才能看懂	社工督導專業能力提昇；社工人員內訓課程分級制度化；逐步發展教學輔導員之訓練課程	英語、數學及閱讀（呼應國中升高中職之"免試入學"政策，國中必須搭配學校課程）	數學再改版，以"四則代數"為重點單元發展出部落課輔媽媽也能上手使用之教材；英文自編基本 1200 字彙每日會話；閱讀以中西經典名著為目標編寫學習單

表 3：埔里中心與信義中心的學童學習落差

中心 \ 學期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
埔里中心	8 階以上 52.6%	8 階以上 61.6%
信義中心	3 階以上 11.0%	3 階以上 23.1%

試辦專業英文老師進駐部落的效果出奇的好，英文老師除了可以直接教學童英文之外，同時還可以進行培訓課輔媽媽的工作，讓媽媽的程度與教學能力快速提升，真是一舉兩得啊！因此 2009 年博幼基金會開始增聘全職英文教師進入偏遠地區教學及培訓課輔媽媽，慢慢將課輔媽媽的程度及教學能力培養起來。因為效果很好，因此不久之後又增加全職數學教師加入教學與培訓的行列。

培訓課輔媽媽的過程是一項長期且密集的抗戰，每一科的培訓是每週 2 小時，課輔媽媽跟學生一樣要做前測，從課輔媽媽的程度開始培訓。多數的課輔媽媽英文都是從字母開始培訓，看上去很像是愚公在移山，效果不太容易看得出來，不過我們的想法是也許一個課輔媽媽需要培訓 3-5 年才能將國小的英文或數學教得很好，但是她可以在當地教 10 年，甚至 20 年，這樣的效益其實是很划算的。就算之後博幼基金會離開了，具有教學能力的課輔媽媽也不會被基金會帶走，這樣的社區工作才能在偏遠地區生根，而且筆者認為這才是社區工作。

另外，聘用當地居民擔任課輔老師還有一項意外的收穫，那就是讓偏遠地區弱勢學童在這些課輔媽媽身上找到認同。很多偏遠地區弱勢學童無法在學校老師身上找到認同，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學童，因為多數老師都是外地的平地人，即使少數的原住民老師也多半是在都市長大與求學，與住在偏遠部落地區的原住民學童生活環境不一樣，並不是同一種人，因此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學童很難認為自己長大可以跟老師一樣，自然也就不會讓老師成為典範，因為

成為父母的機率畢竟遠遠大於老師。但是如果課輔老師是自己的媽媽或隔壁的親戚，對學童的意義就會有很大的不同，因為他們是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吃同樣的東西，講同樣的話，呼吸一樣的空气，是同一種人，沒有道理會差異很大。同時，擔任課輔老師會讓這些社區課輔媽媽需要讀書備課，以前這些媽媽根本不可能讀書，但是現在常常需要讀書，孩子看到媽媽或是社區裡時常見到的阿姨都在讀書了，自然而然也會被影響，這就是身教大於言教的效果，而這項浩大工程的最關鍵人物就是偏遠地區這一群「素人課輔老師」。

如果課輔的對象只有學童，要在偏遠地區看到補救教學課輔的成效恐怕需要 10-20 年的時間，但是，如果博幼基金會的目標是連偏遠地區居民一起提昇程度，時間就可以大幅縮短，同時提昇偏遠地區的人口素質讓能力在偏遠地區生根，才有機會徹底解決偏遠地區的教育問題。最後，在培訓課輔老師同時，可以在偏遠地區創造典型工作受僱者（typical employee）的就業機會。在新竹縣尖石鄉服務超過六年，也是下文即將登場的一位單親媽媽，就是在社區中一路擔任課輔老師，接受基金會的培訓成為種籽教師，到最後成為基金會的正職人員。站在「同村教養」經營策略原則下，博幼基金會在偏遠原住民部落中的原住民課輔老師比例都明顯高於機構的平均數（見下頁表四）。就個別中心來看，以本文抽取單親課輔老師服務的南投縣信義中心、新竹縣尖石前山中心為例：原住民課輔老師的比例分別是全部課輔老師的 73%、75%，而就博幼基金會的正職人員來說，這二個偏遠部落的工作基金會工作人員原住民比例亦達 45%、23%。其中，信義中心更在今年晉升初期即在基金會擔任課輔老師的當地居民為管理督導人員。相信只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同村教養」的策略選擇下，不管是在偏遠部落的課輔老師人數、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比例也會逐漸地上升，直到課輔能力在社區生根，直到完全自主為止。

## 二、單親的課輔媽媽如何在「同村教養」的策略下進行復原的歷程

單親母親復原的階段，本文透過訪談六位在博幼基金會分別位於南投縣信義鄉、新竹縣尖石鄉擔任課輔老師的單親媽媽，採取胡韶玲、孫世維（2008：93-95）（圖一）描述單親母親在適應過程中所整理出的階段架構進行資料上的說明。透過復原階段的說明，表達身為位處偏鄉低收入戶的單親母親如何在博幼基金會「同村教養」的策略下，在課輔中心擔任課輔媽媽，增加與子女互動的親子關係，透過交互回饋對單親媽媽產生成員關係（membership）、促能（empowerment）、韌性（resilience）及痊癒統整（healing and wholeness）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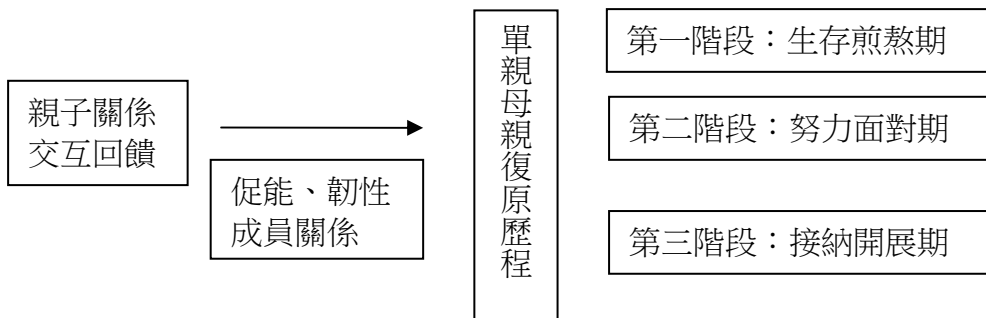


圖 1：單親母親復原歷程

資料來源：胡韶玲、孫世維，2008：94

表四 博幼基金會工作人員、課輔老師與學生身分人數表

	中心別	偏遠/ 部落	偏遠/ 部落	偏遠/ 部落	偏遠/ 部落	偏遠/ 部落	偏遠	偏遠	偏遠	南投 埔里	新竹 竹東	新竹 橫山	屏東 潮州	台中 沙鹿	合計	比例
工作人員	原住民	9	2	3	2	4	1	0	0	0	0	0	3	0	24	20.7%
	非原住民	11	5	10	5	2	8	6	13	10	7	7	7	8	92	79.3%
	小計	20	7	13	7	6	9	6	13	10	7	7	10	8	116	
原民比例		45%	29%	23%	29%	67%										
課輔老師	原住民	38	11	15	14	10	0	0	0	1	0	0	9	0	98	37.5%
	非原住民	14	2	5	2	1	11	26	4	25	8	8	29	36	163	62.5%
	小計	52	13	20	16	11	11	26	4	26	8	8	38	36	261	
原民比例		73%	85%	75%	88%	91%										
學生	原住民	281	65	181	81	50	0	5	21	62	6	6	59	4	815	42.9%
	非原住民	80	0	2	1	32	117	112	299	109	59	59	121	152	1084	57.1%
	小計	361	65	183	82	82	117	117	320	171	65	65	180	156	1899	

**第一階段：生存煎熬期 成員關係及促能**

沉浸在傷痛最久的是阿蘭，和她一起打拚事業的先生突然過世。阿蘭回想當初先生剛走的那時候還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當時孩子還小，但都還在小學唸書，早上起床送他們上學之後，就開始喝酒。喝到下午孩子放學，如果下雨，阿蘭還要自己開車去接小孩放學，醉茫茫的也不知道車是怎麼開下去，怎麼開上來的。這樣每天張開眼睛就醉的日子阿蘭過了三年，直到最大的孩子小學畢業了，擔心如果媽媽繼續這樣下去的話後面四個弟弟妹妹該怎麼辦，和媽媽大吵一架後，才讓阿蘭思考究竟未來的日子要怎麼過下去，尤其是先生留下的錢也快用光了。

阿蘭算是幸運的，因為先生突然過世，所以留下一筆錢。加上先生還在的時候二個人一起努力在部落蓋好自己的家，所以有錢、有房子住，她沒有立即陷入經濟的困境。但離婚帶著孩子回到娘家部落的單親媽媽就不是這種景況了。阿意、阿紅帶著孩子回到娘家的時候，都是身無分文。但是離婚對她們生命的創傷，讓她們就算沒有錢還是尋找酒精慰藉。沒有錢又要喝酒的條件是自己家裡有開店，家裡開雜貨店的阿意等於在喝娘家店裡頭的酒。孩子在學校的時間藉著顧店可以喝酒，孩子回家之後把孩子丟給媽媽仍然繼續喝酒。直到孩子功課跟不上學校了，娘家沒有辦法教的時候，阿意才想起自己還是三個孩子的媽媽。

因為先生外遇最後在家人支持下成為單親媽媽的阿紅受到家裡頭最大的支持。娘家哥哥雖然並不富裕但自行經營的餐廳倒還是可以支應母子初期的生活。在餐廳裡頭待久的結果就開始接觸原來在婚姻生活裡頭不曾有過的酒精。當時間一步一步往前推的時候，阿紅慢慢發現原來和孩子相當親近的關係開始生變。當時還是四年級的孩子已經開始出現排斥自己的動作與情緒，在學校的

表現也開始每況愈下。這個變化讓她驚覺自己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重新尋回孩子對自己的那份親密的關係。

在這個階段中的親子關係對單親媽媽而言是需要表現出相互依賴的成員關係。尤其是面對失婚這種重大挑戰的時候，跟在身邊的孩子是讓媽媽重新尋找非自己不能的那份能力。即便是支持或不支持的娘家，或是接納或不接納的社區環境，都無法取代孩子那份對單親媽媽的愛與溫暖所可能產生的促能力量。當然，這段初期適應時間的長短和單親媽媽擁有的經濟能力和內在特質有相當大的關係。因為擁有最多孩子的小如在没有其它支持可以依靠的時候，就只能看著嗷嗷待哺的孩子在工作上一路苦熬著。

### **第二階段：努力面對期 成員關係、促能、韌性**

小如回想先生還在醫院苦熬的時候，自己就已經是博幼基金會的課輔老師了。原因不是什麼偉大的理想或是認同基金會所採取的經營策略。就是博幼基金會可以提供一份穩定的收入，而且在工作時也和孩子保有接觸的機會關係。而且就現實經濟環境的考量，這份兼職的工作在當時面對先生生病的挑戰時，是她眼下最好的選擇。但她没有想到的是，在基金會強調「同村教養」策略下，小如更能進一步參與基金會的培訓，真正進入孩子讀書的情境。究竟對孩子而言在學業功課裡頭什麼是困難的，什麼是容易的，又應該怎麼面對，小如在這份工作之中自己也親身清楚的經驗過。這或許是在台灣其他單親媽媽很難自我開創的認識空間。小如回憶當初她面對英文測驗的時候，透過和孩子們的互動與交換經驗，她開始能夠慢慢理解自己這六個孩子之中，有哪幾個可能真的沒有辦法把書唸得很好。而自己需要在工作上也為自己孩子突破的是令所有的孩子都能聽得懂英文老師在教什麼。縱使英文培訓的工作很艱難，在眾人面前開

口大聲教英文很困難，但面對結合孩子與工作的這份責任，小如只有不斷的自我充實、自我突破。

在訪談過程我要很認真聽才能聽得清楚小惠在說什麼的過程，就讓我印象十分深刻。我當時就在想像如果我是小惠班上的學生可能會聽不到老師在上什麼課。我詢問曾經培訓過小惠的工作人員，她告訴我小惠已經比初期擔任課輔媽媽調大許多音量了。因為家暴而成為單親的小惠是個很安靜的老師，但她告訴我在課輔班裡頭看見自己的孩子一個年級一個年級往上升的時候，感到十分欣慰。雖然孩子長大的腳步越跨越大，自己的程度已經沒有辦法追過她了，但身為課輔老師的她卻可以把在家裡指導自己孩子的方法拿來課輔班來使用。或許班級的秩序沒有辦法管理得很好，但拿出在家裡媽媽的耐性還是可以讓學生一點一滴的把功課學好。

不服輸則有阿意和阿紅。自恃自己五專畢業程度很高的阿意，在初期接受培訓的時候總是要求博幼基金會的工作人員把教材交給自己，剩下她自己會處理。的確她也很認真將每本教材從頭到尾的練習完，反正閒著也是閒著，不算數學就要去喝酒，有點事做沒什麼不好，她嘻皮笑臉的說著。阿意最大的孩子現在就在她課輔班的班上，我問孩子會不會挑戰妳問妳一些困難的問題，但她說我都可以用孩子聽得懂的方法解出正確的答案給他，就沒問題啦！當初阿意想著只要會算就不需要懂得教，但博幼基金會聘請專職教師就是為了要讓部落的媽媽可以用簡單易懂的方式進行教學。因此，當孩子與她開始在課輔班相遇的時候，讓她會思考基金會培訓工作的用意，並且透過教學的過程不斷進行自我肯定。

阿紅白天的工作是在工地當保全，一個月只休息四天，也就是說每個週末她都得要在工地上班。在阿紅擔任課輔老師之後，她週末和孩子一起上班做的事情就是算數學。因為她現在的數學程度和她六年級的孩子是一樣的。使用的

課本教材沒有差別，要做的事情也沒有差別，在離婚過後與她有些距離、行為有些偏差的大兒子透過這個與媽媽重新相遇的空間慢慢回到學習的軌道上。講到這件令阿紅綻放笑容的情景，即便身處的環境、未來的前景仍然險峻，卻也同時綻放她那份堅定自己成為母親的無怨無悔。

當單親母親走出煎熬的那一段時期，面對生活上的刺激逐步出現有願意改變的動機出現。在博幼基金會培訓課輔媽媽的過程裡，老師們出現獨自照顧孩子的自我肯定。而且透過孩子在培訓過程中的陪伴，彼此的關係顯得較能容忍增加溝通的彈性。這個逐步的轉變也讓單親母親得以在工作上思考自我的突破與充實。在自我充實之後不管是阿紅、阿意或是阿蘭心裡都還有更大的企圖心。

### 第三階段：接納開展期 促能、韌性、痊癒統整

現在已經是博幼基金會工作人員(typical employee)的小如，如果沒有特別提起，很少人會感覺她是有六個孩子的單親媽媽。在基金會的工作就是過去培訓過程之中領著社區媽媽往前走的老師角色。她不時對於可以在部落裡頭有著一份可以就近照顧孩子的工作表達幸運之意。因為在偏鄉相對其它同樣報酬的工作，她就可能需要犧牲假日，犧牲和孩子相處的時間，一不注意那孩子的成长就會在手中溜走。隨著現在的生活逐漸穩定下來，小如也開始對未來有了進一步的想像。

剛通過基金會內部種籽教師認證的阿意雖然對於自己的信心不太足夠，但對於可以安居在自己部落的周圍，擁有許多社會上的支持也感到十分滿足。她特別感謝在培訓過程中不斷鼓勵她鞭策她的工作人員，讓她在和子女的互動過程中可以有不斷肯定自己的機會。若工作狀況順利，她也即將開始轉化過去的經驗面對課輔老師進行社區媽媽的培訓工作。口頭上她雖不斷推辭自己在教學

能力上的不足與培訓老師的擔憂，但在過去失敗、再開始、失敗、再開始的試煉過程中，也為她埋下可以一路撐下去的能力。

在信義鄉已經報名空大準備完成過去未完成學歷的阿紅，也希望未來可以回到現在居住的部落工作。由於在她身旁的基金會培訓人員不斷鼓勵她可以透過讀書，為孩子立下好的榜樣；對自己而言或許對未來在部落也會有較好的工作機會，因此選擇今年準備重新拾起書本為未來的人生努力。雖然她較大的孩子曾經因為自己失能的時候遠離了媽媽一陣子，不過她充分把握在課輔班的時間與孩子們接觸的機會，因為和他們在一起相處，人生就似乎充滿著希望。

人之所以可以和其它生物比較較佔有優勢的原因是源自我們擁有不受時空限制的想像力量。這份想像的力量可以讓我們擁有希望與幸福的感覺，但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人都可以善用這份天賦，讓它充斥在我們的生命之中自由自在地增添自己生命色彩。這個基本的前提仍然还是要令人在具有對於掌握自身生命的統整性狀況下才能達成。面對貧窮直接外在的協助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但令人重新為人的過程也絕對是不可缺少的一環工作。

## 參考書目

- O. Lewis (原著), 丘延亮 (譯) (2004)。《貧窮文化》。台北：巨流。
- W.L Neuman (原著), 朱柔若 (譯) (2002)。《社會研究法：質化與量化取向》。  
台北：揚智。
- 王永慈 (2005)。〈台灣的貧窮問題：相關研究的檢視〉。《臺大社工學刊》，10，  
1-54。
- 王若蘋 (2013)。〈台灣的「貧窮」議題與「社區諮商」可行作為〉。《諮商與輔導》，333，48-52。
- 江明修 (1997)。《公共行政學：理論與社會實踐》。台北：五南。
- 江明修 (1999)。〈非營利組織協助政府再造之道〉。載於江明修主編，《第三部門-經營策略與社會參與》，頁 145-154。台北：智勝。
- 朱雲鵬 (1984)。〈談我國貧窮的成因和解決方法〉。《文星》，113，88-93。
- 李安妮 (1998)。〈貧窮的性別差異分析〉。《第二屆「家庭與社會資源分配」學術研討會論文》。南港：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 呂朝賢 (1995)。〈貧窮的性別與婚姻屬性差異〉。《婦女與兩性學刊》，6，25-54。
- 林萬億 (2013)。《當代社會工作：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
- 周大堯 (2006)。《脫貧婦女復原力建構歷程之初探》。台北：輔仁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胡韶玲、孫世維 (2008)。〈低收入戶單親母親復原歷程：論親子力量的影響〉。  
《應用心理研究》，38，61-105。
- 孫健忠、萬育維、王增勇 (2001)。〈建構原住民社會救助制度之研究〉。台北：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研究報告。
- 馬淑蓉、吳惠如、郭俊巖、賴秦瑩、巫承宗 (2013)。〈單親婦女的生活困境與

- 福利需求：以非營利機構受助者為例》。《社會發展研究學刊》，13，72-108。
- 畢恆達（2008）。〈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載於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頁 21-36。台北：巨流。
- 張玉珠、楊嘉琳（2003）。《八十九年戶口及住宅普查-原住民族人口概況之研析》。台北：行政院主計處。
- 張英陣、彭淑華（1996）。〈從優勢的觀點論單親家庭〉。《東吳社會工作學報》，2，227-272。
- 張清富（1992a）。〈貧窮變遷與家庭結構〉。《婦女與兩性學刊》，3，41-58。
- 張清富（1992b）。〈區域貧窮與家戶組成：台灣省的個案研究〉。《社會學與社會工作》，9，6-25。
- 張國偉（2009）。〈十年來台灣貧窮趨勢分析-以 1994、2001、2004 年低收入戶調查為例〉。《東吳社會工作學報》，124，28-41。
- 張嘉玲、黃素滿（2013）。〈確認貧窮的類別：台灣低收入家戶的特性〉。《社會科學論叢》，7（1），1-46。
- 陳恆鈞（2002）。《治理互賴與政策執行》。台北：商鼎。
- 童小珠（1992）。《台灣省女性單親家庭經濟困境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廖榮利、鄭為元（1982）。〈台灣的貧民：社會學與社會工作面的探討〉。臺北：中華民國社區發展研究訓練中心。
- 薛承泰（2000）。〈臺灣地區單親戶之貧窮：以 1998 年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2，151-189。
- 湯淺誠（原著），蕭秋梅（譯）（2010）。《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台北：早安財經。
- Felty, K.M., (1991). Female-headed Family poverty: Tes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an

- Ecological Focus.*Sociological Focus*, 24, 329-341.
- Osborne, S. P. (2000).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Theory and Practice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London:Routledge Press.
- McLanahan,S.S. & Garfinkel, I. (1989). *Single Mother,the Underclass,and Social Policy*.Annal,AAPSS, 501, 92-104.
- Pearce, D.(1978).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Women,Work,and Welfare.*Urban Social Change Review* 11, 128-136 °
- Tellis. W. (1997). Application of a case study methodology.*The Qualitative Report* [On-lineserial], 3(3).Available:<http://www.nova.edu/ssss/QR/QR3-3/tellis2.html>.
- Vosler, N. (1996). *New approaches to Family Practice:confronting economic stress*.London: sage.

## 研究論文

# 杜修蘭「逆女」小說中的母女關係\*

房智慧

亞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收稿日期：2014 年 4 月 2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6 月 25 日。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 **The Mother-Daughter Conflicts in Du Xiu-Lan's *Ni Nü***

Chih-Hui F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 Asia University, Taiwan

### **Abstract**

The novel *Ni Nü*, by Du Xiu-lan, was published in 1995 and won the Crown Publisher's Popular Novel Award. In June 2001, the issue of lesbianism emerged again in Taiwan when TTV broadcast the drama adapted from the novel of the same title. The novel depicts Angel Ding who grows up in a natal family with a dominant mother and a voiceless veteran father. As a lesbian, Angel faces conflicts between homosexuality and heterosexuality, and between motherhood and daughterhood.

However, women's relationship with women (including mother-daughter, friends, and lesbians), both in Western and Chinese histories, are accorded less attention than the relationships with men or children. Since ancient times, women are often regarded as the tool of reproduction. It was not until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the beginning of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the issue of sisterhood and motherhood was debated in western countries. Two debates in regards to motherhood emerged: one regards motherhood as depreciating women's status; the other promotes motherhood as a common experience among women, which encourage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women, the bonds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 and the sisterhood in lesbianism.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the bonds and conflicts between Angel and her mother. How Angel finds her own lesbian identity in a typical family with a dominant mother who only adores the eldest son?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will also discuss some feminist theories and the theory of Pre-Oedipal stage in order to prove that lesbian daughters actually reveal an unbreakable and profound love toward the mother figure.

**Keywords:** Lesbians;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Pre-Oedipal Stage; Du Xiu-lan; Ni Nü

## 中文摘要

1995 年杜修蘭出版女同志小說「逆女」，得到「第一屆皇冠大眾小說獎」首獎，並在 2001 年的六月翻拍成電視劇。「逆女」中描述了一位同志女兒丁天使如何在二十世紀的台灣社會中展現出對自己的同志認同感，以及在面對破碎的家庭時，與母親之間的感情衝突。

不論在東方或是西方的歷史中，女女關係(包括了母女，朋友，與女同志)鮮少被討論或是被視為重要。例如中國傳統五倫(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關係中，沒有一項提到女人與女人之間的關係。即使在朋友項目中，也是主要在談論男子之間的朋友關係。然而，這種被沒視的女女關係都在在證明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地位的低落，只有視女性為傳宗接代的工具罷了。直至 18 世紀，西方國家開始探討姐妹之間的情誼(包含了母女關係)與母職相關的各種議題。而女性主義漸漸對母職持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視母職為女權運動發展的阻礙；另一種則是認為推崇母職可以增進母女之間的關係，甚至進而擴展至全世界女性的聯結。

本篇文章將探討逆女中女兒丁天使與母親之間的情感糾葛。身為同志與重男輕女的家庭裡，丁天使如何找尋到自己的性別認同，如何反抗在眼裡只有大兒子的母親，以及憐憫在家裡一直都是沒有聲音的外省父親。本篇文獻探討將提出西方對於提升女女關係的不同觀點，透過前伊底帕斯(Pre-Oedipal Stage)情節的理論進而證明雖然丁天使與母親時常存在著仇恨與衝突，但母女之間情感的臍帶最終是無法被剪斷的。

**關鍵字：**女同性戀、母女關係、前伊底帕斯情節、杜修蘭、逆女

## I. Introduction

In June 2001, the issue of lesbianism emerged again in Taiwan when TTV broadcast the drama, *Ni Nü*, adapted from the novel of the same title. The novel, by Du Xiu-lan, was published in 1995 and won the Crown Publisher's Popular Novel Award. The novel depicts the struggles that lesbians encounter the family and society at large. The success of this novel reveals a contemporary positive response to homosexuality, and proves that a novel about lesbianism can win a commercial literary award.

Born in 1967, Du Xiu-lan studied Economics before working in architecture. Because of such subjective statements as a "natural born writer," Du Xiu-lan has a vivid characterization technique. In *Ni Nü*<sup>1</sup>, as the title indicates, she endeavors to rebel against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discourse of familial filial piety.<sup>2</sup>

The following will discuss various issues of women's relationships with women such as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friends, and lesbians in *Ni Nü*. It will analyze the bands and conflicts between straight mother and lesbian daughter. In addition, the second section will also discuss some feminist theories and the theory of Pre-Oedipal stage in order to prove that lesbian daughters actually reveal an unbreakable and profound love toward the mother figure.

## II. Lesbian Daughter's Struggle With Family Ties

As 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 argued i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

<sup>1</sup> Xiu-lan Du, *Ni Nü* (Taipei: Crown Press, 1995). The Chinese term *Ni* means "contrary" and *Nu* means "daughter." The use of "daughter" focuses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sup>2</sup> Ta-Wei Chi, "Chih Shen Hung Pao Shih Kuo Tzu Ts'ung Lin Chung - Ts'e Hsieh Du Xiu-lian [Replacing in a Rubyfruit Jungle: Depicting Du Xiu-lan]," *Wen Shi Za Zhi* (June 1996): 82-83. Compared with Bai Xian-Yong's *Nie Zi* (*Bastard Sons*) and Zhu Tian-wen's *The Notes of the Desolate Man*, the term *Ni* (Contrary) as, Chi Ta-wei indicates, "does not represent as pessimistic a function as the expression of 'Nie (Bastard)' and 'desolate.'" (82)

*Woman*<sup>3</sup> that only when women and men are equal, and are equally dutiful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responsibilities to family and state, can true freedom be reached. Wollstonecraft goes on to argue that educated women will strengthen the marriage relationship. Her concept of marriage underlies this argument. A stable marriage, she believes, is a partnership between a husband and a wife - a marriage is a social contract between two individuals. A woman thus needs to have equal knowledge and sense to maintain the partnership. A stable marriage also provides for the proper education of children.<sup>4</sup> As the title *Ni Nü* (The Contrary Daughter) indicates, the novel is centered a lesbian rebelling against the discourses of familial and filial piety. It describes a dysfunctional family with an acrimonious, frantic, uneducated mother, and a weak, voiceless father.

Angel Ding (丁天使) grows up in a natal family with a dominant mother and a voiceless father. The father is a war veteran who followed the government to Taiwan before the separation of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1949, and the mother is a local Taiwanese woman. The eldest son, Ding Tien-Hou (丁天厚), is dearly loved by the mother. Her partiality is evident through the use of "Tien-Hou" as the name of family's grocery store. The partiality towards the eldest son leaves Angel Ding, her other brother, Ding Tien-Ming (丁天明), and her father feeling both neglected and powerless. Angel's mother even reviles and loathes her own husband for his overall impotence. This problematic family indirectly caused Angel's inability to maintain a monogamous relationship and thus she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in her lesbian identity.

---

<sup>3</sup> Godwin, Mary, and Miriam Brody.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sup>4</sup>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ritten by the 18th-century British feminist Mary Wollstonecraft, is one of the earliest works of feminist philosophy. She argues that women ought to have an education commensurate with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 claiming that women are essential to the nation because they educate its children and because they could be "companions" to their husbands, rather than mere wives. Instead of viewing women as ornaments of society or property to be traded in marriage, Wollstonecraft maintains that they are human beings deserving of the same fundamental rights as men.

In junior and senior high school, Angel meets with two girls, Ciao Meng-ling (喬孟翎) and Zhang Qing-qing (詹清清) - and falls in love with them. Angel does not reveal her love for the former, but does so for Zhang Qing-qing. The relationship is discovered by the drillmaster (the female military officers) as Angel and Zhang sleep together in the school's dormitory. Zhang then commits suicide before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leaving Angel to suffer. Some years later, despite males' interests in Angel in college, she falls in love with an older woman, Maggie. She moves in with Maggie but also has encounters with several older women in T-bars<sup>5</sup>.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Angel suspects she has AIDS when she is dying of cancer. She does not confront her mother before she dies, thus not resolving mother-daughter conflict.

The exagger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vel are revealed in the names of each character, as Du notes:

If you want me to find which part of the novel I was satisfied most, I would say the name of each character... The name of each character symbolizes its paradox except the "mother" figure. It is because she dominates the protagonist's (Angel) destiny, that "mother" would be the most proper name for her.<sup>6</sup>

The name of "Angel" should correlate with paradise, of a perfect and sacred image but this is not how the character feels. Angel asks:

What about me? My mother named me "Angel," but I always feel that paradise is so far away from me, for my mom often shouts at me, which makes me extremely furious. Angel? Like "Shit" (the term "Tien-Shi's Shi" means both

---

<sup>5</sup> A T-bar is a lesbian bar.

<sup>6</sup> Xiu-lan Du, "The Exit of the Maze," *Ni Nü* (Taipei: Crown Press, 1995) 7.

Angel and shit). I am like shit falling down from the sky that disgusts everyone... Dirty is the only expression for myself.<sup>7</sup>

As Martha Vicinus notions in her book *Intimate Friends: Women Who Loved Women, 1778-1928*.

“The ideal mother was the essence of human divinity, for she poured unconditional, unearned love upon her children. One could take one’s anger, arrogance, and folly to a good mother and expect understanding. As a paradigm of intimacy, nothing could surpass the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sup>8</sup>

Tien-Ming<sup>9</sup> is unworthy of his name. As for the father figure, he is invisible, categorized, like Angel and Tien-Ming, as unwelcome:

The client had walked away, but Mom was still angry, and stamping her feet said, “has your spirit flown to the mainland? You stupid not-willing-to-die old thing!” Mom stopped for a moment, I thought she’d finished, but she went on, “useless is useless, useless outside, useless at home... useless even in bed”... Dad just lowered his head, as if nothing had happened, and began to clean the string that would tie the empty bottles together. Mom spit another mouthful, and finally went into the kitchen.<sup>10</sup>

However, Angel grows up under the pressure of a family in which the eldest

---

<sup>7</sup> Du 21-22.

<sup>8</sup> Vicinus, Martha. *Intimate Friends: Women Who Loved Women, 1778-192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113.

<sup>9</sup> “Ming” means bright and hopeful in Chinese. But Tien Ming goes around with the gang and often makes troubles.

<sup>10</sup> Du 17-18.

son is supreme, and that supremacy has been imposed by her mother. When Angel struggles for her identity, she doesn't get any support from the mother, instead she receives only cynical remarks.

David Norman Rodowick discusses in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sup>11</sup> that "the figuration of patriarchal authority in a given text will formulate the terms of conflict through the perpetuation of a series of symbolic divisions and oppositions which organize the narrative around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 identity, both social and sexual."<sup>12</sup> Even though the author, in the preface, claims that there is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ial influence and Angel's lesbian subjectivity,<sup>13</sup> it could, nonetheless, be read as an allegory of precisely such a trajectory,<sup>14</sup> implying that "dysfunctional families in general and abusive mothers in particular will produce a rebel, an unfilial lesbian (butch) daughter."<sup>15</sup> However, as far as Du Xiu-lan is concerned, lesbianism is the result of both biology and environment: "tragedy is a hereditary illness. It is the destiny that is inescapable once the embryo is formed."<sup>16</sup>

### III. The Pre-Oedipal Stage: Feminist Perspectives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Angel's lesbian identity. This raises a sense of relevant question. If there is constant conflict between mothers and lesbian daughters, can we explain lesbianism as a compensation for motherly and womanly love on the basis of the pre-oedipal stage? With different cultural

---

<sup>11</sup> David N. Rodowick, "Madness, Authority and Ideology," in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ed. Christine Gledhill (London: BFI, 1987)

<sup>12</sup> *ibid.*, p.271.

<sup>13</sup> Du Xiu-lan claims that "the motivation of writing the lesbian subject is to reveal the paradox of the idea that lesbians are the result of social constructions. (I hoped readers would not be misled by defining lesbians as the ones in the pre-oedipal stage or from a broken family)... There is no choice in being a homosexual,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amily is the one that we endeavour to improve." Du 7.

<sup>14</sup> Du 121.

<sup>15</sup> Naifei Ding and Liu Jen-peng,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3:4 (September 1998): 121.

<sup>16</sup> Du 9.

ideologies, would the conflict of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be more turbulent or vice versa? Should lesbian daughters free themselves of the bondage to their mothers, or should they maintain links with their mothers? If they are freed from their dominant mothers, both economically and socially, will they then be independent completely?

Women, both in western and Chinese societies, are often regarded as the tool of reproduction. It was not until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 the beginning of eighteenth century that the issue of motherhood was debated. Before women's liberation, motherhood was considered an individual problem rather than a social construction. Despite the admittance of the existence of heterosexual hegemony and hierarchy leading women to motherhood, it was and is still essential to normalize the paradigm of rol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cluding viewing motherhood as a duty for women.

There are two attitudes to motherhood: one regards motherhood as depreciating women's status; the other promotes motherhood as a common experience among women.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issue of motherhood has been discussed by feminists.<sup>17</sup> Positioning "woman" within debates about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liberation is liberal feminism. Furthermore, it encourages women to go out from the household and work in the public sphere. However, men rarely share the household duties, so women often suffer a double burden in dealing with both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atters. In the 1960s, a radical view towards motherhood began to emerge. Women's physical reproduction, as far as radical feminism was concerned, was the crucial element in women's inferiority. To eliminate inequality, women should give

---

<sup>17</sup> For instance, 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 in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 of Women*, explain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en and women (women as emotional and men as rational) as the result of social constructions. She strongly believed that women were capable of becoming rational and independent if they received enough education. Wollstonecraft, however, still advocated the obligation of motherhood: the better education allowed women to become responsible mothers and housewives.

up motherhood, and artificial reproduction was regarded as the best way of doing so.

Radical feminists such as Shulamith Firestone, Ann Oakley, and Adrienne Rich,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motherhood. For instance, Firestone subverts the paradigm of biological reproduction, and views an androgynous society as the best way to eliminate the sexual/gender divergence. In *The Dialectic of Sex*<sup>18</sup>, she believes that biological reproduction is the source of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iological motherhood is, in fact, the hindrance in limiting women in the public sphere. Ann Oakley and Adrienne Rich tra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oedipal period in order to reinf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hood, daughterhood, and sisterhood.

Ann Oakley posits three hidden sisterhoods amongst women: co-operation between women; the bonds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 and sisterhood in lesbianism.<sup>19</sup> She does not deny the intimately emotional ties that motherhood may bring, and argues that this tendency leads women to be hostile towards men.

Adrienne Rich states that “lesbian relationships are invested with the intensity and ambivalence of the mother-daughter bond.”<sup>20</sup> She claimed women’s friendships should be viewed as homosexual relationship, for all women are potentially lesbian.<sup>21</sup> This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usually starts in the childhood. For instance, When Angel is confronted with her sexual disposition, she desires her mother’s support. The formation of Angel’s lesbian subjectivity is due to the influences of her mother and the grocery store:

It must be the grocery store that changed my happy family! My destiny! It must be! Experts analyze the cause of the homosexual behavior – the naturally biological element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ocial psychological

---

<sup>18</sup> 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Bantam Books Press, 1970).

<sup>19</sup> Ann Oakley, *Subject Women*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5) 268.

<sup>20</sup> *ibid.*, p.13

<sup>21</sup> *ibid.*,

construction. As for myself, besides the genetic heredity, I think my homosexual behavior is due to the influence from my Mom and the grocery store as well.<sup>22</sup>

Angel's dominant and furious mother not only "drives her into affirming her own sexual identity as a measure of resistance, but also ironically shapes that identity by condition her choice of partners."<sup>23</sup> Angel's preference for partners is quite complex, she chooses mature and tender women about her mother's age,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el and her mother is paradoxical.

The concept of motherhood, for Adrienne R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ing"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sup>24</sup>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ing" refers to what the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brings to women,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otherhood" refers to that experienc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patriarchy. Women have "been literally massacred on the site of motherhood."<sup>25</sup> Under patriarchy, women do not have complete power over educating or controlling their own children as it is the father figure who is dominant in the family. If children do not behave properly, the father figure assigns blame to the mother. Yet, Rich, unlike Firestone, does not wish to abolish the biological experience of motherhood,

---

<sup>22</sup> Xiu-lan Du, *Ni Nü*. Taipei: Crown Press, 1995. p.17.

<sup>23</sup> Yao-Ming Cheng, "Figuring the Homosexual Struggle: From Social Regulation to Family Ties," dis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998. p.45.

<sup>24</sup> Adrienne Rich said, "Throughout this book I t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wo meanings of motherhood, one superimposed on the other: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 of any woman to her powers of reproduction and to children; and the *institution*, which aims at ensuring that that potential - and all women - shall remain under male control. This institution has been a keystone of the most diver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ystems. It has withheld over one-half the human species from the decisions affecting their lives; it exonerates men from fatherhood in any authentic sense; it creates the dangerous schism between "private" life; it calcifies human choices and potentialities. In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bewildering of contradictions, it has alienated women from our bodies by incarcerating us in them... But for most of what we know as the "mainstream" of recorded history, motherhood as institution has ghettoized and degraded female potentialities."

<sup>25</sup> Rich 13.

because it is the patriarchal system which degrades women's position, not reproduction.

Concerning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Rich's assertion is both an evocation of the desire that connotes mother and daughter and of the knowledge<sup>26</sup> they share, "is subliminal, subversive, pre-verbal." In addition, it is a knowledge that flowing between two alike bodies, one of which has spent nine months inside the other."<sup>27</sup> Rich's assertion is both an evocation of the desire that connotes mother and daughter and of the knowledge<sup>28</sup> they share, "is subliminal, subversive, pre-verbal." In addition, it is a knowledge that flowing between two alike bodies, one of which has spent nine months inside the other."<sup>29</sup> Lynn Sukenich has called "matrophobia" the "desire to become purged once and for all of our mother's bondage, to become individual and free."<sup>30</sup>

Julia Kristeva argues in her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that the way in which an individual excludes the abject mother as a means of forming an identity, is the same way in which societies are constructed. On a broader scale, cultures exclude the maternal and the feminine, and by this come into being.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s crucial in the process of one's exploration and definition. For Julia Kristeva, the repressed space – not exclusively female, but also found in the breaks that occur in the semiotic. "Semiotic"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fantile pre-oedipal referred to the works of Freud's psychoanalysis of Object Relation, and the Lacanian (pre-mirror stage)<sup>31</sup>. It is an emotional field, tied to the instincts, which dwells in the fissures and prosody of language rather than in the denotative meanings of words. In this sense, the semiotic opposes the symbolic,

---

<sup>26</sup> Experience the maternal knowledge they share in being a woman.

<sup>27</sup> *ibid.*, p.220.

<sup>28</sup> Experience the maternal knowledge they share in being a woman.

<sup>29</sup> *ibid.*, p.220.

<sup>30</sup> *ibid.*, pp.236.

<sup>31</sup> Hirsch, Marianne. *The Mother/daughter Plot: Narrative, Psychoanalysis,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11.

which correlates words with meaning in a stricter, and mathematical sense. The semiotic is pre-oedipal, chronologically anterior to syntax, a cry, the gesture of a child. In adult discourse it is rhythm, prosody, pun, non-sense, and laugh.<sup>32</sup> According to Kristeva, women's access to the symbolic paternal order depends on their repressions to the connection with their mothers, her censoring of the woman within herself, her denial especially to the maternal sexuality, or, as she calls it the maternal "Jouissance."<sup>33</sup>

As for Nancy Chodorow, she maintains that both boys and girls' personalities are formed in the attachment to their mothers.<sup>34</sup> According to Sigmund Freud, boys become masculine for the sake of identifying with their fathers in the Oedipal stage. Therefore, a normal masculine psychology is developed, which places women in the category of "other." Chodorow notes that the child forms its ego in reaction to the dominating mother. Boys form this sense of independent agency easily, identifying with the agency and freedom of the father and emulating his possession of mother or wife. This procession is not as simple for girls. The mother identifies with daughter more strongly, and the daughter attempts to make her father her new love object, but is stymied in her ego formation by the intense bond with the mother. Where boys typically experience love as a dyadic relationship, daughters are caught in a libidinal

---

<sup>32</sup> Kristeva, Julia. *Polylogue*. Paris: Seuil, 1977. pp.14.

<sup>33</sup> *ibid.*, pp.210.

<sup>34</sup> Many feminists, like Nancy Chodorow, highlight the pre-oedipal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as disrupting Freud's Oedipal symmetry. The pre-oedipal stage is a crucial phase, for feminis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sterhood, motherhood and daughterhood. Rivaling Freud's oedipal stage, the girl becomes intimate with her mother, viewing her father as a rival. Even though both boys and girls see their mothers as the first love object, mothers will narcissistically treat daughters as physical and mental extensions of themselves. They control their daughters' sexuality, using them for their own "autoerotic gratification":

The mothers lacked real empathy but had pseudo-empathy which kept the daughters from forming their own identity, either through identifying and feeling like someone or through contrasting themselves to someone. The mothers attained instinctual gratification through their daughters, not through directly using their daughters for autoerotic gratification, but by identifying vicariously with their sexuality and sex lives.

triangle where the ego is pulled between love for the father and mother, concerning and worrying ove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ather to the mother.<sup>35</sup>

Chodorow relies not so much directly on Freud but on the work of object-relations<sup>36</sup> which the pre-oedipal period is not seen as a stage through which infants progress instinctually, but as an interpersonal field of relationships internalized by the infant and therefore configuration in the adult personality.<sup>37</sup> The mother thus remains an important object to one's life. Chodorow finds that this interpersonal field functions differently for male and female infants: mothers identify more strongly with female infants, seeing them more as extensions of themselves, whereas they encourage boys to become autonomous. Ego boundaries between mothers and daughters are more fluid, and undefined. The girl is less encouraged to be autonomous, but she is also less nurtured, since the mother projects upon her daughter her own ambivalence about being a woman in patriarchal society. Chodorow finds these dissatisfactions the source of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 a woman becomes a mother in order to regain a sense of being mothered and in order to compensate for a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a man who values separation rather than connection and continuity as she values. In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daughter, a mother works out her unresolved relationship to her own mother. Theref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still exists, and no break in the girl's identification with her mother is required. In the process of consolidating the masculine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father figure is the boy, the girl's attachment remains with her mother. For Chodorow, the concept of the female

---

<sup>35</sup>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pp.137-158.

<sup>36</sup> Object Relations Theory is a theory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in particular within a family and especially between the mother and her child.

<sup>37</sup> See esp. Winnicott, D W. *Playing and Re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 Mahler, Margaret S, Fred Pine, and Anni Bergman. *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the Human Infant: Symbiosis and Individu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and Fairbairn, W R. D, and W R. D. Fairbairn. *An Object-Relations Theory of the Person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54.

Oedipus Complex is not merely the transference from mother to father, but rather the significance of girls' "external" and "internal" relations toward their mothers.<sup>38</sup>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omen are able to achieve "self-definition and personality which is not characteristic of masculine self-definition or personality."<sup>39</sup>

Motherhood in the pre-oedipal stage is a kind of "prolonged symbiosis," and it is because daughter and mother are both female that the sense of gender and self in daughter is always linked with the mother. Furthermore, Chodorow and other feminists utilize the insight of object-relation as the theory through which to analyze different experiences in boys and girls' development. The object-relation explains the progress by which children become adults. Judith Kegan Gardiner claims that the object-relation:

stre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elf in social relationships rather than through instinctual drives. In this terminology, "objects" include everything that the self perceives as not itself. That is, the maternal object is not the mother but the child's mental representation of its mother.<sup>40</sup>

Gardiner asserts three crucial ideas about the object-relation: pre-oedipal primacy; the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process; and the transitional space. An infant's object-relation period starts before Freud's oedipal stage (from three to six years). The object-relation begins with the child's first three years, which is also the crucial stage for the child to form a self-identity via his/h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imary caretaker (the mother). In contrast, fathers in the object-relation stage play a

---

<sup>38</sup> Chodorow 93.

<sup>39</sup> Chodorow 93.

<sup>40</sup> Judith Kegan Gardiner, "Mind Mother: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ed. Gayle Greene and Coppélia Kah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85) 130.

secondary role. The child's process of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year is to achieve a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in which they psychologically separate from their mothers on the one hand and, on the other, develop their own sense of self. The theory of object-relation thus does not deny the model of Freud's castration. Instead, it emphasizes the child's mother, thus differing from the Freudian oedipal conflict with the father.

As for "penis envy", feminists not only criticize Freud's masculine bias, in that the whole theory originates in a notion of male power, but also for the notion that women are believed to have penis-envy:

Girls want babies very early, and women seem to enjoy babies as babies, not as penis substitutes... Current studies of female sexuality also deny Freud's contention that a normal girl must turn from an active "phallic" interest in her clitoris to mature, passive feminine fulfillment through vaginal orgasms experienced during heterosexual intercourse.<sup>41</sup>

Women's tendency to desire babies, for lesbian feminists, is a compensation for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heterosexuality. Therefore, women's friendships, Adrienne Rich claims, should be viewed as homosexual relationships, for all women are potentially lesbians,<sup>42</sup> something which starts with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n childhood. If the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 is a significant stage for women, is it fulfilled by lesbianism? Is the pre-oedipal stage usually represented in lesbian novels, as well as in reality? The questions will be answer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gel and her mother in *Ni Nü*.

---

<sup>41</sup> Gardiner 132.

<sup>42</sup> Adrienne Rich states that "lesbian relationships are invested with the intensity and ambivalence of the mother-daughter bond." Rich 13.

#### IV. The Conflicts Between Mother and the Sapphic Daughter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the famil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to each member...The Chinese people would not leave their big family except for some special occasions. Once they achieve their aims,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ir familial group; or they would develop a mold of the “pseudo-kin ties” when they cannot live with their own family.<sup>43</sup>

Angel desires familial support, especially from her mother, whilst dealing with their sexual disposition. In the novel, the formation of Angel's lesbian subjectivity not only relies upon essentialism but also on the influences of her mother and the grocery store. Even though the narrative emphasizes the mother figure 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forming Angel's lesbian behavior, it is, however, inappropriate to define it as a key factor.<sup>44</sup> It would be more useful to say that the mother figure plays a crucial part in Angel's desire to seek a lover of her own rather than as simply the reason for her lesbianism. For instance, Angel falls in love with Maggie who is older than she. She lives with her but still has an affair with other older women, due to her tragic past which does not allow her to carry on a faithful and healthy relationship.

The more Maggie understood me, the more she would forgive my indulgence, which was like a mother spoiling a child. Maggie was like a mother, but, different from my mom, she never abandons me.<sup>45</sup>

---

<sup>43</sup> Shuen-wen Chen, “Benevolence and Propriety: The Family Values and Attitudes Toward Work in Taiwan,” *Research of Applied Psychology* 12:4 (1999): 205.

<sup>44</sup> Lesbianism is essentialist and biological rather than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 family or society. The emergence of Angel's lesbianism is because of her own sexual disposition although aided by familial oppression at the same time.

<sup>45</sup> *ibid.*, p.216.

Angel's dominant and furious mother not only drives her into affirming her own sexual identity as a measure of resistance, but also ironically shapes that identity by conditioning Angel's choice of partners.<sup>46</sup> The characteristic that scares Angel most is dominance, obviously reflecting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mother, but, paradoxically, she still seeks for older women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probably because of my mom that I was scared of dominant girls, especially girls like my mom who were dominant and loved to cry - what a weird combination!<sup>47</sup>

In fact, she enjoys being needed among them:

The ecstasy of the first acknowledgment had faded. The prosaic love life made me start to linger in T-Bars, making love with some women, especially non-good-looking older women, whose lonely hearts highlighted their needs for my love. They acted calmly at first, and then felt extremely flattered whilst knowing my intention, which excited me.... They would kneel down naked before me, motivated by my kindness, and calling me Angel just like a sacred name before God... I found myself becoming sacred, not dirty anymore... These are mine. This is my human nature - the hunting instinct for the satisfaction of hunger.<sup>48</sup>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Angel suspects she has AIDS<sup>49</sup> before being diagnosed

---

<sup>46</sup> Yao-Min Cheng, "Figuring the Homosexual Struggle: From Social Regulation to Family Ties," dis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998, 45.

<sup>47</sup> Du, *Ni Nü* 78.

<sup>48</sup> Du 185.

<sup>49</sup>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or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is a disease of the human immune system caused by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s having a terminal liver cancer, which motivates her to re-examine her life. Eventually Angel does not confront her mother before she dies.

Angel's lesbian identit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her mother and the pursuit of other women, is a complex web. She endeavors to find "pseudo-kin ties" - as a replacement for her family - with Maggie and her lesbian friends, Xü Jie, and Zhong Wei. However, even though these "pseudo-kin ties" provide another home for Angel, the frightened feelings she has for "home" still exists which makes her want to escape. It is because of her sense of foulness in the family that she is able to transform into a model of resistance. She feels foul about her mother's temper, her weak father, the grocery store, her mother's relationship with her elder brother, and even her own lesbianism. For instance, when she find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er mother and her older brother, she is, in fact, "disqualified to envy him, but, strangely, a sense of foulness and intranquility often occurred while seeing this mother-son love."<sup>50</sup> Being threatened by the closed mother-son relationship, Angel feels insecure and jealous of her mother's partiality.

Furthermore, she also feels foul towards her changing body in adolescence, which is mainly affected by her mother. For instance, when Angel's mother finds the changes on her daughter's body in adolescence, her attitude toward this incident is almost silent. She gives Angel two bras and a pair of menstruation underpants with a frigidity of manner that makes Angel ashamed of her resemblance to her mother's body.

Suddenly I realized that Mom and I were both women. Before this she was only a mother and me only a kid. That last time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useless even in bed," suddenly seemed to raise my cheeks red and hot. I was so ashamed for Mom; I felt that a mother should really not say such improper

---

(HIV).

<sup>50</sup> Du 21.

things.<sup>51</sup>

The dislike towards her own body often occurs in some lesbians. For instance, in Radclyffe Hall's *The Well of Loneliness*, Stephen Gordon is born into an upper-class family, is well-educated and plays male sports in childhood. She is always "served as a certain man with a great deal of nicety and care by the servant."<sup>52</sup> Stephen is taller, and possesses a much stronger character than other female children. She often suspect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wrong with her own body, particularly when wearing dresses that her mother bought:

Sometimes Anna would triumph, having journeyed to London to procure soft and very expensive dresses, which her daughter must wear in order to please her... Then off she (Stephen) would rush and put it on all wrong, so that Anna, would sigh in a kind of desperation, and would pat, readjust, unfasten and fasten, striving to make peace between wearer and model, whose inimical feelings were evidently mutual.

Came a day when Stephen was suddenly outspoken: "It's my face," she announced, "something's wrong with my face."

"Nonsense!" exclaimed Anna, and her cheeks flushed a little, as though the girl's words had been an offence, then she turned away quickly to hide her expression.<sup>53</sup>

Angel deals with her feelings of disgust by taking on the trappings of femininity: wearing contact lens, skirts, and having long hair. And although a male student, Jiang Meng-Zhong, is attracted to her, Angel finds herself unable to respond.

---

<sup>51</sup> *ibid*, pp.74-75.

<sup>52</sup> Radclyffe Hall, *The Well of Loneliness* (London: Virago Press, 1928 1982) 325.

<sup>53</sup> Hall 71.

### i.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Reticence in *Ni Nu*

Why Angel's mother is so silent in dealing with her daughter's adolescence? It may have a connection with the reticen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ulture. The reticence, as Naifei Ding (丁乃非) and Liu Jen-peng (劉仁鵬) argue, is a typical strategy when dealing with sexual matters, as well as one that is "against the normal order" in the Chinese culture.<sup>54</sup> Furthermore, it is not only a "poetics and a rhetoric, but a socio-familial force and power." The reticent force gradually becomes an invisible tolerance, which may encourage homophobia.<sup>55</sup> They refer to an anecdote in Zhou Hua-shan's (周華山) book, which illustrates how lesbians and gays are fired in various subtle ways. It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boss is very homophobic, he will understand (enough) to fire his gay employee for 'unsatisfactory work,' there is no need at all to broach (the issue of) gay identity.<sup>56</sup> In fact, people in Taiwanese society prefer reticence when confronted with homosexuality. However, reticently opposing homosexual behavior, Ding and Liu maintain, actively threatens homosexuality:

We suggest that reticence allows for the reigning proper order in speech and

---

<sup>54</sup> Ding and Liu,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5.

<sup>55</sup> The reticent attitude in Chinese culture originates in the Yin and Yang cosmological beliefs - men are comprised of Yang and women as Ying. This concept of tolerance and peace, according to Ding and Liu, may be idealized, and encourages familial and social homophobia indirectly:

The idealization and reification of "tolerance" in the aforementioned historical schema is a sign of a benevolent albeit class-fractured yet truly Chinese past. Such an idealization reinforces how an imaginary and imagined "tolerance" inheres in the present, and must be a continuation from the past. Such "tolerance" demands, from a superior position, allegiance and debt-return of all those in inferior but especially in dissident or different positions. The continuation of a word-order framed in terms of an old tolerance turned over into a new multi-cultural democratic respect for others, ensures that minoritarians or dissidents will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whatever problems incurred by their "non-normality." (30)

<sup>56</sup> Ding and Liu 31.

action (at work, at home) to remain untouched, unsullied, harmoniously whole... We will further suggest that cooperating in the preservation of such an order is itself homophobic. To the extent that the very preservation of such an order in a narrative as influential as Zhou's will allow for the continued spawning of just this sort of benevolence and reticent good will, with its especial containing force in the areas of personal sexual and affective behavior. It is as if containing itself were not in this particular Chinese space/time a terribly effective form of homophobia.

It is then in the keeping of familial and social shadows and shades in their proper places and times in the micro-politics of everyday life, that Ni Jiazhen passionately asks, can it be that only orphans can consider coming out here? What is it in the famous "traditional" tolerance and reticence of everyday life in/with the family that makes it impossible, that silently creates no room, no space, no outside at all, for gays and lesbians and bisexuals to be heard and seen? How is it that the only way to fight back against these reticent containment techniques, is through equally though differently reticent tactics?... Isn't it time to forge another paradigm, other models of thinking, acting and feeling not so much "out" but empowered to bareboned speech, acts and feelings, non-reticent lives?<sup>57</sup>

People in Taiwanese society prefer reticence when confronted with a person who speaks of a thing while he/she makes a show as if he/she would say nothing on the subject and avoid saying too much. They prefer a silent and reserved nature. The reticence attitude even contributes to self-restraint, not communicating, remaining taciturn and reserved. Sometimes it i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really

---

<sup>57</sup> Ding and Liu 32-33.

mean. For instance, when Tian-Hou has a girlfriend, and they have a date, Angel's mother use a reticent attitude to express her thoughts,

Mother asked with a deliberately natural smile, "Tian-Hou! You can ask Yao Yao in the morning if Mom can go with you both. Of course! You know that I won't really go, I just want to test her response."<sup>58</sup>

Angel's mother wants to go with Tian-Hou, yet, she uses reticent attitude to express her thoughts.

Does the particularly Chinese reticence and tolerance condemn homosexuality to invisibility and unspeakability?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reticent nature of Chinese culture defines homosexuality as an unacceptable sexual disposition, keeping it in the closet forever. The reticent native of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acknowledged, as well as being utilized as a means of dealing with the homosexual liberation movement. It implies that the only way to fight back against these "reticent containment techniques" is through equally reticent tactics.

The conflict of reticent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powers (social oppressions) occurs when Angel meets Zhang Qing-qing. The space of the girl's school is used to convey the intimat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girls and it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pace is ideal for representing adequate female romance imagines. Take one of the scenes from for instance,

What happened to your hand? There's even a crack in your finger nail...did it hurt? Qing-qing gently put my finger into her lips with dear love; her lips felt warm, hot, wet and cold. A cozy feeling went through my finger and then all over my whole body. I felt dizzy and hot-headed. I feel as if my head was going

---

<sup>58</sup> Xiu-lan Du, *Ni Nü*. Taipei: Crown Press, 1995. p.103.

around and around and I couldn't even balance. The feelings in my deepest mind were totally liberated, a sort of painful tenderness and desire which had been depressed and agonizingly constrained for a long time, was released. When the class bell rings, I was roused from the enthusiasm and of realized I had just blushed as if a physical orgasm had just happened.<sup>59</sup>

The girl's school is reserved in its portrayal of a homosexual relationship, especially by today's standards. Christina Gilmartin argues in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al, and the State*<sup>60</sup> that same-sex love in a girl's school is caused by the sex-segregated environment and is thus situational, provisional, and spiritual. Same-sex desire between young women is caused by a lack of interaction with boys/men (socially imposed separ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thus is merely situational. Having erotic feelings for a girl/woman is regarded as a common stage that many girls might experience during puberty. It is thus different from what is understood as homosexuality. In *Ni Nü*, the space of a girl's school is visually deployed as a "heterotopia" —a single real place that juxtaposes both heterosexual discipline and homosexual flows. The space of a girl's school is represented as simultaneously performing the heterosexual disciplines and allowing same-sex desire at first. However, when their love was exposed, then the school became a non-reticent space.

## ii. The Space of T-Bar and the Grocery Store

What is the homosexual space? Ruan Qing-yue, in *The Space for Coming-out*, defines it as, "in the form of the opposite way of the straight people. This space is formed according to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but it cannot exist with the

---

<sup>59</sup> Xiu-lan Du, *Ni Nü*. Taipei: Crown Press, 1995. p.83.

<sup>60</sup> Gilmartin, Christina K.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essentialism, it should follow notions of power and order.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heterosexual society, homosexual space should learn how to survive amongst the conflicts. The homosexual space endeavors to find the normality within the paradigm of heterosexual society.”<sup>61</sup> The homosexual space has two parts: essentialism and non-essentialism. Furthermore, there are five homosexual spaces within these two parts. Firstly, the self-identified space in which identity is “the enduring sense of oneself as a sexual being which fits a culturally created category and accounts for one’s sexual fantasies, attractions and behaviors.”<sup>62</sup> According to Chi Ta-wei, identity refers to a specific people with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rough a common identity that individual is encouraged to link with the group, and the groups to attract individuals. Identity brings union and belonging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and the group. Homosexual identity, like national identity,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against the heterosexual paradigm.<sup>63</sup> Secondly, through the body space (e.g. appearance, body signal, clothes, and expression of one’s eyes), tacit understanding may occur amongst homosexuals. Thirdly, it is the living space. The fourth is the public space. In contrast to the heterosexual public space, homosexual space in Taiwan is usually situated in boundaries, the hidden places such as the dark parks, streets, unnoticed corners and buildings. Fifthly, the subculture space which Ruan Qing-yue argues extends from the homosexuals’ taste in dress to the essential space of the T-Bar. Through these subculture spaces, homosexuals in Taiwan may take off their masks and reveal their true identities.

The T-Bar, a subculture, actually provides a space for lesbians to “come out

---

<sup>61</sup> Qing-yue Ruan, *The Space for Coming-out*, (Taipei: Yuan Zuen Press 1998) 24-25.

<sup>62</sup> R.C. Savin-Williams, “Lesbian, Gay Male and Bisexual Adolescents,” ed. Anthony R. D’Augelli and Charlotte J. Patterson,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Identities Over the Life Span,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66.

<sup>63</sup> Ta-wei Chi, “Queer: The Thinking of Contemporary Queer and Queer Literature in Taiwan,” *Queer Archipelago A Reader of the Queer Discourses in Taiwan*, ed. Chi Tai-wei (Taipei: Meta Media Press 1997) 12.

without feigning themselves, they would feel easy in this relaxed atmosphe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this is the place men can fall in love with men, and women with women.”<sup>64</sup> Bai Xian-yong (白先勇), in *Nie Zi (Bastard Sons)*, discusses the subject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Park in Taipei City. The narration brings the New Park “into a cultural label that brings out gay men and summons gay identity as a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sup>65</su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Taipei New Park is described thoroughly as the “kingdom” amongst these gay groups:

In our kingdom, there was no division of honorable or low class. What we possessed was a painful body and a lonely heart. Every midnight, we hunted like a hungry monster, and somnambulistic patient circling around the lotus pond under the moonlight. The hunting was endless, leading us to pursue the nightmare of love and desire.

There were no days in our kingdom, only nights. As soon as the sun came up, our kingdom went into hiding, for it was an unlawful nation; we had no government and no constitution, we were neither recognized nor respected by anyone, our citizenry was little more than rabble. Sometimes we had a leader – a person who’d been around for a while, someone who’s good-looking; impressive, popular. But we had no qualms about dethroning him any time we felt like it, because we were a fickle, unruly people.<sup>66</sup>

Homosexual spaces such as the T-Bar and the Taipei New Park are subcultures of invisibility, and darkness, but they create a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dentification. The same feeling occurs in Angel as she enters the T-Bar for the first

---

<sup>64</sup> Meng-Ru Lai, “A Study of Lesbian Subculture in T-Bar,” diss., Zhong Yuan University, 1999, 11.

<sup>65</sup> Yao-Min Cheng, “Figuring the Homosexual Struggle: From Social Regulation to Family Ties,” dis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998, 35.

<sup>66</sup> Xian-yong Bai, *Nie Zi (Bastard Sons)* (Taipei: Yuan Jing, 1983) 20.

time:

When we arrived, there was no sign. I glanced right and left, trying to find out the entrance. When Xü Jie rang the bell, I found there was a barely seen mark under the tiny door ring, which showed the word “pub.” Even if someone discovered this mark, they would suspect the strangeness of this place, and not intrude. Then the door opened with narrow space, someone looked out, like the entrance was heavily guarded...Though I knew no one in the Bar, yet I did not need to restrain myself. In this place, as Xü Jie said, you come here to make yourself happy. Even though you do nothing here, the relaxation of uncovering the mask was beyond description.<sup>67</sup>

Wang Cheng-Hua, in *The Black Lesbian*, says that the T-Bar “is unlike other pubs which openly welcome the customers. It would not open unless someone rings the bell. Even though it is unlocked, the door is still closed. It is usually situated on the top of the building or in the basement.”<sup>68</sup> The unclear sign and the doorway in the T-Bar are to refuse those curious customers who are not lesbians. Because of this strict control, the customers are able to remove their masks, relaxing completely with their lovers and friends.

Angel starts to love the atmosphere of the T-Bar, feeling surprised that the world could become so different just behind one door:

When going out this door, it becomes another world. We live the same life as heterosexual people but with the mask, and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happiness there. In the T-Bar, you can find dignity and confidence. No need to hide, or

---

<sup>67</sup> Du, *Ni Nü* 167-68.

<sup>68</sup> Cheng-hua Wang, *The Black Lesbian* (Taipei: Hao Jiao Press, 1995) 44.

feel shame for yourself.<sup>69</sup>

Unlike the T-Bar, the grocery store has a contradictory image – a disgusting, dirty, oppressive, heavy working and unpleasant place which Angel hates enormously. Since her childhood, Angel believes that the opening of the grocery store brings tragedy to her happy family. She indicates that:

To open a grocery store is the cruelest career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when the trade is brisk. The most active place at our village is Tien Hou grocery store rather than the post office. If someone ask me what will I do in the future, I would say never open a grocery store. Never... It has no holiday the year round, no rest. I am pretty sure Mom's furious temper and hysteric emotions are mainly caused by the busy work of the grocery store... Our house is a grocery store, our rooms are the storage, all the children are clerks, and mom is the boss. What is my father? He is the one who works hard without grudge.<sup>70</sup>

The grocery store not only deprives the freedom of the family but its mixed and disorderly commodities occupy the space and destroy the space that a family should have. In addition, the grocery store, unlike the limit of the T-Bar, becomes an open space for Angel's mother to complain about her family affairs in front of other neighbors. Angel feels foul about her mother's misconduct in revealing her domestic shame to others, as if the grocery store was a theater stage in the village.

However, both the T-Bar and grocery store have a strong appeal for Angel. The T-Bar not only provides comfort to Angel but also makes her confirm her sexual disposition as a homosexual. In contrast, the grocery store symbolizes Angel's family and even the turbulent mother figure. Even though Angel hates the

---

<sup>69</sup> Du, *Ni Nü* 170.

<sup>70</sup> Du 16.

grocery store so much that she attempts to run away from it, the impulse of coming back home always occurs in Angel's mind: "I do not want to come back to this house at all, a resistant voice shouted from my mind. But I know that next Sunday I will come home involuntarily, helping mother to clean the house, and to wash the clothes. I do not know whether I am bitchy or not, or just consider here as my home, my patronage, and my burden that cannot be got rid of all my life."<sup>71</sup> The grocery store, for Angel, is a complex and ambiguous place. When she became very ill, Angel decides to visit the grocery store for the last time. As the car approaches the grocery store, Angel sees her old, hunchbacked, and sorrowful mother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grocery store which has been closed for a long time. Angel finally does not have the courage to face her mother again despite her eagerness.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defines utopia as an unreal space, or a site of no real place, and argues that a "heterotopia"<sup>72</sup> is "an effectively enacted utopia," in which "the real emplacements, all the other real emplacements that can be found within the culture are, at the same time, represented, contested, and reversed."<sup>73</sup> Take looking at a mirror as an example, Foucault claims that the mirror reflects a mixed and joint experience between utopias and heterotopias. The mirror functions as a heterotopia when one looks at himself/herself in the glass; one is both real and

---

<sup>71</sup> Du 105-106.

<sup>72</sup> A heterotopia is a physical representation or approximation of a utopia, or a parallel space that contains undesirable bodies to make a real utopian space possible. It is a concept to describe places and spaces that function in non-hegemonic conditions. These are spaces of otherness, which are neither here nor there, that are simultaneously physical and mental, such as the space of a phone call or the moment when you see yourself in the mirror.

<sup>73</sup> Foucault, Michel, and James D. Faubion ed. trans. Robert Hurlev. "Different Spaces," i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178.

Entitled "Des Espace Autres," and published by the French Journal Architecture /Mouvement/ Continuité in October, 1984, it was the basis of a lecture given by Michel Foucault in March 1967. Although not reviewed for publication by the author and thus not part of the official corpus of his work, the manuscript was releas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for an exhibition in Berlin shortly before Michel Foucault's death.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

unreal. The mirror does exist in reality, and through it a counteraction against one's absence in the virtual space is produced. Only through the existence of the unreal can a virtual place be established.<sup>74</sup> It makes this place the one that one occupies at the moment when one looks at oneself in the glass. It becomes at once absolutely unreal, yet, connected with all the space that surrounds it, since in order to be perceived it has to pass through this virtual point.

A mirror is a metaphor for utopia because the image that you see in it does not exist, but it is also a heterotopia because the mirror is a real object that shapes the way you relate to your own image. Through the mirror, you can recognize the contrariness or similarity that exists between physical situations and sexual orientations. A girl's school also exists as a heterotopia as it juxtaposes the contradictory spaces for hetero-patriarchy and homoeroticism in a single real place. It is a physical place, and through female student's imagination, the scheme of the heterosexual environment is transformed into a homoerotic setting and the real space becomes an enacted utopia that enables same-sex desire. Furthermore, the space of the girl's school is used to convey the intimate interaction between Angel and Qing-qing and it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how the space is ideal for representing adequate female romance imagines.

Furthermore, Zhang's parents, like most parents in Taiwan, encourage their daughter's friendship with Angel without a thought of lesbianism. Angel and Qing-qing, afterwards, are caught in bed in the dormitory at school by drillmasters, and their parents are immediately summoned. However, the parents have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ir daughters' behavior. Zhang's parents are middle class, and they cope with their daughter's homosexual behavior in a reticent manner. They blame Angel and insist she be expelled, while wanting their daughter to act normally by returning to school. In contrast, Angel's mother, at this time, reacts

---

<sup>74</sup> Foucault uses the idea of a mirror as a metaphor for duality and contradictions, the reality and the unreality of utopian projects.

with a non-reticent attitude:

Mom came in and immediately pinched me hard on the arm, "I told you not to live at school but you insisted, now look at what's happened! Your damn father, never takes care of anything, all he knows is to encourage you to live at school, he'd be happiest if you were all to die." With Mom's moves, everybody knew who she was without need of introduction. Mr. Zhang's expression clearly said, look at that! With such a perverted family no wonder the child is abnormal. The Zhang family on purpose sat far away from us... Mom did not say much to this, but Mrs. Zhang insisted that I be expelled, so that I could not influence her daughter at school. This angered mom, "Why insist that my daughter be expelled, as for sleeping, both of them slept, not to mention it was your daughter who came to sleep in my daughter's bed." Mom's saying all this nakedly made me feel once again as if I had been stripped of all clothing and exposed in front of everyone. What little self-respect left was entirely gone. I wished I could immediately shrink so small I would completely disappear, and everyone would then forget this disgusting abject memory.<sup>75</sup>

However, Angel's non-reticent and uneducated mother denies Angel's homosexuality, and thus shirks her responsibility. Angel's mother, unlike Zhang's parents, 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homosexuality is nor its cultural implications. The enquiry of "what is homosexuality?" makes Angel feel for the first time how lucky she is to have her as a mother.

Zhang, in contrast, is not so lucky. She refuses to go to school, pulling off her uniform and cutting it into pieces. She jumps from the car as her parents drive her to school and finally commits suicide. Suicide, for Zhang Qing-qing, is not only

---

<sup>75</sup> Du, *Ni Nü* 114.

“the ultimate and final act of resistance,”<sup>76</sup> but a non-reticent act. Zhang Qing-qing’s suicide does not lead her family to introspect on their behavior, rather they consider Angel to have killed Zhang. Suicide - a non-reticent behavior - cannot solve anything; instead it allows the family and society to conceal Zhang’s homosexuality.<sup>77</sup> The utilization of political reticence is not a compromise but the measure of politics that may achieve the aim.

Though a powerful figure in Angel’s family, Angel’s mother, however, is not an independent woman. She likes to take a dominant role in quarrelling with her elderly husband, but the more interesting is that she does not extricate herself from the conventional role that patriarchal society allows her. She feels ashamed of her husband for not providing sufficient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family, as well as not having a powerful position in the society. To compensate for her insecurity, she tries to build a “uterine family”<sup>78</sup> by smearing the image of her husband and creating hide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her husband and children. She endeavors to make alliance with her children especially Tien-Hou, feeling furious towards Angel and Tien-Ming for not being on her side. Therefore, her husband becomes her only foe in this family.

In my family, especially after the opening of the grocery store, it was a kind of sin to talk to my father. We belonged to “mom,” and she wanted us to know that it was she who worked hard to raise us... I often thought this was the reason why there always existed conflict between mom and myself. I was much

---

<sup>76</sup> Ding and Liu,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14.

<sup>77</sup> Zhang’s suicide is reported as the result of too much pressure with regards to the upcom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up>78</sup> The uterine family is a woman’s mother and her mother’s children. In Chinese culture, a woman’s only real family is her uterine family which consists of her mother and siblings. Wolf, Margery “Uterine families and the woman’s community.” *Talking about People: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Mayfield Publishing, 1993. pp. 166-69.

closer to my dad since childhood, besides, Tien-Ming depended on me, which threatened her role as a mother....<sup>79</sup>

This sort of insecurity also reveals her mother's miserly character. She is afraid her husband will spend the money on the relatives in Mainland China. It is not because of money but insecurity that mom detests dad. In addition, she is not willing to live like that for the whole life, so she saves money as much as possible to build up her security and confidence.<sup>80</sup>

Angel's mother actually considers her eldest son as the one on whom she can rely as she gets old. The dependency grows as she discovers her husband as a useless man. The mother figure becomes a symbol of inferiority, and she begins to save money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ompensate for her economic insecurity. To regard Angel's mother as independent is inappropriate as she is still dominated by the patriarchy. It is because of this that Angel feels foul towards her mother.

While talking about the power rel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it is interesting to discuss of why is the mother figure so powerful between husband and children when there is no apparent dynamic giving her such power? Why is Angel's father so weak despite supporting the whole family financially? The relationships in *Ni Nü* can be understood by the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in Taiwan and the influence of mutual relations of "Three Bonds" and "Five Relationships" in Confucian humanism. When male soldiers followed Guo Ming Dang from Mainland China in 1949, Taiwan had the problem of more men than women. Most older war veterans, like Angel's father, married with local Taiwanese young women. Based on different identities between Mainlanders and local Taiwanese, these war veterans were not only opposed as the outsiders politically, but also socially. From these

---

<sup>79</sup> Du 20, 22.

<sup>80</sup> Du 151.

biological and financial points of view, Angel's mother often blames her husband as "useless outside, useless at home...useless even in bed."<sup>81</sup>

### iii. The Confucian "Three Bonds" and Mencius'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

In addition, the models of the Confucian "Three Bonds"<sup>82</sup> and Mencius'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sup>83</sup> play a role in the interrelation in Angel's family. The "Three Bonds" refers to: "The minister serves the king, the son serves the father, and the wife serves the husband. If the three are followed, the world will be in peace; if the three are violated, the world will be in chaos."<sup>84</sup> The Confucian "Three Bonds" becomes a mechanism of the symbolic control for social stability. Confucius believed that bonding between parents and siblings in a family was an obligation, and it was a duty to maintain and nurture family ties. While Confucianism promoted the family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central aspects of one's life, another set of core values of Confucianism was the "Three Bonds" (sangang 三綱). The Three Bonds delineated the authority of the ruler over the liegeman, the father over the son, and the husband over the wife. Filial piety is considered the priority among these virtues and must be shown towards both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Even today, filial piety is still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t has formed part of the way Chinese relate to their parents and ancestors, and elders.

With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the concepts of kinship and consanguinity are deeply ingrained in Chinese culture. In "Five Bonds or Five

---

<sup>81</sup> Du, *Ni Nü* 18.

<sup>82</sup> Three Bonds refer to the ruler over the minister, the father over the son, and the husband over the wife.

<sup>83</sup> Five Cardinal relationships refer to father-son, ruler-minister, husband-wife, old-young and friend-friend.

<sup>84</sup> *Han Fei Zi*, compiled by Zhou Zhongling, Shi Xiaoshi, and Xu Weili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1982) 863.

Cardinal Relationships (wǔlún 五倫/常), three of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related to the family. In many ways this dedication to the well-being of one's parents is admirable and certainly provides stability and harmony in families as well as in society as a whole. In most Chinese minds, a person's happiness is forever tied to the happiness of his or her parents. And this evidence can be found in Angel's ambiguous struggles with her mother. While this is admirable, the Chinese tendency to sacrifice the dreams and passions of an individual, often at the whim of an elder, is sometimes unfathomable to a Western mind. Hence, it is unnecessary for a woman to have an intimate friend with whom to share spiritual feelings and mutual love. Due to the strength of familial ties and cultural constraints on emotional expression, Chinese culture might have engaged in less intimate sharing of their female romance than western culture did, yet, it was sure that female romance certainly existed in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condemn these bonds as forms of bondage, and as despotic, patriarchal and male chauvinistic principles. The bonds give the superior the power of judging the moral code, and if the inferior challenges the superior, the moral fabric of society will be theoretically damaged. Mencius advocates the "Five Relationships" by adding the two additional relationships of Old-Young, and Friend-Friend to the Confucian "Three Bond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Mencius states that, "there are those who use their minds and there are those who use their muscles. The former govern; the latter are governed. Those who govern are supported by those who are governed."<sup>85</sup> All of these five relationships are founded upon a mutual affection in the family and in society rather than just one-way obedience. Wei-Ming Tu argues that:

What Mencius advocates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extending the self to

---

<sup>85</sup> Mencius, *Mencius*, trans. D. C. Lau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4.

the family, the state, the world, and beyond. By implication,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son is politically significant and duty between ruler and subject is recognizably a family ethic. This may have been the reason that in Confucian political culture love between father and son often serves as an analogy for duty between ruler and subject, even though the difference, as Mencius originally detects it, is enormous.<sup>86</sup>

The husband-wife relationship is also based on a principle of mutuality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husband is responsible for the outside work, and the wife is for the housework. The role of the wife is actually the husband's equal, raising a family collaboratively.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 family, the powerful father figure releases some power to the wife to handle housework and child raising. Sometimes the role of the mother should be preceded in some way over that of the wife figure. And even though the husbands formally are always in control, the wives have numerous informal ways of interfering with family matters.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Confucian wife is "owned" by the husband like a piece of property. The wife's status is not only determined by her husband's position but also by her own family's prominence. By implication, her ultimate fate is inevitably intertwined with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dition of her children, both sons and daughters. While in the domestic arena, the husband's influence may also prevail, especially in extraordinary situations when vital decision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tutors for sons' education, the wife usually wields actual power on a daily basis.<sup>87</sup>

---

<sup>86</sup> Wei-Ming Tu, "Probing the 'Three Bonds' and 'Five Relationships' in Confucian Humanism," *Confucianism and the Family*, ed. Walter H. Slote and George A. DeVo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126.

<sup>87</sup> Tu 132.

However, the mother figure is a complex figure in the Chinese family. She has to follow the authoritarian division of labor on one hand, and to receive the power and respect of parenthood from her children on the other. When Angel's father is unable to provide sufficient social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 his family, the mother figure then supplants the weak husband. In a word, the dynamics of the Confucian family lies not only in the authoritarianism of the "Three Bonds" but also in the benevolence of the "Five Relationships." This is why Angel's mother has a strong and dominant character versus her weak husband and her three young children.

## V. Conclusion

*Ni Nü* circles around the theme of what Angel calls a tragedy: "tragedy is a hereditary illness. It is the destiny that is inescapable once the embryo is formed."<sup>88</su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the combination of the war veteran father and the local Taiwanese mother creates a tragic destiny for Angel. The poor economy and her weak father figure encourage her mother's resentment and dissatisfaction towards her useless husband. Her mother endeavors to ally herself with her three children, labeling herself as a poor mother who should be pitied. The eldest son, Tien-Hou, chooses the mother's side, and the other two, Angel and Tien-Ming, are forced to be with the father.

Angel, in fact, does pity her mother, but she cannot tolerate her non-reticent ways of complaint, and subsequently decides to move away from her mother, as well as the miserable grocery store. Her feeling towards the mother figure is ambiguous - a mixture of hatred and love. The feeling of hatred originates from her rejection of the female body, which reminds her of her mother. Angel is also

---

<sup>88</sup> Du 9.

confused by her sexual longings. It is not until she experiences her desire for Zhang Qing-qing that Angel's lesbian identity is recognized.

In the novel, familial politics complicate and entangle the formation of identity, and familial oppression still plays a crucial role for lesbians and gays in Taiwan. The novel shows that people who would like to come out must carefully evaluate the power of familial oppression. How or in what way they should fight against the dominant familial power is also important. Many radicals think that once the family is no longer a site of oppression, gays and lesbians will find liberating spheres which are not actually available i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society. With the reticent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 the liberation of homosexuality is supposedly reticent and gentle as well. Angel's feelings reflect how the family still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a lesbian daughter even though being abandoned by her family. In Chinese society, the family either symbolizes a kind of Eden, a sacred fort, and a "transcendental signified"<sup>89</sup> that cannot be encroached, or constitutes the core unit in the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TTV drama series, *Ni Nü*, made a sensation throughout Taiwan with its emphasis on female friendships, and by depicting the difficulties lesbians encounter in reality. The drama was a success and helped focus attention on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lesbians in Taiwan.<sup>90</sup>

---

<sup>89</sup> Ye, *Zhueng Wai Literary* 77.

<sup>90</sup> Take Lisa See's *Snow Flowers and the Secret Fan* as an example, it shows how women share their emotional feelings with each other. In rural Hunan Province (湖南省), Lily and her friend Snow Flower are "laotong" (老同), related more closely than husband and wife. They created Nushu (女書), which literally means "Women's Writing" (*Ecriture feminine*), is the only written language in the world known to have been developed by women, and was created and used exclusively by women in a wrote part of China. The novel was then adapted as a film in 2011.

See, Lisa. *Snow Flowers and the Secret Fan: A Novel*.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 Bibliography

- Bai, Xian-yong. *Nie Zi (Bastard Sons)*. Taipei: Yuan Jing, 1983.
- Baird, Vanessa.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Sexual Diversity*. Taipei Shi: Shu lin chu ban you xian gong si, 2003.
- Beetham, M. "Periodicals and the New Media: Women and Imagined Communitie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9.3 (2006): 231-40.
- Chen, Shuen-wen. "Benevolence and Propriety: The Family Values and Attitude Toward Work in Taiwan." *Research of Applied Psychology*. 12:4 (1999): 205-26.
- Cheng, Yao-Min. "Figuring the Homosexual Struggle: From Social Regulation to Family Ties." Diss.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1998.
- Chi, Ta-Wei. "Chih Shen Hung Pao Shih Kuo Tzu Ts'ung Lin Chung - Ts'e Hsieh Du Xiu-lian (Replacing in a Rubyfruit Jungle: Depicting Du Xiu-lian)." *Wen Shi Za Zhi*. (June 1996): 82-83.
- Chodorow, Nancy.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Denmark, Florence, and Michele Antoinette Paludi. *Psychology of Women : Handbook of Issues and Theories*.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7.
- Ding, Naifei and Liu Jen-peng. "Reticent Poetics Queer Politics." *Working Papers in Gender/Sexuality Studies*. 3:4 (September 1998): 109-55.
- Du, Xiu-lan. *Ni Nü (The Contrary Daughter)*. Taipei: Crown Press, 1995.
- , "The Exit of the Maze." *Ni Nü*. Taipei: Crown Press, 1995. 6-7.
- Ellis, Havelock, John Addington Symonds, and Ivan Crozier. *Sexual Inversion a Critical Ed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Firestone, S. *The Dialectic of Sex*. New York: Bantam Books Press, 1970.
- Foucault, Michel, and James D. Faubion.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

- New York: New Press, 1998. Print.
- Gardiner, Judith Kegan. "Mind Mother: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Making a Difference: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Ed. Gayle Greene and Coppélia Kah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1985. 113-145.
- Gilmartin, Christina K. *Engendering China :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all, Radclyffe. *The Well of Loneliness*. London: Virago Press, 1982.
- Lai, Meng-ru. "A Study of Lesbian Subculture in T-Bar." Diss. Zhong Yuan University, 1999.
- Mencius. *Mencius*. Trans. D. C. Lau.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Oakley, Ann. *Subject Women*.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5.
- Rich, Adrienne. *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Experience and Institution*. London: Virago Press, 1977.
- Ruan, Qing-yue. *The Space for Coming-out*. Yuan Zuen Press, 1998.
- Tu, Wei-Ming. "Probing the 'Three Bonds' and 'Five Relationships' in Confucian Humanism." *Confucianism and the Family*. Ed. Walter H. Slote and George A. DeVos.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8. 121-136.
- Wang, Cheng-Hua. *The Black Lesbian*. Taipei: Hau Chiao Press, 1995.
- Wolf, Margery.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 "Uterine families and the woman's community." *Talking about people: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anthropology*. Mayfield Publishing, 1993.
- . Societies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and Acls Humanities E-Book.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lif., 197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hdl.handle.net/2027/heb.04206.0001.001>>.

## 研究論文

# 漢譯佛典《普曜經》敘事結構分析<sup>\*</sup>

王晴慧

亞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收稿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6 月 27 日。

<sup>\*</sup>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漢譯佛典文學研究”（批號：12AZW007）階段研究成果。

## 中文摘要

漢譯佛典中，有一類經典專門記述佛陀生平故事，亦即佛傳經典，此類佛典意在傳教，並不注重還原史實，就其特色而論，奇幻敘事性強烈、結構井然。其中，《普曜經》不僅具有早期佛傳經典的典型內容結構，且可說是早期佛傳經典中記述較為詳盡者，翻譯卷數與內容篇幅，皆較先前漢譯之佛傳經典為多，可說是承先啟後的代表性佛傳經典。

目前研究漢譯佛傳經典者，對於《普曜經》之敘事研究，尚屬闕如，本文認為敘事學的運用，是一個值得嘗試的研究方法，故擬以敘事學觀點來研究《普曜經》，探析其敘事結構，以拓展學術研究的面向。

研究方式上，本文先將《普曜經》八卷 30 品的內容，依其情節進展，概分為十個主題，以明其內容大意；文末並附錄表格，歸納整理《普曜經》30 品所對應之敘事主題，以相參酌。而後再依據敘事主題及內容，並考量其佛傳文學屬性，以敘事結構的四個元素來分析《普曜經》的敘事結構，以明此經敘事結構之特點，並歸結出該經敘事結構完整縝密，透過敘事的開展、結構的設計，使佛陀的人物形象與故事，得以生動的展現，此乃因敘事者在文本中，能挑選有用的細節、串連事件序列，裁減成一個可連結敘述的線索，使文本結構能呈現有機完整的架構，而非零散無組織的架構。

**關鍵字：**普曜經、漢譯佛典、佛傳經典、敘事結構、敘事主題

#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alysis of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 《Pu-Yao-Jing》**

**Chin-Hui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Asia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there is one kind that specializes in recording the life stories of Buddha, namely the autobiographic scriptures of Buddha. The main idea of such scriptures is to preach rather than focus on restoring historical facts. The strong narrative fantasy and the solid structure are their primary features. Among all the autobiographic scriptures of Buddha, 《Pu-Yao-Jing》not only includes the typical content structure of the earlier scriptures but also is thought of as an autobiographic scripture of Buddha with the most detailed records and facts. The number of the translated chapters/rolls and the scale of the content are more than any previous Chinese-translated autobiographic scriptures of Buddha. It can be treated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autobiographic scriptures of Buddha and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As far as the narrative study of 《Pu-Yao-Jing》 is concerned, the researchers of Chinese-translated autobiographic scriptures of Buddha still have known very little about it. As a resul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thinks of the application of narrative knowledge as a good method for stud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Pu-Yao-Jing》 based on the narrative points of view so as to further extend the diversity of its academic study.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eight chapters/rolls and thirty sections of 《Pu-Yao-Jing》 into ten themes based on their story lines so that the meanings of the content can be well-interpreted. The appendix attached to the end is used to introduce the corresponding narrative theme for each of thirty sections

of 《Pu-Yao-Jing》 for readers' reference.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narrative themes, content, and the properties of Buddhist literature, the article utilizes four essential elements from narrative knowledge domain to point ou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features of 《Pu-Yao-Jing》 by analyzing its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o summarize the detailed completeness of its narrative structures. Through narrative openings, extensions, and structural designs, Buddha's human images and stories can be unfolded vividly. Thanks to the author's effort of every narrative section, useful content are well-organized in detail, a series of timely events are also well-connected, therefore, a linkable narrative clue can be well-formed, which makes the content structure of every section be able to present a complete organized structure rather a messy disorganized one.

**Keywords:** Pu-Yao-Jing, Chinese-translated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Autobiographic Scriptures of Buddha, Narrative structure, Narrative theme

## 壹、前言

漢譯佛典中，有一類經典專門記述佛陀（釋迦牟尼）生平故事，亦即佛傳經典，此類佛典意在傳教，並不注重還原史實，就其內容而論，奇幻敘事性強烈、敘事結構井然，所塑造的佛陀形象，已然成為方內、方外所認知的不朽典型。就文學面向來看，漢譯佛典中的佛傳經典，不僅是世界文學所藉以形塑佛陀的臨摹來源，也可視為漢譯佛典中獨特的傳記文學。

記載佛傳故事的漢譯佛典，大致有《修行本起經》（東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東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太子瑞應本起經》（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普曜經》（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異出菩薩本起經》（西晉居士聶道真譯）、《佛說十二遊經》（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佛所行讚》（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佛本行經》（劉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過去現在因果經》（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佛本行集經》（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方廣大莊嚴經》（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眾許摩訶帝經》（宋代法賢譯）<sup>1</sup>等。佛傳經典內容，主要是述說佛陀入胎、誕生、求學、成婚、出家求法、成道、涅槃等一系列在世時的經歷。其中，《普曜經》不僅具有早期佛傳經典<sup>2</sup>的典型內容結構，且可說是早期佛傳經典中記述較為詳盡者，翻譯卷數與內容篇幅皆較先前漢譯之佛傳經典為多<sup>3</sup>，可說是承先啟後的代表性佛傳經

<sup>1</sup> 見《修行本起經》（T03n0184，即表示大正藏第三冊 184 經，以下說明皆同，不再贅述）、《中本起經》（T04n0196）、《太子瑞應本起經》（T03n0185）、《普曜經》（T03n0186）、《異出菩薩本起經》（T03n0188）、《佛說十二遊經》（T04n0195）、《佛所行讚》（T04n0192）、《佛本行集經》（T03n0190）、《方廣大莊嚴經》（T03n0187）、《佛本行經》（T04n0193）、《過去現在因果經》（T03n0189）、《眾許摩訶帝經》（T03n0191）。

<sup>2</sup> 梁啟超〈佛典的翻譯〉一文將佛典翻譯分為三期：自東漢至西晉，為第一期；東晉南北朝隋為第二期；唐貞觀至貞元為第三期。見梁啟超《中國佛教研究史》（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 年），頁 167-192。

<sup>3</sup> 《普曜經》之前的佛傳經典，如《中本起經》二卷、《修行本起經》二卷、《太子瑞應

典。

《普曜經》為竺法護譯經階段的後期所譯，應可視為翻譯更為成熟之作<sup>4</sup>。據《出三藏記集》所載，竺法護是西晉的譯經家，本姓支，祖籍是西域月支人，其祖先不知何時遷居敦煌，八歲出家，拜天竺沙門竺高座為師，遂改姓氏為竺。後來他隨師至西域，遊歷諸國，精通外國異言三十六種，並攜回大量梵經，回到中原譯經，「自敦煌至長安，沿路傳譯，寫為晉文」<sup>5</sup>。他所譯經典數量及內容均極豐富，幾乎包含了所有重要的大乘經典及部份非大乘經典，可說是西晉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譯經僧<sup>6</sup>。

就譯經史來看，《普曜經》屬於譯經初期經典，具有早期佛傳經典的典型敘事內容及結構，故深具佛傳研究的前導性意義；就譯經評價來看，竺法護譯經態度力求忠於原典而不厭詳盡，譯本語言質樸淺白，事不加飾，故在佛傳經典研究上，《普曜經》實為不容忽視之佛典。

目前研究漢譯佛傳經典者，對於《普曜經》之敘事研究，尚屬闕如，本文認為敘事學的運用，是一個值得嘗試的研究方法，故擬以敘事學觀點來研究《普曜經》，探析其敘事結構，以拓展學術研究的面向。

《普曜經》（經錄中或作《普耀經》）共有四譯，即：（1）《出三藏記集》卷

---

本起經》二卷、《異出菩薩本起經》一卷，篇幅皆較為短小。

<sup>4</sup> 見梁僧祐《出三藏記集》：「《普曜經》，永嘉二年，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齋菩薩沙門法護在水寺手執胡本，口宣晉言。時筆受者沙門康殊、帛法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67。

<sup>5</sup> 前揭書，頁518。

<sup>6</sup> 西晉國祚不長，從武帝建始元年至愍帝建興四年（265-317），總共五十一年。此時的佛教活動，主要是佛經的翻譯，譯經又以洛陽和長安為兩大重鎮中心，譯出的經典，據《出三藏記集》載其為167部，《歷代三寶記》和《大唐內典錄》皆載為451部，而《開元釋教錄》則載為333部；其中，竺法護所譯經典，據道安《綜理眾經目錄》著錄150部，《出三藏記集》卷二著錄為154部309卷，《歷代三寶記》卷六載為210部394卷，《開元釋教錄》卷二考定存在的凡91部、208卷（現經重新對勘，實係法護翻譯的只74部、177卷）。以經錄統計而論，竺法護的譯經量，實是超過了以往任何一位譯經家所翻譯的數量。

四失譯雜經錄所載蜀《普曜經》八卷，為初譯，並已註明為闕本；(2)《出三藏記集》卷二、卷七所載西晉竺法護譯《普曜經》八卷，一名《方等本起經》，為第二譯（現存）；(3)《出三藏記集》卷二記載宋文帝時沙門釋智嚴、寶雲共譯《普曜經》六卷；《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四記載此經為第三譯，乃八卷或六卷；然《開元釋教錄》卷五記載此經乃六卷本或四卷本，並已註明為闕本；(4)《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一、《開元釋教錄》卷九記載唐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一名《神通遊戲經》，為第四譯，與竺法護普曜經乃同本異譯（現存）<sup>7</sup>。

以上四種漢譯本，竺法護所譯本，為目前現存《普曜經》漢譯最早之文本，故本文以此為研究對象，分析其敘事主題，解析其敘事結構。

漢譯《普曜經》文本，本文主要採用《大正新修大藏經》，同時輔以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所提供的電子佛典資料庫。

## 貳、漢譯《普曜經》佛傳敘事主題及內容概述

漢譯佛傳經典的內容，關於記錄佛陀住世的，其敘事情節的各主題，大部分都從降生、入胎、成長、成婚、出家修行、證道成佛至回到釋迦祖國度化為

<sup>7</sup> 翻查主要經錄，《出三藏記集》卷四〈失譯雜經錄〉記載「蜀《普曜經》八卷(舊錄所載似蜀土所出)」，且註明「未見其本」。《開元釋教錄》第十四卷目錄部則記載蜀《普曜經》八卷為失譯經，並註解似是蜀土所出在魏吳錄第一譯，為闕本；並載竺法護所譯《普曜經》八卷為第二譯；又載《普曜經》八卷（或六卷）為宋沙門智嚴共寶雲譯，為第三譯，並註明闕本；又載《方廣大莊嚴經》十二卷，為唐地婆訶羅譯，與上述諸經同本異譯，故《普曜經》前後共四譯，二存二闕。《普曜經》與《方廣大莊嚴經》雖為同本異譯，然就譯經分期來看，一為譯經早期經本、一為譯經成熟期經本，本文主要在於討論早期譯經中的佛傳經典《普曜經》之敘事結構，故《方廣大莊嚴經》不在本文討論範疇內，有關此二經相關主題的並列討論，將再另文研究。

止，也有一些是記錄到佛陀入滅、分配舍利子為止<sup>8</sup>。

佛教有所謂「八相成道」，亦即將佛傳經典中記載釋迦牟尼的一生經歷分為八個重要階段，又稱為「八相示現」，八相即八種儀相。據佛典記載，釋迦牟尼在過去世早已成道，為了度化眾生，遂化身示現八種相狀，應時對機地降生人間，此八相分別為：降兜率相、托胎相、出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轉法輪相、涅槃相，這八種儀相可說是一系列相因相承的情節發展，就「敘事學」觀點而言，八相乃是整個佛傳敘事鍊條中的核心事件<sup>9</sup>，若以《普曜經》呼應此八相，則除了「涅槃相」之外，其餘皆具足。以內容而言，《普曜經》記載從佛陀降生、出家修行至成道，直到訪問釋迦族為止的敘事，並未述及佛陀入滅、分配舍利等事蹟，而西晉以前所譯的佛傳經典，亦皆記錄至佛陀成道、轉法輪為止。水野弘元認為：「各部派較早成立的佛傳中，大多是以佛成道後一、兩年內的事蹟為中心，從他成道前的修行時代，直至成道後訪問釋迦國前後的數年為止。」<sup>10</sup>據此，則《普曜經》可說是呈現早期佛傳經典的典型敘事內容。

<sup>8</sup> 例如《修行本起經》敘述自燃燈佛授記到佛陀成道為止。《中本起經》敘述自佛陀成道、行世度眾轉法輪，到向弟子說明之所以食馬麥的前世因由為止。《太子瑞應本起經》敘述自燃燈佛授記到三迦葉皈依佛陀為止。《異出菩薩本起經》敘述自燃燈佛授記到佛陀轉法輪為止。《佛說十二遊經》敘述自佛陀過去世至現在世證道後，行遊度化眾生十二年之事。《佛所行讚》敘述自佛陀誕生到分配舍利，及至阿育王造塔為止。《佛本行集經》敘述自佛陀過去世至現在世，證道後回到迦毘羅衛城為止。《方廣大莊嚴經》敘述自佛陀過去世到訪問迦毘羅衛城為止。《佛本行經》敘述自佛陀誕生到入滅後分配舍利為止。《過去現在因果經》敘述自燃燈佛授記到舍利弗、目犍連與大迦葉出家為止。

<sup>9</sup> 羅鋼《敘事學導論》：「在故事中發生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一種等級次第的關係，從敘事學的角度看，有的重要一些，有的意義小一些。法國敘事學家巴爾特把重要的事件稱為『核心』事件（kernel），把意義小一些的稱為『衛星』事件（Satellites），巴爾特認為，前者屬於功能性事件，後者是非功能性事件，功能性事件必須在故事發展的兩種可能性中作出某種選擇，這種選擇一旦作出，必然引發故事中接踵而至的下一個事件。」「在故事中，『核心』是不能省略的，一旦被省略，就會破壞基本的敘事邏輯，而『衛星』事件卻沒有這種重要性，它即使省略也不會破壞故事的邏輯，它可以重新布局，甚至由另一個『衛星』事件替代，它不涉及故事發展中的基本選擇，它的任務是補充、豐富、完成核心事件，使之豐滿和具體。」（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83-84）。

<sup>10</sup> 水野弘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佛教的真髓》（嘉義市：財團法人安慧學苑文教

漢譯佛傳經典中，雖然都是記述佛陀之事蹟，但內容各有千秋，方式也不盡相同，以「開場」而言，有的從釋迦族的悉達多太子降生敘起，有的從釋迦族的祖先談起，還有的從釋迦牟尼的前生開始講。但其基本的故事模式，都會述及降生、入胎、誕生過程的種種瑞相，及離家尋道、菩提樹下證道成佛過程。現將《普曜經》八卷30品的內容，依其情節進展，概分為十個主題，並呈現其核心事件，以明其內容大意；文末附錄表格，歸納整理《普曜經》八卷30品所對應之敘事主題，以相參酌：

## 一、敘事緣起：

無論是虛構或非虛構的敘事作品，審視敘事技巧，大體皆不脫離從「因」到「果」或從「果」溯「因」的敘事技巧。以《普曜經》內容來看，亦展現出從「因」到「果」敘事模式。經文起始即說明佛陀之所以講述《普曜經》的緣由，乃是因佛陀與眾比丘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修行的某一夜晚，淨居天子及諸眷屬來到佛陀住處，稽首足下，希望佛陀能講說《普曜大方等典》此經，令眾生普蒙其恩。佛陀默可，諸天子欣悅，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以花散佛，旋即還歸天上。翌日，佛陀於迦梨講堂，告訴眾比丘昨夜之事，並為大家講說該經。此即是揭開《普曜經》佛傳故事的「序幕」，〈論降神品〉云：

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比丘萬二千，菩薩三萬二千，一切大聖神智以暢，一生補處當成正覺，……於時其夜淨居天子名寂然尊，及神妙天，加歡樂天，……及餘無數淨居天子，威神巍巍各有光明普照祇樹，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還住一面。是諸天子前白佛言：「曾聞有經號名

---

基金會附設香光書鄉出版社，1986年，頁358）按：就漢譯普曜經所述佛傳內容情節來看，竺法護據以翻譯《普曜經》的梵本，應是屬於較早成立的佛傳經典。

《普曜大方等典》，分別菩薩眾德之本，從兜術天降神母胎，在於胎中娛樂開化，顯示殊特復現出生，皆為一切諸立法行，在宮嫪女愛欲之間，顯諸藝術，現行學書計校諸算，醫藥療治射御手博，要誓擲象示現道力超諸群生，具足成就諸菩薩行，往來周旋，果實超殊名稱流布，以菩薩力而自娛樂，降伏魔場，具足如來十力無畏，頒宣諸佛無量經典，敷演過去如來至真所講說法。……世尊！愍哀一切，今亦頒宣如是法訓，多所哀念，多所安隱，普護世間及十方人……時佛默然，可諸天子所啟白意，欲令一切普蒙其恩。時諸天子見佛默然聽啟白意，欣然大悅，稽首足下繞佛三匝，以天心華供養散佛，忽然不現還歸天上。於是世尊，明旦與諸菩薩及諸聲聞眷屬圍遶，會迦梨講堂，告諸比丘：「昨夜半時，淨居天子及諸眷屬來禮我足，叉手白言：『願為一切重演《普曜大方等典》，令諸群生普蒙其恩。』吾時默然，可其所啟。時諸天子歡喜踊躍，忽然不現，各還天上。」……爾時世尊告諸菩薩及諸聲聞：「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無極訓誨，一切如來所可宣暢普濟眾生。<sup>11</sup>」

## 二、兜術降生：

「降生」主要是概述佛陀向眾比丘說道菩薩（經中「菩薩」即指佛陀）前世累積福德，住在兜術天，因緣所故，欲降生人間，成佛度眾。諸天遂齊集一同商議，究竟菩薩該降生何國何處？幢英天子提議眾人往詣菩薩處所，諮問其

<sup>11</sup> 見 T03n0186\_p0483a21~T03n0186\_p0484a02。T03n0186 即表示《大正藏》第三冊 186 經，483 頁 a 欄第 21 行至 484 頁 a 欄第 2 行（大正藏分上、中、下三欄，分別以 a、b、c 欄位標示）。

意願，菩薩便回答欲降生迦維羅衛國為白淨王之子，並述說白淨王及其皇后之美德，及他與他們的宿世因緣。〈論降神品〉云：

於斯菩薩住兜術天，……宿世種妙德，處兜術天宮，……其諸天子學大乘業行等慈者，亦復俱昇此大講堂，各從本位次第而坐。捨玉女眾及諸天子，咸從同學各來集會。諸眷屬眾各六十六億，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爾時會中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行菩薩道逮不退轉暢達大乘，告諸菩薩及諸天子：「諸賢者等！可共俱往問於菩薩，何所種姓，最後究竟一生補處，應往降神處於胞胎？」僉共叉手，詣菩薩所，而前諮問：「惟願正士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何類？功勳云何？」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應降神……今此種姓熾盛，五穀豐熟安隱平賤，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殖眾德本，迦維羅衛眾人和順，……其白淨王性行仁賢，夫人曰妙，姿性溫良，仁慈博愛，容色難倫；心無傾移無有子姓，厭於世俗不倦道訓，猶天玉女覩莫不歡；無女人態言語至誠，初無麤獷，除棄恚恨，不傳彼此；好樂布施，禁戒無漏，敬重夫主；知時止足，不懷異心，常吉祥定；髮紺青色，顏貌熙怡，言先意至，仁和其性；體行質直而無諛諂，常懷慚愧，性重不輕，三垢薄黜，忍辱第一；手足柔軟猶如蓮華，護心口意強如金剛，若玉女寶德本清淨；前五百世為菩薩母，釋種飢虛宿夜望待，應往降神受彼胞胎。」<sup>12</sup>

### 三、象形入胎：

佛陀於兜術天欲降生前，問諸天子（天神）應以何形貌降神母胎？諸天子

<sup>12</sup> 見 T03n0186\_p0484a03~T03n0186\_p0486a27。

紛紛進言，有的建議以儒童之形、有的建議以釋梵之形、有的建議以金翅鳥形，此時有一梵天建言應以白象之形入胎，因為白象象徵通達三界十二緣起，較之其他獸形更能彰顯直達法本。〈所現象品〉云：

於時菩薩為大天眾，敷演經法，勸助開化咸令悅豫。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彼有梵天名曰強威，本從仙道中來，沒生天上，於無上正真之道而不退轉，報諸天子言：「吾察梵志典籍所載，歎說菩薩應降神母胎。」又問：「以何形往？」答曰：「象形第一。六牙白象頭首微妙，威神巍巍形像殊好，梵典所載其為然矣。緣是顯示三十二相。所以者何？世有三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差猛，猶不知水之深淺也；白象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度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譬若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如是比丘，於是菩薩處兜術天，普觀天下，意欲降體白淨王宮。<sup>13</sup>

欲降生入胎時，白淨王王宮內先出現八種瑞相：所有瓦石不淨之處，諸垢自然消除，現出種種香花；所有奇珍異鳥皆飛至王宮中，唱出婉轉美妙的歌聲；王宮後花園流泉豐沛，開出種種花朵；所有浴池，自然生出大如車輪的青蓮芙蓉；所有食器中流出的水、油、蜜，源源不絕；王宮中的各式樂器，自鳴妙音；王宮中充盈珍奇異寶；王宮中光明普照。以此八瑞相來預示佛陀之非凡降生。

〈降神處胎品〉記載春末夏初之際，佛陀自兜術天化身六牙白象，由摩耶王后的右脅進入，摩耶王后遂在夢裡受孕：

春末夏初樹木彫落，初始花茂不寒不暑。時三界尊觀察十方，適在時宜沸星應下，菩薩便從兜術天上，垂降威靈化作白象，口有六牙諸根寂定，頸首奮耀光色巍巍，眼鼻晃昱現從日光，降神于胎趣於右脅；菩薩所以處於

---

<sup>13</sup> 見 T03n0186\_p0488b08～T03n0186\_p0488b27。

右者，所行不左。王后潔妙，時晏然寐忽然即覺，見白象王光色如此，來處于胎其身安和。<sup>14</sup>

王后將此夢境告訴白淨王，國王於是請教梵志此夢吉凶，梵志便說此夢境乃是吉利：「生子有相好，在家為聖王；假愍世出家，成佛祐三界。<sup>15</sup>」

摩耶王后懷胎時，因身懷佛陀之故，唯覺己身輕便柔軟，安穩無橫，國中若有病人來求見王后，王后以右手撫摸其頭，病人的病痛便皆消除：

若有諸病風寒熱氣疾，眼耳鼻口身心之疾，脣齒咽痛塵勞狂病顛疾，金瘡癰瘡，詣菩薩母，母舉右手而摩其頭，病皆除愈各還其家。<sup>16</sup>

#### 四、非凡誕生：

摩耶王后臨產之時，欲入花園遊觀，眾綵女隨侍身旁，天地間現三十二瑞相，諸天散花，天人自虛空中下降；王后漫步至隣鞞樹下，樹神躬身垂下其樹枝，王后舉起右手摸了摸枝條，太子就從右脅誕生了。太子一出生，便自行七步，說道：「我當救度天上天下為天人尊，斷生死苦，三界無上，使一切眾無為常安。」此時，天帝及釋梵諸天亦降臨其旁，九龍<sup>17</sup>自天上澆灌香水，洗浴太

---

<sup>14</sup> 見 T03n0186\_p0491a26~T03n0186\_p0491b04。

<sup>15</sup> 見 T03n0186\_p0491c09~T03n0186\_p0491c10。

<sup>16</sup> 見 T03n0186\_p0492b06~T03n0186\_p0492b08。

<sup>17</sup> 佛傳經典中有關二龍雨水或九龍雨水的記載不一，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第六章詳細論述佛陀出世時九龍吐水的敘事主題乃是漢文化影響下的產物，不存在於早期佛教文獻中，而是早期佛教文獻在漢譯過程中出現的新說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334），按：考察佛傳經典，九龍以水沐浴初生太子（佛陀）之說，確實僅出現在《普曜經》中，例如《修行本起經》卷一記載“二龍”澆溫水、冷泉在初生太子身上：「有龍王兄弟，一名迦羅，二名鬱迦羅，左雨溫水，右雨冷泉，」並無九龍；《太子瑞應本起經》則無記載二龍或九龍雨水，只記載四天王以天香湯，浴太子身：「四天王接置金机上，以天香湯，浴太子身」；《異出菩薩本起經》亦無記載二龍或九龍雨水，只記載四天王抱持太子，置黃金机上，以湯浴太子身：「四天王即來下作禮，抱持太子，置黃金机上，和湯浴形，王與夫人、左右皆驚」；《佛所行贊經》亦無記載二龍

子聖尊。〈欲生時三十二瑞品〉云：

滿十月已，菩薩臨產之時，先現瑞應三十有二，……眷屬圍繞宿衛王后，鄰韓樹下。天帝釋梵四王皆共翼從，諸天散華速行案行，……又諸天人一時咸鼓百千伎樂，侍從王后。王后適至於此樹下，菩薩威神樹躬屈枝，自歸王后；虛空諸天稽首為禮，……爾時菩薩從右脅生，忽然見身住寶蓮華，墮地行七步顯揚梵音，無常訓教：「我當救度天上天下為天人尊，斷生死苦，三界無上，使一切眾無為常安。」天帝釋梵忽然來下，雜名香水洗浴菩薩，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聖尊，洗浴竟已身心清淨。<sup>18</sup>

有關佛陀出生時的種種奇幻說法不一，但基本上呈現的是非凡誕生：瑞相齊現、大地震動、諸天龍神降臨祝福，這些超自然的描述，一方面是希望藉由非凡描述太子誕生的不凡，以增強信徒對信仰對象（佛陀）的景仰，一方面是因為佛典在說法形式上，總以譬喻性、想像性作為其形式表現的模式。

此外，《普曜經》中，並未言及太子的命名過程（其他早期佛傳經典則有），經中大多以“菩薩”、“太子”、“佛”、“如來”稱之，而後在卷八〈優陀耶品〉中，方藉白淨王之口道出：「悉達寐臥時，不敢妄呼覺；鼓琴發歌音，爾乃令寤起。<sup>19</sup>」，由此而知太子之名為「悉達」。漢譯第二期所譯佛傳，則大多譯為「悉達多」。

20

---

或九龍雨水，只記載自虛空中，雙流淨水，一溫一涼，洗浴太子身：「應時虛空中，淨水雙流下，一溫一清涼，灌頂令身樂」；《佛本行集經》亦無記載二龍或九龍雨水，只記載自虛空中，二水注下，一煖一冷，洗浴菩薩身：「從虛空中，二水注下，一煖一冷，復持金床，令童子坐，澡浴其身」；《普曜經》異譯本《方廣大莊嚴經》則記載太子初生：「龍王下二水，冷煖極調和；諸天以香水，洗浴於菩薩」亦無九龍雨水，而僅記載二龍。

<sup>18</sup> 見 T03n0186\_p0492c26~T03n0186\_p0494b02。

<sup>19</sup> 見 T03n0186\_p0535b05。

<sup>20</sup> 漢譯早期佛傳中，大多稱佛陀本名「悉達」，如《修行本起經》：「於時集至梵志相師，普稱萬歲，即名太子，號為悉達」（見 T03n0184\_p0463c25）、《太子瑞應本起經》：「夫人即裹以白褻，乳母抱養，字名悉達」（見 T03n0185\_p0474a03）。漢譯第二期之佛典，

悉達太子出生之後七日，其母摩耶王后辭世，上昇忉利天。白淨王便請摩耶王后的胞妹大愛道來撫育太子，〈欲生時三十二瑞品〉記載：

又今太子轉當長大，誰能養育令長大乎？皆和共議：「唯大愛道能育慈心，推燥居濕飲食乳哺使長大耳。」大愛道者，太子姨母，清淨無夫，是能堪任常不遠離。時白淨王，與諸釋種和同共往，詣大愛道說是意故：「太子母終，爾時姨母乳哺令長。」時大愛道則然可之。<sup>21</sup>

## 五、早慧示現：

〈現書品〉記載太子從七歲起，白淨王就延請名師教導他，然太子與老師見面時，卻早已通曉一切典籍，並能將六十四異書之知識一一解析，得到老師與共學童子們的佩服：

菩薩乘羊車將詣書師，適入書堂欲見其師，師名選友，時見威神光曜，不能堪任，即僻墮地。兜術天上有一天子名曰清淨，即前牽手令從地起，置於座上，在大眾前，說此偈言：「現世釋中生，在俗學伎術；計校及書疏，無數劫已了。救眾生故現，博學示入師；度無數童子，惠眾入甘露。」……太子謂師：「是六十四書，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時師選友歡然悅豫，棄捐自大，說是偈言：「難及真淨尊，在世興悲哀；悉學一切典，現入書教中。咸宣諸書名，吾不知本末；皆達此眾書，故復示入學。」<sup>22</sup>

〈坐樹下觀犁品〉記載太子年紀稍長，與群臣出宮至村落觀耕犁者，見到

---

則大多已譯作「悉達多」，如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迦毘羅城淨飯王子，姓瞿曇氏，字悉達多」（見 T12n0374\_p0478a05）、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汝愛刹利種，淨飯王子，字悉達多」（見 T25n1509\_p0073b14）、北齊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大寶積經》：「世尊本號悉達多，字為父母所喜樂」（見 T11n0310\_p0357c23）。

<sup>21</sup> 見 T03n0186\_p0495a26～T03n0186\_p0495b03。

<sup>22</sup> 見 T03n0186\_p0498a11～T03n0186\_p0498b28。

從田裡鑽出的小蟲，立刻被烏鳥啄食，內心深感生命之無常，遂獨行至閻浮樹下，見樹蔭茂盛，便在樹下禪思靜坐。

當時群臣正四處尋找太子，及至發現太子靜坐樹下，炎日當空，但上方與附近之樹枝，卻自動彎身以遮蔽豔陽，便趕緊請白淨王來看此一奇景。白淨王問太子何以獨行至此，太子回答坐禪可去除妄想、降服群魔，白淨王遂想起太子初生之時，梵志阿夷頭預言「處國當為轉輪聖王」、「若捨國出家，為自然佛度脫眾生」<sup>23</sup>，遂認為應是該為太子尋找妃子成婚，以阻斷其出家修行的意念。

〈坐樹下觀犁品〉云：

爾時太子年遂長大，啟其父王，與群臣俱行至村落；觀耕犁者，見地新墾蟲隨土出，烏鳥尋啄。……時菩薩遊獨行無侶，經行其地，見閻浮樹蔭好茂盛，則在彼樹蔭涼下坐，一心禪思三昧正定，以為第一。……時王群臣及大眾人，各各馳走欲見太子今為所在？遙見諸臣逐之隨後，見閻浮樹下禪思定意。爾時日照樹曲覆菩薩身，樹木一切曲躬向閻浮樹而稽首禮菩薩不移。疾往啟王：「其光明相樹不可蔽暎，日照樹傾覆太子身不能蔽相。」時王聞之往詣其樹，即見菩薩威神吉祥巍巍無量……於是太子啟王：「我適行來在近遊觀，何以相追？」王問：「何故爾行？」答曰：「諸臣欲除眾塵諸妄思想，光明清淨執於相好，坐禪三昧而不動搖，降伏諸魔闇蔽悉除。」王曰：「善哉！善哉！初生瑞應終不虛妄，今皆現矣，十方蒙度。」<sup>24</sup>

## 六、娶妻成婚：

〈王為太子求妃品〉記載為替太子求得王妃，白淨王與釋迦族長老集會共

---

<sup>23</sup> 見 T03n0186\_p0496b03~T03n0186\_p0496b05。

<sup>24</sup> 見 T03n0186\_p0499a26~T03n0186\_p0500a02。

商議，並請太子慎思所求女子應為何，太子遂請工藝師畫一人像，並說若有女人的德行、面貌、形體若此，我便聘之為妃：

爾時菩薩使上工師，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假使女人德義形體面貌若斯，吾乃可之。不用凡庶，如吾所說乃應聘耳！其色顏貌如紫磨金，內外相應身口不違，心淨如空安徐光光，不以放逸希言屢中，慈心無害奉敬道義，沙門梵志布施持戒，乃為我求不嫉無厭；志性仁賢不失時節，質直無諂專敬夫主，不懷他意恒無放恣；不在妊身不卒懷子，捐高自大事夫如婢；不嗜酒，不貪味，不慕聲，不愚冥，消無明根，知法住真諦；不輕舉，無有邪術，常懷慚耻；不惡口，不呪咀，常奉行法；身口意淨言行相應，心如下使多修慈愍；不持頭首不在愚戇，無有恚恨在眾猶安而不迷惑，所作業善，敬於親友視如世尊；念彼如己，流長名稱，眾善普修，常奉恭恪。如是妻者爾乃可耳！<sup>25</sup>

白淨王知道太子納妃「不好種姓唯樂德耳」後，遂發出命令，請梵志至迦維羅衛國各家探求如斯賢德女子，並集眾女於無憂堂，使太子自行挑選。會中有一女子名為「俱夷<sup>26</sup>」，太子見後即欣然微笑，以眾寶瓔珞送她，俱夷婉拒說她不慕珠寶，僅以功德莊嚴其身，太子還室後深歎俱夷不慕世榮：

爾時菩薩會諸姝女，時釋家女名曰俱夷，與諸姝女到菩薩所；却住一面諦視菩薩，目未曾眴。菩薩普察即時欣笑，執持寶英以遺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慕眾寶瓔珞，當以功德自莊嚴身。」太子還室歎未曾有：「今此俱夷解

<sup>25</sup> 見 T03n0186\_p0500a28~T03n0186\_p0500b15。

<sup>26</sup> 《普曜經》中有時譯為「俱夷」，有時譯為「瞿夷」，皆指太子妃，乃是音譯筆誤，造成同經之中，前後不一。如〈告車匿被馬品〉：「俱夷明日從寐起已，遙聞眾言，覺知已去；聽大聲響即察求之，不見菩薩。」（見 T03n0186\_p0508a04）、〈告車匿被馬品〉：「瞿夷心望菩薩當還，不覩行來，心疑不信菩薩當去。」（見 T03n0186\_p0508b12）、〈優陀耶品〉：「俱夷携羅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見 T03n0186\_p0536c08）。

世無常，不貪世榮。」<sup>27</sup>

白淨王遂遣使者往俱夷家求親，俱夷家中長者提出需六藝皆備者，方將俱夷許配。白淨王為使太子技藝卓群能彰顯於世，遂命侍者於七日後召開藝術技藝集會，使有才者皆與會競賽，並宣布「藝術勝者以執杖釋女而娉與之；戲射手博最第一者當得是女」，當時親族中的調達（即提婆達多，為佛陀叔父之子）為顯神力，便以右手牽象頭、左手持鼻，撲捏殺之置於道上。難陀（佛陀之異母弟）來到，遂將象移於道旁，避免擋路。佛陀來到，為避免象身惡臭普薰城內，遂以右手接擲拋置城外，展現其非凡神力。於〈試藝品〉中又述及太子在釋迦宗族面前展現書疏計校眾術等技藝，皆無人能出其左右，最後更以射藝之高超，贏得所有人稱歎，並博得執杖釋種將女兒俱夷送至白淨王宮，作為太子妃：

爾時國王及諸釋種，更欲試射。時調達豎四十里准，難陀准六十里，菩薩百里。時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執杖釋種亦四十里，皆不能過；於時持弓授於菩薩，菩薩張弓，弓即折破。菩薩又問：「於是城中寧有異弓任吾用不？」王即言：「有。」問：「在何所？」王曰：「昔吾祖父名曰師子，所執用弓奇異無雙，身沒之後無能用者，著於天祠。」時菩薩言：「便可持來。」持來授之，執杖釋種一切諸釋無能張者；以授菩薩，菩薩在坐以手捺張，桴弓之聲悉聞城內，百千國人虛空天子，舉聲嗟歎……中百里鼓而穿壞之；箭沒地中踊泉自出，箭便過去中鐵圍山，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虛空諸天咸嗟歎言：「至未曾有，如是妙術清淨至真，諸菩薩中最为殊特。」於斯執杖釋種以女俱夷送詣白淨王宮，為菩薩妃。<sup>28</sup>

<sup>27</sup> 見 T03n0186\_p0500c18~T03n0186\_p0500c23。

<sup>28</sup> 見 T03n0186\_p0501c27~T03n0186\_p0502a19。

## 七、捨國出家：

〈四出觀品〉記載太子成婚後，出四方城門，見到東城門外「頭白齒落目冥耳聾，短氣呻吟執杖僂步」的老人，又見到南城門外「水腹身羸臥于道側，氣息張口命將欲絕」的病人，再見到西城門外送葬隊伍，有一「死人著于床上，家室圍繞舉之出城」，內心深感無常變化；最後見到北城門外「寂靜安徐淨修梵行」的沙門，內心深感契應。白淨王知道後，為防止太子出家，嚴令眾兵被鎧執杖於四城門，並增加更多伎女、綵女隨侍太子，希望太子常處歡愉，不捨離宮。

但太子心欲出家，便向白淨王表其心志，白淨王悲泣垂淚，勸說自己已年老，若太子出家將何所依？太子便說若得四願成就，當不復出家：

菩薩即時以柔軟辭而啟王言：「欲得四願，假使聽我還得自在；得是願後不復出家。何謂為四：一者、欲得不老，二者、至竟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神仙五通雖住一劫不離於死，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

29

此四願普天之下無人能成就，自然是太子意欲止息父王阻止其出家的權宜之計。白淨王既悲傷又擔憂，遂更令侍衛嚴守四城門，大愛道姨母亦令諸伎作樂，欲使太子沈浸此樂，不捨離家。

太子夜半逾城出家的過程，在漢譯佛典中，一直是著墨重點，《普曜經》中亦以不少篇幅描述此過程。據〈出家品〉記載，太子深夜未眠，見宮中眾伎女「亂頭倚鼓，委擔伏琴，更相扶枕，臂脚委地，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再還視妻

---

<sup>29</sup> 見 T03n0186\_p0503c20～T03n0186\_p0503c24。

子睡臥之姿，亦是披頭散髮，深感「外是革囊中有臭處」、「強熏以香飾以華綵」，此時諸天於虛空中，見太子思惟感嘆「一切所有皆如幻化，三界無怙，唯道可恃」，便出聲詢問太子：「何以稽遲？時已到矣。」<sup>30</sup>太子此時早已堅定出家修行之志，遂叫醒隨侍馬夫車匿，命其將坐騎白馬撻陟帶來。

從〈出家品〉至〈告車匿被馬品〉，以相當長的篇幅，透過對話鋪陳車匿苦苦哀求太子勿離宮修行，然太子終捨國出家的過程：

爾時菩薩告車匿曰：「車匿！速起嚴被白馬，今日人尊宜吉祥時，應當出去。」車匿聞之心懷憂感，淚下如雨：「所行平等光明清淨，猶若師子，今欲若行願見告示。」……菩薩復告車匿：「欲得白馬，宿本所行當致上尊；妻子恩愛，財寶重業，則是牢獄；古來遠之身所不樂，惟欲護戒、奉行忍辱，修精進力、禪定、智慧，是心所樂」……爾時車匿益悲，白菩薩言：「故當住此決了進退。」菩薩告曰：「聽我決了，愍傷眾生欲度脫故，其心堅住如須彌山而不可傾。」車匿又問：「正士云何？」菩薩答曰：「強如金剛，所行清淨，懃修顯曜，假使大棒破壞我頂，終不退還慕於世榮。」……爾時車匿聞菩薩言，流涕交面白菩薩曰：「惟賢聖子知時識義，今夜非時也。」菩薩告言：「今正是時。所以者何？吾從久遠長夜求願，為諸眾生顯示道跡，今可樂時當度眾生，適得閑靜。」……車匿重悲淚下如雨：「今人中尊為欲所至，門闢下鑰誰能開者？」天帝念知即時開門。車匿見之心歡悅豫：「乍悲乍喜誰為我伴？當作何計？復如何行？」於時四神即捧馬足，其四部兵力勢難當。……諸天百千天帝釋梵以待送之，嚴治道路校飾莊嚴，演大光明散華燒香；諸天伎樂同時俱作，踊在虛空，諸天圍繞以待送之。<sup>31</sup>

<sup>30</sup> 上引數句，見 T03n0186\_p0504c17~T03n0186\_p0505b13。

<sup>31</sup> 見 T03n0186\_p0505c04~T03n0186\_p0508b26。

太子所居宮中，本是城門封鎖，高牆聳立，難以跨越，然〈告車匿被馬品〉中對於太子離宮的情節，極盡奇幻，描述虛空中諸天俱現，天帝開啟城門、四大天王捧起馬足載著太子奔馳而去，笙簫樂器俱時而作，百千諸天前後導從。

## 八、證道成佛：

〈異學三部品〉記載太子至各方尋師訪道，先後拜見鬱頭藍弗、迦羅及三迦葉兄弟，但深感外道所學並無精進正道之心，遂再離去。〈六年勤苦行品〉則記載太子於樹下靜坐，度過六年勤修苦行的歲月：

日服一麻一米，六年之中，修立難及勤苦之行，宿命不債。菩薩六年之中結加趺坐，威儀禮節未曾進退，常存露精亦無覆蓋，不避風雨，不障頭首塵土之患，不起左右行大小便，亦無涕唾，不屈申俯仰，亦不傾側，身不倚臥，或興雲大雨電雷霹靂，春夏秋冬菩薩默坐。<sup>32</sup>

後來太子深覺單是苦行、斷食，絕不能達到開悟證道，遂離座而起，走到尼連禪河沐浴淨身，並接受牧女的乳糜供養，使身體恢復元氣，再回到樹下靜坐：

菩薩修勤苦行竟六年已，心自念言：「雖有神通聖明慧力，今吾以是羸瘦之體，往詣佛樹，將無後世邊地諸國有譏者乎？謂餓得道。吾身寧可服柔軟食，平復其體使有勢力，然後乃往至其樹下，能成佛道。」……時修舍慢加村落長者女與諸梵志，奉美乳糜詣菩薩所，稽首足下右遶三匝，以賓乾水灌菩薩手，以美乳糜進奉上之。菩薩愍哀女故輒受食之，氣力得充心無所戀。……於是菩薩飯食已充，愍念十方救濟危厄，欲坐樹下現成佛道

<sup>32</sup> 見 T03n0186\_p0511a18~T03n0186\_p0511a24。

度脫眾生。<sup>33</sup>

〈迦林龍品〉記載當太子於樹下靜坐時，自誓不成佛道終不起身，值此之時，身放光明照耀迦林龍宮，龍王、龍后皆歡喜供養華香珍寶瓔珞奇珍，十方諸天齊降，環繞於即將證道成佛的太子身邊：

菩薩身光照迦林龍王宮，龍蒙佛光身心悅豫……龍后聞之，歡喜悅豫出觀四方，遙見菩薩如須彌山，威光莊嚴，百千億天而圍繞之……菩薩坐師子床，如月盛滿照於十方。菩薩自誓：「使吾身壞肌骨枯腐其身碎盡，不成佛道終不起也。從無央數億載劫，勤為苦行，今乃得之，終不迴還。」<sup>34</sup>

〈召魔品〉記載將欲成佛的太子，身放光明照耀波旬魔王所住宮殿，魔王於睡夢中夢見三十二種惡相變化，擔心悉達太子證成佛道將使魔界崩毀，便召集群臣眾兵，策劃攻打在樹下靜坐的太子，使其不得證道。然魔兵到了太子面前，皆無功而返。〈降魔品〉記載魔王命令四個女兒到太子面前極盡媚態之姿，惑亂其心，使其難成佛道，然最後四女仍舊無功返回魔宮：

爾時波旬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汝詣佛樹惑亂菩薩，嗟歎愛欲之德，壞其清淨之行。」女聞魔言，即詣佛樹，住菩薩前，綺言作姿三十有二：一、曰張眼弄睛。二、曰舉衣而進。三、曰閤閤並笑。四、曰展轉相調。五、曰現相戀慕。……爾時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往欲亂道，而重言曰：「仁德至重諸天所敬，應有供養，故天遣我。我等既好年壯盛時，天女端政優鉢華色莫喻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薩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瓶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淫惡不善自亡其本，死則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形，欲脫致難。汝輩故來亂

<sup>33</sup> 見 T03n0186\_p0511c18~T03n0186\_p0512c07。

<sup>34</sup> 見 T03n0186\_p0514b12~T03n0186\_p0515b05。

人善意，非清淨種，革囊盛臭而來何為？去，吾不用。今阿母等不安天上，何為橫來？」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sup>35</sup>

魔王又發動魔軍變幻為種種凶猛野獸攻擊太子，然靜坐金剛座上的太子仍毫髮未傷，光顏益好，魔軍戰敗後，魔王現前與之相詰難，太子以「慈心却魔怨」，大地震動，魔王及其大軍皆墜地<sup>36</sup>。此時，太子不僅降伏魔道，也早已參悟成佛之道，〈行道禪思品〉記載天上明星出現時，太子證道成佛，通曉一切知見，經中的稱謂也悉由「菩薩」改稱為「佛」、「如來」：

明星出時廓然大悟，得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佛得道意一切知見，坐自念言：「是實微妙難知難明，甚難得也。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苞天地，細入無間。錠光佛時翦我為佛，名釋迦文。今果得之，從無數劫勤苦所求，適今成耳。……累劫勤苦功不唐捐，今悉獲之。」

37

## 九、成立僧團：

自〈梵天勸助說法品〉至〈十八變品〉，敘述佛陀證道之後，梵天勸其說法度眾，佛陀遂先至波羅奈國鹿苑度化在此修行的五位比丘，此即初轉法輪；而後再度化三迦葉，三迦葉率領千名弟子皈依於佛陀座下，此時僧團規模大體形成：

於時世尊從樹下起，尋時舉聲告於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從次前行至波羅奈神仙鹿苑，詣五人所。……如來於是轉法輪已，化彼五人拘鄰之等，

<sup>35</sup> 見 T03n0186\_p0519a25~T03n0186\_p0519c03。

<sup>36</sup> 見 T03n0186\_p0521a24~T03n0186\_p0521c11。

<sup>37</sup> 見 T03n0186\_p0522b13~T03n0186\_p0523a05。

念：「此間有優為迦葉等，大有名稱，國王黎庶咸來奉之，與五百弟子俱。欲往先開化令解道法，然却彼後當次伏焉。」即往從之。……」於是師徒脫衣裘褐及水瓶革屣，諸事火具悉棄水中，俱共詣佛稽首白言：「今我五百人皆有信意，願欲離家剃除鬚髮作沙門。」……優為迦葉有二弟，次名那提，幼曰竭夷，二人各有二百五十弟子……二弟及五百弟子，鬚髮自墮袈裟著身，即隨佛後成為沙門。佛便有千沙門，俱到波羅奈夷縣叢樹下坐，諸弟子皆故梵志。<sup>38</sup>

〈佛至摩竭國品〉記載佛陀領弟子們至摩竭國說法，瓶沙國王率臣民出城相迎，佛陀向其開示十二緣起，並授五戒，國王並敕命舉國齋戒讀經。該國有一迦陵長者，見佛陀尚無修行之精舍，遂將其竹園捐奉佛陀作為精舍，即竹林精舍：

時摩竭國有一長者，名迦陵，見佛入國，天人所奉而無精舍：「我有好竹園欲用上佛。」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視愛子，棄轉輪王不慕世榮，今無精舍，有一竹園去城不遠，願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呪願，佛及聖眾遊處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園。<sup>39</sup>

〈化舍利弗目連品〉記載舍利弗有感於佛弟子安陞沙門威儀具足、行步安詳，知其師事何師後，遂來到迦陵竹園拜見佛陀，成為佛陀弟子，後又牽引其好友目犍連成為佛弟子，二人本有弟子二百五十人，也依其師加入僧團：

佛有沙門名曰安陞，遣行宣法開化未聞，五濁之世人心荒迷不達至真，入城分衛，衣服整齊威儀禮節，不失常法行步安詳，因是使人見之心悅。時舍利弗，本字優波替，而遙見之心中欣然。自心念言：「我學來久，未曾覩此沙門，衣服禮節安詳齊整，不失儀節。試往問之，所奉何道？吾常意

<sup>38</sup> 見 T03n0186\_p0529a08~T03n0186\_p0532b03。

<sup>39</sup> 見 T03n0186\_p0533b27~T03n0186\_p0533c04。

疑當有異聞，殊妙之道未必齊此。」……頭髮自墮袈裟著身，佛為說經分別諸法，十二根本坦然意達，漏盡意解得無著果。……時舍利弗稽首佛足，辭出入城求目捷連。遙見目連與諸弟子遊行城裏街曲里巷，舍利弗趣之。……時舍利弗與目捷連俱，往詣佛所稽首佛足，……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時，誓供養我，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弟子，得舍利弗、目連二百五十人，合一千二百五十比丘，一時所度。

僧團至此，規模具足，眾弟子追隨佛陀度化十方，佛陀僧團亦聲名遠播。

## 十、歸國度眾：

〈優陀耶品〉記載佛陀捨國出家已逾十二年，白淨王思子心切，遂派遣親信優陀耶迎佛歸國，優陀耶見到佛陀後，受其感化亦出家為沙門。佛陀欲歸國度眾，遂命優陀耶先行還國展現神足通<sup>40</sup>，以方便化俗：

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汝以神足經行虛空現其神變，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爾，況佛威德巍巍無量，爾乃信受。」優陀受教，神足飛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迦維羅衛。城上虛空現無數變，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水不濕身，火無所傷，七現七沒，從東沒地出於西方，西沒東出，南沒北出，北沒南出，行空如鳥，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

<sup>40</sup> 「神足通」乃佛教六神通之一，因其神奇變化之術，在佛典中獲得極富文學性的記載，「神通」原是印度的一般信仰，後來為佛教吸收，並被視為諸佛菩薩用作度眾的方便法門之一。在習慣於神教意識的一般信眾中，由於對佛存有神奇的想法，故神通也一直被作為化俗度眾的權宜方法。（見《大智度論》釋初品中八念義第三十六之一，T25n1509\_p0220b15～T25n1509\_p0220b18。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1994年，頁103。）

乃知道尊。<sup>41</sup>

白淨王知道佛陀將返國後，悲喜無限，敕命一切道路打掃盡淨，香汁灑地，張懸幡綵、豎其幢蓋，使國內光彩盡呈。七日後，佛陀帶領弟子們歸國，將入城時，瑞相齊現，「百歲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出」，白淨王率領百官群臣迎接佛陀，見到佛陀相好莊嚴，然身邊弟子身黑形瘦，遂勅命國中諸豪族，選五百端正顏貌者為沙門，侍佛左右，佛陀之弟難陀亦追隨出家：

王見佛巨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諸根寂定如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觀諸梵志，久在山中曝露身形，日炙風飄身體黑瘦，在佛邊侍，猶如黑象在紫金山不能發起。顯佛大德令一切悅，便勅國中諸豪族釋，端正姝好顏貌殊異，選五百人出為沙門，侍佛左右。……時佛弟難陀亦作沙門，來下鬚髮。

當佛陀在宮中說法度眾時，佛陀出家前的王妃俱夷攜子羅云前來頂禮佛足，當時宮中眷屬皆疑俱夷之子非佛陀之子，認為佛陀在外修行十二年，羅云年僅七歲，俱夷怎能懷孕多年方生羅云？佛陀知曉他人疑心俱夷，遂顯神通，使諸弟子皆化身眾佛陀相，俱夷交給羅云指印信環，讓他拿指環給其父，面對眾多佛身，羅云果能將指環直接交給佛陀，從而證明其為佛子，俱夷亦因此洗刷眾人之猜忌，還其清白，並受戒淨修梵行：

時佛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俱夷携羅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久違侍觀曠廢供養。」時王眷屬皆懷沈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懷妊生子羅云？佛語父王：「告諸群寮：『俱夷守節貞潔清淨，無瑕疵也。』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眾僧皆使如佛，相好光明等無差異。於時羅云厥年七歲，俱夷即以指印

---

<sup>41</sup> 見 T03n0186\_p0534c06~T03n0186\_p0534c16。

信環與羅云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群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所見無量，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正子，緣吾化生，勿咎俱夷也。」王得道證，俱夷受戒淨修梵行，宮人大小咸受戒法。<sup>42</sup>

《普曜經》的佛傳故事情節，至佛陀回國度眾、俱夷清白得證後，可謂圓滿落幕。其後〈嘆佛品〉、〈囑累品〉可視為經典之補充說明，大體是敘述佛陀向諸天說明諷誦、流布、受持是經的功德，以及殷切叮囑弟子們應廣為人說此經，使佛法周布，十方蒙濟。

檢視附錄表格，可知《普曜經》的佛傳故事，其敘事情節發展相因相承，可歸納出十大敘事主題，且每一主題環環相扣，各品目前後相續不斷層，在敘事陳述中，按時間順序來開展佛傳故事，使《普曜經》展現出縝密的線性敘事，以下，再據此分析其敘事結構。

## 參、普曜經敘事結構

敘事結構乃指文本的敘述方式與結構安排，敘事結構亦可被視作一種框架結構，在此基礎上，故事或敘事的順序和模式被展現給讀者或聽眾。對於文本的敘事結構所涉及的結構元素，各敘事學理論家提出許多看法<sup>43</sup>，本文考量《普曜經》佛傳文學之屬性，並就第二部分所揭示的主題、內容來看，擬分成四個

<sup>42</sup> 見 T03n0186\_p0536c06~T03n0186\_p0536c21。

<sup>43</sup> 弗拉基米爾·普羅普（Vladimir Propp）《民間故事形態學》、A·J·格雷馬斯《結構語義學》、茨維坦·托多洛夫《〈十日談〉語法》、羅蘭·巴特〈敘事的結構主義分析導論〉、熱拉爾·熱奈特《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華萊士·馬丁的《當代敘事學》等。概括言之，敘事學乃是關於敘事文本的理論，它以各種被敘述後的文本（narrated text）為基礎，探討敘述文本內在構成的機制，以及各部分之間的相互關係與內在關連，從而尋求敘事文本區別於其他作品的獨特規律。

敘事結構元素—敘事線索、角色模式、語義方陣、因果關係—以便分析《普曜經》的敘事結構。

## 一、敘事線索：

敘事結構即是敘事線索的安排，敘事線索即是文本內部的敘事方式安排。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認為敘事方式與故事線索息息相關，而故事線索可由人物情節發展來研究敘事是如何安排<sup>44</sup>。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則認為敘事時間上的序列關係，是一種敘事線索，為故事發生的前後順序安排了敘事的前後關係<sup>45</sup>。綜合言之，敘事線索即是對一個事件，或一個過程的完整敘述；敘事作者在文本中，挑選有用的細節、串連事件序列，形成一個超越時空、新的、可以敘述的線索，成為一個表述的中心鏈結。

從文學文本來說，敘事線索在傳統作品中也構成兩種結構模式：「一種是以人物為中心，另一種則是以事件為中心」，「如果以人為中心，文本會描述有關這個人物生平的許許多多事蹟，以反映人物性格，或歷史狀態；如果以事件為中心，則在事件中反映人物的性格和描述其社會生存狀態；這一切使整個文本構成一個起因到最終結束的過程。我們把這個過程稱為“敘述的圓”。」<sup>46</sup>

《普曜經》屬於佛傳文學，整部經重點在於敘述佛陀一生重要事蹟，其敘事線索可說是以主角人物—佛陀—為中心，展開故事情節。經中所分品目，悉以主角前生至今世的時間序列為鋪設，前生部分僅簡略述及主角本住兜率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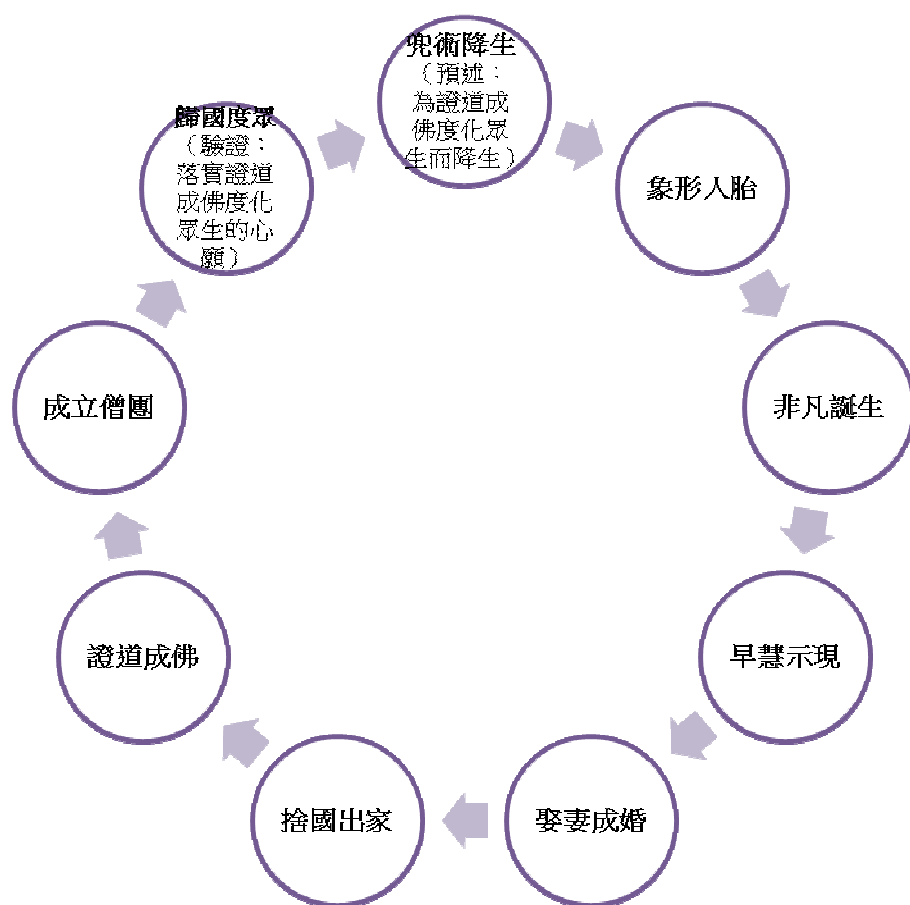
---

<sup>44</sup> 見 J·希利斯·米勒〈阿里阿德涅的線：重複與敘述線索〉，載於郭英劍等譯《重申解構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43。

<sup>45</sup> 見熱拉爾·熱奈特著，王文融譯，《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年，頁 14。

<sup>46</sup> 見董小英《敘述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年，頁 291、299。

然欲降生人間、度眾說法，今世（住世）部分則開始詳細敘述，敘事線索以主角人物為主軸，時間為副軸，從兜術降生、象形入胎、非凡誕生、早慧示現、娶妻成婚、捨國出家、證道成佛、成立僧團至歸國度眾為止，形成一個「敘事的圓」，筆者以圖示之：



所謂敘事的圓，是由預述和驗證組成，即對一件事物的預述開始，以這件事物的最後驗證為結束。如果人物欲完成或實現某一件事、理想，不管中間發生多少曲折、困難，最終實現所欲完成的事情或理想，即是「敘事的圓」，且是「肯定的圓」；反之，當事件的序列發展沒有被敘述完全，或者結果相反，則是

不滿的圓或否定的圓。敘事的圓在敘事文本的形成過程中，給了讀者一個固定的模式，使讀者產生“閱讀期待”，只有把這個圓完成了，讀者才會覺得這個事件和人物的敘述是完整的，否則總覺得這個故事有未完成的感覺<sup>47</sup>。

《普曜經》中，〈論降神品〉、〈說法門品〉屬於故事起因，是引言亦是揭開佛傳故事的「序幕」：敘事者（佛陀）於迦梨講堂，告訴眾比丘昨夜諸天來請經說法，並為大家開始敘述從降生至出家成佛的故事。在〈論降神品〉中即敘述主角累世修行，福德具足住在兜術天，乃是因為欲度眾成佛的動機，故降生人間、示現成佛，故〈欲生時三十二瑞品〉中，主角誕生時即自云「我當救度天上天下為天人尊，斷生死苦，三界無上，使一切眾無為常安」，此即是「敘事的圓」的“起點”，亦是主角人物於此敘事歷程中欲完成的事件或理想。

以象形如胎，乃是體現「出離生死直達法本」的隱喻。經中藉梵天之口說「菩薩大乘譬若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sup>48</sup>」，可知在敘事的“淺層結構”上，展現為象形入胎的情節，以銜接降生的前提設定；但因經中品評了“兔”、“馬”、“白象”在渡水寓意上之別，彰顯“白象”不僅能從此岸渡至彼岸，且能「盡其源底」，故與他獸之高下區分暢然分明，進而凸顯出“深層結構”上的象徵意涵：亦即情節設定為象形入胎，其實是呈現主角降生乃是為教化大眾出離生死輪迴，且達自覺覺他的目的。

接下來在主角人物住世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遭遇，諸如坐樹下觀犁、娶妻成婚、出四城門觀老、病、死、沙門等，皆是鋪設其欲出家修行的前置敘事線索，其中情節無不扣緊、呼應欲出家證道的目的，諸如：

- 〈坐樹下觀犁品〉：觀耕犁者，見地新墾蟲隨土出，烏鳥尋啄……。人命甚短憂長無量，日月流邁，出息不報就於後世；天人終始，三惡苦患不可

<sup>47</sup> 前揭書，頁 299-300。

<sup>48</sup> 見 T03n0186\_p0488b25。

稱載；五趣生死輪轉無際，沈沒不覺毒痛難喻；入山成道，乃度十方三界起滅危厄之患。

- 〈王為太子求妃品〉：吾不貪欲不宜處家，棄兜術來在此人間心無所慕，寂三昧定以權方便而試當之，勤親道場以無蓋哀而勸助之。
- 〈四出觀品〉：萬物無常有身皆苦，生皆有此何得免之。吾身不久亦當然矣，不亦痛乎。有身有苦，無身乃樂。……是吾所樂，心意寂靜自慙度彼，善業快利成甘露果。

上述情節，皆是主角未出家前的心情描述，可知其內心早已對人間富貴無所戀慕，入山成道成為心之所欲。及至捨國出家，到處尋師訪道，乃至為魔王迫害等情節，都是為彰顯「證道成佛」的願望所相應的敘事線索。

敘事線索進行到證道成佛後，已是完成由「預述」（欲證道成佛，斷生死之苦）到第一階段「驗證」，然因主角出家前曾起誓若證佛道必當還度父母<sup>49</sup>，故歸國度眾成為最後階段的「驗證」。由上圖可知，《普曜經》透過敘事線索的環環相扣，完成「敘事的圓」，呈顯出其敘事結構的縝密性。

## 二、角色模式：

法國敘事學家A·J·格雷瑪斯，曾提出兩個著名的概念來詮釋敘事結構：「角色模式」及「語義方陣」。他以語言學為模式，力求找出故事內部基本的“二元對立”關係，再據此推演出整個敘事模式。格雷瑪斯認為任何事件都離不開行動者，故所謂「角色」，乃指「行動者」，他認為「角色」與「人物」不能等同，其區別在於：有的人物在故事結構中沒有功能作用，因為他們並不引發或經歷

<sup>49</sup> 〈優陀耶品〉：「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見 T03n0186\_p0534c06～T03n0186\_p0534c07）

功能性事件，這種人物便不能稱之為角色，而僅是人物，例如《普曜經》中，簇擁瓶沙王去迎接佛陀的臣子們便是「人物」，而瓶沙王與佛陀便是故事中的「角色」。角色一定與敘事文本中的功能性事件有關，根據作品中主要事件的不同功能關係，格雷瑪斯區分出敘事作品的六種角色：主角、對象、支使者、承受者、助手、對頭<sup>50</sup>。茲說明於下，並據以分析《普曜經》的角色模式框架：

### （一）主角與對象（Subject and Object）

在故事中，最重要的功能關係，便是追求目的的角色，以及角色與目的之間的關係，格雷瑪斯將二者稱為「主角」與「對象」。「對象」不一定是個具體人物，也可能是指抽象意涵，例如主角所期望達到的某種狀態，例如成功、財富、愛情等。「主角」與「對象」是一種二元對立的基本結構，並藉以統攝眾多的具體內容。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構，可套用在敘事文本中，例如以《普曜經》來看，則呈現出如下的二元對立結構：



上述結構還可區分出主角與對象之間的兩種不同關係，第一種是指「對象

<sup>50</sup> 見 A·J·格雷瑪斯著，蔣梓驊譯《結構語義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 年。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頁 100～112。

係外在於主角的某人或某事」，例如上述圖象的第一個、第二個；第二種是指「對象是主角自身的某種狀態或期望」，例如上述圖象的第三個。

## （二）支使者與承受者（Sender and Receiver）

主角既然要追求某種目標，就可能存在者某種引發他行動或為他提供目標和對象的力量，格雷瑪斯稱這種力量為「支使者」，而獲得這種力量的則稱為「承受者」。支使者並不一定指人物，有時亦代表某種抽象的力量，例如社會、命運、理念、慾望等。此外，支使者和主角，常是同一個人物。從理論上來說，主角與支使者，較之對象和承受者，更為重要，因為它們是實現敘事功能的積極和能動的因素。以《普曜經》而言，「支使者」散落在經典之中，隨情節而展現，例如〈四出觀品〉記載主角（悉達太子）四出城門遊觀，盡見老者、病者、死者、沙門，而興起欲解脫生死出家證道之想法；再例如〈出家品〉記載主角在深夜宮中，見到眾伎女亂頭倚鼓、臂腳委地的睡姿，深感「外是革囊中有臭處」，「百年之命臥消其半，又多憂患其樂無幾」，遂萌生應及早出家修行證道成佛之想法；再例如〈六年勤苦行品〉記載主角經過六年苦行後，萌生一味苦行並非成佛之道的想法，遂接受牧女供養乳糜，再於樹下靜坐而後證道。而承受者，在《普曜經》中，自是指覺悟真理的佛陀。

以上四種角色，都與對象有著直接的關係，或追求對象，或給予對象，是故事結構中不可少掉的元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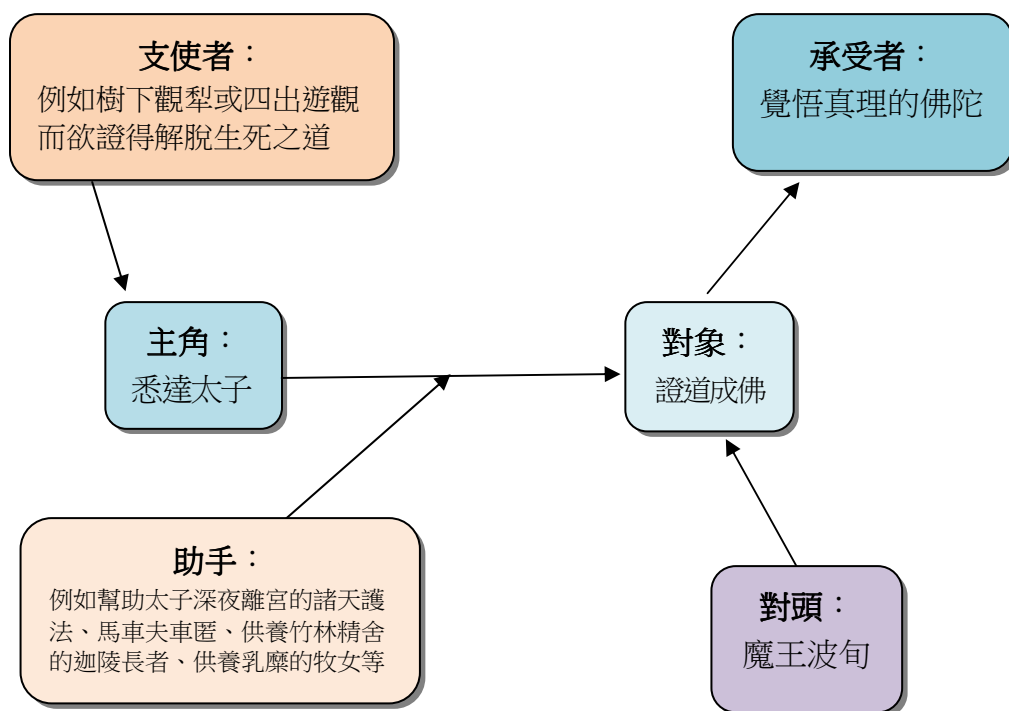
## （三）助手與對頭（Helper and Opponent）

在敘事文本中，要達到最終目標或結果，往往要經歷曲折的歷程，主角在追求對象的過程中，可能受到來自敵對勢力的種種阻擾，也可能獲得非敵對者的種種幫助，故在角色模式中，便會再增加「助手」與「對頭」，它們主要作用於主角與對象的關係，在主角追求對象的過程中，完成幫助或阻礙的功能。「支使者」與「助手」的區別在於：「支使者」的作用一般貫串於整個敘事文本，而

且常常是抽象的，而「助手」的作用則常常是局部的、暫時的，但較為具體。「助手」與「對頭」的角色身份的確認，只能以它們與主角的關係為依據。

從敘事結構的角度來看，每一個「助手」都是主角達到目的的必要卻不充分的條件，在故事的進程中，「對頭」必須被逐一戰勝或消滅，正是助手與對頭的加入，才使故事產生迭宕、懸念，使敘事更形豐滿而不單調。以《普曜經》而言，「助手」的角色，諸如幫助太子深夜離宮的諸天護法、馬車夫車匿、供養竹林精舍的迦陵長者、供養乳糜的牧女等皆是；「對頭」，則為魔王波旬，因為他的功能乃是作為與主角對峙的要角。

茲將《普曜經》的六種角色模式圖示於下，以明其敘事結構的展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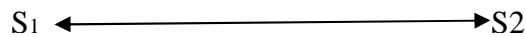
上圖的角色模式，乃是一種結構性模式，它主要在於由繁複的敘事文本中，

抽絲剝繭，簡化出一基本的框架結構，使讀者能透過此模式操作，明瞭各角色在敘事結構關係中的功能，及各角色間的關係，然有關角色的本質、性格為何，則並非此結構分析所欲關心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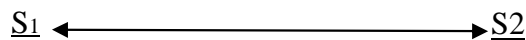
### 三、語義方陣：

格雷瑪斯認為敘事文本的意義不假外求，他通過語義學研究來為這種意義的產生，尋找一套客觀的規則系統，在《結構語義學》中，他提出「語義方陣」的概念，認為一切意義可概括在此語義方陣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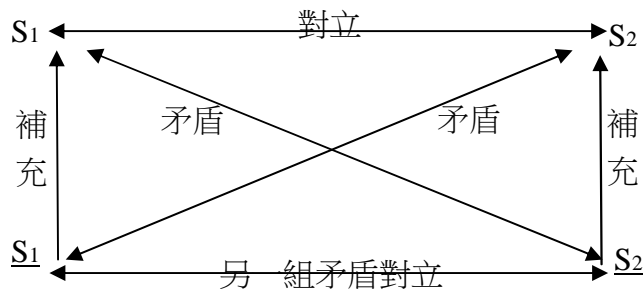
語義方陣仍是由結構主義的二元對立原則所發展出的，但又更加複雜，他認為在任何語義結構中，存在著一個基本的語義軸，如下所示：



上述語義軸的關係是一種對立關係， $S_1$ 與 $S_2$ 之間是一種絕對否定、對立的關係。在此一基本的語義軸上，還可引入另一種關係，乃 $S_1$ 與 $S_2$ ，是屬於另一組對立的矛盾關係，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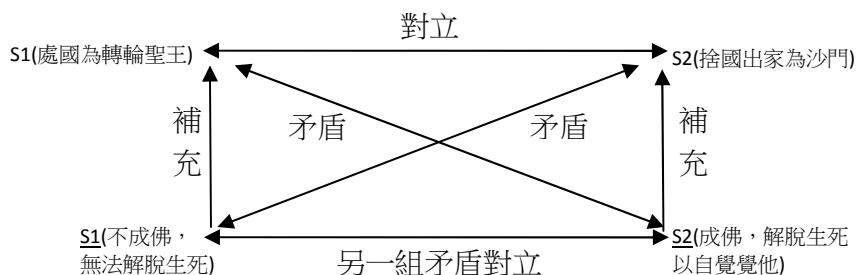
上述符號關係與基本語義軸間，構成一種矛盾關係。如果把上述兩組符號畫成一基本結構，則形成一個語義方陣，如下圖：



圖中由 $S_1$ 至 $S_1$ 或 $S_2$ 至 $S_2$ 的關係，則為補充關係，亦即不對立、不矛盾，有

所一致或呼應的關係。

格雷瑪斯的語義方陣用於敘事文本的分析時，則故事的發展軌跡與語義方陣的運動方向是相對應的，故事的展開乃是從某一特定因素向其相反或矛盾的方向轉化。這個方陣構成了故事的深層結構，在這個故事的基本框架上，作者可增添許多細節，對它進行擴充、鋪陳，使故事更為豐富，但故事意義的基本結構則不會改變<sup>51</sup>。以《普曜經》而言，在語義層次上，整個佛傳故事的主旨在於傳達“出家修行，證道成佛，解脫生死以自覺覺他”的意涵，則其語義方陣的基本結構，應如下圖所示：



從上圖可以明瞭，《普曜經》所敘述的佛傳故事，基本上乃是一個有機設計的結構，是對稱的、平衡的有機組合，而非零散無組織的組合。角色、事件、敘事發展的設定，不僅呈現二元對立的基本架構，且語義關係上能自成一完整的邏輯架構，使敘事結構自有一套客觀的規則系統。

#### 四、因果關係：

故事是由一系列事件構成的，事件就是故事從某一狀態向另一狀態的轉化。一個故事至少必須包含兩個事件，這些事件構成一個序列，這個序列也需

<sup>51</sup> 見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11。

具有「可續性」，可續性涉及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連，亦即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各事件的因果關係，也形成敘事文本的結構框架。

檢視《普曜經》的主題及其內容，可發現一條清晰的因果鏈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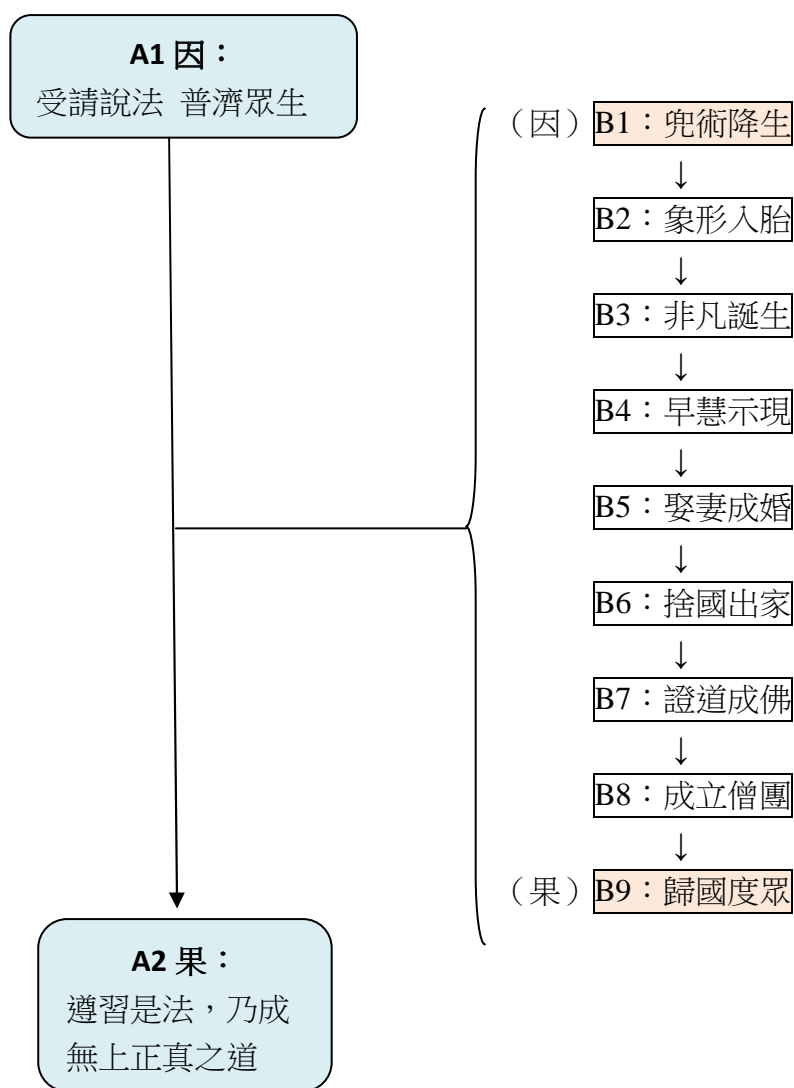
$A1 \rightarrow (B1 \rightarrow B2 \rightarrow B3 \rightarrow B4 \rightarrow B5 \rightarrow B6 \rightarrow B7 \rightarrow B8 \rightarrow B9) \rightarrow A2$

A1：敘事的起因。〈論降神品〉中記載佛陀為諸天所請，故欲演說《普曜經》此一佛傳經典以普濟眾生。從B1至B9，代表所述佛傳故事的因果關係，故其因果鏈條為：

B1：兜術降生 → B2：象形入胎 → B3：非凡誕生 → B4：早慧示現 → B5：娶妻成婚 → B6：捨國出家 → B7：證道成佛 → B8：成立僧團 → B9：歸國度眾。

A2則是連結A1之「因」的「果」，〈歎佛品〉、〈囑累品〉可視為A2，表達佛陀述說若有人諷誦受持、抄錄流布此佛傳經典，將能獲得諸多福報，佛陀並向弟子說明自己從無數劫以來，皆遵習是法，乃成無上正真之道，故囑咐弟子們應受持諷誦此經，廣為人說<sup>52</sup>。若以“因果關係”來概括《普曜經》的敘事結構，則如下圖：

<sup>52</sup> 〈囑累品〉：「爾時世尊告賢者大迦葉、賢者阿難、彌勒菩薩：『我從無數劫遵習是法，乃成無上正真之道。囑累汝等，以手相付，受持諷誦廣為人說。』」（見T03n0186\_p0537c04～T03n0186\_p0537c07）。



基本上，《普曜經》的敘事因果關係，乃是採線性關係的發展，由一個「因」，開展出一個「果」，「果」又成為「因」，開展下一個「果」，如此因果相銜，則共構成一完整的敘事結構。若把A1至A2，視為一外因的「因」、「果」，則B1至B9，可視為一內緣的「因」、「果」，因有兜術降生之「因」，方有成為太子後，仍想證道成佛之「果」，而此「果」又成為「因」，方有捨國出家、尋師問道、自悟成佛的「果」，此「果」又成為「因」，方有歸國度眾、度化眾生之「果」。

可見《普曜經》的敘事透過因果鏈條的緊密度，彰顯出敘事結構的完整與彼此間的環環相扣。

## 肆、結論

佛傳經典在於重塑佛陀的崇高完美形象，以紀念其偉大的人格、思想與行為，並感召信仰者對宗教的虔誠與堅定。因為佛傳經典在屬性上可視為傳記文學的一種模式，故就文學面向而言，其敘事結構亦值得探究，本文綜述前揭討論，歸納對漢譯佛典《普曜經》敘事結構之研究結果為以下五點：

### 一、敘事主題相因相承：

佛教有所謂「八相成道」，亦即將佛傳經典中記載釋迦牟尼的一生經歷分為八個重要階段：降兜率相、托胎相、出生相、出家相、降魔相、成道相、轉法輪相、涅槃相，這八種儀相可說是一系列相因相承的情節發展，就敘事學觀點而言，八相乃是整個佛傳敘事鍊條中的核心事件，若以《普曜經》呼應此八相，則除了「涅槃相」之外，其餘皆具足。此係因西晉以前的早期佛傳經典，皆記錄至佛陀成道、轉法輪為止，故《普曜經》可說是呈現早期佛傳經典的典型敘事內容，以八卷30品的內容來看，依其情節進展，本文概分為十個主題，並呈現其核心事件，文末附錄表一，並歸納整理《普曜經》30品所對應之敘事主題，以供參酌。

### 二、從敘事線索形成「敘事的圓」：

《普曜經》的敘事線索是以主角人物—佛陀—為中心，展開故事情節。經中所分品目，悉以主角前生至今世的時間序列為鋪設，前生部分僅簡略述及主角本住兜率天，後欲降生人間、度眾說法；今世（住世）部分則開始詳細敘述且環環相扣，敘事線索以主角人物為主軸，時間為副軸，從兜術降生、象形入胎、非凡誕生、早慧示現、娶妻成婚、捨國出家、證道成佛、成立僧團至歸國度眾為止，達成由「預述」到「驗證」的完整敘事線索，構成「敘事的圓」，呈現其敘事結構的縝密性。

### 三、從繁複敘事中概括為六種角色模式：

透過格雷瑪斯的「角色模式」分析，本文歸納整理出《普曜經》繁複敘事中的六種角色模式，以明其敘事結構的展現，並透過圖示說明各角色間的關係模式，可發現《普曜經》的角色功能與關係，並非雜亂無序的編排，而是能透過二元對立的基本模式，呈現出有序的敘事結構。

### 四、對稱、平衡的語義方陣：

運用格雷瑪斯的「語義方陣」分析，歸納整理出《普曜經》的語義基本結構，並透過圖示，說明各語義符號間的對立與矛盾或不對立與補充的關係，一方面清楚掌握該敘事文本的語義與符號關係，一方面亦得以清楚其敘事乃是一個有機設計的結構，是對稱的、平衡的有機組合，而非零散無組織的組合。角色、事件、敘事發展的設定，不僅呈現二元對立的基本架構，且語義關係上能自成一完整的邏輯架構。

## 五、敘事因果環環相扣：

《普曜經》的敘事因果關係，乃是採線性關係的發展，各事件的因果關係，形成敘事文本的結構框架，其因果鏈條的形式為：

$A1 \rightarrow (B1 \rightarrow B2 \rightarrow B3 \rightarrow B4 \rightarrow B5 \rightarrow B6 \rightarrow B7 \rightarrow B8 \rightarrow B9) \rightarrow A2$ 。若把A1至A2，視為一外因的「因」、「果」，則B1至B9，可視為一內緣的「因」、「果」，因果相銜，環環相扣，品目之間以事件相續相生，共構成一完整的敘事結構。

以文學角度而言，漢譯佛典是中國文學中一門獨特的文學，因其涉及翻譯者視角及翻譯語言的傳達，漢譯後的佛典，作為一研究文本而言，本文企求能考察並分析出此故事性濃烈的敘事文本，究竟在敘事結構上的展現為何，故在研究上先分析與敘事結構息息相關的敘事情節，再就佛傳文學之屬性，以四個敘事結構元素（敘事線索、角色模式、語義方陣、因果關係）來分析漢譯《普曜經》的敘事結構。

綜上所論，本文認為漢譯《普曜經》作為一早期佛傳經典，其敘事結構完整縝密，透過敘事的開展、結構的設計，使佛陀的人物形象與故事，得以生動的展現，此正在於敘事作者在文本中，能挑選有用的細節、串連事件序列，裁減成一個可連結敘述的線索，使文本結構能呈現有機完整的架構，而非零散無組織的架構，且佛傳人物的形象與事蹟，亦得以藉由此有機編排的敘事架構彰顯其非凡神聖之處。

**附錄：**《普曜經》敘事主題對應 30 品目簡要表

品目		敘事主題	敘事緣起	兜術降生	象形入胎	非凡誕生	早慧示現	娶妻成婚	捨國出家	證道成佛	成立僧團	歸國度眾
論降神品（第一品）		✓	✓									
說法門品（第二品）		✓	✓									
所現象品（第三品）				✓								
降神處胎品（第四品）				✓								
欲生時三十二瑞品（第五品）					✓							
入天祠品（第六品）						✓						
現書品（第七品）						✓						
坐樹下觀犁品（第八品）						✓						
王為太子求妃品（第九品）							✓					
試藝品（第十品）							✓					
四出觀品（第十一品）								✓				
出家品（第十二品）								✓				
告車匿被馬品（第十三品）								✓				
異學三部品（第十四品）									✓			
六年勤苦行品（第十五品）									✓			
迦林龍品（第十六品）									✓			
召魔品（第十七品）									✓			
降魔品（第十八品）									✓			
行道禪思品（第十九品）									✓			
諸天賀佛成道品（第二十品）									✓			
觀樹品（第二十一品）									✓			
商人奉爇品（第二十二品）									✓			
梵天勸助說法品（第二十三品）										✓		
拘鄰等品（第二十四品）										✓		
十八變品（第二十五品）										✓		
佛至摩竭國品（第二十六品）										✓		
化舍利弗目連品（第二十七品）										✓	✓	
優陀耶品（第二十八品）											✓	
歎佛品（第二十九品）											✓	
囑累品（第三十品）												✓
備註	打✓者為呈現該敘事主題之品目，因《普曜經》的故事情節相續相連，按時間順序來呈現事件，研究者基於敘事情節及主題考量，以敘事主題為主，品目為輔，做成此一表格以供參酌，有些品目則橫跨兩個主題。											

## 參考書目

### 一、大正新脩大藏經（按翻譯時代排序）：

東漢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T03n0184）

東漢西域沙門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T04n0196）

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太子瑞應本起經》（T03n0185）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普曜經》（T03n0186）

西晉居士聶道真譯：《異出菩薩本起經》（T03n0188）

東晉西域沙門迦留陀伽譯：《佛說十二遊經》（T04n0195）

北涼天竺三藏曇無讖譯：《佛所行讚》（T04n0192）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T03n0190）

唐天竺三藏地婆訶羅譯：《方廣大莊嚴經》（T03n0187）

宋涼州沙門釋寶雲譯：《佛本行經》（T04n0193）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過去現在因果經》（T03n0189）

宋代法賢譯：《眾許摩訶帝經》（T03n0191）

姚秦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T25n1509）

北齊三藏那連提耶舍譯：《大寶積經》（T11n0310）

梁僧祐：《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二、近人論著及集刊（按出版時間排序）：

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56年。

[日]水野弘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佛教的真髓》，嘉義市：財團法人安慧學苑文教基金會附設香光書鄉出版社，1986年。

[法]熱拉爾·熱奈特著，王文融譯：《敘事話語·新敘事話語》，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1994年。

胡亞敏著：《敘事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

羅鋼：《敘事學導論》，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荷]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

[法]A·J·格雷瑪斯著，蔣梓驊譯：《結構語義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

董小英：《敘述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

陳懷宇：《動物與中古政治宗教秩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研究論文

# 阻礙大學生通過必修服務學習課程成因之探討：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發展歷程與反思<sup>\*</sup>

羅淑真

亞洲大學學生事務處服務學習組組長、服務學習委員會執行秘書

廖淑娟<sup>\*\*</sup>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蕭至邦

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收稿日期：2014 年 5 月 12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6 月 30 日。

<sup>\*</sup>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sup>\*\*</sup>通訊作者：廖淑娟，shuchuan9@asia.edu.tw。聯絡電話（公）：04-23323456 轉 3400。

## 中文摘要

本研究團隊以大一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直到大四才重修完畢的學生為研究對象，運用質性分析，了解阻礙學生參與必修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同時檢視大四學生補修課程後的實質改變，做為亞洲大學未來規劃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之參考，並嘗試建構亞洲大學理想的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模式。

本研究結果得出，學生可以接受必修服務學習課程，然而阻礙學生參與必修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有三：分別是時間太早、沒有興趣、與你丟我掃/心灰意懶。在畢業前修習通過的學生有三點實質改變，學生學習到 1.溝通與合作，2.同理心，以及 3.自省能力與工作態度。學生建議學校調整必修服務學習課程的上課時間和改變服務學習內容。

本研究結論指出，建構亞洲大學理想的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模式，在作法上必須尊重學生的意願，並且改善課程實施的方法，讓參與的同學明瞭，維護校園的整潔不只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也是亞洲大學大家庭每一份子的榮耀。在技巧上必須讓參與的同學有互動的機會。在時間的運用上，可以更彈性的規劃服務的時程。在服務方式上，服務學習課程可以更多樣化，比方，將部分課程轉化為當地社區的服務工作。總之，學校必須提供學生多元參與的機會和賦予學生自主決定的權利，激發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熱忱。

**關鍵字：**阻礙參與服務學習因素、必修服務學習、學生學習成效、學生主動參與

# **A Study on Obstruction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A Reflection on Asia University Service Learning Development Process**

**Shu-chen Lo**

Director, Sec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Asia University, Taiwan

**Shu-chuan Lia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Social Work, Asia University, Taiwan

**Chih-Bang Hsia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Social Work, Asia University, Taiwan

## **Abstract**

The research team took Asia University (AU) senior students, who did not pass the freshmen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only completed until the last year, as subjects. We use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understand students' obstruc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We then investigated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fter they complete the course. The aim is to better plan futur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s at AU as well as construct an ideal model for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s that students can accept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Obstructing fresh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is three-fold: too early, lack of interest, and no motivation. Those who completed the course until graduation showed learning outcomes as follows: 1.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2.empathy, and 3.introspective ability and better attitude. Students suggested the university adjust class time and change the service cont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onstructing an ideal model for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at AU needs to include students' voices in terms of methods, contents and time of services. In doing so, students would have motivation to involve themselves to the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and show their responsibility. The university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ie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campus services. Furthermore, AU should give students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to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Keywords:** required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obstruction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service learning course,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stud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 壹、緒論

### 一、研究背景

亞洲大學自 2001 年成立以來，即遵循教育部政策開始規劃大學生服務學習課程，並於 2003 年成立服務學習組，全面推行大一入學新生之服務學習課程。十年來，亞洲大學服務學習課程成效卓著，多次獲得青輔會(現已組織再造更名為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多次的肯定，成為中彰投地區大學校院的志工大學楷模，亞洲大學協助推廣並滾動服務與學習活動，美中不足之處是每年仍有不少大一學生無法完成服務學習課程，必須仰賴服務學習組提供各種補救措施，得以順利畢業。為了瞭解原因及問題本質，強化服務學習課程效能，本研究團隊設定大一沒有通過服務學習的學生和大四補修完成服務學習之學生為研究對象，希望研究成果做為亞洲大學修訂服務學習課程之參考，並嘗試建構亞洲大學理想的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模式。

根據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組之資料，每年約有 200 多名大一學生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總要拖延至大四，為了畢業才補修服務學習課程。因此，本研究想要了解大一生沒有通過服務學習的原因，並從補修才能畢業之學生的心得反思資料及部分口述訪談，了解其想法及理想中的服務學習課程，包括課程目標、課程種類、教學方法、實施方式等制度面。希望透過本研究了解阻礙同學參與必修服務學習的原因，同時檢視學生修課後的實質改變，做為亞洲大學未來規劃必修服務學習課程之參考。

方法上，研究團隊首先透過大一沒有通過服務學習學生的抽樣訪談，了解其沒有通過的原因，然後從為數眾多補修服務學習課程學生的心得反思，了解其對於服務學習的想法和變革建議，從中歸納出這群學生理想中的服務學習課程。

透過此研究，研究團隊希望評估服務學習課程的各種作法，依據學生反應及提出之改進意見，重新思考服務學習課程之實施，最終的目的在提高亞洲大學學生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習成效，以達到服務學習課程之宗旨與目的。

亞洲大學積極準備建立更多元的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方式，讓學生有更多的選擇實際服務的場域與方式，培養其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引導學生於在學的階段，以多元的方式善盡社會責任。具體的做法在於，持續的將志願服務訓練導入服務學習課程，努力統整校園服務、社區服務、偏鄉服務、海外服務等，以系統化方式規劃服務進程，提供多元服務機會。雖然亞大不斷地朝著培養大學生成為社會公民的方向邁進，在這個推動的過程中，亞大已達到初步所設定的目標，但是在不斷向前邁進的同時，亦應回頭檢視需要改進的可能，並且針對參與學生的反應及回饋，進行檢討及補強之道。

## 二、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

### 研究目的：

- 1.分析大一生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
- 2.探討重修後通過服務學習課程學生之想法。
- 3.探究重修後通過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理想中的服務學習課程。
- 4.建構亞洲大學理想的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模式。

### 研究問題：

- 1.大一學生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為何？
- 2.重修後通過服務學習課程學生之想法為何？
- 3.甚麼是重修後通過服務學習課程之學生理想中的服務學習課程？
- 4.甚麼是亞洲大學理想的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模式？

###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質性研究方法來探索研究目的，質性研究者必須在自然的情境下，透過與被研究者的互動過程，透過一種或多種的資料收集方法，對所研究的社會現象或行為，進行全面式的、深入式的理解（潘淑滿，2003）。本研究採用質性方法中的檔案分析法及深度訪談法，檔案資料來源包括：

- 1.亞洲大學 100 和 101 兩個學年度學生補修後通過服務學習課程後之心得反思，共 305 篇，
- 2.從所有大一未通過服務學習的學生隨機抽樣訪談 13 位，採一對一訪談方式，了解其沒有通過的原因，
- 3.服務學習組長自述文本，以及
- 4.亞洲大學服務學習政策相關資料。

深度訪談法強調，研究者應深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瞭解現象或行動之意義（林淑馨，2010）。除了學生的反思心得外，同時面對面訪談 13 位重修之學生，了解他們沒有通過服務學習的原因、困境、以及對服務學習的想法。13 位同學的訪談編碼分別為，同學 01、同學 02、...、同學 13。以下訪談摘錄將以訪談時間日期及同學編碼的方式呈現，如 20130920-01 表示該訪談於 2013 年 9 月 20 日進行，訪談對象為 01。

除了上述的訪談外，研究團隊邀請本校服務學習推動之負責人撰寫自述文本，針對其推動服務學習之歷程與遭遇之困境，以及服務學習在變革中的因應方式，做進一步的了解。

研究團隊反覆閱讀文本，彼此討論，並以服務學習相關論述、亞大服務學習的推動理念以及實施方式，做為分析架構，探討學生無法如期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以及改進之道，做為亞洲大學持續推動服務學習之參考。

## 貳、文獻探討

本段落就服務學習課程相關之理論與可能之實踐模式分析討論，首先探討服務學習內涵，緊接著闡明台灣之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藍圖、最後根據亞洲大學服務學習課程之現況做為陳述的內容。透過以下這三個面向的探討，呈現出本研究的論述基礎。

### 一、服務學習內涵

服務學習課程應具備的五項核心特質：

- (一) 協同合作：服務學習過程往往是協同合作的過程，當設定服務目標後，所有參與者彼此是平等、互利的關係，在合作過程中全體一起分享責任和權力，一起努力和共享成果（Chrislip & Larson, 1994）。
- (二) 互惠：在合作基礎上的服務者與被服務者雙方是「互惠」的，彼此既是教導者也是學習者，共同努力和共享成果（Kendall, 1990）。例如，學生協助學校進行環境維護之工作，不只對學校的環境整潔有助益，做為學校大家庭份子的學生也互蒙其利，可以說是自助助人理念的體現，亦即是施與受為一體的真諦。
- (三) 多元差異：學生來自不同系所，彼此都有機會接觸與自己背景、經驗不同的人，在服務中挑戰自己既有的刻板印象與偏見，學習與瞭解並尊重他人不同的觀點，促進彼此的轉變與成長（Jacoby, 1996）。
- (四) 以學習為基礎：服務學習與志工服務最大不同，乃在強調「學習」與服務連結，設定具體學習目標，透過服務的具體經驗，來達到學習目標，經驗學習是服務學習最重要的理論基礎（Kolb, 1984）。

(五) 社區意識：在「社區意識」的概念中，鼓勵學生把學校視為自己的生活環境，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樣，所以基本上協助學校進行各種事務，比方，進行行政支援或是環境維護亦是學生份內的事。學生愛護自己居住的環境，把學校看成自己所居住的社區，愛護居住週遭的環境，並且關心身旁的人。同理，亞大身處霧峰社區之間，對霧峰盡一份心力也是服務學習理念的實踐（廖淑娟、蕭至邦、陳竹上、簡宏哲，2011）。

## 二、台灣各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藍圖

服務學習推動至今，有關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之意願、成效、滿意度等研究調查陸續被發表，做為持續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改進的參考資料，有利於我國服務學習發展不斷改進的借鏡。總結本研究團隊推動經驗，結合相關研究（林慧真，2006；張同廟，2011；陳韋良等，2011；孫智辰、涂靜宜，2011；鄭博真，2012；陳文喜，2012；黃瓊慧，2012；劉梅蘭、蔡竹固、林佳慧，2012），從制度方面提出台灣的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之藍圖：

- (一) 大學應全力支持服務學習推動單位，編列服務學習課程實施經費，補助學生社團參與服務學習方案，例如，提供服務學習課程交通保險及成果展示費用。
- (二) 鼓勵教師與學生連結更多的服務學習機構，透過簽訂夥伴合作契約，建立服務學習單位資料庫，有效發展社區與大學夥伴關係。
- (三) 舉辦校內服務學習研習交流活動，邀請服務學習課程教師分享方案設計及教學成效。
- (四) 重視大一新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意願，奠定未來服務學習多元參與的興趣及動機。

- (五) 校內服務學習課程，應設計不同的配套方案，如多元的服務方式、彈性的服務時間、不同的服務成果展現方式等，目的在提供學生更多元的選擇，以適應不同學生的興趣、能力與需求。
- (六) 推動服務學習刊物的發行，展現服務學習成果的不同面向及多元的實施成效；獎勵學生及教師投稿，讓師生分享學習經驗，並累積教師服務學習教學經驗與研究能量。
- (七) 鼓勵專業教師開設不同領域及層次的服務學習內涵課程，呈現學校特色與師生創意。

### 三、亞洲大學服務學習

亞洲大學蔡進發校長為旅美學人<sup>1</sup>，從美國的學習生活經驗中，觀察到學生需要生活教育的規範，亦即，大學生擁有良好的生活教育，除了幫助學生建立自律的學習習慣，更能養成良好的待人處事方法。大學生在校園中學習與生活，已半獨立於家庭之外，又要開始為進入社會工作做出準備，於是亞洲大學創校之初，即將「服務與學習」課程列入校務發展重點之一，藉以實現創校的宗旨與理念。

因此，亞洲大學自 2003 年開始實施服務學習制度，以愛的教育和全人教育的辦學理想，來增進學生人文關懷精神，培育學生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熱忱的服務精神、以及管理自我的能力，成為一個值得他人信賴的人。亞大師長期望透過服務學習的生活實踐，培養學生的社區意識，並期待學生從服務學習的準備、服務、反思、和慶賀的四階段的行動過程中，了解服務學習的內涵，

---

<sup>1</sup> 亞洲大學創辦人為蔡長海醫師及林增連先生；蔡校長為美國西北大學電機工程與電腦科學博士。

進而成為優秀的公民。

根據《亞洲大學服務學習辦法》，服務學習的性質分為四項，分別是基本服務學習、進階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學習、以及服務學習融入課程，本文主要是探討基本服務學習。基本服務學習的實施對象是大學日間部一年級學生、未修習之轉學生和復學生，這是共同必修課程，上下學期各零學分，不及格者須重修，亦列入畢業門檻。在《亞洲大學服務學習施行要點》中，規定服務學習內容課程分講授課和實作課兩部分，講授課採課堂教學，用以加強學生服務學習、志願服務、及生活教育等意涵，再加上每學期 12 小時的志工培訓課程，敦促學生了解服務的意義。實作課的服務性質是，服務學習（一）為上學期實施，以安排學生參與校園內服務工作為主，旨在引導學生身體力行服務工作，服務學習（二）於下學期實施，除安排學生參與校園內服務工作外，亦開放申請校外多元服務。校內服務每週三天，每天 30 分鐘為原則，每週上課 1.5 小時，每一學期安排二次的反思時間，學期結束繳交反思心得。校外多元服務學習課程原規定申請人必須完成第一學期實作課及講授課，且成績通過，始可提出申請。101 學年度服務學習組認養中彰投 10 所高中職校為服務學習夥伴，特地開放校友回母校服務的機會，申請學生數為 70 人。服務工作項目以協助辦理基礎及特殊訓練協同服務居多，另於母校校慶及志工服務之參與居次，實施以來獲得認養高中職校之讚許，申請多元服務學生感謝學校之創舉。102 學年度服務學習組更首開先例，與鄉鎮社區結合，讓子弟返回家鄉協助志工服務學習，替代學校實作課程之申請。

亞大服務學習的發展，一開始即結合學習反思的引導與校園環境維護，服務學習組<sup>2</sup>首任推動者廖淑娟老師便思考經驗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的關聯，對她

---

<sup>2</sup> 亞洲大學為推動服務學習實施項目，於「學生事務處」下設立「服務學習組」，總理有關服務學習政策的推動及發展。

而言，服務學習符合亞洲大學「創意學生、人文關懷」的治學理念，亞洲大學矢志建立一個以健康、關懷、創新、卓越為主的優良校園文化，其具體的做法在於加強人文關懷和社會服務，因此，亞大發展出服務學習四個內涵特色，亦即「社區意識」、「知行合一」、「行動與反思」、「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四個理念（廖淑娟、蕭至邦、陳竹上、簡宏哲，2011）。廖老師之後更迭 4 任組長，均以延續前任者之理念為目標，99 學年度接掌的羅淑真組長將此內涵特色發揚創新，在全校通力合作下，自 99 學年度起亞大成為志工大學，並建立「服務學習志工人力銀行」，肩負推動志工培訓及志工服務學習之使命，建構亞大成為全國第一所『快樂志工人』的有品志工大學<sup>3</sup>。

為協助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同學能貢獻所長服務社會，亞大積極推動在地志工服務學習，鼓勵學生針對附近鄉里社區推行社會服務工作，增進學生關懷、認同、回饋社區的情操與服務精神，進而能以全球化志工精神，參與不分區域、國度的國際志工服務。此外，為深化中區大學校院服務學習效能，並提升推己及人的陽光利他精神，亞洲大學全力配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每位大學校院青年皆能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成為優質快樂志工人，形塑青年典範與表率。亞洲大學首創志工大學之先例，協助中部地區各大學校院成為志工大學推動服務學習，鼓勵大學生以其所學習之專業能力，帶動中小學與弱勢家庭之服務學習，以肯定自我並能善盡有品公民之社會責任為己任，是為教育目標之一大躍進。

---

<sup>3</sup> 自 100 年截至 102 年 6 月 31 日止，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之師生共計 3,817 人。

##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透過服務學習推動負責人的自述文本，以及歷年重修學生的課後心得反思描述，輔以重修生的訪談資料蒐集，我們反覆與資料對話，歸納上述所有資料，得出研究結果有三，一為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成因、二是學生修課後的實質改變、三是學生對服務學習的建議，藉以呈現學生學習收穫與課程待反思之處，如下所示：

### 一、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成因

眾多學生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我們歸納出了三點，一是時間因素，二是不符興趣，三是種種因素造成的惡性循環。分述如下：

#### （一）時間太早

從心得與訪談的資料顯示，學生無法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第一個原因是時間的因素，資料呈現出，學生在實作課中，要是課程時段在中午或下午幾乎都順利通過，修習早上 7:30 ~ 8:00 時段服務學習課程的同學，有不少學生無法順利通過服務學習課程。在扣除個人無法早起的不當作息管理外，另有其他難以克服的外在因素，如，非住校生的交通問題，以及經濟弱勢學生必須於早晚班打工。對此，在罰則與限制上，學校勢必還得做出更彈性的配套，以解決學生的困擾。

#### （二）興趣缺缺

在時間因素之外，我們發現，學生對於服務學習感到興趣與否，是另一個影響修課的重要因素，不少學生完全不想參與校園環境維護的服務學習，也就

是說，課程是否有趣、或者是課程足以引起他們的興趣，對於學生是否成功完成服務學習課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檢視無法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學生，我們發現絕大部分曾經修過服務學內涵的講授課程，對於服務學習精神並不是全然無知，即便如此，還是有人不願意去完成實做課程。經研究結果，得知原因乃是出在「興趣缺缺」，對學生來說，課程必須有趣而且吸引人，學生對「校園環境維護」這件事發自內心地感受到枯燥與乏味：

對啊，你不覺得很無趣嗎，都只有掃地而已。(20130921-07)

掃地喔...啊就無聊啊！(20130922-01)

因應學生的抱怨與需求，服務學習組在 100 學年度開發了**多元服務學習方案**，主要方式在於，在學校與機構督導認可之下，到校外的機構進行每週固定時數的服務，以取代在校園內進行的服務學習課程，提供學生有校園環境維護之外的選擇，但該方案實施至今（2013 年）僅三人申請，當中有二人完成。探究學生不願提出申請的理由，研究顯示對學生而言，在學校服務較單純，不必自己找尋機構，更不用走出校園，或者為安排交通的問題而傷腦筋。與此同時，亞大於 101 學年度首推高中優質精進計畫，與 10 所高中職校合作，服務學習組藉此機會鼓勵學生回母校服務，結果計有 70 多人選擇此方案，成效超乎預期，這似乎是一個成功的嘗試。

除了上述方案外，服務學習組也提出了外展服務學習課程，任由學生挑選上午九點到晚上九點的時段，進行所謂的自由心證服務，參與者可以在校園內無須小組長帶領，進行例如教室清潔、傳送公文、校園撿垃圾等活動，計有 80 多人申請此方案，這一方案的實施增加了服務學習組許多的行政業務。另外在學生的反思心得中也發現，對某些學生而言，外展服務更能引發學生的興趣，或是符合他們對服務學習的期待。

比起無趣的掃地，或是服務內容本身，更希望可以在當中與人互動獲得樂趣！因為其實...我個人心裡就是會比較喜歡跟大家一起互動，會比較[喜歡]分到外展，像我就覺得很好玩啊！

(20130920-03)

### (三) 你丟我掃 / 心灰意懶

在資料分析過程中，發現某些學生排斥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在於，不少學生覺得因為有環境維護的服務學習，讓有些人心存僥倖，某些缺乏公德心的學生因此放任自己行為隨意丟棄垃圾，有些參與服務學習的學生認為，這些不符合道德的行為，竟然由他們來善後，因而心裡無法平衡，感到心灰意懶。學生對這樣的事發出不平之鳴，

服學的人累得半死，自私的人仍然丟爽爽，乾脆亂丟垃圾的人被舉發就記大過，滿三次就退學，不然學生根本不怕...我期許能以自己的意願去社會上服務學習，不是在學校當被逼著替自私同學撿垃圾的免錢掃地工。(20130922-13)

## 二、學生修課後的實質改變

服務學習以「做中學、學中做」為立意基礎上，無非希望學生從中體會課程帶來的好處，回歸到服務學習的五個核心價值「協同合作、互惠、多元差異、以學習為基礎、以社會正義為焦點」，我們在重修生的心得中看見不少的學生表示，自己從大一對服務學習並不了解，而是在經歷重修服務學習的過程中，深切地體驗到自己的改變，主要是藉由與同學共事的過程中，學習做事的方法與態度，對服務與助人有重新的認識，對周遭開始多了一份同理心，也多了對自己的要求與自省，紮實地由服務中獲得了反饋、學習與成

長。同學心路歷程的轉變計有溝通與合作能力的增長、同理心的強化、以及自省能力的增強與工作態度的轉變，茲分述如下：

### （一）溝通與合作

在為重修學生所安排的服務學習課程裡，老師會把同班同學或是彼此認識的人重新編組，所以大部分修課的學生都會與不熟悉的人同一組，對學生而言，有些人會感到不習慣，不知道怎麼跟組員相處。這樣安排的目的是要讓學生學會如何與不同的人共事，學習彼此尊重與如何協同合作。

有一些同學反映從前的自己老是獨來獨往，並不會理會他人，也很少跟人互動合作，做任何事總是以自己的角度思考，不會以團體立場著想，更不用說，會為團體分擔一些事，也向來不認真看待團體的目標：

我學到了做人處事的道理，如果總是自己一個人獨來獨往，那往往都是最累且沒效益的。(20130921-05)

最大的成就莫過於體會到在一個大團體中怎麼幫這個團體分擔事情。  
(20130921-08)

協同合作的目的在於，促使大家共同合作，一起完成任務。透過任務的分組，幫助同學面對跟以往單打獨鬥迥然不同的情況，例如分配在圖書館內服務學習的小組，面臨多且繁雜的工作，成員必須很清楚，這不是自己一個人就能完成的事，例如，在進行書籍移架時，必須有讀架的人、搬書籍的人、將書打齊的人、依序進行工作，才能讓整個工作順暢運行。遇到圖書館辦活動時，工作量劇增，這時小組成員才體會到，團體的每一份子就像機器中的螺絲釘，各司其職，讓機器運轉，個人主義一定行不通，相信同伴與之互助，讓事情變得簡單，這正是協同合作所帶來的好處與不變的真理：

我們將書歸類越來越有效率了，大家會提早到圖書館，盡早把工作做完，每個人各司其職更讓我體會到了分工合作的重要。

(20130920-04)

我從服務學習這堂課程中學習到與同伴間互助的重要性、及  
1+1>2...彼此互相幫忙，大部分的事情因為互助而變得容易不少。

(20130921-06)

除了從協同合作學習到分工的重要性外，參與服務學習的同學表示，自己最大的改變之一，就是懂得如何與人溝通，除了體會到團體的重要性外，也明確感受到，原本不擅長開口與人交際的自己，為了讓工作能順利進行，必須把握機會與人互動。當團隊遇到困擾時，成員能夠集思廣益，提出意見來解決問題，不僅增進團隊氛圍，也確實改善了工作的進行。

在這段時間裡，有問題大家拿出來討論，有意見有方法也拿出來分享，對於處理事情也有更好的幫助，更加省力省時間，大家也都開心。(20130920-03)

協同合作重在互相協調，交換成員的想法與意見，促進彼此了解。如果不懂得如何開口，就無法互動，人際關係也隨之膠著。在團體合作中，不能因為不想和不認識的人說話，就讓事情原地踏步，毫無進展，所以同學必須督促自己，用各種方式與組員互動，達成溝通的目的：

頭幾天大家都默默做事情，其實氣氛真的很尷尬...後來我學到『微笑』是很重要的非語言表達，有時候跟同學四目交接，輕輕地微笑就會得到善意的回應，後來跟其中幾個伙伴都比較有話聊了。

(20130920-01)

## (二) 同理心－將心比心

重修服務學習課程的同學有不少人提到，在維護校園環境的過程中，體悟到自己一開始所看輕和無法認同的清潔工作，其實也沒有那麼不堪；相反的，因為重修時的密集安排，反而讓他們有機會長時間與髒亂環境為伍，看

見了自己以前所待的教室、宿舍有多麼髒亂，明白自己就是造成環境髒亂的元兇之一。在親嚐箇中滋味後，才了解到自己過去造成清潔工作者很大的困擾，因此學習到不管做什麼事，都要將心比心，同理他人的處境。不少同學也從中有所啟發，多了份替他人著想的心情：

從來不知每個阿姨所必須負責的區域有多大...原來一直以來可愛的

阿姨們是這麼辛苦地處理我們製造出的麻煩。(20130921-05)

同理心－將心比心，也是服務學習核心價值中「互惠」的特質。同學體認到，對於大家習以為常的一切，例如，乾淨整潔的地板、窗明几淨的教室，都不是憑空得來的。享受好處的背後，必然有一群不為人知的人在默默地付出，他們沒有被表揚與讚賞，卻依舊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所以，只有當自己體認到怎麼服務他人，才知道原來自己是怎麼被他人服務著、受著他人恩惠。

### (三) 自省能力與工作態度

在學生所有的收穫與改變當中，自省能力的提升與工作態度的改變是令人深思的一環。不少學生都提到，因為當初自己對課業與作息沒做好管理，所以才需要在畢業前夕還要重修服務學習課程，他們雖然悔不當初，但覺得怨不得人，後果是自己應當承擔的。同學們的想法也更加務實，認為自己在服務學習的過程裡，除了學好守時習慣與管理好作息外，更呈現了對自己負責的行為。大多數人體驗到，對待任何事情態度要認真，對工作要有責任感，如果有這些體認，對以後在社會上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

## 三、學生對服務學習課程的建議

參與研究的同學給予以下的建議，這些意見都非常具體而直接：第一就是

時段的調整，第二是服務內容的改變。

(一) **調整時間：**學校應考量學生實際狀況與無法順利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學生建議，在持有具體證明的狀況下，懲罰之前必須給予學生緩衝的空間，或是給予遲到者補救的機會，這對即使遲到仍有心堅持要來的同學，會是一個比較正向且積極的鼓勵。

(二) **改變服務內容：**不少學生希望服務學習不要只有校園環境維護，他們希望可以到校外進行服務，一方面可以接觸他人，一方面可以選擇發自內心熱誠的服務項目：

希望服學能採自由性的選擇到機構服務。我認為有服務學習是好的，但希望能開放到機構服務會更好，像醫院、流浪狗收容所，讓我們主動去協助弱勢團體達到服學的真正意義。(20130922-10)

雖然學校已經開始實行多元服務學習方案，學生認為即使是替代性的方案，校方也需要考量多方因素，例如，往返服務地點的交通、機構開放的時間等因素，學校在推出替代方案的同時，必須先想好配套措施。當然學生也需要以積極的心態去面對自己自由選擇的服務方式，努力克服其中的困難，好好完成所交辦的任務。

## 肆、討論與分析

依據服務學習內涵的相關理論，我們可以看得到重修服務學習課程的同學已經學習到相關的理念與要求。在協同合作上，學生體認到必須與小組成員溝通合作，才可以完成服務工作；在互惠方面，學生體驗到，自己身為學校的一份子，服務學習是利己利人的工作，彼此共同努力，共享成果；在多元差異面

向，來自不同系所的學生，都有機會接觸與自己背景與經驗不同的同學，在服務中學習，並尊重他人不同的觀點，促進彼此的轉變與成長；最後在社區意識上，學校有如學生另一個家，不少學生認識到以服務學習的方式，協助學校進行各種事務，亦是學生份內的事。

再者，台灣各大學之間的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方式，雖有各校的特色，但絕大多數還是以勞作教育為主要的基礎模式進行，再搭配其他多元方案實施，亞洲大學則是藉由校園環境維護的方式，讓學生從參與服務行動中學會與人合作，並透過人與自然的對話體驗，以及經驗反思的過程，體悟生活教育為主要的實施方式。亞洲大學在實施階段中與各校所遇到的問題也大致相近，學生的不認同與無法接受是其主因，為何繳學費還得進行校園維護；你丟我撿等問題一再重演。多數學生選擇配合課程實作，少數學生的不平則是促使服務學習課程推動單位，在規劃新藍圖時需正視學生的心聲。

對照各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藍圖要點中的「鼓勵教師與學生連結更多的服務學習機構，透過簽訂夥伴合作契約，建立服務學習單位資料庫，有效發展社區與大學夥伴關係」與「重視大一新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意願，奠定未來服務學習多元參與的興趣及動機」，此二點來看，亞洲大學在服務學習校務推動上設有服務學習組專責實行，當中服務學習組推廣多元服務方案時，亦事先與校外各個社會福利機構和弱勢團體，如瑪莉亞霧峰教養家園、德安教養院、青松養護之家等，簽訂相關合作契約，以做為學生服務多元性的選擇。但在部分重修學生的建議中，卻還是提出了想要至校外服務的建議，顯示這些重修生是不知道學校提供相當多的資源與多元方式的。

因此，可以知道有許多重修生缺乏完整相關資訊，也未上網查詢服務學習整合平台，汲取他們想知道的服務相關資訊。一來，顯示這些即將畢業的重修生，當初大一接觸服務學習時，學校是沒有這麼多方案可以選擇的；二來，顯

示即使現在方案已經開始推行，但是因為配套措施付之闕如，讓需要重修的同學即使有意願，卻不知如何參與。服務學習組所呈現的資訊平台與管道雖多，但部分學生卻從未接觸，更無從知悉相關資訊，甚至當校方告知學生有此多元方案可選擇時，學生也會帶著詫異的眼神與語氣表示並不知曉。

此外，在重視學生修課意願的部分，確實是值得執行單位深思探討。現今實施方式是學生開學就得進行每週三天校內環境維護及反思課程，卻見部分學生無法打從心底接受與認同。如果說服務的範疇是利基的，就如同服務學習組開設校內多元服務，讓學生在其他系辦或圖書館等行政單位進行外展服務，因為服務時間較有彈性，且可利用課餘時間執行，不用早起做環境維護，學生還有努力的動力。但現階段除了多元服務學習方案的學生外，其他服務學習修課學生的實作服務內容與性質、區域及時間地點等，全數都由服務學習組所安排並分配執行。對於部份學生而言，若能由其自主選擇服務方式、時間及地點，他們其實是不排斥服務學習課程的。

在缺少動機的基礎下，非自願服務的學習成效必然會因此打上折扣，雖非所有人如此，但這是學生實質的反映，顯示出當前本校服務學習在實作課程實施時，可朝向更多元的面向設計，但是，令人欣慰之處是，有學生同樣地正視這個問題，給予了實質的意見：

可以試著透過了解學生狀況評估及個人考量，服務學習莫非就是讓每個人了解服務、關懷大眾的宗旨，軟性教學會比制式化的硬式學習來的更有幫助，這是！（20130922-12）

透過學生的反思觀點，給予了教學上不同的視野，在往後的服務學習實作課程上，服務學習組也許可以朝著給予學生更多自主性的方式，讓學生有機會為自己設定服務方式、服務區域、和服務性質，並且由學生自行規劃評估從實施到完成的可行性，藉由自己「準備」到實際「行動服務」，進而「反思」自身

方案的做法，亦是落實服務學習各階段的一種學習方式，同時也學會為自己負責。

最後在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的目標上，可以看見蔡校長當初所認為「大學生需擁有良好的生活教育，幫助學生建立自律的學習習慣，養成待人處事的方法」，因而將服務學習列入校務發展的此一理念，已成功體現在重修本課程的學生身上。從學生們再次修課的經驗可以看到，學生展現出自省的態度，對自身以往在生活管理上過度欠缺，以至於日夜顛倒的作息，讓課業與身心健康都無法正常發展感到可惜，覺得實在應當好好珍惜，否則也無需於面臨畢業之際，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學畢業，而自己還要暑修。因而要求自己作息也回歸正常，不讓爬不起來成為自己無法準時到課的理由。

而多數學生不僅從中養成優良生活習慣，更因每天不斷地自我要求，連帶讓他們更加認真對待所面臨的事情與考驗，認為服務學習要讓他們學習到的就是對工作、對生活要認真的態度，對照亞洲大學自 2003 年實施服務學習制度以來，秉持「以愛的教育和全人教育的辦學理想，來增進學生人文關懷精神，培育學生具備良好的生活習慣、熱忱的服務精神、以及管理自我以完成交付任務的能力。」之理念，重修學生的表現無疑是對此一精神的明確印證。學生能體會到學校對學生生活教育的要求，是出自於對學生身心健康、養成良好處事態度的關懷，並且認真實踐反映在實際的再次修課表現上，加強對自身所肩負的責任感，戮力協同完成當中的任務。

另外，依據亞大服務學習所發展出的四個內涵特色，即「社區意識」、「知行合一」、「行動與反思」、「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四個理念，學生在服務中皆必須藉由反思心得的填寫，進而思考自身，留一隻眼睛看自己，行動過後反思、反思完再改進的循環過程，這是「行動與反思」的展現；學生自服務中獲得的改變一再都為此印證。即使還是有部分學生會丟垃圾，但是更多的學生已

經把校園維護當成自身的責任，視校園為生活環境之一，校園亦是一個家，這就是「社區意識」的提升；再者，從研究結果中看出，學生從服務中看到他人服務自己時的辛勞，由衷發出同理心，在明白同理心、將心比心的重要後，同學們仍不忘拿出實際行動，即是「知行合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同步實踐！欲推動服務學習，深化學習效能，這般推己及人，利己利他精神的深度推廣，是絕對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便這些學生是在重修過後才明白這道理，但服務學習的種子已然在學生邁向人生下一階段前種下，以助他們能為社會所用。

## 伍、結論與反思

本研究旨在分析大一生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以及探究學生重修服務學習課程後之想法，同時詢問其理想中的服務學習課程，最後，從研究資料分析，重修後通過的學生是否達成亞洲大學設定之服務學習課程目標。本研究結論如下：

### 一、沒有通過服務學習課程的原因為

- 1.時間太早：由於上午課程於 7:30 開始進行，修課時間太早，以致於學生起不來，無法準時到課，甚至錯過上課時間，或是索性不來上課。
- 2.興趣缺缺：對於所分配的工作感到單調與乏味，缺乏足夠動機。
- 3.你丟我掃/心灰意懶：不少學生覺得因為有服務學習存在，放任自己行為隨意丟棄垃圾，這些不符合道德的行為讓修課學生心裡無法平衡。

### 二、重修服務學習同學修課後的實質改變

- 1.溝通與合作：學生在服務的過程中，學習與人溝通，協調合作，完成所交辦之任務。

2.同理心—將心比心：學生在實作的過程中，親身體會到工作人員的辛苦，能替他人著想。

3.自省能力增強與工作態度的改變：學生反省到過去對課程跟作息都沒有好好管理，所以才需要在快畢業時還要回來重修服務學習，同時也認為自己在服務學習的過程裡，除了學會守時與如何管理作息外，也體認到對待事情態度要認真，以及培養對工作的責任感。

### 三、對於服務學習課程的建議

1.調整時間：能夠彈性調整課程時間，處罰之前給予緩衝的空間，或是給予遲到者補救的機會。

2.改變服務內容：希望服務學習不要只有校園環境維護，可以踏出校園，多接觸人群，從事真正發自內心的服務活動。

依據服務學習內涵的相關理論，我們可以看得到重修服務學習課程的同學已經達到相關的理念與要求，學生與小組成員溝通合作完成交辦任務，瞭解協同合作之重要；學生體認，身為學校的一份子，為校園服務同時利己也能利人，感受互惠的好處，共同努力，共享成果。小組裡聚集各系的學生，接觸與自己背景與經驗迥異的同學，於服務中學習尊重他人觀點，藉由多元差異促進彼此的成長。最後在社區意識上，學生認同學校是自己的生活環境，如同另一個家，亦有學生認識到透過服務學習，協助學校進行各種事務，也是學生分內當為。

相較於台灣各大學實施服務學習課程，亞洲大學服務學習課程的特性有二：1.亞洲大學不同於他校之處為讓學生從參與服務行動中學會與人合作，藉由經驗反思體悟生活教育重要性；2.亞洲大學在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藍圖上，則有著部分學生不認同校園維護工作、你丟我撿問題反覆上演、服務資訊與平台欠缺整合、及修課同學需要更多自主性選擇服務方式、時間及地點等有待解決之需求。

從亞洲大學設立服務學習課程之宗旨與目標來評析，這些同學的修習服務學習課程結果大致符合學校要求，由學生習慣之改變呈現亞洲大學當初設立時提出的「大學生需擁有良好生活教育」的教育理念；藉由學生的自省，認知良好工作態度之於社會的重要性，印證本校全人教育精神的實現；再者，由重修生在修課中的蛻變，實踐了亞大服務學習所發展出的四個內涵特色，即「社區意識」、「知行合一」、「行動與反思」、「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綜上所述，亞洲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在實施上仍有變革及改善的空間：在政策上，亞洲大學配合教育部之政策，全力推展服務學習課程，到目前為止，已經從初始的校園環境維護，延伸至支援校園內服務性工作，到近年的校外多元服務。但是，囿於資源與行政管理不便等原因，到目前為止，僅大部分止於校園環境維護工作，在課程理念建構和傳達給服務學習學生的努力有待加強。少部分支援校園環境維護工作以外的服務，如校內服務性工作，也存在同樣的問題。晚近引入之多元服務學習方案，從學生的反映看來，受到學生一致好評，不論此類多元服務學習方案是否傳達給學生服務學習相關之理念，但在實施上確有吸引學生之處。可惜的是，進行相關方案的學生仍占少數。因此，本研究團隊提出下列建議：

對於亞洲大學服務學習以校園服務工作為主，詢問學生的意見，高達七成的學生還是做為第一優先選擇，所以在**實施作法**上，可以尊重學生的意願，校方有義務改善課程實施的方法與技巧，比方，理念上的傳輸，讓參與的同學明瞭維護眾人日常生活環境的整潔是大家共同的責任，也是亞洲大學大家庭每一份子的榮耀。在**技巧**上必須利用這個時間，讓參與的同學有互動的機會。在**時間**的運用上，可以更彈性的規劃，比方，推行榮譽認領制，讓同學自組團隊認領環保區域，自動自發分配輪值人力，發揮最大效能。在**服務方式**上，可以更多樣化，比方，亞洲大學身處霧峰社區之間，是否可以把亞洲大學學生服務學

習課程部分轉化為當地社區的服務工作：從社區老人照顧據點的老人陪伴，到社區弱勢家庭子女課業輔導以及關懷陪伴，或是社區綠美化，還是發揮大學生專業知識協助社區進行各種發展工作。總之，學校必須提供學生主動參與的機會和賦予學生自主決定的權利，目的在激發學生參與服務學習的熱忱。

此外，亞洲大學是否考量加強校園服務工作以外之課程，亞洲大學考量學生多年的反映，曾提出服務學習替代課程方案，少數同學表現也令人讚賞，比方，主動積極擔任亞洲大學與其高中母校溝通的橋梁，在學校與資源高中之間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這些學生仍占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學生之少數，顯然學校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規劃，不只深化與潛在學生族群的溝通與互動，也可將這樣的工作推廣至在校學生與校友的維繫工作，若深化加強類似的工作，則不僅對參與此類服務學習替代方案的同學在其與母校學弟妹聯繫，或將來職涯與學長姐關係之建立有重大貢獻，相關服務學習替代課程也必然對學校之校務推展與將來發展有所裨益。

再者，除去返回母校服務學習方案外，亞洲大學另訂有其他多元服務學習方案之辦法，截至今日，僅有寥寥數人依據辦法完成多元服務學習方案，此辦法之定訂立意極為良善，透過服務社會的服務學習方案是培育具有服務熱忱、公民意識之大學生的最佳途徑。檢視其成效不彰之原因為學生認為到外面服務需要花更多的時間以及金錢，因此，申請意願較低。所以在資訊平台下，學校有責任對潛在之多元服務學習單位進行分析，了解其屬性、工作時間、工作內容，並在社會工作學系教師協助下，給予事先的培訓；倘若進行之多元服務學習牽涉專業技能，比方，社區教室、社區相關電腦課程之建構，可由學校相關專業老師予以支援。目前之多元服務學習辦法旨在規範，而缺乏協助學生之精神，難怪學生望而卻步。

從學校建立資訊平台及各種社會服務暨專業知能提供之必要性，可見學校

教師參與服務學習課程為不可或缺之元素。分析亞洲大學目前實施之服務學習課程，存在諸多可改進之處，教師參與確有不足，惟有在教師積極參與之下，亞洲大學服務學習的一些問題方能改善，在此觀點下，校方是否考慮將服務學習課程學分化，服務學習雖然要傳達服務利他之精神，然而對於大一新生而言，常有不平之怨言。不論必須早早起床，或是覺得時間上無謂的耗損，常為其藉口，若將服務學習課程學分化，讓尚未明事理、尚未認同服務學習理念的大一新生，至少有修習該課程之動機。或許在身體力行一個學期後，自是有所體會，學分不過是要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方法與手段。對督課或提供專業指導之教師而言，亦無須有做白工之嘆，目前雖有少數教師擔任志工，但是獎勵及誘因相當有限，學分化後的服務學習課程當可吸引不少優秀教師共同參與。

亞洲大學立足於霧峰，與霧峰地區共存共榮，相依相存，倘若亞洲大學之學生可以在服務學校之餘，走出校園，進行服務學習工作，則是真正發揮了服務學習的理念與宗旨。一方面，大學生生活於亞大，是亞洲大學的一份子，各種在校園內進行的服務學習工作乃是盡大家庭一份子之力，追求亞洲大學大家庭之盡善盡美；另一方面，亞洲大學是霧峰這個大家庭的一份子，倘若亞大師生對此有所體認，當竭盡所能為霧峰這個大家庭盡心盡力，而在霧峰地區進行符合社區需求之各式各樣服務學習，乃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建立同舟共濟之大學與社區夥伴關係，是服務學習目標得以實現的最高境界。

## 參考書目

- 林淑馨（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臺北市：巨流。
- 林慧真（2006）。大學生參與服務學習意願初探。**通識研究集刊**，10：171-192。
- 孫智辰、涂靜宜（2011）。服務學習方案融入社會服務活動的設計與實踐之探究——以活動參與者觀點為例。**崇仁學報**，5，35-66。
- 張同廟（2011）。參與態度、阻礙因素與學習成效之關係模式——以南部四所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學生為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30（1），87-104。
- 陳文喜（2012）。服務學習教學法對大學生專業課程學習效果之影響。**真理大學運動知識學報**，9，113-129。
- 陳韋良、羅慶徽、于大雄、俞志誠、張耀文、周稚傑、張維國、范保羅（2011）。醫學生至國內外服務學習之學習效益分析。**醫學教育**，15（1），31-42。
- 黃瓊慧（2012）。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與品德教育實施之成效探討以遠東科技大學「遠東心·服務情」服務學習內涵課程深耕計畫為例。**應用倫理教學與研究學刊**，7（1），145-157。
- 廖淑娟、蕭至邦、陳竹上、簡宏哲（2011）。服務學習取向的社區工作——以亞洲大學霧峰學為例。**Asian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2(2), 185-204.
- 劉梅蘭、蔡竹固、林佳慧（2012）。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設計與反思-以社區營養學為例。**稻江學報**，6（1-2），145-156。
- 潘淑滿（2003）。**質性研究：理論與應用**。臺北市：心理。
- 蔡培村、武文瑛（2010）。**成人教育學**。高雄市：麗文。
- 鄭博真（2012）。服務學習課程實施歷程與成效之研究：以某科技大學為例。**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報**，30（4），79-97。

- Chrislip, D. D. & Larson, C. E. (1994). *Collaborative leadership: How citizens and civic leaders can make a differen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Jacoby, B. (1996). *Service-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Kendall, J. C. (1990). Combining service and learning: An introduction. In J. C. Kendall et al. (Eds.), *Combining service and learning: A resource book for community and public service*, vol. 1 (p.1-33). Raleigh, NC: National Society for Internships and Experiential Education.
- Kolb, D. A.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s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 研究論文

# 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應用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領域閱讀教學之行動研究<sup>\*</sup>

吳俊憲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吳錦惠<sup>\*\*</sup>

中州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胡惠珊

臺中市頭家國小教師

---

收稿日期：2014 年 5 月 12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6 月 30 日。

<sup>\*</sup>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sup>\*\*</sup>通訊作者：吳錦惠。

##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運用合作學習中的共同學習法，結合閱讀理解策略，進行國小二年級國語文領域之課文本位的閱讀教學，希冀探討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策略應用於國語文閱讀教學的成果、面臨困境和解決之道。研究發現：學生對於分組合作學習的意見歧異，雖有應用小組競賽和加分等增強作用，仍有少數學生會藉機會聊天或玩鬧。學生課堂行為的改變方面，能促使學生懂得聆聽、尊重及合作的重要性，而且大多數學生主動探討問題的意願也獲得提升。

**關鍵字：**合作學習、閱讀理解、國語文領域

# **The Action Research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Applying for Mandarin Chinese Area Reading Instruction in Second Grade at A Primary School**

**Chun-Hsien Wu**

Professor & Chai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Chin-Hui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Chung C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i-Shan Hu**

Teacher, Toujia Elementary School, Taichung City

## **Abstract**

The researcher in the current study developed a set of Chinese reading comprehension lessons and integrated them into cooperative learning, with the aim to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willingness of Mandarin Chinese Area in second grade at a primary school. Group-based cooperative learning conditions and focused students' learning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Students disagreed on grouping. Although reinforcement was utilized, some students still found ways to chat and play around. The second part elaborated on students' learning changes. With regard to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udents better understood the importance of attentive listening, respect and cooperation. Willingness to actively probing into questions was enhanced among most of the students.

**Keywords:** cooperative learn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Mandarin Chinese Area

##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教育部在 2007 年公布「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PIRLS) 的研究報告指出，香港學生的閱讀能力從過去的第 14 名躍升到全球第 2，遠遠領先臺灣的第 22 名(天下雜誌，2008)，引發研究者的好奇心，為何香港學生的閱讀能力會有如此驚人的進步？反思國內的教學現場中，課堂學習方式大多以考試為導向，經常可見到教師總是滔滔不絕的講述國語文的教材內容，學生等待教師給答案，然後記憶背誦下來。即使有部份嘗試使用「提問法」來提升學生學習動機，但是在「一對多」的提問教學下，也只有少數學生在回答問題，其他學生仍多是沉默以對。久而久之，學習變得枯燥無味，學生失去探究、合作、表達和思考的能力，令人擔心的是，會造成學生對於國語課產生害怕，甚至逃離學習。

為改變上述現象，教師必須轉變傳統以來偏重單向講述、學生被動聽講的教學模式，轉而依據學生差異需求來選用多元且適性的教學模式和策略，以達成適性揚才之教育目標。分組合作學習被當前教育改革視為活化教學的重要途徑之一。詳細來說，合作學習是一種小組成員之間彼此互相協助、共同合作，以提高個人學習成效，並達成團體目標的學習活動(Johnson & Johnson, 1999)。Slavin (1995) 認為團體目標和個別責任是提高學生學習成就的關鍵要素，因為它會引起學生學習與助人的動機。國外和國內已經累積許多研究都證明合作學習確能提升學習成效，而且適用於各年級和各學科的教學，甚至從基本的技能到複雜的問題解決也很適用(黃政傑、吳俊憲，2006)。而這正與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納入「表達、分享、溝通與團隊合作」做為學生的基本能力指標是相契合的。

另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是，現今社會快速變化、資訊科技日新月異，人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下，如何找對方法吸收新的知識和技能，並能面對困難、解決問題，閱讀理解能力成為重要的學習途徑。當學生愈能掌握個人組織和管理資訊的效能，就愈能克服學習困難，邁向成功學習之境（洪碧霞、林素微、吳裕益，2011）。因此，近年來國內由上到下都致力於推動閱讀教育，培養學生理解、評鑑和判斷所聽到和讀到的訊息，或傳達複雜的想法，進一步從閱讀文本中獲取意義並提升批判思考能力（鄒慧英、黃秀霜、陳昌明，2011）。

研究者在 101 學年度轉調至天使國小（化名）服務，擔任國小二年級陽光班（化名）的班級導師，原班級導師因故調往他校服務。由於每位教師都有自己班級經營的規範和教學風格，甫一接觸學生便發覺有適應上的問題，另一項問題是研究者發覺學生相當不喜歡上國語課，於是引發研究者試圖找出其中原因並尋求解決之道。

基於上述，研究者從國語課的教學問題和困境做為出發點，本研究採行動研究法，強調循環、反思和修改的過程，研究對象為研究者授課班級（二年級）的全體學生。研究設計採「課文為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也就是以現行教科書為文本，融入國小二年級相對應學習策略的教學方式，試圖瞭解教學實施後是否加強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其次，應用合作學習中的共同學習法，透過分組同儕的互搭鷹架和共同學習，希冀增進學生學習效果和社會技巧。

基於上述研究背景和動機，本研究目的分述如下：

- 一、探討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應用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領域教學的實施結果、面臨困境和因應之道。
- 二、探討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應用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領域教學時，瞭解學生課堂行為改變的情形。

## 貳、文獻探討

### 一、合作學習的理論與教學方式

探討合作學習的理論依據主要有：學習的鷹架理論、社會建構理論、社會互賴理論及社會學習理論。鷹架（scaffolding）一詞是由俄國學者 Vygotsky 提出的「近側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概念所衍伸而來。他認為學生要發展新的能力，是藉由成人或其他有能力的同儕相互合作或互動，再內化為自身的知識結構，一旦遇到問題時就能加以應用並解決問題（谷瑞勉譯，1999；Vygotsky, 1978, 1986）。他進一步認為教育是「引導」發展的工作，在近側發展區提供給學生的作業是學生無法獨自完成的，須透過與教師和父母的引導，或是安排小組合作的情境，讓能力強的學生協助能力較弱的學生，經由合作學習、互動理解和解決問題，以促進學生可以建構新的心智能力（王明傑、陳玉玲譯，2002；張春興，1997），這個過程就是「鷹架」。

社會建構理論強調學生的知識學習與其所處的社會文化脈絡有關，包括了個人的成長背景、經驗和興趣，也與學習環境、學習活動及學習同儕等有關聯（Watson, et. al., 1998）。社會建構理論應用於教學上，主張學習是個人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過程中須以學生的先備知識和經驗作為基礎，然後鼓勵學生主動探究新知識。因此，教師角色除了是知識的傳遞者，也是學習環境的設計者，提供給學生一個適合探索學習的環境，引導學生從被動接受知識者，變成主動參與學習和建構知識者（張新仁，2002）。

社會互賴理論源於完形心理學派創始人 Kurt Lewin，他提出團體是一個動態的整體，各團體中成員的互賴有差異性。Kurt Lewin 主張團體的形成是因其

成員有共同目標，此一互賴性促使團體成為一個整體，若團體中任何成員的狀態改變，就會影響其他成員跟著改變（黃政傑、林佩璇，1996）。此一理論影響了 Johnson 和 Johnson，他們認為合作學習可以營造積極互賴的情境，有助於學生間的互助並提升學習效果（Johnson & Johnson, 1999）。

Bandura 於 1977 年提出社會學習理論，他著力於探討個人的認知、行為與環境因素三者及其交互作用對人類行為的影響。他指出人們有許多行為是通過觀察他人而學到的。以此來說明合作學習之所以能提高學習效果，主要是因為合作學習情境提供了觀察和模仿學習的機會（張春興，1997；Johnson & Johnson, 1999）。

藉由分析上述理論可知，學生透過合作學習可以發揮團隊精神，在互助中建立相互的尊重和信任，也賦予每位學生都要對學習負責任，一方面可藉以發展學生的社會技巧，另方面也可增進學生對知識學習有深層理解，培養高層次的思考能力、批判能力和解決問題能力。由此可進一步獲知，合作學習之所以能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合作學習善用學生互助能力，可以促進每個學生的學習效果；其二，合作學習有助於促進學生的思考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及統整應用的能力；其三，合作學習有利於促進不同背景學生間的人際關係，培養出合宜的社會技能（黃政傑、吳俊憲，2006）。

在實務應用上，學者提出合作學習的類型相當多，比較常被應用在教學上的方法有：學生小組成就區分法（Student's Teams Achievement Division）、小組遊戲競賽法（Team Games-Tournament）、拼圖法第二代（Jigsaw II）、合作統整閱讀寫作法（Cooperative Integrated Reading and Composition）、團體探究法（Group-Investigation）和共同學習法（Learning Together）等。由於本研究中的教學對象是國小二年級學生，考量常規管理、小組競賽加分具有鼓勵作用，因

此採行共同學習法，將學生分成每 6 人一組的異質性分組，除了可增進學生間的想法更加多元外，也可以增加教室空間移動的流暢性（王金國，2003；王金國、張新仁，2003；Johnson, Johnson & Johnson, 1994）。

## 二、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

閱讀是一個複雜的歷程，需要統整和轉化成為可接受的訊息，柯華葳(2009)指出閱讀歷程有「認字」與「理解」兩項成分，認字是基本條件，理解則是目標。閱讀理解是指讀者運用過去的經驗和知識，從閱讀材料中許多相關的訊息來建構意義的過程(陳海泓，2004)。教育部為協助教師增進閱讀教學專業成長，近年推動「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計畫」，所謂「以課文為本位」是指教師不用額外設計補充教材，也不需要花費額外時間教學，而是以現行的各版本教科書為文本，融入各年級相應學習策略的教學主張。

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可分為識字、預測、課文大意、推論、自我提問以及理解監控六大項。茲分述如下（教育部，2010，2012）：

### （一）識字

是指學習辨識文字的字形，並建立與字音和字義的連結。有效的識字學習策略包括瞭解文字部件的結構與功能，遇到有相同部件的文字時，能運用已學到的文字知識，更有效率的學習新字並擴充詞彙。

### （二）預測

是指讀者閱讀時會根據讀過的訊息以及和訊息相關的背景知識去推測文章內容的發展，包括作者或主角的情感、想法和行動。讀者根據自己的經驗與先備知識（或稱背景知識）針對閱讀文本的線索，對文本內容發展形成假設，並

不斷的檢證自己的假設，它有助於喚醒大腦主動閱讀，並能在閱讀中證實自己的預測而產生成就感。

### （三）課文大意

針對課文大意所使用的閱讀理解策略有三項：首先是「重述故事重點」，讓學生在閱讀後可以說出、聆聽、組織、評估及修正自己對故事的瞭解，建構出有共識的文章意義。其次是「刪除/歸納/主題句」，讓學生透過刪除、歸納、找主題句三個步驟，可以擷取文章重要的訊息。第三是「以文章結構寫大意」，讓學生根據標題及概略的閱讀，讀出段落與段落間的關係，判斷文章結構。

### （四）推論策略

主要有四個類型：首先是「連結線索」，讀者必須從不同的句子中找出相互對應的詞彙或概念，形成有意義且連貫的心理表徵。其次是「找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讀者必須能從文章的脈絡中找出造成某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第三是「由文本找支持的理由」，讓讀者從文本內容提出某些想法或觀點，這樣有助於讀者閱讀後的理解與記憶。第四是「找不同觀點（或反證）」，當文章對某一事物有不同的觀點時，讀者要能夠先整理出特定觀點，再全文比較觀點間的不同之處。

### （五）自我提問策略

提問有助於引起學生學習動機，提供學生參與討論和發表意見的機會，也能幫助澄清概念和啟發思考。常見的自我提問策略有三種：一是「六何法」，是指採用 5W1H 的方法（when、where、who、what、why、how）做為引導學生對於文章內容的理解。二是「有層次的提問」，當讀者能問出「不同層次的問題」（包含事實性、推論性、評論性的問題），表示已經瞭解文章意義，並具有統整文章概念和高層次思考的能力。三是「詰問作者」，當讀者遇到所讀到的訊息與

預期有差異，或是閱讀後會有想法或疑問時，可以把問題提出來詢問作者，或與作者對談，藉以澄清想法或疑問。

### （六）理解監控

是指閱讀者能自我評估理解文章的狀況，當讀者覺察自己沒有讀懂文章，也知道遇到什麼閱讀上的困難，然後能夠採取適當的方法來解決困難，就能增進自閱讀理解能力。

研究者認為增進學生閱讀理解能力，也等於是培養學生的思考能力。研究者根據班級學生的年齡、認知發展和學習特性，除了為學生佈置合適的閱讀環境，培養學生對於閱讀的正向態度，也從上述六項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中，選擇識字策略、預測策略、推論策略（連結線索）、六何法和重述故事重點作為本研究施行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較特別的是，研究者另外指導學生繪製心智圖作為重述故事重點的基礎，讓學生以小組或個別方式把文章重點繪製出心智圖。

## 參、研究設計與實施

### 一、採取行動研究的理由與實施流程

由於研究者有意圖的想要改善班級學生學習國語文動機低落的情形，行動研究適能提供教育現場的教師一個教學自主和反省改進的方式，讓教師能根據實務工作上所遭遇的困難，研擬問題的解決途徑及策略後付諸行動，並在行動研究中進行反省及修正，進而對問題情境做最適切的改善（蔡清田，2000；潘世尊，2005；Noffke & Somekh, 2009）。因此，研究者即教學者，透過行動研究進行教材設計、教學實施、觀察記錄、教學省思、資料分析和修正教學的循環

歷程，探討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策略應用於國語文教學的成果、面臨困境和解決之道。

本研究實施期程分三階段，研究流程詳見圖 1，第一階段為準備期（2012 年 9~12 月），研究工作主要為蒐集文獻和設計課程。第二階段為實施期（2013 年 3~6 月），為了改變學生學習國語文的課堂行為，研究者結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教學策略重新設計國語文教學活動。此階段再細分兩個時期，實施前期（上課第 3~8 週）觀察學生小組合作學習的情形為主，實施後期（上課第 13~18 週）改採觀察四位焦點學生的課堂行為改變情形為主，同時也撰寫教學札記和省思日誌、觀察學生課堂討論記錄和蒐集學生學習文件（例如學習單），除了豐富研究資料外，也藉由不同來源的資料進行交叉檢證，以提高研究的可信賴度。各項資料的編碼詳見表 1。第三階段為結束期（2013 年 7~8 月），進行資料分析和撰寫研究成果。

表 1：資料編碼說明

資料來源	編碼代號	編碼說明
教學札記	T	T-1020305，於 102 年 3 月 5 日的教學札記
觀察記錄	O	O-1020305，於 102 年 3 月 5 日的觀察記錄
省思日誌	R	R-1020320，研究者於 102 年 3 月 20 日的省思日誌
文件資料	OT	OT-1020320，研究者於 102 年 3 月 20 日的相關資料

## 二、研究場域和對象說明

本研究實施場域為研究者任教的「天使國小」（化名），該校成立十餘年，全校共有 62 班，將近兩千人。因學校辦理英語教學已建立特色聞名，故每年吸引許多學生越區就讀。該校家長的社經背景多為中上階層，對於學生的學習表

現和課業成就十分在意，因此學校也極為重視學生課業表現，班級教師在課業要求上相對於鄰近其他學校自然也高出許多。

研究者（即第三作者）於 2012 年因原任教學校面臨教師超額而調任天使國小，擔任二年級陽光班（化名）級任導師，學生數共 29 人。班上學生的家長社經背景均在中等水準以上，家長十分重視子女學業成績，班級同學的資質程度普遍優於同學年的其他班級，班上並未有需要到資源班或是其他特殊身分的學生。不過，仔細觀察到班級裡有少部分的學生在行為上比較內向害羞，不擅於表達自己的意見，如何引領這群學生主動學習，以及如何應用合作學習來增進學生互助合作和學習成效，乃是本研究的焦點課題。

### 三、合作學習活動實施說明

本研究採合作學習法中的共同學習法應用於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研究者依據實際教學情況調整為 16 個教學步驟，可區分為教學前準備、正式教學實施和教學後的學習評量共三個階段來說明。

#### （一）教學前準備

1.教師敘述教學目標：教師要在上課前先明確的告訴學生，當教師提問問題後，所有同學要一起討論和發表，才能達到教師設定的目標。

2.決定小組人數多寡：考量班級人數眾多，教室空間較為狹隘，若採四人一組會造成教室空間動線受阻。再考量到低年級學生的學習需要和教師維持較緊密的引導和互動，如果組別過多，教師教學分身乏術。因此決定採六人一組的座位方式進行活動。

3.採異質分派學生到各組：分組採男女混合，此外，由教師衡量學生的學

業成績、上課專注情形、是否會干擾他人學習等標準加以分組，目的是希望盡量將容易會干擾他人學習的學生分散到各組，以利合作學習和討論的進行。

4.安排學習活動空間：教師會安排讓學生容易面對面討論的座位方式，另外，組和組的間隔距離也要適當，避免互相干擾，班級實施合作學習的座位安排詳見圖 2。

5.安排所需學習材料：各組由教師幫忙準備白板筆，另外，各組會分配到一個大白板，以方便討論後書寫答案。

6.分派組員角色和任務：各組於每一課都要分配由一位組員負責書寫大白板，負責書寫的同學要輪流擔任，其他同學則要幫忙檢查書寫內容是否正確。

## （二）正式教學實施

1.解釋作業內容與方式：教師在提問問題後會視問題的困難度，給予每組足夠的時間進行討論，時間截止前，各組必須將討論後的答案書寫於白板上。

2.解釋成功學習的標準：只要能夠共同討論並完成書寫答案的組別，教師會給予各組加分。

3.建構積極互賴的情境：說明加分標準後，教師會再一次強調同組內的每一個成員也必須參與討論，若有組員沒有參與，則其他組員要提醒未參與的組員。

4.建立個別責任：教師針對不參與的組員去瞭解不想參與的狀況，若無正當理由而不參與，則教師會給予個人扣分。另外，教師在討論結束後，會隨機抽取學生回答，藉以強調個別責任。

5.說明教師期望：由於合作學習的過程中，同儕之間的互動息息相關，因此教師會明確的告知學生所期望的行為，讓學生能於活動中表現出來。

6.監控學生表現：當學生在進行小組合作學習時，教師會巡視各組以監控

學生互動狀況，當各組在討論上遇到困難時會主動給予協助。

7.教師介入提供必要的協助：教師若發現學生對於提問的問題不清楚或是不知該如何著手，會再次解說重要步驟或採舉例方式協助學生。

8.學生合作學習的總結活動：學生在合作學習後，必須形成概念架構並且摘述要點，學生如果能透過口語表達說明概念，表示學生的學習狀況已符合教師所設定的目標。

### （三）教學後學習評量

1.評量學習的結果：學習活動結束後，小組要將討論出來的答案書寫於白板上，教師也會點選各組的成員來說明討論重點。

2.評估小組合作表現：學習活動結束後，教師會請小組針對活動過程進行自我檢核和同儕檢核，作為下次教學活動改進之依據。

## 四、教材文本結合閱讀理解策略說明

研究者採南一版國語文領域教科書作為上課教材，原先設定文本教材的第3課到第10課作為教學範疇，但考量到第11課到第16課多為記敘文，對於施行閱讀理解教學策略會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因此決定將教學範疇擴及第16課。其中，因為第9課和第10課的童詩體材較難施行閱讀理解策略，故不納入本研究之教學範疇。文本教材的實施週次、課程單元名稱、文章體材、課文內容大要、結合的閱讀理解教學策略和教師觀察學生課堂行為的焦點，詳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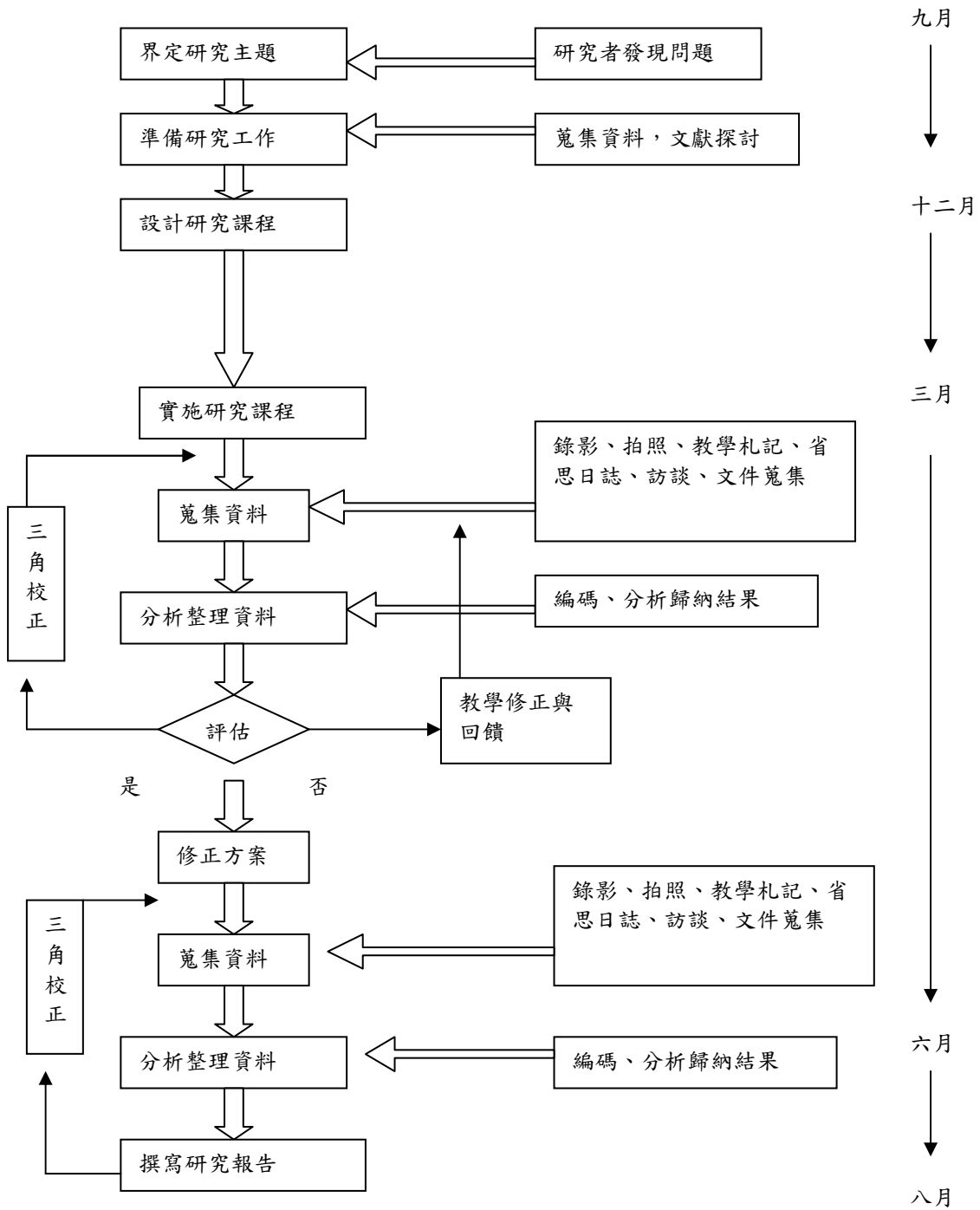


圖 1：研究流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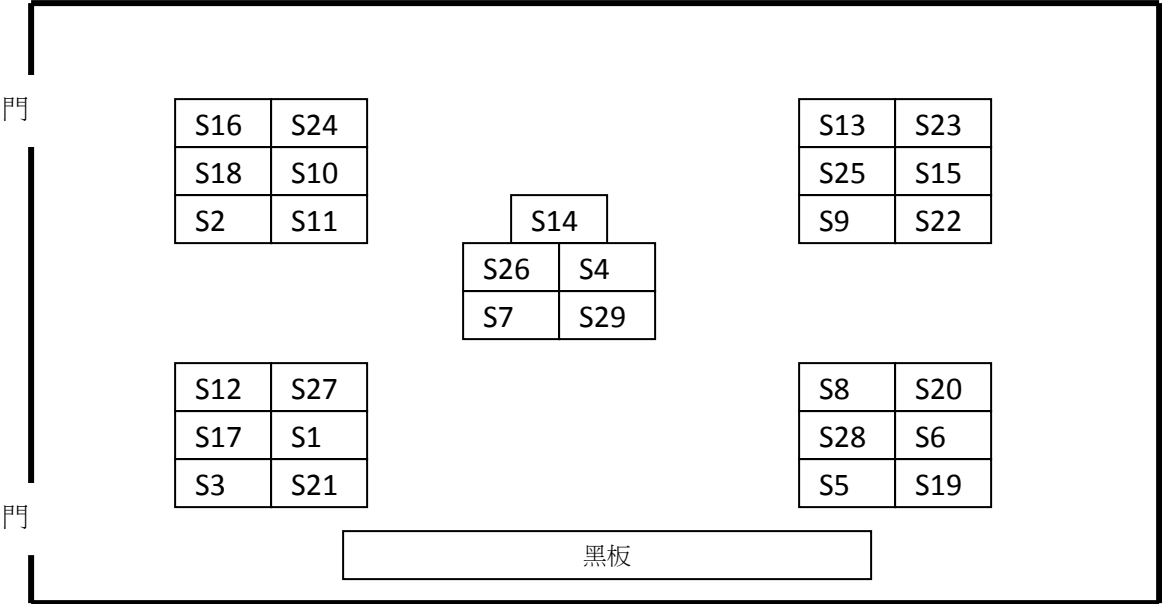


圖 2：班級實施合作學習的座位安排

表 2：國語文領域課程內容說明（實施版）

觀察重點	週次	課名	文體	內容大要	閱讀理解策略
第 1 次合作學習 －觀察小組	第 3 週	種子的旅行	童詩	蒲公英、鬼針草、指甲花用不同的方法傳播種子，讓種子四處旅行。	預測、課文大意（重述故事重點）、課文大意（歸納）、推論（連結線索）
第 2 次合作學習 －觀察小組	第 4 週	我想去的地方	記敘文	寫出大自然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美麗景色，也都有作者想去的地方。	課文大意（重述故事重點）、推論（連結線索）
第 3 次合作學習 －觀察小組	第 5 週	盒子裡的寶貝	記敘文	作者有一個盒子，裡面放的都是朋友送的禮物，每一樣都代表溫馨的友情。	預測、推論（指示代名詞）、課文大意（重述故事重點）
第 4 次合作學習 －觀察小組	第 6 週	好朋友	童詩	大自然裡，風和雲、樹和鳥、花和蝴蝶是好朋友，他們彼此照顧，共度歡樂的時光。	推論（指示代名詞）、推論（連結文本因果關係）
第 5 次合作學習 －觀察小組	第 7 週	點一盞燈	記敘文	林爺爺每天晚上都會打開門口的燈照亮小路，這小小的舉動，溫暖了作者的心。	推論（指示代名詞）、自我提問（六何法）、推論（結文本的因果關係）
第 6 次合作學習 －觀察小組	第 8 週	小布熊的悄悄話	應用文（書信）	小布熊感謝小主人的愛和照顧，以書信的方式闡述希望永遠陪伴主人的心情。	課文大意（重述故事重點）
觀察焦點學生	第 13 週	賞鳥	應用文（日記）	作者以日記的格式，寫下全家去賞鳥的過程，並體會出賞鳥的樂趣。	課文大意（重述故事重點）
觀察焦點學生	第 14 週	我的借書證	記敘文	敘述作者第一次使用借書證借書，以及回家後和家人分享閱讀樂趣的情形。	自我提問（六何法）、推論（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
觀察焦點學生	第 15 週	救救小蝌蚪	記敘文	敘述少雨季節，動物們幫青蛙媽媽挖水道，拯救小青蛙的故事，點出團結在一起，問題好解決。	課文大意（重述故事重點）
觀察焦點學生	第 16 週	猴子撈月亮	記敘文	猴子看到月亮的倒影，以為月亮掉進井裡了，便急忙得想撈起月亮，最後才發現月亮還在天上。	自我提問（六何法）、推論（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
觀察焦點學生	第 17 週	一起玩玩具	記敘文	藉由小熊的行為說明和朋友相處的態度與方法，點出「分享」的重要與溫馨。	自我提問（六何法）、推論（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
觀察焦點學生	第 18 週	角和腳	記敘文	花鹿喜歡頭上美麗的角，卻害他差點沒命，反而是四隻不起眼的腳，救了自己一命。	自我提問（六何法）、推論（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

##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 一、教學實施歷程與分析

#### (一) 第一次實施合作學習

##### 1. 分組和討論過程

教師（即研究者）依據設定的教學目標，將學生按照能力和學習狀況，平均分配到各組中。在組別中，有些學生的人際關係不佳，因此在當其他組員知道要和這些學生同一組時，便會露出不太認同的表情，教師會立即施予機會教育，告知他們這是教師的安排，希望每個人都要學習如何去接納別人。在分配組內工作方面，教師會讓各組都要推派一名學生擔任小組長，小組長負責領取和收回物品，小組長並非由組內能力強的同學擔任，而是每個小組成員都有機會輪流當小組長。另外，每次討論都會有一位負責書寫答案的同學，也是採輪流負責，由小組自行推派。可能是第一次在班上採行合作學習，上課沒多久就出現小組成員內訌的爭執情形。

小岑：（對小玲說）你不要寫白板，給小俞寫就好。

小玲：為什麼我不可以寫？你又不是老師。（O-1020305）

正式上課後，教師在本次課程中運用預測策略，座位安排調整成小組合作學習方式，讓學生方便討論和發表，結果學生情緒變得興奮起來，甚至還有些脫序的行為出現。

（對於鬼針草一詞又稱恰查某【臺語】……）

小睿：小迺老師（一年級老師）就是恰查某！

師：小睿，這是不禮貌的行為，不可以這樣稱呼老師。（O-1020306）

接下來由教師先示範如何繪製心智圖，然後讓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並完成心智圖。可能這是學生第一次進行這樣的學習活動，除了花費很多時間討論外，各組書寫的答案大多都必須再修正。其中，第 5 組負責書寫的小皓一直寫了又擦，以致時間結束後沒有完成課堂討論作業。

從準備活動到進行預測活動和討論心智圖已經用掉兩節課時間，歸納和推論未及完成，於是教師必須借用到後面的綜合活動課程時間。進行歸納策略時還算順利，但進行推論策略時卻讓學生陷入苦思。

由於研究者先講解第一種植物的歸納方法，所以學生在找其他兩種植物的歸納方法時都很順利。但是當研究者要學生找出各段之間的關係時，學生陷入了苦思。研究者認為學生找不出答案的原因可能有二：（1）這樣的題目完全沒有接觸過，所以學生會較無所適從；（2）學生已經習慣回答低層次的問題，當遇到需要思考的高層次問題時，就面臨窘境。（R-1020307）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研究者在課後有三點自我省思：首先，教師一開始以為讓學生自己分配組內工作是一件很簡單的事，但沒想到由於學生缺乏經驗，小組在討論準備分工內容花費了很多時間，甚至還要借用到下一堂課繼續討論（R-1020305）。其次，因為是第一次安排學生以小組討論的座位進行課堂活動，造成學生非常興奮，除了討論外也一直出現聊天狀況，造成教師必須不斷提醒學生要把握時間。第三，在第三課中導入預測活動，很多學生都能踴躍發表，不過，許多學生無法安靜的聆聽他人說話，教師只好提醒一直提醒學生要懂得尊重他人。第四，在學發表過程中，有一些學生會說出與題目不相關的答案，有些學生也隨之起舞或哄堂大笑，造成課堂秩序一直很混亂，教師必須一方面要鼓勵不願開口的學生發表，一方面又要制止學生失序的行為，於是教師透過小組加分和扣分來掌

控這些行為（R-1020306）。

## （二）第二次實施合作學習

### 1.分組和討論過程

學生雖然在前次已練習寫過心智圖，但到了本次課程仍然遇到問題，例如有的小組誤以為要解釋文章各段的意義，有些小組無法取捨重點，反而把整段課文抄寫於白板上，有些小組是由一人完成討論作業，沒有符應合作學習。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在這兩次課程結束後，研究者發現日後需要教學改進的幾個地方。首先，學習活動前應該將進行方式再解說得更清楚，除了告訴學生心智圖乃是針對課文內容做重點整理，教師最好要先舉例和示範，也要讓學生多做練習。其次，小組討論很花費時間，尤其二年級學生需要更多時間去摸索，在本次小組討論中仍然出現有的小組遇到困難，有的小組出現爭執，但是竟然有一個小組（第5組）完全沒有討論，原因是只有程度好的小淇知道如何寫出答案，其他人只能當旁觀者（R-1020315），這些問題是教師接下來要克服的課題。

## （三）第三次實施合作學習

### 1.分組和討論過程

在本次課程討論中，學生在運用預測策略進行學習活動時大都能踴躍發表，在推論-指示代名詞的判斷上，學生也大都能清楚的知道課文中代名詞所指涉的對象是誰。但是在課文大意—重述故事重點的部分，只有第4組能夠達到教學目標，其他各組都出現了各種學習問題，教師只好到各組逐一解決問題。

同學：（對教師說）老師，小睿都不參與討論，還在一旁搗蛋。

教師：（對小睿說）小睿，你要一起討論才會學到你所不知道的知識，如

果你不參與討論還要在在一旁搗蛋，老師要在你的座號表下打X了。

(O-1020322)

同學：(對教師說) 老師，小皓一直離開座位跑到我們這組，想要偷看我們的答案。

教師：(對小皓說) 小皓，別組的答案是透過他們辛苦的討論才得到的成果，你不應該用這種不勞而獲的方法去得到答案。(O-10203022)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首先，教師明瞭自己應該針對學生討論時間掌控要再加強，因為每堂課原先設定的討論時間和進度幾乎都無法如期完成。其次，教師原以為在推論—指示代名詞這個部分會比較困難，沒想到學生卻很快完成，反倒是對於文章段落的界定概念產生模糊不清，促使教師必須額外花費時間去教導學生段落概念。第三，過程中，當教師宣告討論時間終止時，第3組仍繼續討論並想要完成未寫完成的部分，教師一方面扣了第3組的分數，以符應遵守討論規則，另一方面也提醒各組一旦討論停止就要專心聆聽別組同學的報告，這樣才是尊重他人的行為(R-1020315)。

### (四)第四次實施合作學習

#### 1.分組和討論過程

本次結合閱讀策略採推論去連結文本的因果關係，並透過問題的三層次去導引出教師要讓學生思索的內容。在第一層次的問題，多數學生總是能很快的找到答案。在第二層次的問題，學生雖然可以從文章中找到答案，但對於冗長的答案卻不知如何擷取。在第三層次的聯想問題，學生在剛開始進行時並不順利，後來透過教師的舉例和引導後，學生便開始有了討論方向。雖然有些小組討論的答案並不十分切合本次討論主題，但基於合作學習精神所重視的不只是結果，因此教師仍然肯定討論的歷程。

第一組的聯想：橡皮擦和鉛筆是好朋友，這個聯想值得稱讚，。但是另一個聯想：貓熊和箭竹，就比較不佳。老師解釋因為箭竹是被貓熊吃掉，這樣應該沒有互惠關係，應該稱不上好朋友。

第二組的聯想：蚯蚓和泥土是好朋友，這個聯想很棒，雖然他們只寫出蚯蚓住在泥土裡，泥土保護蚯蚓。其實，蚯蚓也在幫泥土鬆土。

(O-1020329)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首先，第一層問題的答案較為簡單，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討論，教師不採齊聲回答的方式，而是讓每個學生拿小白板的方式去回答問題，這樣可以更清楚的知道學生是否知道正確答案。到了第二層問題，教師就必須逐步的引導，先例舉第一個問題要如何找到答案，再讓學生做學習遷移和應用。對於第三層次需要聯想的問題，教師先舉例說明，讓學生有例可循，學生才不會浪費太多時間在摸索上面。

### (五) 第五次實施合作學習

#### 1.分組和討論過程

本次結合六何法以增進學生更加瞭解文章概念，各組在「何人、何時、何地」這三個簡答題都能快速的找到答案，但是在「何事、為何、如何」這三個題目則花費許多時間討論。當學生在描述「何事」(事情發生的經過)而找不到重點時，教師就會介入引導說明。另外，學生也對「為何」(為何故事的主角要這樣做)和「如何」(主角的舉動有什麼樣的結果)這兩個問題上一直無法掌握重點而苦思許久。經過教師引導說明後，再讓學生進一步討論，結果大都能找到答案。

教師：你們為什麼都沒有開始討論呢？

同學：老師，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寫。

教師：沒關係，我們先來看看文章的重點在哪裡，等一下再把重點用條列

式的方式簡單寫下來，這樣就是事情的經過了。(O-1020408)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首先，小組合作討論雖然很花費時間，但是看到學生大都能認真討論，他們寫出來的答案也大致能符合教師原先設定的教學目標，令教師感到欣慰。但是學生討論時的音量一直無法降低，有時是小組內的人互相爭辯，有時是各組的音量互相干擾而導致於音量加大，結果是教師採小組扣分才把音量壓低下來。

### (六) 第六次實施合作學習

#### 1.分組和討論過程

本次討論依舊採心智圖來引導學生對文章重新思索，並加深對文章的印象，進一步明瞭文章內容。實施下來，因為此篇文章並不是故事體材的內容，而是以書信方式呈現，所以會發現學生在討論心智圖時較難掌握文章重點。

教師：(看完學生所寫的答案)你們這樣的寫法，幾乎是將課文全部抄上去了，並沒有針對重點去書寫。

同學：老師，我們不知道要怎麼寫。

教師：沒關係，我們先來看看各段的重點在哪裡，待會你們再決定心智圖上要寫什麼。(O-1020415)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因為教師沒有先跟學生講解文章結構的分層概念，如果可以先將各段依照「開頭」、「相處情形」、以及「結尾」去作分析，相信日後學生在討論時應該會更容易找出重點。

綜合以上，研究者在實施六週的教學後可以發現小組在討論時，已經漸漸學會如何去聆聽他人的想法和互相尊重，這對陽光班的學生來說是一項明顯的進步。透過合作學習，可以讓多數學生學會如何團隊合作，也能試著主動思索教師拋出的問題和解決問題，進而達到閱讀理解的目標，這是第二項顯著的進步。不過，仍有少數學生仍無法透過這樣的方式而有所成長，成為教師日後必須積極關注的部分。

## 二、學生課堂行為的分析

教學實施期程的第二階段，教師從全班中挑選出 4 位焦點學生，小軒和小晴是屬於高學習成就的學生，小峰和小芯是屬於低學習成就的學生，希望透過觀察這兩組學生的課堂行為來檢視學生課堂行為改變情形。

### （一）個案學生一：小軒

#### 1.個案的課堂學習行為

小軒是一個主動學習的學生，平時父母工作雖忙而無法指導課業，他也大都能完成功課。在班上的行為表現一直都是楷模，成績名列前茅，擔任幹部也十分稱職，與同學相處十分和睦。此外，因為小軒的思路清晰，對於上課內容總是很快就能領悟，加上他一直以來都擔任班級幹部，所以當學習活動進行時，小軒會主導小組討論，也會一個人把所有的答案寫完，導致其他同組學生還來不及思考下就只好接受小軒的答案。

教師：為什麼你們這一組都是小軒在寫答案呢？其他同學也要一起想一想呀！

組員：老師，我們還在想，小軒就開始寫，因為他擔心時間不夠。

教師：就算時間不夠，小軒你也不可以只有一個人寫，因為老師進行這項活動是要大家一起針對問題想想看，透過討論大家一起合作把答案呈現出來，如果只有你一個在寫，那怎麼能稱得上是合作呢？  
(O-1020619)

另外，小軒在與他人合作討論時屬於「獨善其身」類型者，教師原本都是讓各組在討論後用心智圖方式把答案書寫在一張大白板上，但到了第十二課時，研究者想要瞭解每一位同學運用心智圖學習的情形如何，後來改採每人一張學習單去完成心智圖，過程中仍然可以進行小組討論，只是不能拿著同學的答案照抄。小軒的理解力很好，所以很快就完成整張心智圖，他會謹守教師的規範，不會讓同組其他同學抄答案，但是小軒對於同組同學有疑惑時並不願意幫忙解說，因為他會認為攸關個人成績，所以不應該告訴同學如何書寫。

小君：（哭泣）老師，小軒會寫，我們問他，他都不教我們。

教師：小軒，同學請教你，你為什麼不教同學呢？

小軒：因為老師有規定不可以讓同學照抄，所以我沒有給他們看答案。

老師：沒有讓同學照抄你的答案，這樣是對的，但是你可以和同學一起從課本上找出要寫的內容，再讓同學自己寫在心智圖的學習單上。

小軒：好，我知道了。(O-1020527)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當教師使用大白板的方式讓各組進行合作學習時，小軒會認為這是「我們」的成績，所以會主動召集同組同學一起討論完成。但遇到要計算個人成績時，平時人緣極佳、也樂於助人的小軒，就會變成一個獨善其身的人，比較不會去管其他同學的學習狀況。

## （二）個案學生二：小晴

### 1.個案的課堂學習行為

小晴是家中的獨生女，在學校裡的課業和行為表現十分良好，但比較沒有安全感，經常需要家人和老師給予關注，有時會用身體不適的理由來取得他人的關心。小晴成績名列前茅，擔任幹部十分稱職，但是有個人優越感，與同學說話時會不自覺的讓人感到不舒服，所以和同學相處時有摩擦。經過教師幾次的糾正後已漸有改善這個狀況。

在實施合作學習過程中，小晴是負責書寫答案的同學，一開始她經常和同學有意見相左而出現不愉快的狀況，甚至會不想聆聽他人意見而是想要自己完成書寫答案。經過引導後，小晴會先請同組的同學說看看自己的想法，然後再統整大家的看法並將答案寫出來，表示小晴已經逐漸成為一位好的聆聽者，並且具有組織學習的能力（R-1020603）。尤值一提的是，小晴後來對於同學在課業上有困難時，能主動給予協助，言談語氣並沒有不悅或不耐煩的情形。例如第十二課改採每人一張學習單的方式去完成心智圖，小晴的隔壁同學小彥會一直詢問小晴，因為小彥是反應較慢的學生，小晴花費很多時間去教導小彥（O-1020527）。

教師：小晴，為什麼都是你自己在寫答案呢？

同學：老師，小晴都沒有跟我們討論就開始寫答案了！

小晴：我覺得這樣比較快。

教師：這樣不對喔！老師是希望你們能夠輪流發表自己的想法，再把大家認為哪一個同學的想法是最好的寫在大白板上。如果只有你自己寫出答案，那老師請每一位同學拿出小白板來各自書寫就好了！但是這樣就失去合作的意義啦。

小晴：點頭表示瞭解。(O-1020305)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小晴與同學的相處或是對待同學的態度出現很大的正向轉變，甚至在學習活動中能扮演稱職的角色。由此可見，小晴在合作學習過程中已經學會如何尊重和欣賞他人，也習得社會技巧，達到「教學相長」的目標。

### (三) 個案學生三：小峰

#### 1.個案的課堂學習行為

小峰的父母離異，由母親和外婆一起扶養，母親是新住民女性，因為工作忙碌且能力有限而經常忽略小峰的學習。小峰個性很迷糊，不是學用品忘了帶來學校，就是忘記將功課帶回家，小峰上課時常在發呆，所以學業成績並不理想，加上衛生習慣不佳，因此班上有些同學對小峰不友善，但樂天個性的他並沒有放在心上。傳統的講述教學中，小峰常被外在事物吸引而無法專注學習，在實施合作學習後，教師觀察到小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況似乎未見明顯改善，例如教師請小峰代表小組報告討論結果，小峰常是支支吾吾的說不出話來。當同學在第十三課中運用「六何法」進行合作學習討論時，小峰一開始會注視白板，但經常偷瞄教師是否有注意到他，沒多久就開始嘴咬白板筆，或發呆，或手上拿衛生紙把玩(O-1020603)。

教師：小峰，你有參與討論嗎？

小峰：(沉默) .....

教師：(問同組其他成員) 小峰剛才有加入討論嗎？

同學：沒有，他都在發呆。

教師：那你們有提醒他要參與討論嗎？

同學：有啊！我們有提醒他好幾次，可是他還是在發呆。

教師：小峰，你要好好改進自己的態度喔！（O-10203018）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雖然小峰不積極的學習態度會讓有些同學對他不友善（例如同組的小玲會不讓小峰上台發表），但小峰並未受到影響，相反的，只要其他同學有困難，他會主動表示願意幫助同學，而教師也有在過程中引導同組學生要互相尊重他人發表（O-1020520）。教師會一直叮嚀小峰上課要專心，但因為班上學生數多而不可能隨時關照小峰，原本期望小組合作可以幫助小峰，但效果仍是有限，令教師感到無力，久而久之，為顧及全體同學的學習進度，時而會暫時忽略小峰（R-1020603）。

### （四）個案學生三：小芯

#### 1.個案的課堂學習行為

小芯家中有五個女孩，她排行第四。小芯的個性害羞、內向，經常不發一語，只用點頭或搖頭來回應教師。教師家訪後發現，小芯的母親是新住民女性，為了傳宗接代而接連生產，家裡孩子多而經常忽略小芯，造成個性退縮。為鼓勵小芯主動參與課堂活動，教師刻意的推選小芯擔任小組長，但在研究期程第一階段結束前並未有太大的轉變，甚至同組學生還因為組長的不夠積極而發生衝突。教師為幫助小芯增強信心，會製作優點獎勵卡來鼓勵她勇敢發表自己的想法。後來教師採用點名方式要她上台報告，發現她慢慢的可以站上講台發表，雖然音量不大，發表內容也不夠完整，但可以看出小芯有盡力、也有進步了（O-1020527，O-1020603）

教師：為什麼你麼這一組這麼吵？

同學：小如在罵小芯動作太慢。

教師：（生氣的責罵）小如，你太過分了，怎麼可以因為小芯動作慢而罵

她？快點跟小芯道歉！

小如：（覺得委屈而掉下眼淚）小芯，對不起！（O-1020306）

## 2.課後省思與改進

教師實施合作學習前已跟學生說明討論規則：討論時要輕聲細語，小組同學遇有學習困惑時，可以請教他人，切不可爭執吵架。承如上述，小芯個性內向，小如因為心急而對小芯態度不佳，引發教師對小如的課堂行為加以糾正，在下課後告訴小如要「將心比心」，小如經過引導後表示日後會修正自己的行為（R-1020306）。教師知道膽怯的小芯要多加鼓勵以增強自信心，另外，小芯書寫課堂討論作業太潦草時，教師也會適當的責備她，或告知可以來請教老師，實施下來雖尚無法達到合作學習之目標，但相較於以前連舉手發表都不敢的小芯來說，已顯見進步（R-1020527，R-1020603）。綜言之，教師看到小芯的成長轉變感到十分欣慰，覺得辛苦付出都是值得的。

#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 一、結論

本研究採行動研究，研究者即教學者，採合作學習與閱讀理解策略應用於國小二年級國語文領域閱讀教學，希冀瞭解教學實施結果、面臨困境和因應之道，並探討學生課堂行為的改變情形，探討焦點在於教學實施後是否加強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並透過合作學習增進學生學習動機。

### （一）教學實施結果、困境和因應

首先，學生對於分組合作從一開始的意見歧異到逐漸磨合。研究者將高學

習成就學生和低學習成就學生平均分配到五個小組中，原本希望能促使學生擦出學習火花，但常會出現學習成就較低的學生遭到同組學生的蔑視，或表達希望和自己的好友編在同一組。教師一方面堅守分組原則，另方面也教導學生在小組學習要懂得包容和接納。其次，教師改變了傳統的講述教學法後，發現多數學生都能熱烈的參與小組合作討論，教師也運用策略來引導學生專注學習，但仍有少數學生藉機聊天或玩鬧。第三，第一次在國語課運用合作學習和閱讀理解策略，因為對於小組討論時間的掌控未能有效管理，加上教師希望在每課都能導入多種的閱讀理解策略，但第一次施行下來未能達到預期目標，之後便決定調整成每課只採一項閱讀理解策略進行教學，如此一來也較能妥善掌控時間。最後，研究者發現每進行一項閱讀理解策略都要先做引導說明，這是考量到班級學生才二年級，教導的理解策略都需要反覆說明和練習，尤其在每一課的教學之初都要先舉例說明，以減少學生摸索時間，這樣也才不會造成小組討論時間不夠的問題。

## （二）學生課堂行為的改變

首先，學生在人際關係方面更懂得聆聽、尊重和合作的重要性。原本班上學生時常在下課時間只會跟自己熟悉的好友交談或玩耍，跟其他人鮮少互動。但經過小組合作學習討論後，多數學生學到人際相處的基本禮節，學會聆聽和尊重他人意見，也能體會團隊合作精神。其次，多數學生也跟著提升主動探討問題的意願。對於已經長期習慣教師直接講述的學生來說，一開始要引導學生主動探究問題實在很難適應，甚至有些學生不願意動腦思考就只等待其他同學給答案。但經過本課程實施下來，許多學生已有正向轉變，未來則需要針對少數學生思謀改善良方。

## 二、建議

### （一）給教學者的建議

當「促進國際閱讀素養研究」研究報告公諸於世後，臺灣學生閱讀能力落後的情形引發檢討聲浪。檢討原因之一在於教師教學缺乏引導學生閱讀理解策略，建議教師應正向面對教育變革，主動尋求各種研習和進修成長管道，充實閱讀理解教學相關的知識與技術。其次，可參考本研究作法，將合作學習融入國語文閱讀理解教學，以培養學生主動探究問題、與他人合作及表達的意願。第三，改變教學方式很花費時間，為求兼顧學校既定的教學進度，建議每課只採用一兩項適配的閱讀理解策略即可。最後，建議組成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或教學團隊，如果在小型學校則可採跨校合作，促進教師同儕互相集思廣益、互通有無，分享彼此教學心得和教學設計，以減少教學摸索和試探的困境，增進教學效能。

### （二）給學校行政的建議

學校行政應提供教師教學支持，或舉辦相關的教師進修活動，讓所有教師瞭解合作學習和閱讀理解的重要性和實施程序，也鼓勵教師導入課堂教學。其次，教師教學常會出現盲點而不自知，也會因為實施合作學習而無法兼顧每一組的學習狀況，建議學校行政可以主動協助進行課堂教學錄影來記錄學習活動。

## 參考書目

- 天下雜誌 (2008)。閱讀動起來 2：香港閱讀現場。臺北市：天下雜誌。
- 王明傑、陳玉鈴 (譯) (2002)。教育心理學：理論與實務 (原作者：R. E. Slavin)。臺北市：學富文化。
- 王金國 (2003)。國小六年級教師實施國語科合作學習之研究 (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 王金國、張新仁 (2003)。國小六年級教師實施國語科合作學習之研究。教育學刊，21，53-78。
- 黃政傑、吳俊憲 (2006)。合作學習：發展與實踐。臺北市：五南。
- 谷瑞勉 (譯) (1999)。鷹架兒童的學習：維高斯基與幼兒教育 (原作者：L. E. Berk & A. Winsler)。臺北市：心理。
- 柯華葳 (2009)。教出閱讀力 2：培養 Super 小讀者。臺北市：天下雜誌。
- 洪碧霞、林素微、吳裕益 (2011)。臺灣九年級學生閱讀樂趣與策略對 PISA 閱讀素養解釋力之探討。課程與教學季刊，14 (4)，1-24。
- 張春興 (1997)。教育心理學。臺北市：東華。
- 張新仁 (2002)。當代教學統整新趨勢：建構多元而適配的整體學習環境。教育學刊，18，43-64。
- 教育部 (2010)。閱讀理解策略教學手冊。臺北市：教育部。
- 教育部 (2012)。課文本位的閱讀理解教學研習手冊。臺北市：教育部。
- 陳海泓 (2004)。聽故事和看錄影帶對國小二年級學童故事記憶和故事推論的探討。南師語教學報，2，257-285。
- 黃政傑、林佩璇 (1996)。合作學習。臺北市：五南。

鄒慧英、黃秀霜、陳昌明 (2011)。從 PISA 2009 建構反應題剖析臺灣學生的閱讀問題。《課程與教學季刊》，14 (4)，25-48。

潘世尊 (2005)。《教育行動研究理論、實踐與反省》。臺北市：心理。

蔡清田 (2000)。《教育行動研究》。臺北市：五南。

Collins, A., Brown, J. D., & Newman, S. (1989). Cognitive apprenticeship: Teaching the crafts of reading, writing, and mathematics. In L. Resnick (Ed.), *Knowing,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Glaser* (pp. 453-494).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Johnson, D. W., & Johnson, R. T. (1999). *Learning together and alone: Cooperative, competitive, and individualistic learning* (5th ed.). Boston: Allyn & Bacon.

Johnson, D., Johnson, R. & Johnson H. E. (1994). *The new circles of learning cooperation in the classroom and school*.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Noffke, S. & Somekh B. (2009). *Action research in education*. Thousand Oaks, CA : SAGE.

Slavin, R. E. (1995).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2nd ed.). Massachusetts: Allyn & Bacon.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Vygotsky, L. S. (1986).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MIT.

Watson, M., Kendzior, S. Dasho, S., Rutherford, S.& Soloman, D.(1998). A social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staff development: Ideas from

the child development project. In C. M. Brody & N. Davidson (Ed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for cooperative learning* (pp.148-168). N .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 研究論文

# 從服務使用者的觀點探討「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社工專業」之協同合作關係<sup>\*</sup>

張秀玉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福利學系副教授

---

收稿日期：2014 年 5 月 11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6 月 30 日。

<sup>\*</sup>本文為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專業之協同合作經驗研究」（NSC100-2410-H-126-020）之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4 年 5 月 30 日靜宜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主辦之「第十三屆現代思潮學術研討會」。作者對 15 位接受本研究訪談的發展遲緩兒童家長以及協助提供受訪者名單的苗栗縣、彰化縣、台中市、南投縣之兒童發展個案管理中心致上誠摯謝意，並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建議，以及研究助理張雅雲、郭小萍與張慧婷同學在研究上的參與及協助。

## 中文摘要

早期療育藉由發展遲緩兒童家庭參與，實踐以家庭為中心的理念，進而達到服務的目的與成效。因此，瞭解並掌握發展遲緩兒童家庭對早期療育服務的想法，將有助於服務的有效性。本研究目的在於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瞭解他們如何界定與社會工作者之協同合作關係、影響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研究者採取質性研究取向，運用「半結構式」一對一深度訪談方式，蒐集 15 位發展遲緩兒童家長的意見。研究發現：1.受訪者以「朋友」、「夥伴」、「師生」、「近鄰」及「綜合」五種類型來界定家庭與社工之協同合作關係、2.影響家庭與社會工作專業協同合作的因素包含家庭層面，如社經地位與家長態度；社會工作專業層面，如專業知能與專業態度。最後，本文針對上述研究發現所反映出的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及提出建議。

**關鍵字：**家庭與專業關係、協同合作、社會工作、發展遲緩兒童家長、早期療育

# **Exploring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and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Perspectives from the service user**

Hsiu-Yu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Social Work & Child Welfare Department, Providence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early days, the provisions fo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used to focus on family participation and family-centered services.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practic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how the users of services define their collaboration with social workers and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collabo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Through one-on-one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5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the researcher gathers data from participants' experiences and their point of view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parents use "friend", "partnership", "teacher-student", "neighbor" and "comprehensive" five types of cooperation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mily and social workers. Additionally,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families and social work professionals come from two parts: the families that include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s' attitudes, and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 that include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attitudes. Finally, the researcher makes recommendations based on findings of this study.

**KeyWords:** family-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collaboration, social work,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early intervention

## 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以家庭為中心 (family-centered) 是早期療育服務領域中重要的核心概念之一 (Bruder, 2000; DeGrace, 2003; Dunst, 2000, 2002; Dunst, Trivette & Deal, 1994)。這個概念主要是以家庭系統與生態的角度，強調要協助發展遲緩兒童有效的進行療育，必須將家庭整體視為協助的對象，藉由相關資源的引入，提升家庭的能力，以達成兒童正面發展的結果 (Dunst, 2000)。許多學者 (鄭夙芬、鄭祺緯、林雅琪，2005；Bailey, et al., 2006; Bruder, 2000, 2010; Dunst & Dempsey, 2007; Guralnick, 1997) 提及早期療育服務成效的評估，不應只著重在兒童發展的結果，也應重視家庭在接受服務之後的改變。因此，以家庭為中心的概念一直影響著早期療育服務遞送的方式與內涵。

為了實踐以家庭為中心的信念，早期療育領域的工作者應當關注家庭的需求，更應在各項服務提供的過程中，讓家庭有機會在服務過程中表達意見、選擇適合的服務與參與決策。因此，「家長參與」(parent involvement) 或「家庭參與」(family involvement) 是重要的實務策略 (鄭翠娟，2004; Brooks-Gun, Berlin & Fuligni, 2000; Littell, Alexander & Reynolds, 2001; Mahoney & Wiggers, 2007; Turnbull et al., 2006; Trute & Hiebert-Murphy, 2000)。社會工作專業助人的重要原則之一，便是強調與服務對象建立平等合作的專業關係，尊重他們選擇、參與及進行服務決策的權力 (鄭維瑄，2013；曾華源摘譯，2010；謝秀芬，2010)。由此可見，從事早期療育服務的社會工作者，應將與發展遲緩兒童家庭建立互相信任、彼此合作的協同合作關係，視為重要的工作目標與內涵。

但許多研究 (鄭翠娟，2004; Mahoney & Wiggers, 2007; Keen, 2007; Shannon, 2004; Turnbull et al., 2006) 則發現早期療育領域的專業工作者要與發展遲緩兒

童家庭發展出具有互信、互相合作等特質的協同合作關係是困難的。從專業的角度來看，Shannon (2004) 指出要實踐以家庭為中心的理念，是件耗時又耗成本的工作，加上並不是所有專業人員都具有與家庭工作之相關專業知能。Mahoney & Wiggers (2007) 提出專業工作者高估自己的能力，不願意對家庭釋放專業權力、沒有受過與家庭工作的完整訓練等，都會影響其與家庭的協同合作意願與關係。從家庭的角度來看，Keen, Davey & Grimbeek (2006, 引自 Keen, 2007) 提到家庭從兒童的病因診斷過程中，就因為診斷評估的耗時與等待、對兒童病因的不確定等負向經驗，對醫療復健專業人員產生不信任的感受。這種感受甚至連帶影響在後續服務過程中，對教育人員、社會工作者等產生不信任的感受 (Stoner et al., 2005)。除了家庭接受服務的經驗之外，家庭本身的能力 (周月清等人, 2001; 鄭夙芬、鄭期緯、林雅琪, 2005; Littell et al., 2001)、與專業合作的動機 (周月清等人, 2001; 鄭夙芬、鄭期緯、林雅琪, 2005; Mahoney & Wiggers, 2007; Littell et al., 2001) 及家庭資源的狀態 (Hamilton, Roach, & Riley, 2003) 等因素都會影響家庭與專業的協同合作意願與結果。

不僅從文獻中，發現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專業協同合作的困難。研究者執行另外一個有關於早療社工在專業團隊與家庭合作經驗的研究中，訪談 15 位早期療育社會工作者，多位受訪者提到他們與發展遲緩兒童家庭協同合作過程中的困境。

依照我的觀察，家長認為自己早療服務裡面是屬於最矮一等的，比社工的地位都還要矮。所以，他會將社工當成一個老師，只要社工提的建議，他就應該要聽，不需要提出自己的想法 (社會工作者 1)

家長的觀念可能比較傳統或是覺得自己比較不懂，不大敢發表自己的意見。我有時候會鼓勵他們提出自己的想法，不過家長還是覺得他們相對

於社工、醫療復健或是特殊教育人員，在專業知識上，是比較弱的。專業人員說什麼，他們覺得照著做就好了（社會工作者 2）

我自己認同文獻上寫的：「家庭是團隊的一員」。可是家庭在面對團隊中的專業人員時，他們其實是很有點害怕、有點退縮的，針對團隊中專業人員提出的建議，即使不是家庭想要的，他們也很少會表達出真正的聲音。我覺得是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有能力可以和專業人員平起平坐，或是專業人員沒有協助他們瞭解家庭在服務中的角色與權力（社會工作者 3）

研究者檢閱與本研究相關之國內外文獻後，發現大多數的文獻都將專業與家庭之間的協同合作關係，稱做「夥伴關係」(partnership)。所謂的夥伴關係不只是人際關係，而是指家庭與專業人員之間相互支持的互動關係，雙方在信任、相互尊重、有共同的目標及相互分享決策權力的前提下，共同合作以滿足發展遲緩兒童與家庭的需求（許素彬，2008；Dunst, Trivette & Deal, 1994; Keen, 2007）。研究者認同建構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專業夥伴關係的重要性，也同意上述文獻中，將夥伴關係視為影響早期療育服務成效的重要變項。不過令研究者感到好奇的是，若從家庭的角度，他們會以「夥伴關係」來描述其與社工專業之間的協同合作關係？還是他們會以別的概念來呈現？他們對於家庭和專業間協同合作關係的界定包含哪些內涵？這些內涵又與國內外夥伴關係相關文獻的界定有何異同？他們覺得影響家庭與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又有哪些？因此，在本研究中，並不使用夥伴關係的名詞，期待透過開放式的方式，並以早期療育服務使用者「發展遲緩兒童家長」主觀的角度，探討家庭與社工專業的協同合作關係。

因此，本研究所關注兩個研究問題為：一、發展遲緩兒童家長對於家庭與

社工專業協同合作關係的界定為何？二、發展遲緩兒童家長認為影響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為何？研究者期待透過上述二個研究問題的探討，整理出符合本土脈絡之家庭與社工專業協同合作關係的內涵，及釐清影響協同合作關係建立的因素。研究者希冀在學術上，本研究可提出國內之實證研究資料，和國外的文獻進行對話；在實務上，本研究結果能協助社工專業透過發展遲緩兒童家長對彼此協同合作關係的看法，反思國內社工專業與服務對象建立協同合作關係之方法，創造更符合服務使用者需求之實務運作策略。

## 貳、文獻探討

### 一、家庭與專業在協同合作過程中的關係

國外學者 Shannon (2004) 的研究中發現家庭與專業並未建立信任關係，家庭在協同合作過程中，無法放心的分享兒童與家庭的私人訊息、專業也無法信任家庭擬定和執行目標的能力。Minke & Scott (1995) 評估三個早期介入方案中，專業如何促進家庭參與的研究中，則是發現專業工作者懷疑家庭是否擁有足夠的知能與其他專業協同合作、且部分家庭的選擇與決策根本違反兒童最佳利益，在這樣的前提下，專業無法與家庭建立平等的協同合作關係，也無法放心的將專業的權力釋放或過渡到家庭手上。Mahoney & Wiggers (2007) 的研究中發現，醫療復健的場域基本上並未開放家長加入，家長連兒童接受治療的治療室都無法進入，又何以能向醫療復健人員表達其對兒童治療與發展的期待？更無法觀察與學習治療師執行治療的技巧與策略，因而無法獲得相關療育專業知能。Swain & Walker (2003) 則認為專業與家庭本來各自就擁有不同的

權力，專業工作者在釋放權力的過程中，也擔心家庭一旦獲得更高的權力，他們的專業即將受到家庭集體的挑戰。Keen（2007）更進一步提到，家庭與專業的協同合作對於家庭也會產生負向的影響，像是在長期等候兒童接受評估的過程中，感到專業對家庭需求的不重視、懷疑專業的評估等心理感受，或是在與不同專業的互動中，不曉得該以哪個專業的意見為主？

不僅是國外研究，發現家庭與專業的協同合作關係並未達到平等，家庭是擔任被動的服務接受者，專業在此過程中，則因擔心自己的權力被剝奪，而出現對家庭參與的排斥或懷疑等情況。國內的研究也有相同的發現，許素彬（2008）針對家長與個管員夥伴關係對早期療育服務成效之影響中，發現高達 65% 的家長不知道且不曾參與過 IFSP 的擬定，家長在服務過程中，扮演被動接受服務者，而非與其他專業具有平等權力與地位的協同合作關係。鄭翠娟（2004）發現家庭在參與專業團隊的過程中，出現了以下的想法：（一）、覺知他們與早期療育專業團隊之間權力不平等、（二）、對不當的合作關係有著無力感，易感受到傷害、（三）、他們與早期療育專業團隊之間的互動關係影響合作品質與療效、（四）、他們覺得自己被認為是：較專業人員更少的觀察、更少智慧及更少的知覺，家庭大多顯現「憤怒」、「否認」、「抗拒」與「焦慮」的。

學者 Turnbull, Turbriville & Turnbull（2000，引自呂金燮譯，2004）從權力的角度，將家庭與專業之間的權力關係分為：（一）、權力凌駕(power-over)：擁有主宰他人的權力，他人在酬賞與懲罰之下順從權威控制，此種權力的主控者是專業人員，最後的決策也由專業人員負責、（二）、權力共享(power-with)：關係是彼此尊重、彼此分享的，彼此共同學習經驗，但最終決策則需家庭負責、（三）、權力經過(power-through)：此種關係主要目的在創造集體授權，希望融合家庭成員、專業人員、社區人士等，經由體認團體力量之後，通力合作的決

策，最後的決策則是由上述人員集體負責。從上文可知，家庭與專業之間的協同合作關係，因著權力關係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合作思維與方式，其中權力共享的關係類型，是透過以家庭為中心的服務來建立，期待透過家庭與專業間能力及權力平等的狀態下，形成夥伴關係。家庭若能與專業建立夥伴關係，其將瞭解服務的過程、內涵並參與決策，得到充權（empowerment）的狀態，透過這種關係的合作，家庭將會變得更有能力（Dunst & Dempsey, 2007）。

有效的、信任的夥伴關係內涵包含家庭與專業的相互尊重、信任與誠實、對目標有共識、願意分享執行與決策的相關資訊、有效的溝通、重視家庭提出的需求與期待解決的方式等（Dunst, Trivette & Deal, 1994; Dunst & Dempsey, 2007; Morrow n& Malin, 2004, 引自 Keen, 2007; Keen, 2007）。到底家庭與專業之間的協同合作關係與夥伴關係特質之間有什麼相似或不同的地方？則是研究者想透過本研究瞭解的議題之一。不過，不論是要建立夥伴關係，或是藉由家庭參與早期療育服務過程，與專業形成平等的協同合作關係，都需要一些條件，也有許多因素干擾著關係的建立。到底是哪些因素會影響家庭與專業之協同合作？則是下文即將探討的重點。

## 二、影響家庭與專業協同合作之因素

為了探討影響家庭與專業協同合作之可能因素，研究者上網搜尋文獻之後發現，鮮少有研究是以協同合作的概念去探討影響因素，大都是以影響家庭與專業建立夥伴關係的因素、或是影響家庭參與的因素等二個面向作為研究或文章主軸。研究者思考家庭與專業的協同合作關係，夥伴關係的確是重要的類型，加上任何的協同合作型態，都需要家庭的參與才能達成。因此，在此脈絡中，

研究者將針對影響夥伴關係或是家長參與重要因素的相關文獻進行討論。此部分文獻的探討並不是企圖以因果關係、量化的思維，整理影響家庭與專業協同合作的因素或是形成訪談大綱，而是期待透過上述文獻的討論，在研究者以質性研究進行開放式資料蒐集，形成本研究結果，可與之對應的基礎。

在影響協同合作關係、夥伴關係建立的因素部分，張英陣等人譯（2012）討論影響社工與服務對象建立以充權為基礎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包括社工的專業目的、案主的參與狀況、社工在人際互動技巧（如同理、溫暖、真誠等）上的運用，其中社工是以與服務對象建立平等的關係、或是由社工進行服務的主導等不同專業的目的，是影響兩者建立協同合作關係最重要的因素。許素彬（2008）的研究中，發現發展遲緩兒童接受評估的管道、接受療育的年齡，以及家長對於 IFSP 的認知與參與、家長對個管員建議的接納程度是影響家長與個管員建立夥伴關係的重要變項。

學者 Sheppard（2001）在其研究中發現，家長在服務過程中的心理狀況（參與動機、能力等）、服務的接受狀態（參與程度的滿意度、服務諮詢的滿意度以及與專業工作者之間的衝突狀況等）是影響家庭與專業夥伴關係的重要變項。Summers 等人（2005）則是發現兒童年齡、家長年齡與教育程度對夥伴關係有顯著性影響。Mahoney & Wiggers（2007）提出當家庭與作為一個在兒童和其他專業間的調解者之服務模式中，會影響家庭與專業之間的合作關係因素，包括家長（家長對於兒童發展相關療育參與的動機薄弱）、專業（工作者高估自己的專業能力，不願釋權、醫療復健與特殊教育人員缺乏與家庭工作的完整訓練、醫療場域的治療情境，家長難以進入場域中觀察）二大層面的因素。

在影響家長參與的因素部分，Coots（1998）認為影響家庭參與的因素，包括兒童與家庭脈絡等二大因素，兒童因素部分包括年齡與教育階段、兒童障礙

程度影響家庭作息的狀況等；家庭脈絡因素則包括家庭社經地位、家長的參與態度、家庭支持、家庭壓力、家長的教育程度、家長的能力、相關療育活動與家庭時間的搭配性等。陳素禎、郭煌宗、劉芷瑩（2009）在發展遲緩兒童非自願家庭服務歷程的研究中，發現影響家長參與早期療育服務之因素分為障礙幼童個人因素（障礙類別、安置型態、年齡、障礙程度）、家庭特質因素（社經地位、家庭支持、家庭壓力、家長特質）。Hamilton, Roach & Riley（2003）認為家庭參與薄弱的關鍵因素為家庭資源不足。家長能力與家庭功能不足，及合作動機低落時，也會造成家庭缺乏參與的意願（Littell et al., 2001；周月清等，2001；鄭夙芬、鄭期緯、林雅琪，2005）。相關研究（Keen, Davey & Grimbeek, 2006, 引自 Keen, 2007; Stoner et al., 2005）則指出家庭與專業過去的合作的經驗若是負向的，自然會影響其以後參與的意願與動機。

## 參、研究方法

### 一、研究方法的選取

本研究旨在瞭解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專業間之協同合作關係，研究目的並非預測與控制，只期待透過受訪者對其經驗世界的理解與詮釋，從這些概念中呈現出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專業協同合作關係的看法；加上每一個家庭所處環境脈絡及與專業合作的方式都不同，難以用量化研究的方式蒐集到相關資料。因此，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向。

學者 Creswell（2003）提到質性研究可以細分不同的派別（traditions），每一種派別都有其獨特的目的，不過若是研究者並沒有要建構理論、或對某一種

現象建構出意義等獨特性目的，研究者可以採用一般性的質性研究方法( *generic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本研究目的主要是瞭解早期療育領域中，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對其專業協同合作關係的想法，期待能從他們的看法中，整理出家庭與專業協同合作的內涵與影響因素，並不試圖形成理論。因此，本研究將採取一般性的質性研究方法來進行。

## 二、受訪者的選取與基本資料

本研究從發展遲緩兒童家長的觀點，探討家庭與專業間協同合作關係的內涵與影響因素。研究者考量投注在資料蒐集與訪談的時間甚多，因此以中部地區鄰近縣市（苗栗縣、彰化縣、台中縣市、南投縣等）為研究場域。受訪者的選取採用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中的標準（*criterion*）選取。意即依據本研究設定的選取標準選擇受訪者。在各項標準的設定中，期待選取能提供符合本研究目的豐富資訊的受訪者。

本研究受訪者選取的標準為：（一）家中須有持有發展遲緩證明、發展遲緩報告書或身心障礙手冊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孩童、（二）、現為個管中心<sup>1</sup>之服務對象，考量期能提供研究資料的豐富程度，受訪者在本研究執行時（100年12月31日以前），至少需接受個管中心一年以上（含）之相關服務、（三）、受訪者需為發展遲緩兒童之主要照顧者，所謂的主要照顧者係指擔負發展遲緩兒童療育的相關工作，包含日常生活照顧、療育接送與執行、相關會議（例如：IEP、ISP、IFSP、療育安置會議、轉銜會議等）的出席與執行等。若一個發展

---

<sup>1</sup>由於各個縣市提供發展遲緩兒童家庭個案管理服務的單位名稱不同，有些縣市稱為「兒童發展個案管理中心」、有些縣市稱之為「兒童發展社區資源中心」、有些縣市則是稱為「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個案管理中心」等，上述不同的單位名稱，在本文中皆簡稱為「個管中心」。

遲緩兒童之主要照顧者超過二人，則由家庭或是個案管理中心加以推薦其中一人作為本研究之受訪者、(四)、受訪者需有與社會工作者協同合作的經驗，包含正式會議的參與（各縣市個管中心所辦理之機構內或院內之療育會議、IEP、ISP、IFSP 等計畫擬定會議、轉銜會議、鑑定安置輔導會議）、相關方案的參與（到宅服務、到宅療育諮詢服務、巡迴輔導服務等）。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前，先電洽研究場域之個管中心，向其說明本研究目的、受訪者選取標準，請個管中心代為推薦受訪者。取得推薦之受訪者名單後，研究者再一一徵詢受訪者接受訪談的意願。最後，共計 152 位受訪者<sup>3</sup>接受本研究訪談，其基本資料如表 1。

---

<sup>2</sup>原受訪者為 16 位，但研究者在整理訪談逐字稿時，發現其中一位受訪者因其認知狀況，無法理解本研究之問題，以及並非發展遲緩孩子之主要照顧者等因素，其訪談內容無法回應至本研究目的。因此，研究者決定不將該份訪談逐字稿列入分析。

<sup>3</sup>為降低受訪者被辨識的程度，在表 1 中，研究者並未呈現受訪者之居住區域。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年齡(歲)	教育程度	職業	與發 <sup>4</sup> 展遲緩兒童的關係	接受個管中 <sup>5</sup> 心服務的時間	家中發展遲緩兒童的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遲緩或障礙類型	排行
F01	女	33	國小	臨時工	母子	2 年	男	6 歲 5 個月	語言	第一
F02	女	46	大專	家管	母子	3 年 9 個月	男	5 歲 5 個月	語言	獨子
F03	女	32	高職	家管	母子	1 年 8 個月	男	7 歲 5 個月	智能障礙輕度	第一
F04	女	35	高中	家管	母子	1 年 8 個月	男	7 歲 5 個月	認知、細動作	第一
F05	男	33	高職	水泥工	父子	1 年 2 個月	男	6 歲 3 個月	罕見疾病	獨子
F06	女	51	國小	家管	祖孫	1 年 3 個月	男	5 歲	語言、認知、動作	獨子
F07	女	34	大專	家管	母子	1 年 6 個月	男	3 歲 11 個月	社會人際、溝通	第一
F08	女	28	國中	家庭代工	母女	1 年 11 個月	女	2 歲 6 個月	罕見疾病	第一
F09	女	41	大專	家管	母女	1 年 2 個月	女	6 歲	亞斯柏格症	第二
F10	女	37	國小	家管	母子	1 年 2 個月	男	4 歲 11 個月	智能障礙重度	第一
F11	女	41	國小	家管	母子	2 年	男	5 歲	語言	獨子
F12	女	37	高職	家管	母子	2 年 2 個月	男	4 歲 7 個月	自閉症中度	第一
F13	女	36	高中	家管	母女	1 年 1 個月	女	5 歲 5 個月	自閉症中度	第三
F14	女	30	高職	家管	母子	2 年 5 個月	男	5 歲 5 個月	多障中度	第二
F15	男	48	高職	服務業	父子	2 年 5 個月	男	5 歲 1 個月	認知、語言、社會情緒	第三

## 二、資料蒐集、分析與檢核

### (一) 資料蒐集

研究者運用一對一深度訪談蒐集受訪者對於家庭與社工專業協同合作關係的看法，訪談大綱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設計，內容包括：1.請您分享與社

<sup>4</sup>受訪的 12 位母親中，F01、F10 及 F11 為新住民。F10 為越南籍之新住民，其餘 2 位皆為大陸籍之新住民。

<sup>5</sup>受訪者接受個管中心服務的時間、發展遲緩孩子的年齡計算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

工的協同合作經驗，在上述經驗中，您會怎麼形容家庭和社工之間的合作關係？為什麼？ 2.在您的經驗中，您覺得影響家庭與社工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重要因素有哪些？研究者考慮受訪者在參與本研究前，並不認識研究者，為降低受訪者對於訪談的焦慮與擔心，訪談地點都在受訪者接受服務的個管中心進行，並由受訪者熟識之個管中心個管員，在進行研究前為彼此先行介紹。訪談進行時間為 101 年 1 月至 101 年 4 月，每位受訪者皆進行 1 次訪談，每次訪談約為 60-120 分鐘。

## （二）資料分析與檢核

在資料分析前，研究助理將一對一深度訪談錄音內容整理成逐字稿後，便由研究者進行開放式編碼，研究者將與研究目的有關連的字句加以標示，並從中抽取有意義的概念，而後將資料進行歸類與分類，形成初步的幾個範疇。接著，研究者藉由反覆的閱讀逐字稿，連續檢視對前一階段概念化的分類加以修正，並思考各個概念之間的層次與關連性。為了使概念的類別發展可以更為精確，研究者運用資料蒐集與資料分析同時進行的策略，確認「家庭與專業協同合作關係的內涵」及「影響家庭與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等類別，已無新資料的呈現，達到類別飽和的狀態。

在研究資料的檢核工作上，研究者運用「反饋法」及「參與者檢驗法」兩個策略（陳向明，2004）。研究者於研究資料編碼與結果形成過程中，與同事及研究助理不斷的討論，聽取他們對研究結果的看法，並檢視自己與他們想法的異同之處，透過反饋法的運用，以確認研究資料的確實性。此外，研究者於研究資料編碼及研究結果初稿完成時，以 e-mail 方式，請受訪者協助檢視，確認編碼與研究結果的陳述上有無需要調整之處，藉由參與者檢驗法的使用，以增加研究資料的可信與確實程度，此部分 15 位受訪者對於逐字稿內容及研究結果的初步分析，並無提出意見。

## 肆、研究結果

### 一、受訪者對「家庭與社工專業」協同合作關係的定義與內涵詮釋

研究者整理訪談逐字稿之後，將受訪者以「朋友」、「夥伴」、「師生」、「近鄰」及「綜合」五種類型來界定家庭與社工專業之協同合作關係，並從上述類型中，分享協同合作關係的內涵。

#### （一）家庭與社工專業是朋友關係

本研究中有數位受訪者都以「朋友關係」來界定他們與社工的之協同合作。然而受訪者也提到社工這個朋友和一般朋友還是有所差異，因為他們擁有協助孩子發展、家庭問題處理等多面向的專業知能，不僅能提供一般朋友的關懷外，更能提供家庭在協助孩子發展上的重要建議。

受訪者 F02 及 F03 提及社工和他們沒有利益或利害關係，所以不是事業上的夥伴，而是生活中的朋友。

應該是比較像朋友，因為我是覺得有時候和社工見面，就像是朋友在聊天，但在聊天當中，他就已經把我需要的資訊傳遞給我。我不覺得和社工是夥伴，因為夥伴就是那種有利害關係，我和社工沒有那種利害關係，而且也沒有那麼拘謹，就是像朋友一樣自在（F02）

社工就像朋友一樣，他不像我其他的朋友，都去北部、去南部了，有時候要連絡都連絡不到他！而且社工和我沒有利益關係啦！有時候遇到什麼事情打電話問他，他都會像好朋友一樣用心的幫我查資料，或是協助我說出心事、安慰我...他們還有別的朋友沒有的專業知識，可以幫助我（F03）

受訪者 F10 及 F11 還有 F03 則是認為社工和一般朋友又有些不一樣，尤其

他們在教養孩子等面向上，具有專業知識，能夠提供他們受用的建議。

我覺得社工像朋友，他會聽我說話，給我的建議都很有用，他們都很善良，會關心我和孩子（F10）

社工應該是朋友，他們經常來我家或是打電話，對我和孩子都比較熟悉，和一般不大熟的朋友或是鄰居不一樣，他們有相關的專業知識或是資訊，會提供在教養孩子上的一些建議給我（F11）

受訪者 F08 及 F12，則是從社工在提供服務時，是否只是當作例行公事？若不是，則能像朋友一般給予他們感動；若是，就只是一個沒有什麼不同的專業人員。

我得社工會比較像朋友，朋友的話是三不五時就打電話來，幾天就打電話來問一下「你在幹嘛！啊過得怎樣？」，有感動的叫做朋友，若社工只是例行公事的關懷，就叫做專業人員。所以我也希望社工就算沒有什麼服務要提供，一個禮拜或是兩個禮拜也好，要定期打個電話問一下家裡狀況！（F08）

其實我之前與社工的互動經驗，我覺得他們是例行公事...我很希望和社工可以像好朋友的關係，就是比較常連絡的那種好朋友，可以安慰你提供你一些意見或者鼓勵你那一種朋友，因為之前的經驗，給我感覺就是他們下班就回家了，我很希望能有多一些互動（F12）

## （二）家庭與社工專業是夥伴關係

二位受訪者提到家庭與社工是「夥伴關係」，大家共同的事業與目標就是協助孩子順利的發展，社工具有傾聽、瞭解家庭需求的特質，能與家庭一起面對後續的困難。受訪者 F04 更為清楚描繪夥伴關係的內涵，他認為家庭與社工的協同合作關係，本就該建構在協助孩子順利發展的面向上，社工只需

將焦點放在孩子的發展上，不需要太關注家長的情緒，若以企業經營的角度來討論，彼此角色的分工，會因著家長能力改變，而有不同的股份配置，最終家庭仍是孩子的最大股東，而社工終究得退出。

我覺得家庭和社工之間就是「夥伴關係」！我跟社工共同事業就是我的孩子，他不需要介入我的事，不需要和我當朋友。我們就是生意上的夥伴，當然要維持這個生意，社工需要兼顧到我這個夥伴的感覺，只要能夠讓這個孩子順利解決發展上的困難，這個事業就算成功了。夥伴只談事業，有共同目標就是夥伴，好朋友就不見得有共同的目標。在夥伴關係中，家庭是大股東、社工是插股的！若我增資的時候，他的股份就會很少啊！所以服務一開始時，社工要做多一點，要提供許多我需要的資訊或資源給我，讓我去選擇，等到我都瞭解服務的脈絡之後，他就可以開始抽身了，然後只需要給我關心就可以了，其他我就自己運作。等到我更進入狀況後，就可以上市上櫃了，每一個來服務我孩子的專業人員都可以自由入股，我上市上櫃，讓他們自由買賣，這是早療家庭與社工夥伴關係最後的境界(F04)我覺得社工是一個很好的夥伴，因為夥伴要一起走、一起朝同樣的目標努力。社工的確很瞭解孩子和我們家庭的狀況，他們很願意且認真傾聽我所有的想法，就像是一個和我併兼作戰的好夥伴(F09)

### (三) 家庭與社工專業是「師生關係」

受訪者 F01 在他與社工協同合作的經驗中，社工常常提出對於發展遲緩孩子相關的療育建議，以及對於家庭的協助，他認為社工就是家庭的老師，若只是一位朋友，則不可能有這樣的專業知識或資源。

當我面對朋友或是鄰居時，我講不出我、家裡或是孩子的狀況與困難。

但若是老師，他比較能理解這些問題，而且可以提供給我好的建議，我

就比較願意說出來。社工對我而言就是老師，因為我們家或孩子的困難及需要，他都能瞭解，還會教我怎麼處理（F01）

#### （四）家庭與社工專業是「近鄰關係」

受訪者 F07 認為社工是一個與家庭住得很近的鄰居，因為他每天都能看到家庭與孩子的情況，不用向他多做說明，加上這個鄰居不但住的近、瞭解情況，又擁有專業知能，當家庭有困難時，近鄰永遠比遠親來的有用。

社工比較像住在我家隔壁的鄰居，因為鄰居瞭解我們家的生活狀況，因為天天見面，比朋友容易討論自己的心情與孩子的情況，他們也比較容易進入狀況，且這個鄰居又能夠有一些專業的知識，距離又近又能協助我們（F07）

#### （五）家庭與社工專業是「綜合關係」

此外，有部分受訪者認為他們與社工的協同合作關係是綜合的，可能同時包含朋友、師生、夥伴與近鄰。受訪者 F05 指出家庭與社工既是朋友也是師生關係，因為社工有著朋友的親切、也有著老師的專業知識；家庭需要他們像朋友的陪伴，也需要他們像老師的教導。受訪者 F13 則提到家庭與社工是朋友也是近鄰關係社工既是朋友也是近鄰，因為可以和社工沒有顧慮的講心事，家庭需要協助時，社工又好像近鄰般，馬上會給予協助。受訪者 F15 從反向來陳述與社工的協同合作關係，他認為家庭與社工的關係很多元，不能以朋友、師生等概念一以貫之，而是同時兼具了朋友、師生、夥伴關係的內涵。

我覺得我和社工的關係，是朋友也是師生。因為和社工分享心事或是問他問題時，他就會像好朋友一樣，認真的回應我，但他的回應中又充滿著專業的訊息，也能教我很多。家長剛開始接受服務的時候，知識一定

比社工少，這時候社工就是家長的老師，他會教我們、帶我們；等家長懂得越來越多的話，可一些事情就比較不用問他們，到時候就可能比較像朋友（F05）

我能和社工講心理面的話，雖然不像非常好的朋友，可能天天接觸天天聯絡，但至少是個朋友；因為我和鄰居處的很好，加上天天見面，他們能立即給我心理支持或協助，若這樣看來，社工也像是我的鄰居，可以就近協助我和孩子，提供我們相關的支持（F13）

我認為社工和家庭不是朋友關係，因為社工畢竟對家庭來說，還是陌生人，只是他們願意協助我們，我們也接受他們，而且他們又和一般朋友不同，他們會提供我們對孩子成長過程中有幫助的資訊，這是一般朋友很難做到的；他們又不像老師，社工的資訊比老師多很多，而且會主動提供家長相關的訊息；社工和我們的目標都一樣，就是能夠做好自己的事情，將小孩子扶植起來，又有事業上夥伴的關係（F15）

## 二、受訪者認為影響「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

研究者在整理訪談資料後，受訪者認為影響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包含家庭與社工專業層面。在家庭層面的影響因素有社經地位與家長態度、在社工專業層面的因素則是專業知能與專業態度。

### （一）家庭層面

#### 1. 社經地位

多位受訪者皆提到家庭要能與社工協同合作，首要的條件便是家長的教育程度、專業知識與經濟狀況等因素，若家長在上述的條件太差，則光應付生活

所需就已無時間與精力，自然無法與社工進行良好的互動。

受訪者 F02 及 F04 認為家長的教育程度、主動獲取新知的能力等會影響對於兒童發展相關知識的吸收與瞭解程度。F04 更指出不論是教育程度低或高的家長，都可能因為無法理解社工的資訊或是覺得社工提供的資訊，自己早就知道等原因，影響彼此關係的建立。

有些家長教育程度太低，或是兒童發展的相關知識不夠的話，就算社工要灌輸某些方面的資訊，家長不一定有能力接受（F02）

我覺得家庭的生活水平很重要，雖然我的學歷並不高，但是我讀過很多與孩子發展狀況相關的書籍，能與社工討論。知識不夠的家長，無法和社工談；環境很好或對孩子發展知識很豐富的家長，可能將自己擺得很高，這樣有沒有社工，根本不重要，因為他不需要這些服務（F04）

除了家長的教育程度之外，受訪者 F03 及 F10 則是提到家庭經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若是家庭經濟不穩定，光維持家計就很辛苦了，不可能有時間參加活動，當然就不能與社工有較密切的協同合作關係。

如果家庭經濟還可以，家裡就可以帶小朋友去上課或做治療，如果經濟不允許，社工介紹的療育課程、親職課程、親子活動等，根本不可能參加，也沒有機會和社工合作（F03）

像我不用去上班，就可以參加一些活動，家庭經濟也還可以，才有可能花比較多的時間，消化社工給的資訊，或是參與他們介紹的活動（F10）

## 2.家長態度

此外，一些受訪者認為家長對於孩子、療育的態度決定了他們能否積極、勇敢的與專業互動。

受訪者 F04 及 F05 認為孩子是家長的、不是老師或是社工的，所以家長能

不能積極的協助孩子接受相關服務，或是主動向專業人員尋求所需要的資訊，是影響他們和社工合作的重要因素。

我去復健室看過很多家長，他的目標是孩子的，再窮再沒知識，他都去拜託老師，老師再怎麼兇他的孩子，他痛在心裡，他還是把孩子往前推。那如果說那個家長的目標不是孩子，他要的是那個福利，他已經放棄自己的孩子。這時候，家長當然不希望社工再來告訴我要努力這些、要參加什麼活動...，因為家庭根本不想跟社工成為事業的夥伴，根本不想為孩子的未來打拼！（F04）

和社工的合作上，我覺得家長自己要主動、積極，因為是你自己的小孩子，你想要知道什麼？有什麼問題？若不主動和社工老師或其他專業人員說，他們不可能提供你想要的資訊，所以家長不會的、不懂的，一定要主動勇敢的去問（F05）

除了家長主動積極的態度之外，受訪者 F03 則是認為許多家長並沒有接受自己孩子的特殊狀況，當然在這個狀況下，不可能與社工建立相關的合作關係。受訪者 F13 認為若要和其他專業人員真正的合作，家長本身要開放、深入的將自己、家庭與孩子的需求，告訴社工或老師。

我認為家長要先接納自己孩子是特殊兒童，他才有可能跨出第一步，慢慢與社工或相關機構互動。也就是家長一定要清楚、接納孩子的狀況，當社工去跟他接觸時，他才能獲得想要的或是新的知識，也才能繼續接受社工提供的服務（F03）

我覺得社工或老師要幫助家庭和孩子，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是：家長要能夠放開心胸、深入的與他們分享家庭與孩子真正的狀況，不能只講到表面，這樣社工和老師才會比較知道家庭與孩子的需要，才能真正提供建議與協

助，這樣才能一起合作（F13）

## （二）社工專業層面

### 1.專業知能

在專業知能的部分，受訪者陳述了非常多元的看法，研究者為了讓這些看法更為清晰，將專業知能的類型又再區分為對家庭需求的瞭解、對療育資源與相關資訊的掌握、教者育與倡導者角色的發揮、專業關係界線的拿捏等幾個次類型。

#### （1）對家庭需求的瞭解

受訪者 F01 指出家長願意和社工合作，一定是基於感受到社工對於家庭需求的瞭解，在此基礎之下，才能提供家庭適切的建議與服務，家庭也才能對社工產生信任。

因為我的個性，我自己比較喜歡的就是＊老師（個管中心的社工），因為他比較親切，還有他很瞭解我們家及孩子，每次都能講到重點，能告訴我下一步可能需要做什麼？（F01）

#### （2）對療育資源與相關資訊的掌握

部分受訪者則提到在與社工的協同合作經驗中，最重要的是社工對於孩子療育、家庭需求等資訊與資源的掌握，若社工缺乏這些專業知能，則家長得不到正確以幫助的資訊，自然會影響與社工合作的意願。

受訪者 F05 與 F15 便提及社工若具有孩子在發展、教育安置等過程中，相關的資訊或專業知能，較能取得家長的信任，而願意和他們合作。

我覺得社工要能夠提供孩子療育方面的一些資訊，像是要讓孩子受到什麼樣的訓練，或是孩子應該讀什麼幼稚園比較好，家長會很希望社工能具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對我們才會有幫助（F05）

社工的專業知識比我們多很多，我們有些不知道的地方，有時候我們會問他們，早期的時候，孩子接受醫生評估，醫生對於小孩子各方面發展到哪種程度？社工會主動跟我們講，並和我們討論讓我們瞭解，他們有專業知識，讓我們很信任，願意和他們合作（F15）

受訪者 F09 及 F12 提到與他們合作的社工，可能因為年資較淺、提供資訊的態度不夠積極、對資訊掌握度不夠等因素，對於家庭及孩子所需要的資訊，幾乎都是由家長自己去尋找，這也影響了家庭與社工專業協同合作的意願。

我第一個接觸的社工是新手，他大概什麼都不知道，我有很多問題或什麼的，他都沒辦法回答，他知道的資訊比我還要少，這樣為什麼要合作？還不如靠自己（F09）

孩子確診之後，我就開始找資源，但是不知道要找誰，社工沒有主動來找我，沒有說主動告訴我要去哪裡找資源，都是我自己主動去問的。之前我想問國小特教班的相關資訊，我發現社工好像也不清楚，還要我自己打電話去問（F12）

### （3）教者育與倡導者角色的發揮

受訪者 F04 提到社工若要與家庭協同合作，社工應扮演倡導者的角色，協助家長多表達意見、參與服務。若是家長對於服務不瞭解或是無法進入服務脈絡時，社工應扮演教育者的角色，這樣才能將家庭帶起來，讓他們能與社工一起協同合作。

社工可以給家長更多發言的空間啦！就是你要做幕後黑手，不要替他們站出去，社工是要鼓勵他們家長出去的，而不是你去替他們做什麼...社工要當一個教育者，教育你的家長怎麼帶這個孩子，幫助他進入一個管道，而不是去替代那個家長做這些事情，你必須不斷的鞭策，用柔性的方式引導

他進入這些管道裡面，讓他們瞭解為什麼需要這樣做，這樣做對你有什麼幫助？社工要一直很正面積極的把他們推到這個領域去，等到工作完成後，就完全的放手（F04）

#### （4）專業關係界線的拿捏

受訪者 F04 與 F08 則提到在與社工協同合作時，截然不同的兩種想法，受訪者 F04 覺得社工應與家長保持專業距離，只需要協助孩子進行療育，不需要介入太多家長的協助。然而，受訪者 F08 則期待社工與家長能透過更多正式與非正式的活動，才能讓彼此更瞭解。因此，研究者將其命名為專業關係界線的拿捏，畢竟家長特質與家庭需求不同，對於與社工專業關係的期待也會不同，所以，社工提供服務時，應進行審慎的評估，才能找到最適合彼此的專業關係界線。

若社工一開始就想要進入那家庭，想要跟家長維持深入互動的關係，那個就是錯的了啦！你今天根本就不應該跟家長有什麼關係，你應該是要服務那個孩子。若社工一開始就是期待與家長建立好的互動關係，再藉由這層關係去服務孩子，我覺得是很危險的、目標也很容易失焦（F04）

我覺得社工跟家長互動要好的話，可以多安排一些活動，不論是針對家長或是針對小孩子的活動。多在活動中接觸，才會互相的了解，才会有更多深入的互動，有了互動才有可能瞭解對方，也才會更信任，有好的合作（F08）

## 2.專業態度

在專業態度部分，研究者依據研究結果區分為「同理、尊重的態度」及「主動、積極的行為」二個次類型。

### (1) 同理、尊重的態度

社會工作在提供服務時，除了需要注意服務的成效之外，服務的品質更是需要維護的。服務品質的構面，專業人員的態度是重要的面向之一。本研究多位受訪的家長提到他們之所以願意相信社工、與他們一起合作，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服務過程中，他們感受到社工對他們意見的尊重、親切與同理的態度以及不用自身專業價值去評斷討論的事情，這是受訪的家長認為影響彼此協同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訪者 F01 與 F02 提到了他們最希望社工在協助家庭時，能先瞭解家長的教育與社經文化背景，而後以家長能夠接受的方式去和他們溝通及互動，千萬不要運用太多的專業術語或是不尊重、過於直接的溝通方式，去與家長互動。

我覺得彼此尊重很重要，因為今天的問題出在我的孩子是有特殊狀況的，家長已經很難受，若是社工講話不客氣或不尊重家長，家長更沒辦法承受 (F01)

我覺得是同理心跟尊重是比較重要啦！在與家長溝通時，可能他們就是聽不懂又不敢再問，所以要有同理心。因為社工有很多專業術語，他認為因為他們聽久了，都習慣了，以為這是正常的，有些家長若知識水準比較低的，就會更緊張，會更不好意思或更不瞭解的話，他們就不知道要怎麼問... 尊重的話，社工對於家長的社會背景應該要有深入的瞭解，要清楚家長的個性，和他們溝通的時候，話不要講得太直接，要能以家長可以接受的方式去討論 (F02)

此外，受訪者 F03、F04 與 F05 則比較重視社工所提出的相關建議是否有依循家庭的需求？不評斷家庭所提出的任何想法？更重要的是尊重家庭的態度，不要強迫家庭接受相關的建議或服務。

我的經驗，社工會接受我的意見，是很關鍵的。有時候社工建議的服務或活動，我認為不需要，他並不會一直強逼你，會尊重我的想法。這很重要，這樣的態度讓我更願意和社工一起解決問題（F03）

我接觸到的社工他是傾聽者，不是建議者，他給我的就是問我有沒有需求，當我提出我的需求，他就努力的幫我，他不對我的孩子下任何的評斷，也不會對我下任何評斷？這樣我比較不會有那麼大的壓力，這是我可以和社工一起合作這麼好，很重要的原因（F04）

社工在提供相關活動的時候，會寄宣傳單或打電話邀請，但是給家長自己選擇這樣，不會強迫你，我覺得這樣不會有壓力，反而我會更願意參加（F05）

## （2）主動、積極的行為

除了專業的態度之外，幾位受訪者則從自己接受服務的經驗中，提到若要建立信任的協同合作關係，社工與家庭間必須有各種形式的互動機會，且需要社會工作者主動積極的去建立。

受訪者 F06 的孫子進入早期療育服務體系的原因，便是社工不厭其煩，積極主動的介入，這對他們後續與社工協同合作的經驗，都非常正向。

我心裡想說我的孫子又沒有怎麼樣！可是社工就是很有耐心，一直說：「那阿嬤你說沒有怎麼樣，那我們來去給醫生評估看看啊！」我敷衍一次、兩次...，但他不會生氣，換做是我，早就氣死了，我就是被他這種不放棄、很努力的態度感動的，才會讓孫子去接受評估和治療，後來我對社工的建議都非常的信任，也願意參與每一項服務（F06）

受訪者 F08 與 F12 提到合作的社工在互動聯絡上，次數過於少，讓他們常常處在自行處理問題的狀態中，因此期待社工更積極的與他們聯絡。

說實在的，社工幾乎都沒有很頻繁的跟我連絡。因為我有幫孩子申請居家復健，有很多細節要討論，社工才跟我聯絡稍微頻繁一點。因為較少聯絡，其實感情就很生疏，很多事情就不好意思麻煩社工，只能自己處理（F08）我希望社工能夠主動一點，因為他們的服務到後面，就變成比較被動式的，我不找他們，他們也不會找我。我覺得至少一個月要去家庭看看或是打電話都可以，看看我們有沒有什麼需要。要不然都是家長自己主動去找社工，有些社工就是認為說那只是工作，他沒有熱忱。你當社工你就是有那種抱負，想要服務人家的那種心態，如果你以例行公事的觀念來做的話，當然你就沒有辦法那麼積極了，這樣我們家長就無法和他們有好的合作（F12）

受訪者 F14 則是擁有正向的經驗，因為社工非常頻繁的家訪與聯絡，讓他更信任社工，也讓彼此的協同合作關係更好。

社工不僅是打電話，還常常出現在我家，兩年內至少來過我家七、八次吧！只要他路過或是來附近，都會來我家看看孩子的狀況，並和我說明他們要辦什麼活動，我要不要參加之類的，因為常常出現、互動，我們之間合作蠻好的，我蠻信任這位社工的（F14）

## 伍、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目的旨在從服務使用者的角度，討論發展遲緩兒童家庭與社工專業的協同合作關係。依據上述的研究結果，研究者提出以下的討論與建議。

## 一、「家庭與社工專業」協同合作關係具有多元內涵，但不應脫離充權的概念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家庭與社工專業」的協同合作關係，包括朋友、夥伴、師生以及綜合等五種類型。若檢視受訪者對上述這些關係類型的內涵界定，與文獻定義之夥伴關係，相同的部分包括：朋友與近鄰關係中的「鼓勵陪伴」、「共享訊息」（許素彬，2008；Blue-Banning et al., 2004; Denboba et al, 2006; Dunst, Trivette & Deal, 1994; Kasahara & Turnbull, 2005）、夥伴與綜合關係中的「共同目標」（Dunst, Trivette & Deal, 1994；Keen, 2007）、師生與綜合關係中的「專業知能」（許素彬，2008；Kasahara & Turnbull, 2005; Fereday, Oster, & Darbyshire, 2010; Tomasello, Manning, & Dulmus, 2010）。

然而，文獻中所討論家庭與專業在建立協同合作關係時，受訪者較少提及「以家庭需求作為服務設計與執行的依據」、「願意與家庭分享執行與決策的相關資訊」、「協助家庭參與服務與決策過程」、「釋放專業權力，與家庭建立平等關係」等與充權概念相關的內涵（許素彬，2008；Dunst, Trivette & Deal, 1994; Dunst & Dempsey, 2007; Minke & Scott, 1995; Keen, 2007; Swain & Walker, 2003）。只有受訪者 F04 及 F05 提到當家庭知能不足時，社工必須教家庭、讓他們瞭解相關服務的訊息；當家庭知能提升後，社工就可以放手，漸漸退出服務，只需要提供朋友般的支持與鼓勵。研究者考量這樣的研究結果可能受限於本研究受訪者之經驗，抑或是在受訪者與社工協同合作的過程中，其並不清楚家庭在服務中的角色？社工並未對家庭釋放專業權力？社工並未協助家庭參與服務決策等？這則需要後續相關研究的進行，才能獲得解答。因此，研究者建議社工在與家庭協同合作的過程中，仍須透過充權策略的運用，例如：相信家

庭具有面對問題的能力、清楚解釋服務的內涵、協助家庭瞭解與看見其在服務過程中具有的權力、協助家庭得以具備參與服務、進行決策的能力與機會等，才能與家庭建立平等信任之協同合作關係。

## 二、在任何形式的協同合作關係中，受訪者都需要社工像朋友一般的關心與陪伴

本研究受訪者雖認為家庭與社工專業的協同合作關係具有不同的類型，但不論是哪種類型，受訪者認為社工能夠關心家庭需求、陪伴家庭等朋友的特質，是他們得以放心與社工一起工作的重要原因。受訪者 F11 及 F12 則提到社工將家庭的工作視為例行公事，則彼此的關係缺少感動，社工對家庭而言就只是一個專業人員。

Dodd 等人（2009）提到與家庭建立夥伴關係，不是意味著增加家庭更多的責任或工作，而是更應重視傾聽家庭的聲音、瞭解家庭的需求、陪伴家庭等關係的建立。Dybicz（2012）整理許多文獻對於專業關係及朋友關係的討論，他指出朋友關係不一定會破壞專業關係，它也有可能是實踐專業關係的重要方式。O'Leary, Tsui, & Ruch（2013）指出社工與案主之間的專業界線具有「動態」的本質，在專業界線中，有些具有不能協商的特質，例如：性關係、金錢的交換關係等，有些則具有協商的空間，例如：朋友關係中具備的關懷、同理與傾聽等特質，和專業關係要求的是相通的。Ribner 和 Keni-Paz（2002）從 12 位以色列來自於多元問題家庭婦女的質性訪談中，發現「社工像朋友」是這群受訪者認為成功助人關係的重要特質，有些受訪者更直接提出當社工做與專業界線有差距的事情時，將他們當作朋友、進入案主的生活場域時，

更讓案主覺得窩心。

由此可見，協同合作專業關係的建立，不能只從社工的角度來思維，而需瞭解服務使用者對於兩者之間關係的期待。本研究受訪者提及同理、尊重、關心與陪伴等朋友關係的特質，能讓他們感受到社工的親切、對家庭問題的關切等，而讓他們因此放下擔憂，安心的與社工一起工作。若從專業關係的角度，社工可能擔心這樣類似朋友關係的建立，是否會模糊專業關係的界線？這個部分則從上述相關文獻中得到了解答。因此，研究者建議早療社工在與家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時，不論關係的型態為何，都應重視家庭對彼此關係的期待，學習運用朋友關係中的不具威脅性、沒有利益衝突、尊重、陪伴的技巧，與家庭一起合作。

### 三、影響建立協同合作的因素中，包含家庭與社工專業的面向，惟關鍵因素是社工能否因應家庭不同需求，而發展出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不同策略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認為影響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包含家庭與社工專業兩個層面，其分別包含家庭社經地位、家長態度、專業知能與專業態度等四個類型。家庭層面之影響因素：社經地位與家長態度，呼應相關文獻（陳素禎、郭煌宗、劉芷瑩，2009；許素彬，2008；鄭夙芬、鄭期緯、林雅琪，2005；周月清等，2001；Coots, 1998; Hamilton, Roach & Riley, 2003; Littell et al, 2001; Mahoney & Wiggers, 2007; Sheppard, 2001; Summers et al., 2005）。社工專業層面之影響因素專業知能與專業態度，部分類型呼應文獻，像是：專業知能中「對療育資源及相關資訊的掌握」（Blue-Banning et al., 2004;

Fereday, Oster, & Darbyshire, 2010; Kasahara & Turnbull, 2005; Mahoney & Wiggers, 2007; Sheppard, 2001; Tomasello, Manning, & Dulmus, 2010)、「對家庭需求的瞭解」(Denboba et al, 2006; Kasahara & Turnbull, 2005)、「教育與倡導者角色的發揮」(Fereday, Oster, & Darbyshire, 2010; Kasahara & Turnbull, 2005)、專業態度中「同理尊重的態度」(張英陣等人譯, 2012; 許素彬, 2008; Bailey et al., 2006; Kasahara & Turnbull, 2005; Sheppard, 2001)以及「主動積極的行為」(Dunst, Trivette & Deal, 1994)。

不過本研究受訪者並未提到「發展遲緩兒童」相關人口特質(許素彬, 2008; Summers et al., 2005)、過去協同合作的經驗(Keen, 2007; Stoner, et al., 2005)對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影響。研究者思考前者可能因為該篇研究室以量化問卷進行調查,所以在問卷建構時就有相關發展遲緩兒童人口變項的問項,本研究則是運用質性研究一對一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研究資料,當以開放式問題詢問受訪者時,他們並未將發展遲緩兒童的相關特質視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過去協同合作經驗」的部分,在本研究中雖未有受訪者提及,但卻是重要影響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因素。因此,研究者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再進行探究,才能釐清其對家庭與社工專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影響。

此外,本研究中所發現社工專業層面「專業知能」中「專業關係界線的拿捏」則未在任何文獻中被提及。這個因素其實凸顯了任何協同合作的關係,都必須先釐清家庭需求與家長特質,這正呼應了早療社工的服務強調以家庭為中心的信念。另外,就像文獻(Dodd et al., 2009; O'Leary, Tsui, & Ruch, 2013)所提及的任何型態的專業關係,若要達到平等互惠的協同合作,都需以傾聽家庭的聲音與需求、尊重家庭習慣及文化脈絡為基礎。因此,研究者建議早療社工

在與家庭建立協同合作關係時，應遵守個別化的原則，以家庭習慣、家長特質為評量依據，發展及運用不同建立協同合作關係的策略。

## 參考書目

- 呂金燮譯（2004）。〈特殊幼兒及其家庭的服務〉，載於鍾莉娟總校閱，《早期療  
手冊》（頁 433-462）。台北：心理。
- 周月清、朱鳳英、許昭瑜、劉玉珊、蔡秀妹、黃鈴雅、黃淑文（2001）。〈協助  
拒絕接受服務之家庭進入早療體系〉。《台大社工學刊》，4，97-161。
- 張英陣、許雅惠、潘中道、陳玲萍譯（2012）。《社會工作概論》。台北：雙葉。
- 許素彬（2008）。〈家長與個管員夥伴關係對早期療育服務成效之影響研究〉。《台  
大社會工作學刊》，17，43-92。
- 陳向明（2004）。《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陳素禎、郭煌宗、劉芷瑩（2009）。〈發展遲緩兒童服務歷程中非自願家庭之原  
因初探：以苗栗縣為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15，41-68。
- 曾華源摘譯（2010）。〈助人歷程概論〉。載於曾華源、翁毓秀、趙善如、李  
自強主編，《社會工作直接服務：理論與技巧》（頁35-61）。台北：洪  
葉。
- 鄭夙芬、鄭期緯、林雅琪（2005）。〈以充權為觀點的早期療育家庭之家庭功能  
探討〉。《臺灣社會工作學刊》，3，51-97。
- 鄭維瑄（2013）。〈社會個案工作的專業關係〉，曾華源（主編），《社會個案工  
作》（頁109-142）。台北：洪葉。
- 鄭翠娟（2004）。〈早期療育與家庭參與〉，許天威、莊育芬、陳素苓、唐詠雯、  
簡言軒、唐紀絮、王淑仙、謝協君、吳勝儒、鄭翠娟、鄭善明（合著），《早  
期療育概論》（頁 11-8~11-14）。台北：群英。
- 謝秀芬（2010）。《社會個案工作：理論與實務（三版）》。台北：雙葉。

- Bailey, D. B., Bruder, M. B., Hebbeler, K., Carta, J., Defosset, M., Greenwood, C., ... & Markowitz, J. (2006). Recommended outcomes for familie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 28(4), 227-251.
- Blue-Banning, M., Summers, J. A., Frankland, H. C., Nelson, L. L., & Geegle, G. (2004). Group action planning as support strategy for hispanic families: Parent and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s. *Mental Retardation*, 38(2), 262-275.
- Brook-Gunn, J., Berlin, L. J., & Fuligni, A. S. (2000).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programs: What about the family? In J. P. Shonkoff & S. J. Meisels (Eds.), *Handbook of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2<sup>nd</sup> ed.)(pp. 549-5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uder, M. B. (2010). Early childhood intervention: A promise to children and families for their future. *Council for Exceptional Children* 76(3), 339-355.
- Bruder, M. B. (2000). Family-centered early intervention: Clarifying our values for the new millennium.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0(2), 105-115.
- Cornwell, J. R., & Korteland, C. (1997). The family as a system and a context for early intervention. In S. K. Thurman, J. R. Cornwell, & S. R. Gottwald (Eds.), (pp. 93-109). *Contexts of Early Intervention: Systems and Settings*. Baltimore, MD: Paul H Brookes Pub Co.
- Coots, J. J. (1998). Family resources and parent participation in schooling activities for their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31(4), 498-521.
- Creswell, J. W. (2003). *Research Design. Qualitative, Quantitative, and Mixed*

*Methods Approaches*. (2<sup>nd</sup> ed.).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DeGrace B. W. (2003). Occupation-based and family-centered care: A challenge for current practi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Therapy*, 57, 347-351.

Denboba, D., McPherson, M., Kenney, M., Strickland, B., & Newacheck, P. (2006). Achieving family and provider partnerships for children with special health care needs.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118(4), 1607-1615.

Dunst, C. J. (2002). Family-centered practice: Birth through high-school.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36(3), 139-147.

Dunst, C. J. (2000). Revisiting 'rethinking early intervention.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0(2), 95-105.

Dunst, C. & Trivette, C. M. (1994). Aims and principles of family support programs. In C. J. Dunst (Ed.), *Supporting & Strengthening Families* (pp. 30-48). 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Brookline.

Dunst, C. J., & Dempsey, I. (2007). Family-professional partnerships and parenting competence, confidence, and enjoy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54(3), 305-318.

Fereday, J., Oster, C., & Darbyshire, P. (2010). Partnership in practice: What parents of a disabled child want from a generic health professional in Australia. *Health & Social Care in the Community*, 18(6), 624-632.

Guralnick, M. J. (1997). Second-genera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early intervention. In M. J. Guralnick (Ed.), *The Effectiveness of Early Intervention*(pp. 3-24). Baltimore: Paul J. Brookes.

- Hamilton, M., Roach, M., & Riley, D. (2003). Moving toward family-centered early care and education: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a glimpse of the future.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30(4), 225-232.
- Keen, D. (2007). Parents, families, and partnerships: Issues and conside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bility,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54(3), 339-349.
- Littell, J. H., Alexander, L. B., & Reynolds, W. W. (2001). Client participation: Central and under investigated elements of intervention. *Social Service Review*, 75, 1-28.
- Mahoney, G., & Wiggers, B. (2007). The role of parents in early intervention: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work. *Children & Schools*, 29(1), 7-15.
- Minke, K. M., & Scott, M. M. (1995). Parent-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in early intervention: A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Topics in Early Intervention Special Education*, 15(3), 335-352.
- Shannon, P. (2004). Barriers to family-centered services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Social Work*, 49(2), 301-308.
- Sheppard, M. (2001).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an instrument for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partnership between mother and social worker in child and family care. *Child & Family Social Work*, 6, 31-46.
- Stoner, J., Jones Bock, S., Thompson, J., Angell, M., Heyl, B., & Crowley, E. P. (2005). Welcome to our world: Parent perceptions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ents of young children with ASD and education professionals. *Focus on Autism and other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20, 39-51.

- Swain, J., & Walker, C. (2003). Parent-professional power relations: Parent and professional perspectives. *Disability & Society*, 18(5), 547-560.
- Summers, J., Hoffman, L., Marquis, J., Turnbull, A., Poston, D. (2005). Relation between parent satisfaction regarding partnership with professionals and age of child. *Topics of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25(1), 48-58.
- Tomasello, N., Manning, A., & Dulmus, C. (2010). Family-centered early intervention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Family Social Work*, 13, 163-172.

## 研究論文

# 非營利組織和政府間的社會創新與合作：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行動研究<sup>\*</sup>

紀金山

靜宜大學社會工作與兒童少年福利學系教授

---

收稿日期：2014 年 6 月 9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7 月 10 日。

<sup>\*</sup>本文曾發表於 2013 臺灣社會學會年會暨國科會成果發表會，感謝與會學者回饋意見，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編號 NSC101-2410-H-126 -012 -SS2。作者並誠摯感謝台中市政府社會局王秀燕局長及相關官員的創新智慧及對此計畫的協助，福氣協會社區發展育成中心工作人員的全力付出及林郁芳督導的資料提供。

## 中文摘要

社會創新是體現行動者回應社會結構的可動性，也是推動社會變遷的正向力量。本文是研究者以負責人身份，針對一個非營利組織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一項社區工作創新方案的行動研究與反思。本文認為此項社會工作鑲嵌在政府、專業、案主與市場所構作的社會脈絡中，此項社會創新實踐，雖然都依約完成各項業務，獲得地方政府委託方案評鑑優等，成果並成為地方政府獲得全國評鑑優等的重要特色；然而仍有其諸多限制與挑戰。本文根據此創新行動經驗，分析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的實際特質，包含目標設定、組織行動位置、社會實踐利益的生產、分享與矛盾，藉以探討社工的專業實踐能力及公私部門合作關係的基礎與轉變。

**關鍵字：**非營利組織、社會創新、合作、社區工作、社會工作

# **Social Innovation an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Government: Action Research on the Incubation Center of Communities of Taichung**

**Chin-Shan Ch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 Child Welfare

## **Abstract**

Social innovation is the possibility that reflects the actor's response to a social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positive strength that promotes social change.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ction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of by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concerning an innovative community work program that is jointly oper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this social innovation, this paper states that social work is embedded in the social context constructed by governments, professionals, clients and markets.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has completed all tasks requir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even received an excellent rating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 and facilitated the local government to be recognized nationwide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However,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needs, resources, and power in social innovation present challenges and limitations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social structure, organization position and social action, the sharing and conflict of social practice interest,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al abilities of social workers, and as well as the basis for and transformation of partnerships 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Keyword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ocial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 Community work, Social work

## 壹、研究起點與目的

### 一、作為廠商：站在社會實踐的現場

研究者這些年在靜宜大學的教學生涯中，一直因能有符合自我期待的收穫，而常生幸福清淨之感。然而，在課程之外，隨著見聞社會角落的需求乃至社工的窘迫日多，對圈圍於象牙塔裡的自身清淨，愈發不安；總覺得身為社工系教師，應有更多的社會參與，特別是所教授的非營利組織管理課程，更應導向社會實踐，這是 2009 年的起心動念。

此舉曾先和幾位學界前輩討論，有前輩提醒我，對政府部門而言，學者創辦或擔任非營利組織負責人，身份將會由大學教授的專業身份轉成為廠商；未來也將承擔組織營運的財務壓力，甚至要跑「三點半」，會很麻煩。研究者仍自許近年初具的清淨心，有需要再經外境考驗才能精進。就這樣 2010 年，在非營利組織不足的台中市海線地區，我們如願地成立了一全國性非營利組織：「社團法人臺灣福氣社區關懷協會」（以下簡稱福氣協會）。

到了 2011 年，協會成立初期以秘書長帶領兼職社工、志工的半結構型態工作人力，已不足應付協會常態和專案的服務需求。增聘專職人力以推展理想中的服務，似乎勢在必行；只是協會為以人聚合的非營利組織，沒有外界捐款支持，增加人力就會擴大協會日常的收支壓力，為此協會必須找到更穩定的財源。

在「事滾人、人滾事」的組織發展需求下，恰值台中市因縣市合併後，大台中幅員廣大、城鄉差距明顯，社會局有意辦理社區培力案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由於此方案規劃有 5 位專職人力，並補助行政及活動經費，加上研究者先前即曾協助台中縣政府推動過相關社區培力活動，對此方案活動相對熟悉，且此方

案基本上符合福氣協會組織宗旨和服務方向，「隨順因緣」便積極配合招標案進行規劃，結果福氣協會在 2011、2012 年都以唯一投標廠商身份參與評選、議約，2013 年則經歷二度評選、議約，再接受方案委託。因此研究者就以該方案主持人身份（後更名為兼職主任），站在此項行動研究的現場，行動、紀錄、反思和書寫。

## 二、誰的需要與行動：學習的課題

社區永續經營與發展，需要社區民眾自發性行動和參與。臺中市整併升格後含括 29 個行政區，下轄 625 個里，社區發展協會成立數量已超過 590 個。在幅員遼闊、社區數量眾多，社區因各有社會環境脈絡而有很大的變異。向來被視為臺灣社區發展主要載體的社區發展協會，則因為與政府無轄屬關係的民間社團，又因政治立場與其公部門基層之村里長還常有對立，加上受限社區財力及專業人力不足，使得社區工作成果很難預期、社會福利社區化的政策期待難以落實與普及；尤有甚者，當政府對社區補助預算減縮，既有的社區工作成果也都常有無以為繼之憾。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針對前述問題，提出「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構想，目的是以集中有限的資源建構一個整合性的社區工作資源平台，更有效率地引導、陪伴或提供各社區可能需要的支援，以活化社區機能，落實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等政策目標。此方案甚受胡市長重視，並成為其連任的重要政見之一。然而，到 2011 年為止全國並未曾有縣市成立「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此項方案的細部規劃和執行經驗亟需大學校院或非營利組織一起協作。

由於「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的執行，是推動社會變遷的正向力量。福氣協會的服務方向本來就包含社區培力，若承接此方案基本上是實踐組織宗旨，有做中學的好機會，也可滿足協會發展初期的增聘人力、挹注活動經費的需求，將能產生提升組織發展量能的效果。

社會創新的實踐過程，體現了行動者回應社會結構的能動性與限制。福氣協會承接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期間，都能完成契約所列載的各項業務，並獲得市府委託方案評鑑優等的佳績。2012 年台中市在全國縣市社區評鑑中獲得優等，委員普遍認為此方案是台中市很成功的社會創新，也值得各縣市觀摩學習。2013 年研究者也獲邀在全國走動式績優社區觀摩活動大會發表專題演講。然而，這些表面的成果，未能突顯此項社會創新的行動關鍵，以及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合作議題。本文研究目的乃聚焦此項社會創新經驗中的關鍵，包含掌握社區工作的目標、組織條件，擬定行動策略、行動利益的分享和矛盾，並據此探討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合作議題，及反省既有社區工作專業知識與政策的限制和挑戰。

## 貳、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的行動觀點

政府本為公共服務與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當政府由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逐漸轉變為公共服務購買者，民間部門就開始承擔更多服務提供的職能。非營利組織因具不以營利為目的、公共財特性，及促進社會融合的重要價值，在提防市場失靈的憂慮中，普遍被認為是較理想的承擔者。然而，組織如何獲得維續生存的財務、人力、資訊和正當性等資源，向來都是備受關切的議題。尤其非營利組織運作多從事公益和扶助弱勢活動，很難直接向服務對象收費；

這些非營利組織既有的內外部資源網絡結構，因而被認為解析其組織發展的關鍵因素（Galaskiewicz, 1979; Gulati & Gargiulo, 1999）。因而非營利組織間與政府的合作議題，就成為重要的行動觀點。

## 一、合作基礎和結構位置

非營利組織是社會價值、社會需求和政經環境的互動產物（Stern & Gibelman, 1990）。因而服務輸送委託關係建構的社會基礎與其結構位置，是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實踐的首要議題，。

### （一）合作的社會基礎

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共同建構服務輸送的合作基礎，可分為交易模型和市場利基模型兩種（Smith & Gronberg, 2006）。交易模型則是指合作雙方存在對方所需的發展資源，而能在合作中創造相互依賴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非營利組織和政府在建構服務輸送體系的合作行動都各有其成本和效益，交易的順利進行取決於雙方都能獲得較佳的效益。例如非營利組織因所能提供服務的種類，往往要比政府部門更快速符合社會新興需求，而可為政府創造福利的施政績效（Schwartz, 2005）；而政府所提供的經費挹注和制度正當性，則是非營利組織實現使命和維持存續的重要資源（Singh, House & Tucker, 1986）。市場利基模型是指交易時賣方因能提供買方所需的某種財貨和服務特性，使得賣方在交易具有相對的談判優勢。在這種關係中，非營利組織在服務輸送體系中有其獨特的市場利基，而具有無法取代的重要性。例如劉淑瓊（2008）對全國各地方政府之身心障礙者服務與婦女服務的委外研究，發現由於委外服務的專業性與困難度、受託者要額外投入的資源，以及房舍狀況等因素，都限制了潛在受託者

進場競爭的可能性；所以即便兩個領域的委外規模懸殊，但實際上約只有一成五的標案有超過一家的競標者。從福利服務服務場域欠缺足夠的服務供應者來看，臺灣非營利組織與政府提供服務輸送的合作基礎，似乎比較偏向市場利基關係模式。

## （二）行動的結構位置

市場利基模型的不可取代性，雖然意味著服務提供者擁有特定的交易優勢。但在非營利組織在與政府的交易中，由於非營利組織的服務供給，通常有地域限制，而政府經常又是該類服務的單一購買者，在這種只有單一買方的獨特交易關係中，反而又貶低了非營利組織服務具有的利基價值。

非營利組織在社會創新服務上具有獨特市場利基，但其社會實踐卻不見得處在相對有利的合作位置之現象，很值得進一步加以檢視。Galaskiewicz & Krohn (1984)認為社區組織間的合作地位，取決於組織間是否具有相似的目標與活動，及所形成之對等交易的「對稱」結構位置，或不對等互動的「共生」結構位置。Pfeffer & Salanick (2003)認為互動雙方對彼此資源的依賴狀況，包含對外在資源的依賴程度、資源的重要性、擁有者對資源分配的決定權、資源的稀少度，決定了組織間的關係位置。在政府採購權獨大的買方市場中，非營利組織在服務輸送網絡所處的結構位置，有必要具體就方案目標的設定、政府對非營利組織的專業知識技能和人力資源之依賴程度，以及政府願意提供非營利組織的行動自主性與財務效益加以分析。

## 二、合作關係的轉變

民間部門隨著公共服務輸送典範的轉移，逐漸承擔政府原本的服務供給職能。從服務輸送的角度來看，這是政府透過補助或委託方式，將本身責任轉移給具有創新規劃和服務能力的非營利組織，並對非營利組織提供經費挹注的互動模式；也被認為是可促進社會正向變遷、創造雙贏的夥伴關係。然而，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合作關係，因為夾雜著管制、財務、服務輸送、政策倡議等關係（劉淑瓊，2009），意味著雙方的合作，比一般市場或利基型市場交易，有更複雜的互動意義，因而在學術研究上帶出了關係的形式、合作關係的轉變之重要議題。

### （一）關係的形式

臺灣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合作，一般偏向以政府主導的關係式委託。這種合作被認為有著希望由盟約架構的推動，以建立一個有效率夥伴關係的目標（劉淑瓊，2009）。實際上，若真要達成有效能且具持續性的夥伴關係，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在服務場域中需要有創新規劃力、服務執行力，一方面政府要對服務場域提供穩定的資源支持，但這兩個面向始終不是簡單的選擇問題，而是一種動態的建構過程，而關乎雙方合作的主體、目標、行動等問題。學界對組織間的合作關係，已有過許多廣泛的討論（劉麗雯，2004）。本文認為 Bailey & Koney (2000)針對廣義的合作關係，所區分出各自獨立個體間的資訊分享和相互支持之「合作」（cooperation）、獨立個體間以聯盟行動追求相容目標和執行共同任務之「協調合作」（coordination）、個體為追求集體目標並擬定整合策略之「通力合作」（collaboration）分類，兼容合作過程中主體性、目標與行動的整

合程度，相當能體現非營利組織和政府合作的豐富意義，可作為檢視其關係形式的基礎。

## （二）關係的轉化

政府方案委託的投入，雖可營造出非營利部門的蓬勃氣氛，學界卻早就對政府權力擴張感到憂慮，擔心政府規約管控會弱化公民社會發展（Harris, 2001）。王增勇（2009）認為台灣福利體制，在解嚴後，特別是 90 年代以後，隨著台灣福利法案大幅翻新和服務擴張，更廣泛採取委託民間提供社會福利，並試圖極小化政府的資源投入，而形成一種規範性的契約關係，進而啟動與建構了一種國家與民間社會的新權力關係。在方案委託的現實中，政府一方面運用契約中的規範性條文與驗收過程，要求非營利組織盡力配合，一方面則透過招標模式的開放性，爭取其他組織加入競爭，以維持公私部門間權力不對等，並對非營利組織產生強大的規訓力量。因而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合作，除正向效益外，也存在負面的衝擊和影響；拉長時間來看，這種與政府方案委託的合作關係轉化及影響，值得從實踐結果進一步分析。

## 三、行動利益的創造與分享

社會工作的價值，普遍被認為在為社會和服務對象帶來正向的改變；按照這種正向改變的行動利益意涵，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價值就來自聚合組織社工的專業實踐能力創造和生產社會利益，而其結果也帶出利益分享及潛存著分配矛盾的問題，這是探討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經驗的重要主軸。

### （一）社會工作的價值生產

非營利組織社會實踐若要生產出符合社會利益的價值，有賴聚集具有專業能力的社會工作者，積極從事專業勞動，以生產出被期待的專業價值。社會工作專業能力是以價值、知識和技巧為基礎（Vass, 1996）。這意味著社會工作體系的整體價值，或是社會工作者的生產力，是立基於其專業的價值取向、理論知識和實務技巧。其中價值面向，是此專業工作理念的核心，根據美國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的說法，包含了服務、社會正義、人的尊嚴和價值、人際關係的重要性、廉正與能力（Reamer, 2000）。在知識面向上，社會工作關鍵的知識內涵，是藉由學習觀察、描述、解釋、預測和干預等專業知能，以掌握工作環境特質、目標問題、服務對象或角色的差異，並提出符合情境的服務計畫和進行服務（Howe, 2002）。在技巧面向上，社會工作技巧則是運用價值、知識轉變為可回應服務需求的行動能力，包含對人的瞭解、溝通和評估、介入、賦權協商和參與、專業能力和責信等（Trevithick, 2005）。社會工作專業特質就依靠這三種缺一不可的能力面向，以形構出社會工作者在社會中的重要角色。因此社會工作者得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發揮自己的才能，才可有效執行專業角色，為社會生產出被期待的專業價值。

### （二）社會實踐的利益分享

在非營利組織和政府合作的委託關係中，雙方願意為共享的社會實踐目標，分別投入各自擁有的經費、人力及相關資源；然而，雙邊關係的維持和轉化，則繫乎所生產前後之利益分享與衝突模式。葉富春（2004）認為社會關係結構就是人們的利益結構；當人們做出的行為，引起一定的社會關係構成或解體時，就涉及利益關係的實現或成本的付出。李景鵬（2008）認為社會利益結構建立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關係基礎之上，包含各社會成員之間以追求利

益為目的之相互作用，以及社會對這種相互作用的控制和調節的結果，並涉及社會成員間、以及社會成員與社會間的利益關係模式。探討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合作關係，因而應考察其實踐的社會利益的生產和分配結構。

利益結構基本要素包含利益主體、利益內在觀念動力、利益同異競合性質、利益追求占有方式、利益分配階層關係等（李景鵬，2008）。若依利益結構中的受益主體為標準，合作關係就可具體區分為雙方受益和單方受益的利益結構。雙方受益的利益結構，是指利益關係主體互為對方提供資源，雙方都在該利益關係中獲得利益實現的狀況，其典型形式是買賣關係。另一種是建立在法律上要求的單方受益的利益關係，這大部分情況是因國家機關的活動是通過它的工作人員來完成的，所以與一般主體發生直接聯繫的是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並充當國家機關的代理人的角色，基於防弊而形成單方利益的結構。這雙邊合作關係中利益主體的分享模式，就成為合作關係維持或轉化之結構基礎。

### （三）社會實踐的利益矛盾

單方受益的利益結構通常是基於法律要求，原本目的是針對合作中可能的違法，以及消除違法的特殊措施賦予法律的正當性。在單方受益的利益結構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所擁有的酌處權（也稱自由裁量權），卻直接影響權利人利益實現的效益。這種酌處權同時意味著義務的不確定性，並影響利益實現的不確定性，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力也可能轉化為個人利害（葉富春，2004）。這種不確定性和權力不對等，就成為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過程的矛盾和衝突因子。

由於經濟、科技的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利益資源的也不斷增多，客觀上片面要求單方利益結構已不符實際。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不但是社會利益結構變遷的過程，也是一個政治發展的過程（葉富春，2004）。長期以來，臺灣福利服務供給量能不足，即可反映非營利組織對方案合作利益分配的整體

態度。國家經費委託契約因而應重視其合作關係的利益分配結構，有效地調節整個社會利益資源狀況的配置，從而促進整體福利服務的發展和公共財的增長。葉富春（2004）認為要解決利益結構的衝突問題，一方面是要對酌處權做出限定，對其運用及運用程式的條件儘可能做出量的描述；另一方面，從行為動力原理出發，非營利組織不像國家機關直接握有保證利益實現的國家權力，必須為他們提供有效的和低成本的法律救濟措施；特別是社工專業組織若欠缺自主，連帶地也會限制和削弱社會工作者專業角色的發揮，自然也會降低其所能生產的專業價值。因此從實際合作經驗中，探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關係中潛在的利益分配矛盾，也具有重要的反思意義。

## 參、社會實踐的研究取向

### 一、社會創新和行動研究

在行動的意義上，「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對於台中市政府、對於福氣協會，都是一種創新的嘗試。蕭新煌（2012）認為「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是目前熱門和超夯的概念和話題，社會學更被期許以社會創新，貼近、掌握和創新社會，創造更好社會的真實烏托邦」。儘管從韋伯的理念型來看，烏托邦只是一種現實社會的對照，最多或許只能趨近而已。但不可否認的社會學者似乎愈來愈被期待要實際參與創造。然而，如何實際執行，則需從其概念意義做進一步的思考。Howaldt & Schwarz 認為創新是提供未來變遷發生的新因素組合，更是一種干預設計，企圖去啟動和建立新的技術、經濟、地位之社會實踐（Howaldt & Schwarz, 2010）。在具體做法上，Schneider（2006）關切如何引入

社會資本角色，透過社會關係和信任模式，建立使服務對象可獲得資源的進入管道。從這種社會創新角度來看，社區工作創新的嘗試，涉及建構一種政府、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間的新社會資本，從而引動在地經濟資本、人力資本、文化資本，提升對社區所需的服務量能。

從概念意義來看，每一種創新都有他的到期日，當一種新技術或有效的社會實踐被整合在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中、團體或制度關懷裡，它的獨特性和創新性就消失了（Howaldt & Schwarz, 2010）。本文所聚焦「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的推動經驗，從 2011 年連續執行至今；而推出後第二年即受到內政部肯定，並鼓勵各縣市政府參考辦理，台北市政府也隨後跟進。因而本文認為若從社會創新來整理此一方案的推動經驗，恐怕會引發不必要的創新程度之爭論，模糊社會實踐的行動意義。

若從社會建構觀點來看，這樣的社會創新並非一種外在於人的社會實體，而是情境中的行動歷程；故以研究者參與動機和其分析意義，比較貼近行動研究取向。陶蕃瀛（2004）認為行動研究是集研究、教育和實踐於一體的增強權能之行動，其分析運用可處理助人專業日益重視增強服務對象之權力地位與公民權力之課題。陳東升（2012）認為社會行動者行動目的是依據平等、互惠與合作的社會治理模式，及所生成的微視面和鉅視面的作用機制，持續在社會互動和特定歷史及社會情境中建構強互惠的社會稟性，以創造公共利益。因此「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的推動，無論從政策目的或福氣協會參與動機，大抵都符合助人專業欲增強服務對象權能之行動特質，故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方法來描述此社會實踐的行動經驗。

## 二、行動研究和研究問題

陶蕃瀛（2004）強調行動研究要在實踐行動中，找研究問題、研究者的位置、與研究對象的合作信任關係；分析資料時，則要持續地反觀而常見研究螺旋的特徵。在行動研究中有兩個主要的課題：1.行動研究是行動者自主的研究，強調行動者對其自我、對自我所處之社會位置、對自己的行動、對自己行動所產生之影響所進行之自主研究。2.行動研究是因為實踐者尋求自主和促成社會正義之社會實踐需要而產生，要將自己從知識生產的霸權中解放，以積極促進社會正義的社會運動實踐，故以實踐社會正義為職志。Jackson（2008）認為社會實踐鑲嵌在廣泛的社會脈絡，需意識到創意實踐者和社區間的民主關係，還有專家和非專家間的知識分享。因社會實踐包含差異的評價，正如對分享理解和同理的需要，而應聚焦在技巧、知識和理解人們所擁有之私人、家庭、社區和工作生活。這兩種觀點揭橥了行動研究關鍵的議題與價值。

綜合前述行動研究的關鍵議題，本研究分析議題便著重描述「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創新方案的目標設定、行動位置、行動策略、行動利益的分享與矛盾，並據以探討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合作關係的基礎和轉變，以提供公私部門、實務工作者在建構公私部門合作平台時的參考。

## 三、研究資料的取得

本研究使用的質性資料，包含組織間互動的文件，有歷年台中市政府之「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計畫邀標書、福氣協會之「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執行計畫服務建議書、成果報告書，都是研究者擔任計畫主持人時經手的一手

資料。至於參與者的訪談紀錄或會議記錄稿，則是經育成中心工作人員過錄後轉交的記錄資料，主要對象有社區理事長、市府官員、育成中心督導和工作人員。資料記錄時間長達三年多，訪談記錄數量不少，不另列表詳載，文中僅依其職稱摘述之。

## 肆、行動發現與討論

### 一、方案的目標

#### (一)「誰說的算？」：目標的設定

##### 1. 「政見承諾」：委託單位的方案目標

「臺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是市長因應縣市整併需求所提的政見之一，目標為集中有限的資源建立一個全市性社區工作的資源整合平台和陪伴機制，以活化社區機能，落實健康社區六星計畫、社區營造及社區自主參與。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做為方案委託單位，方案的執行就是落實政見的承諾。根據100-102年度社區發展育成中心執行計畫書內容，100年服務目標：建構「臺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組織「社區發展育成諮詢顧問小組」、辦理臺中市的第一階段社區需求盤查、辦理社區發展人才培訓課程、建構社區支援輔導機制、推動榮譽社區的評鑑機制。101年服務目標：延續「臺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之運作機制、推動社區發展工作之輔導及資源整合、推動社區陪伴制度，引發社區自主能量。102年服務目標：規劃辦理社區發展工作聯繫會報、規劃並發展社區培力輔導機制、推動社區發展資源整合。

綜合前述委託單位的方案目標，即建置一個促成社區發展的資源與機制整合平台，作為公部門與社區間之聯繫、協調窗口，並協助推動社區發展資源之整合工作，有效地提供社區發展過程中所需要的引導或支援。主要服務項目可歸納為：一、建立全市性社區及社區組織之基本資料，掌握社區組織特質，發掘地方社區資產，匯集地方意見及社區需求問題，作為市政府擬定及推動社區發展政策之參考。二、組成「社區發展育成諮詢顧問小組」，結合社區發展育成專案服務員之專業服務，建立社區與政府部門的聯繫機制，並推動社區陪伴制度，提供社區發展策略、培訓和輔導活動，厚植社區服務知能，以凝聚社區意識、發展地方特色，落實社區的永續發展。三、結合社區發展評鑑制度和成果，選擇成果優良的榮譽社區作為陪伴社區的示範學習點（社區），透過參訪、社區發表會等活動，發揮帶動潛力社區，促進社區多元互動特色。四、強化社區服務資源平台功能，內容涵蓋會務管理及社區業務發展相關計畫方案、社區發展資訊 E 化、社區發展成果活動辦理，整合呈現臺中市社區發展成果的豐富與多元，展現社區生命力。

## 2. 「一兼二顧」：受託單位的方案目標

福氣協會成立時，強調為重視社會使命及永續經營的非營利組織，帶著關懷社區以及高齡者生活的理念，期望能藉由有效動員、審慎使用各類社會資源，擴大社區參與機會和社會資本，以達成自助、互助和助人的社會理想。由於協會之創立宗旨、發展方向，以及研究者實際推動社區培力經驗的親近性，協會自許能有效推動「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創新計畫，扮演社區發展積極推動者的角色。福氣協會做為受託單位對「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方案目標，一方面是著眼能運用社區輔導培力的創新機制，透過社區發展經驗的經驗交流、傳承與輔導，達成凝聚社區意識、動員社區資源、推動地方發展，增

進社區居民生活品質與福祉，將可落實福氣協會的組織宗旨與發展方向。依徐震（2007）社區發展與社會福利關係的觀點來看，這種行動立場是將社區發展作為一種地方性的綜合福利服務建設、一種推動社會福利的方法，目的為透過支援協助、社區自助，強化社區服務載體的組織性、範圍性、多元性。所以是一種運動、方案、方法和過程。

另一方面，此方案所提供之專案人力和行政管理費用，可用以緩解協會發展的人力、財務需求壓力。協會承接此一社會創新方案的另一目標，即著眼於兼顧非營利組織存續所需之社會價值、經濟產值。

### 3. 「買菜要蔥」：買方的目標設定權

方案委託下的非營利組織和政府之合作，是以政府邀標書所要求之服務事項為依歸，方案目標的設定即按執行計畫邀標書所載之委託服務事項和績效評估為基準。然而，在「台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委託經驗中，卻還明顯感受到服務目標設定是一系列片面規範的討價過程。首先招標時，投標單位要先提出比邀標書更為具體、內容更為豐富的服務建議書，證明具有執行此項服務能力；然後服務目標除要能達成邀標書載明之委託服務事項外，還被要求敘明額外的服務回饋方案；這是書面上的討價程序。其次，進入方案評選階段，由市府找來的審查委員（電腦篩選）會「客觀的」站在委託單位的立場，要求投標廠商應該就服務目標做出更詳細、更豐富的承諾；這種看似中肯的專家意見宣說，本質上卻是向外請幫手的一種討價程序。等到方案議約時，市府承辦官員還會盡責地遊說，希望最後簽訂的服務驗收項目，能比邀標書更貼近其服務理想。最後服務目標還會納入未來方案進入執行階段後，受託單位應協助委託單位解決相關業務難題的「道義」責任。研究者參與本方案評選時，曾遇到一位專業背景為景觀設計的評選委員，因不理解方案以臺中市全體社區發展協

會做為培力對象的重要性，而逕自宣說服務建議書看不到具體的成果與亮點，並要求應提出更令人滿意的成果和回饋機制。研究者會後即對此事有以下的紀錄：

受聘於公部門的社會福利服務評選，應從被評選單位條件與既有表現、方案涉及的對象、欲解決問題複雜性、經費充裕度做整合性地充分思考，這才能貼近社會事實。評選者如果不瞭解 NPO，而將 NPO 當成廠商，並以受雇於政府角度，既要求滿足契約所定事項，還要求要有足夠好的回饋機制，還要詳列各種策略做法（特別要符合他自己的想像）。殊不知服務事項一旦天真亂列，簽約後的 NPO 將陷於政府派遣角色與危難之中。這樣的評選者（特別是本身可能從未投身社會實踐）就淪為職業評選者之流。結果是剝削 NPO，就像剝削年輕人，既削弱社會的理想性格，也削弱未來的希望。（行動研究紀錄 2012.12.25）

根據福氣協會三個育成中心方案投標的實際經驗，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關係，若從方案目標的設定過程來看，不但不像夥伴關係，本質上更接近市場上買菜者的討價行為，買青菜先挑選、再殺價、買好再要蔥。這樣的社會創新，最後還是以權力為依歸，非營利組織若欠缺政治敏感度，原本「一兼二顧」受託單位的方案目標應只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 二、行動的結構位置

「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角色，一開始就被設定為社會局對社區發展協會所提供輔導的工作平台。中心要產生行動的功能前，基本上得先成為多方互動的橋樑。正式業務的推動後，中心開始帶出了與福氣協會、社會局間，與社會

局和區公所間、區公所和社區發展協會間的中介角色。在社會情境的實際互動裡，中心行動的結構位置便帶出其多重隱而未顯的角色關係。

### （一）「契約委託下的媳婦」：處於社會局和福氣協會之間

按專業說法，在「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方案中，福氣協會與台中市社會局應是夥伴關係。在中心的業務推動前，福氣協會得為中心選定場所、招募和訓練員工、規劃和推動活動、並得先自行預支相關活動費用。在邏輯上，中心員工原本從屬於協會的體制；然而，中心建置完成後，工作人員工作內容、福利都得按社會局規定辦理，並限定為中心專職人力。換言之，中心即與福氣協會成為不直接轄屬之關係組織，而變成社會局委外的派出單位。在這樣社會創新方案中的工作人員，感覺是福氣協會的員工，卻要依循社會局的規範和要求，相關工作內容、工時、待遇福利經常都需要溝通協調，中心因而成為委託契約下的媳婦。不過，因為研究者既為理事長，又為中心兼職主任，藉由日常業務的協調及督導會議的統合，尚可有效地解決中心的媳婦角色困境。

然而，依委託方案的契約內容來看，福氣協會作為承攬契約的廠商，除依規定完成計畫內容外，並應接受委託單位之監督、輔導、考核及評鑑。因為委託方除了具有交易中買方購買的審核權外，還保存屬於權力關係上位者的指導權，以及委託案的驗收權。透過這規範性的委託契約關係，福氣協會為滿足社會局對方案事前和事後的要求，連帶也影響到福氣協會的自主性。雖然台中市政府官員素來對研究者相當支持和友善，但做為協會理事長，的確感覺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夥伴關係難為。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行動位置鑲嵌在重疊的服務關係之中，其中以社會局與福氣協會間的權力關係影響最大，而直接影響了行動的實踐和結果。

## （二）「行政體制間的傳聲筒」：處於社會局和區公所之間

目前社會局和區公所雖已同為台中市政府的單位，但因過去縣市合併前，鄉鎮屬於基層民選的政府部門，所以縣政府與鄉鎮間雖有行政轄屬關係，但權力關係實際上並不緊密，甚至政治立場上還可能存在對立；因而社會局多僅以行政協調的模式推動政務。對社會局而言，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中介地位，具有聯繫兩造間的積極功能，並成為社會局掌握各區社區發展概況的重要確認機制。對公所承辦人員而言，社區業務多通過里辦公室、里幹事進行，過去只是被動配合其社區發展協會的經費申請。故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出現，可能是整合社區業務、促進社區自主發展的聯繫機制，但也可能只是多出增加聯繫業務的一個民間承辦單位。有一位公所課長在一場聯繫會報後，就很不客氣地告訴社工督導：

「你們這些接政府方案的民間單位，把自己份內的事處理好就好，不要管太寬，沒事給我們找事。」（訪談紀錄稿 B：4）

然而，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成立後，一方面社工聯繫傳遞服務訊息和技巧，重現了社區發展工作的重要性；一方面透過區公所連繫會報，讓幅員遼闊的大台中，公部門的行政體制間關係變得更為緊密。

## （三）「調和矛盾的潤滑劑」：處於區公所和社區發展協會之間

縣市合併前，鄉鎮公所和社區發展協會間關係是複雜的。在政治上，社區發展協會本身就有凝聚政治動員力量，公所對社區發展協會通常採取懷柔策略，以提供有限的活動經費來維持關係。但當政治立場不同，資源分配難免有別，甚至社會課和村里幹事服務也不盡相同。縣市合併後，這種政治氛圍多少還在，因而各社區發展協會的發展環境一直很不相同。此外，銜命辦理社區工作的區公所業務承辦或里幹事，往往非社會領域背景，在推動相關業務時，除

了以長官意見為依歸外，本身對社區發展協會的價值和業務處理技巧差異甚大，因而與社區關係可以很密切、或很疏遠、或很緊張。一位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社工就提到：

「與區公所合作常會遇到的困難狀況是，每一年公所社區業務承辦人的調動，或有部分接任人員尚未到職或是尚在交接中，暫由職務代理人處理社區業務，當人力調動頻率高，新任的工作人員對於社區的掌握度不足，可以提供的訊息就有限。」（訪談紀錄稿 E：2）

至於社區發展協會遇到新、舊幹部交接時，不但常面臨志工人力流失，甚至社區經驗傳承、社區資料轉交也都會出現斷軌的現象。一位社區理事長就反應常聽到的心聲：

「前任理事長交給我的就只剩社區印章，其他社區資料不是遺失，就是分散在其他幹部手中，因為改選沒有繼續擔任社區幹部，也就不願意將自己做的資料傳承下去。」（訪談紀錄稿 E：1）

對於區公所不熟悉業務的新進承辦人員，或處於基層政治緊張或傳承不順的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發展育成中心就不只是關係的中介角色，而是具有支持和傾聽的服務功能。

### 三、專業服務的提供與行動的價值

「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專業服務，得以服務建議書議約後所要求之服務事項為驗收標準。因此中心的行動價值，就要從其問題辨識、行動策略，以及在台中市全體社區推動的專業服務來落實。

### （一）「培力誰？」：問題的辨識

近年來社區工作雖已重視社區的自主意識與力量，強調由下而上的社區意識，然而，過去社區組織多數仰賴政府部門資源，社區組織運作經常的觀念是「有多少資源，做多少事」（王仕圖，2007）。隨著社區發展工作之法制化，各社區能否提升爭取與執行能力，有效的取得與運用各單位及資源的挹注，以回應日漸複雜的福利需求及社區問題，及提高社區自主性，成為社區發展之重要指標。由於社區發展工作是一動態的推動過程，繫乎社區的行動能力，如釐清社區問題、規劃行動策略、獲取所需要的資源，甚至能突破對政府部門的權力依賴關係。紀金山（2011）認為組織載體是社區行動能否維續的關鍵因素，社區發展工作的落實因而需要仰賴成功的組織化歷程，社區培力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強化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體質。吳明儒、王仕圖（2009）認為中介團體對於社區組織的促成及發展十分重要。中介組織在政府部門與社區發展協會之間，作為社區服務資源平台，扮演橋樑資本（bridging capital）的角色，以整合社區發展資源，提供社區發展過程中需要的引導或支援。

「臺中市社區發展育成中心執行計畫」主要目的是為建構臺中市社區工作的基礎架構，針對臺灣社區工作長久以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社區發展情況不一、延續性不足等問題，市府官員和工作團隊在服務之初皆有相同的共識。因此這項創新服務，在確認服務對象時，就放棄一般採用優良社區的亮點輔導策略，而選擇難度高但工作意義感更大的普及策略，踏實地以台中是全部的社區發展協會為服務對象。市府承辦科長在聯繫會報中提到：

「真要做成育成中心，就是要把那些會務沒正常運作，或者班隊活動沒在動的，都希望能夠讓他動起來，那這樣育成中心才有意義。（聯繫會報紀錄稿 1：2）

在這樣的觀點下，中心得貼近各社區的發展需要，研擬多重服務實踐機制，依其狀況分別服務。例如針對在孕育階段或剛起步的社區發展協會，給予必要的扶持，培養社區自主意識，累積發展能量；針對已經卓有成果的社區，則形構在地培力的擴散機制，給予必要的資源，讓社區在競爭且多變的環境中，仍能穩定的茁壯與成長。

中心扮演社會局、公所與社區之間積極的中介角色，藉專人專責單位的設置，結合專業團隊建構臺中市社區輔導培力之創新機制，有效運用與整合社區發展資源，提供社區發展過程中所需的會務、人力管理與方案運作知能的培力工作，以擴大社區發展能量。這種以每個社區為主體的服務對象選擇，反映出工作團隊的社會創新價值取向和勇氣，及務實的服務規劃。

## （二）「貼近社會脈絡」：行動策略的擬定

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工作規劃，是根據社區協會的組織特質、資源條件、與政府的合約績效，並考量全台中市社區發展脈絡，特別是關鍵的數量、區位、類別，而漸次擬定此方案服務的四大行動策略：

1. **分區專責：**育成中心為了貼近社區需求，形塑在地的支持力量，將臺中市所有的社區發展協會，依過去臺中縣、市習慣的區域劃分方式，分為山線區（9 行政區 / 171 社區）、海線區（8 行政區 / 143 社區）、屯區（4 行政區 / 98 社區）及都會區（8 行政區 / 182 社區）等四區，並以分區專責服務方式，各分配一個專案社工員，以掌握區域發展概況，提供較為即時與適切的服務，並瞭解各社區發展概況、評估及界定社區問題。
2. **量能分級：**中心社工透過面訪完成各社區發展概況的調查工作，以取得可作為整體業務推動與服務發展評估的社區實際資訊，並依社區會務、計畫和班隊推動狀況做為「社區分級」的指標，而區分為停滯型（會務運作不

正常或已停止，或無發展 6 星計畫亦無社區班隊組織的運作）、起步型（業務發展程度低，有發展 6 星任一面向的計畫但無班隊運作，或是僅有班隊運作但無發展 6 星計畫）、發展型（業務發展程度中等，發展面向涵蓋 1-3 星以上，且至少 1-3 種以上班隊建置）、進階型（業務發展程度高，發展面向涵蓋 4 星以上，且至少 4 種以上班隊建置）等四種社區級別。然後根據各分級之行動量能狀況，擬定不同的服務主軸：停滯型為通報、會務輔導；起步型協助推動社區調查、發展方向討論；發展型為提供各局處（含六星）計畫之申請、撰寫諮詢、專家輔導引薦、資源轉介；進階型則邀請加入輔導團隊、擔任培力師資、參與座談分享、社區實地輔導工作，並鼓勵發展聯合社區旗艦團隊，建立社區培力擴散機制。

3. **分類深化：**社區發展量能要依賴社區組織的分工與健全，故須兼顧社區會務運作與業務發展兩類工作。其中，會務運作的輔導涉及中心如何運用社會局、區公所對組織正當性議題，而需以社區發展協會、區公所為服務對象，如推動各自的聯繫會報，分類深化會務輔導效果。業務發展則必須納入多元面向與專業的考量，如辦理能力培訓課程和參訪活動，規劃辦理在地社區發展工作坊，推動實務工作者輔導團隊到社區服務，結合在地有經驗的社區工作者提供駐地輔導，實際推動業務深化工作。
4. **資訊整合：**社區幹部受限於多為志願性人力，對於政府推展的社區相關業務規定，或服務活動的資訊，不容易有全貌的認識，或者即時性取得的能力。本中心積極蒐集相關社區資源和服務資訊，建構起全面性社區資訊交流的平台：社區發展資源網。此一資訊平台的建置與維護，有效促進社區對於會務運作、業務推展的認識、評估與規劃。

### （三）專業服務與行動成果

#### 1.執行各項委辦業務的專業服務：

**個案社區的聯繫與訪視：**要落實支持與陪伴社區發展的任務，首要是對社區資訊的掌握度。社區發展育成中心藉由社工員到個別社區進行實際訪視，掌握全市城鄉社區發協會多元態樣資訊，以推動符合社區需要的服務機制；並提供和引薦社區所需的服務內容。

**個案社區需求的蒐集與分析協助：**社區發展受到外部環境因素、本身資源條件影響，中心提供社區調查問卷和分析資源，以及專家和社工的諮詢，協助社區可以具體評估並規劃發展。

**整體課程與參訪的規劃推動：**中心規劃、宣傳和提供社區發展所需的一般性培力課程或觀摩活動，包含倡議、宣揚社區精神、社區經營和管理的課程規劃，強化社區相關幹部、志工對於社區工作的認識、投入與技能等課程，並透過實際觀摩績優、特色社區活動的辦理，啟發社區人才的想像力和資源連結動能。

**學者專家到訪的引薦及駐地服務：**社區發展工作具有多目標性、綜合性等特質，其橫跨的領域與專業亦相對地複雜、多元。因此引入學有專長的學者，以及已具成熟社區發展經驗的在地專家分享社區發展經驗，是重要的社區支持做法。駐地專家輔導制度透過相似區位脈絡的專家分享與交流社區發展經驗，協助鄰近社區釐清和學習社區發展方向與資源動員。

**地區公所角色的導入及服務：**健全的社區發展協會立基於正常的會務運作，而社區的會務運作若涉及複雜的地方權力與派系角力的問題，或社區會務不正常或停滯時，有賴引入在地區公所的力量，以協助組織重整或帶動會務。服務方案特別辦理區公所聯繫會報，定時提供各區的發展協會發展概況，以及

社區發展資源，使得區公所承辦人員有著力點，再積極推動區內社區發展協會的工作會報或工作坊。

**社區發展資源網與服務成果的整合：**政府各部門有許多社區相關的業務規定和補助方案，志願性的社區幹部很難取得相關資訊或有全面掌握。中心社區發展資源網的建構，透過廣泛蒐集相關社區資源和資訊交流分享，落實資訊平台的功能，有效促進社區對於會務運作、業務推展的認識、評估與規劃。中心於年度終了前，辦理全市社區發展成果展，促進社區分享和學習。

## **2.執行各項委辦業務的行動成果：**

**輔導服務的貼近需求和落實：**中心根據實際的訪視、社區主動的聯繫管道，引薦專家學者到訪輔導服務，並有駐地專家開發之在地輔導數量，每年皆符合預算編列場次數，大約在 200 場。輔導服務的類別若按主要輔導內容區分：會務輔導（含各式文書資料建檔整理、社區幹部或志工團隊組成管理等相關議題）佔 37%，財務（含社區帳務、報表製作以及計畫經費編列與核銷）佔 22%，計畫方案業務（含中央到地方各部會所推展之相關業務計畫申請的輔導）佔 41%。

**整體課程和參訪的廣泛參與：**中心開辦的培力課程數量，每年皆能依契約規定開辦完成，總參與人次皆達 300 人次以上。中心籌辦的社區參訪活動，根據項目經費的上限規定，每年皆有 4 個場次，參與人次皆有 300 人次左右。許多社區都能從這些分區辦理的一般性課程獲得基本的知能，相對有效地提高方案的服務效能。

**社區方案規劃及執行力的提升：**本中心以市政府社會局提供之「關懷福利社區培力補助方案」為主題，規劃辦理了計畫撰寫與推動經驗分享座談活動，以鼓勵社區投入福利社區化的推動，結果 102 年促成了 64 個社區提出 78 個申

請案，其中有 57 個社區共 66 案獲得通過，有效地提升社區執行方案的能力。

**社區運作量能的等級提升：**100 年經各公所提報會務運作不正常或已停止活動的「停滯型」社區有 59 個，101 年中心完成實際訪查統計則有 144 個，這種現象顯示公所提報和實際狀況有別。102 年隨著服務導入及與各區公所共同推動輔導任務後，會務運作不正常或已停止活動的社區數降至 82 個。其次，中心推動各項輔導機制後，起步型社區也逐漸升級為「發展型」。102 年臺中市有穩定的班隊活動與計畫推展的「發展型」和「進階型」社區數，更提升至 415 個，佔全體協會總數的 77%（如圖一）。可見中心業務推動有效地協助台中市社區發展協會進入更普及和深化的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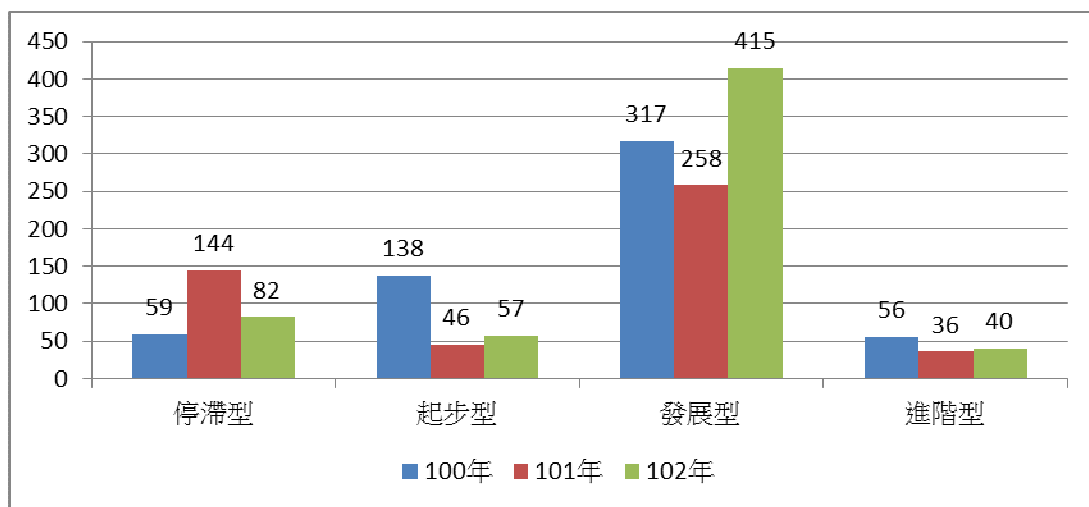


圖 1：社區運作量能的等級變動圖

**社區發展資源網與服務成果的整合：**本中心建置與持續維護「社區發展資源網」資訊交流的平台，透過廣泛蒐集相關社區資源和資訊交流分享，有效提升社區幹部對於會務運作、業務推展方向的認識、評估與規劃。每年年度終了前，中心則辦理全市社區發展成果展，促進社區分享和學習。

### 3. 委託單位對各項委辦業務執行成果的評價：

委託單位台中市政府，一直很重視此方案的推動。而在正式會議報告中，市長和局長對此方案服務結果，都有很高的評價。市長的評語為：

「本府於 100 年 8 月成立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結合專業團隊協助輔導各社區發掘優勢與資源，提升社區在會務運作、社區工作之規劃與執行面向之能力，二年多來努力推行，確實有效發揮本府、區公所及社區間溝通平台，同時透過社區培力輔導策略，讓社區能力普遍獲得提升。」（102 年度全國走動式績優社區觀摩活動大會手冊：5）

局長也提到：

「自 100 年 8 月起創新成立社區發展育成中心專責單位，擔任公部門與社區間中介角色及資源功能，積極發展及運用社區培力策略，....藉以深化社區自主發展潛力，共同推動社區發展特色，促進社區永續發展，方案推動至今成果斐然。」（102 年度臺中市社區發展成果展手冊：3）

## 四、實踐利益的分享與矛盾

三年來此項社會創新行動，完成了服務委託契約的各項項目，這些服務也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產生各項實際的利益。然而，這些行動針對不同社會脈絡所產生的利益，通常只能因循著各種因緣進行分配，行動研究的反思特別聚焦在其利益分享與分配矛盾。

### （一）行動利益的分享：

行動的相關利益關係者是接受服務方案的行動結果及正面影響之相關組織和個人。這些分享行動利益的主要組織，包含了各社區發展協會、區公所、市府社會局、福氣協會等。

#### 1.社區發展協會：補強弱點、健全發展

臺灣各項社區業務的推展都高度依賴在地的志願人力，因而社區組織經常會出現志願不足的失靈問題。育成中心成立後，藉由整理社區發展資源、提供培訓課程、引薦各種會務、財務、業務的輔導知能，這些行動最直接的效益就是促進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健全發展。通過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服務及一系列的輔導活動，無疑給了有心營運的社區發展協會立即且重要的協助。兩位發展協會理事長的說法，可說明中心對社區組織的服務效益：

「當初社區剛起步時，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還未成立育成中心，當他第一年接任社區理事長時，完全不瞭解什麼是計劃書、怎麼撰寫，而第一份計畫書還是四處詢問而拿取。在他眼裡，現在的社區發展協會是好運又幸福的，有任何不瞭解的地方，皆可直接詢問育成中心。」（訪談紀錄稿 C：2）

「有那麼多的資源可以運用，又有其他前輩的指引，我們省下很多時間和心力去摸索，讓我們的幹部更有概念，也讓我們社區發展更有目標。」（訪談紀錄稿 B：1）

#### 2.區公所：厚實服務能力

台中市社區發展狀況的掌握，過去只能原本仰賴各區公所。然而 29 區區公所的承辦人員，不見得有相關專長或背景，且常因職務調動，因而使得政府科層體制本身也是社區發展工作的不穩定因子之一。因而本服務方案在推動第二年後就把各區公所也納入服務對象，中心積極透過聯繫會報，導入社區發展業

務的多方資訊，引薦更多外部的支援與協助，使公所承辦人得以充分發揮業務單位作用。在服務初期因不理解中心的功能和價值，前面述及曾不客氣地要求社工督導不要管太寬、沒事找事的公所課長，在目睹育成中心會先瞭解對方的困難點，再提供相關協助，且能有持續性的服務後，也願意回饋公所的服務能力。因而到了後期，彼此間已能發展出信任和更緊密的關係。一位社工就提到：

「經過一年多的互動瞭解，同一個公所甚至願意動用公所經費主辦業務宣導座談會，並由中心擔任協辦即可，中心除了投入人力和前置溝通成本與時間外，公所免費提供場地、講師、手冊等行政資源，並預留時間讓中心到場介紹，讓中心打進該區。到了後期，我們可以看到公所對於社區業務推動原來還是有許多想法與熱忱，過去的排斥，只是因為社會局過去總是會臨時增加公所的行政負擔。中心是受社會局委託，所以被視為是打手，難怪對方不願與中心互動。直到今年，在協助社區工作上合作愈來愈愉快。」（訪談紀錄稿 B：4）

### 3. 市府社會局：提升政策量能

台中市府社會局推動這個方案，得以引入福氣協會組織的社區培力理念及倡議，而具體提升社區工作政策量能，以發揮健全社區組織體、提升社區發展工作能量，並連結提供社區生活環境、文化特色、產業經濟、福利照顧的發展資訊之普及成效。社工督導就這樣認為：「原本與社會局共同討論培力活動的誘因機制時，除履約事項外，若想結合其他相關補助計畫，往往都需呈報上級再行研議。但我們認為社區發展各項計畫的推動或許看起來是花花綠綠的，一旦政策沒有整合性的規劃，推展實效可能只是虛耗公帑。所以我們作為中介平台，雖然致力完成履約事項，但還是會盡量投入落實、倡議整合性的社區工作平台和計畫。這樣慢慢地，社區和公所也都會覺得這樣的政策很不一樣，不再

是放煙火、扛驕子，各項活動和聯繫會報參與情況愈來愈踴躍，逐漸發揮出政策的量能了。」（訪談紀錄稿 A：2）

縣市合併後，市府人員因大幅的調度與異動，社區各項業務資訊需要重加彙整。育成中心透過實際聯繫拜訪，逐步掌握和描繪出台中市社區發展協會的樣貌，並同步整合學者和實務工作者進行社區發展的培力工作，並吸納原本縣市間社區工作資源的落差，以及行政體制間的權力矛盾。一位公所承辦在與中心建立信任後，就對社工表示：「若育成中心需要該轄區社區相關資料，皆可直接向他詢問與拿取。把資料提供給我們，要比給社會局還有用。（訪談紀錄稿 B：2）

育成中心服務方案專責辦理全市社區發展工作和成果展，讓社區有了持續分享和學習的舞台，並在社區會務的提升、計畫申請和執行的普及、社區評鑑成績的亮眼之上，並於 102 年 10 月全國走動式績優社區觀摩活動普遍獲得參與的全國各縣市及社區之肯定，而充分表現方案對臺中市社區發展政策量能的提升成果。

#### **4.福氣協會：提升組織量能**

福氣協會作為初成立不久的非營利組織，有機會執行此一全市性的委託方案，其實有了很多收穫。藉方案執行首先獲得了行政管理費及設施設備的奧援，可解決福氣協會創立初期資源的窘迫情況。其次，很快提升了福氣協會與其他社區組織互動的正當性。再者隨著委託業務的推動，協會與市府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從契約工作內容的要求、建立更周延的業務溝通管道、到政策的意見徵詢與討論，逐步強化了福氣協會在公私部門夥伴關係的基礎。最後，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是一創新方案，服務初期雖然有些社區業務的規劃欠缺完整，業務執行做法也欠缺統合，特別是因合約載有「其他行政支援事項」，在實際執

行時，承辦單位總被預期要負起更多非契約業務規定之支援業務，使得協會在中心服務人員常忙得人仰馬翻。然而，這些工作壓力也激發組織和成員的服務成熟度。中心社工督導就認為：

「方案實踐過程中，「要做真的，還是作假的」，一直是福氣協會內部經常要面對的拉扯與考驗。就承接方案的我們而言，驗收項目並不完全符合社區需求，社區需要也不見得是委託方案可提供的。然而，我們卻得盡量拉近方案目標與社區需要的契合度，這些努力過程更具體反映為我們承辦單位發展方向的調整、成員專業素養和共識的提升，服務目標與組織價值間的平衡，更考驗福氣協會領導人對「人滾事、事滾人」的拿捏智慧。」（訪談紀錄稿 A：3）

## 5. 方案外部功能：吸收政策不滿

過去內政部的社會司，與現在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推動的社區發展與社區評鑑業務，都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主體。然而，社區發展協會基本上被認為是具有自主性，可獨立發文的人民團體；但社區發展協會相對於屬於基層行政組織的里辦公室，各項資源卻普遍不足，加上受地方政治態勢影響，自主性和行動能力不足，大多依賴公所直接撥付的小額活動經費來維持低度活力。這使得負有輔導責任的社會局人民團體科，經常得幫忙各社區發展協會解決營運難題，並運用有限的經費補助和會議活動來推動社區發展工作。縣市整併後，活動經費改採方案申請模式，對多數教育程度不高、以志工形式運作的社區發展協會而言，這是很困難的挑戰，而引發不少的怨言。一位社區理事長就曾拍桌、破口大罵：「XXX，我過去當過代表，以前只要去跟鄉長講幾句話，再叫我們小姐拿幾張收據去公所就可以拿錢，現在又要寫計畫和核銷，這對社區而言根本不方便。」（訪談紀錄稿 B：03）

社會局業務單位不斷接到各社區發展協會抱怨，溝通成本及壓力很大。中心透過社工聯繫、親自拜訪、教育訓練、聯繫會報、專家引薦等溝通機制，直接降低了社會局與社區間的摩擦，進而成為公私部門組織間的政策緩衝平台，這成為本中心方案的重要外部功能。

## （二）行動利益分配的矛盾：

社區發展育成中心的社區培力行動雖要以委託單位邀標書要求之服務事項為準，但行動卻是鑲嵌在委託單位、服務對象、專家學者的社會關係之中。中心各項業務的規劃與推動，既要滿足服務對象的期待，也必須滿足委託單位制定的績效評估指標和政績展現，並得盡量達成福氣協會本身的組織目標。行動利益的生產有其限制，也有一些其利益分配的矛盾：

### 1.委託與被委託之間：由上而下的目標設定模式

社區培力的邏輯，既要凝聚社區居民意識、健全社區組織體質、提升社區發展工作能量，帶動社區行動和互助的發展方向，就應該先尊重社區組織的自主性。然而，在方案採購的邏輯下，服務目標卻是由上而下的設定，其過程先是有委託單位邀標書的委託服務事項規定，投標時被委託單位提出的服務建議書得再敘明達成所載委託服務事項的執行方法、辦理方式，然後評選時再加入審查委員的意見。這種引用一般勞務採購標案的由上而下之目標設定模式，偏重方案成果管理及成本管控，低估了社會創新行動要貼近社會脈絡深化服務的難度，也欠缺服務對象表達實際需要的機會。解決目標設定模式的矛盾所在，可能需要節制買方權力，以創造更大或更有彈性的社會利益生產空間。社工督導就認為：

「社區自主意識是社區發展的基礎，但方案績效評估卻沒有這樣的價值標準，每一年採購招標的評選委員，也不見得能這樣詮釋方案服務，其實就連主

導方案的官員對此的期待也是模糊不清的。更常見的，跨局處的合作，大家都有自己的績效要顧，也都有自己的亮點培植策略或樁腳社區，然而社區發展協會與其他社團組織的不同，在於其有更深的在地特性，會員組成也可能更多來自於社區本身，各項業務的推展更是與社區整體息息相關。我們設定服務目標和落實工作時，還是盡量著眼社區組織健全發展，只是這種理想性格常會被誤認為沒有亮點，所以有點辛苦。」（訪談紀錄稿 A2：3）

## 2.在地的發展與耗竭：多元、虛弱的社區組織體質

社區發展是一種涉及多目標、長遠性、綜合性的社會事業推動過程。多元類型的社區發展工作，需要更整合性的政策資源與工作模式，然而臺灣社區發展資源卻是散落各處，因而社區發展的關鍵便是要有在地載體重新組織和動員。然而，社區發展協會這種志工型態的組織體質，往往對政府各類補助的運用有消化不良的問題。例如部分社區組織可能會為追求生存和營運資源，而申請太多計畫，虛胖結果，反而使社區志工力量耗竭；部分組織則偏重選擇財務效益高的計畫，而放棄社區有急切需要但補助少的服務，挑食結果，使社區不能循序漸進矛盾日增；這些都會影響了社區的長遠發展。社工督導認為：「政府各部會常各自為政，把社區當作各種服務績效展演的舞台，例如文建會的社區文化特色、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畫、內政部的福利社區化等。」（訪談紀錄稿 A2：3）

社區組織這種高度依賴志願者的組織虛弱體質，導致社區發展業務有著截然不同的面貌。對停滯型社區而言，關鍵就在領導人的欠缺或無心，若無法協助社區找出領導人，或進行會務改造，資源投入往往只是有去無回；解決之道便在於公部門（特別是區公所）協助導入仕紳和運用清理權力。對起步型社區而言，社區有著願意帶頭的領導人，發展初期的虛弱體質若有外來適時的培力，

最能產生進補的效果；即時的政策誘因與資源，就可能可協助其跳脫停滯困境。對已高度動員的社區而言，工作成果早受肯定，業務則往往超過志願人力所能承受的範圍，再發展甚至會提早耗竭。因此資源投入不見得總是特效藥，而是具有兩面刃的效果，需要審慎為之。

### 3.績效與緣分：成熟面對組織生命週期

社區發展育成中心作為社區培力的中介平台，並設定以全部的社區發展協會為服務對象，而不偏重以亮點培植或樁腳社區為績效所在。這種取向雖是落實和普及社區工作的關鍵，但也是最費力，最難快速收割的服務方式，其服務績效還得取決於外在的資源競合、地方權力角力之影響。我們積極為社區引入長期關懷社區的專家學者，並逐步發展社區實務工作者的駐地輔導。然而，此項陪伴服務需要對專家知識和績效限制有清晰的覺察；因為組織如自然人一般，也有生住異滅的階段。社區工作的真實行動，本身就應先意識到社會實踐不是上對下、菁英對世俗的助人過程，並且能有看待組織本質的成熟度。誠如社工轉述一位專家的洞見：

「當社區做的越好，越容易死的更快。因為人是比較的動物，前一任做太好，後面沒有人敢接，反而社區就逐漸萎縮，甚至泡沫化。」（訪談紀錄稿 B：05）

根據強化標竿社區的輔導效益反思，我們察覺到「起步型」和「發展型」社區相對容易看到培力的成果。相對地，「停滯型」、「進階型」社區的發展，則需要更多輔導機制的支持和整合。針對這種矛盾，解決之道是政府的績效評估應考量輔導動能和社區組織體質間的平衡。社區培力團隊則應抱持「成事在緣，不在能」的開放信念和實踐的成熟態度，將社區情境的複雜挑戰當成學習助人和自我成長的一個對境，藉此促進我們的專業發展。

#### 4. 培力與能力：誰來培力被委託單位

非營利組織接受政府委託推動創新服務方案，無論對其組織或個人，服務之初相關業務規劃和執行力一定很難到位。就組織而言，非營利組織與政府建立合作關係，得先具有行動初期的能力和資源。福氣協會在實際服務時，要能充分因應合約所載「其他行政支援事項」衍生之臨時外加的支援任務，如社區評鑑、全國走動式觀摩等，這使得協會和中心經常忙得人仰馬翻。以本方案經驗為例，早在參與本方案創新投標前，研究者即曾辦理過類似服務的經驗，且對委託單位期待之服務事項、服務對象所需之服務內容，及招標制度特質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才有信心可處理合作過程的不確定性。然而，研究者為了方案的順利推動，每週還是得進中心幾次，參與工作會議，並提供諮詢和情感支持，甚至還得親自打電話協調。這些都意味著這個社會創新方案運作的成功關鍵，在非營利組織本身得聚足服務能力和願意持續成長為前提。

以個人而言，資淺的社工通常欠缺社會經驗，若再未經適當培訓和支持，即想提供在地仕紳和資深社區工作者需要的培力服務，或及時面對回應跨專業或跨局處協調時的業務壓力與緊張情緒，其困難不言可喻。研究者曾主持一項座談時，北部某科長就提及他們聘僱三位專職人員辦理社區培力業務，一直有人力很難到位的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就反映該服務規劃，忽視了平台組織和人力本身的培力需求。以本方案經驗為例，一方面以資深社工擔任督導，逐日協助社工解決工作問題；一方面是研究者直接擔任兼職主任，每週以不定期參與工作規劃與執行討論，每兩週則以定期工作團督方式，反覆進行問題解決、行動策略和行動反思。

因此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建立合作關係時，公部門應顧念非營利組織任務繁重、損益難平；若不能及時支持和充分提供培力資源，還不自覺採取類似商業

交易的討價還價、要求片面回饋，那麼雙方合作意願和信任關係勢必會逐步瓦解，既傷害了非營利組織的永續性，當然也導致社會公共財的折損。

## 伍、結論：行動成果、合作與挑戰

社會創新的實踐價值，在於通過行動及其衍生的學習過程，帶來服務成果及行動智慧，除有相關合作的成功經驗值得分享外，也有其結構性的限制與矛盾有待突破，並帶出這是後續行動挑戰之反思。

### （一）行動的成果：

**1.價值主張：**本方案的創新之處在於對問題的重新辨識，行動價值設定一開始就放棄各局處習慣採用的亮點輔導策略，並回歸社區工作所重視的社區自主意識與力量，而選擇更有意義但難度高的普及輔導策略。這種回歸意義本質的行動，是以每個社區為主體，建構多元服務的基礎架構，形塑社區培力的創新價值。

**2.務實策略：**行動方案考量影響全台中社區發展協會運作的主要脈絡因素，如數量、區位、類別，務實擬定出分區專責、量能分級、分類深化、資訊整合等四大行動策略。首先是編配各區專案社工員，確實掌握各區域社區發展概況；其次依社區會務、計畫和班隊推動狀況，區辨停滯型、起步型、發展型、進階型等社區級別，而提供不同的輔導服務；再者針對社區問題狀況的解決關鍵，推動符合對象需要的輔導工作；最後建構社區資訊交流的平台，彙整社區資源和服務資訊，有效促進社區對於會務運作、業務推展的認識、評估與規劃。

**3.業務執行：**中心根據契約書各項委辦業務及前述行動策略，主要業務執行模式落實貼近社區問題和需求特質，採取包含個案社區的聯繫與訪視、個案社區需求的蒐集與分析協助、課程與參訪的規劃推動、學者專家到訪及駐地服務、公所角色的導入及服務、社區發展資源網與服務成果的整合。隨著多重業務執行模式的持續推動，中心逐漸發揮橋樑角色，社區政策、人員及業務互動日趨緊密，社區培力成果日益明顯。

**4.行動利益：**中心服務行動具體落實後，產生了社區服務和輔導效用，包含促進課程和參訪的廣泛參與、提高各社區計畫規劃及執行力、提升整體社區發展協會運作量能的等級、整合社區發展資源成果。這些社會行動利益分享給社區發展協會、區公所、委託單位、承辦單位等相關利害關係人產生直接的正面影響；行動成果促進了社區發展協會的健全發展、厚實公所的服務能力、提升市府政策的量能、也提升福氣協會的組織量能。

## （二）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合作特質

**1.以政府權力為合作基礎：**在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方案中，目標設定當然包含了委託單位的政策想像、受託單位的執行規劃，然而，當雙方目標有歧見時，「誰說的算？」最能看到合作的權力關係。根據方案目標設定過程的經驗來看，無論是政府邀標書的服務事項要求、服務建議書要求有服務回饋方案、方案評選階段增加委員審查意見等，都很接近「買菜先挑選、再殺價、買好再要蔥」的買方討價邏輯。這顯示這種規範式契約的合作關係，還是建立在政府方的權力之上，而非如「夥伴關係」所期待能體現對非營利組織的培力效益。非營利組織若想藉公私合作獲得發展，應具備這種政治敏感度，否則從合作實踐中充權多少只是天真的幻想。

**2.合作位置的中介特質：**社區發展育成中心是介於社會局、區公所、社區發展協會和福氣協會間的互動橋樑，在多元的互動情境中，其組織角色期待自然是高度複雜的。其中，公部門和民間部門間相對的權力關係，是決定中心行動處境的主要基礎。在依循權力差序的合作關係下，的行動位置也呈現出「契約委託下的媳婦」、「行政體制間的傳聲筒」、「調和矛盾的潤滑劑」的弱勢特質。

**3.合作行動的政治功能：**社區發展育成中心透過社工聯繫、親自拜訪、教育訓練、聯繫會報、專家引薦等輔導機制，不但有利於地方政府推動社區發展與社區評鑑業務，實質上更降低社會局、區公所與社區發展協會間的摩擦，實際上還產生了做為政府部門和民間部門的緩衝平台之非預期功能。

### （三）行動的限制與挑戰

社會創新行動鑲嵌在委託單位、服務對象、專家學者的社會關係之中，又因著目標設定由上而下的模式、社區組織的多元和虛弱體質、社區組織本身的生命週期、承辦單位的服務能力等限制，帶出本文對未來此項創新行動挑戰之省思：

**1. 社工的能力和培力：**社區工作與社區時空脈絡是高度關連的，這種工作取向對社區情境的敏感度和實務能力需求，往往超過社工員初入社會時的能力。例如服務過程既要有發掘與連結資源資訊的能力，要能與委託單位和專家學者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也得體察社區組織的特性、習得協會會務運作、議事規則，要有與社區理事長、總幹事的應對技巧，並對在地權力脈絡有所認識，甚至又得會委婉拒絕為社區代寫計畫的不當期待。在這麼繁雜的社區培力任務需求中，行動的首要挑戰，就在如何聘用成熟、穩定、有彈性的社工人力，並建立可緩解人員工作壓力和耗竭的培力機制。

2. **中心工作條件的提升：**人力不到位及流動是社區培力業務不能落實的關鍵因素。中心對此的具體挑戰就是工作環境和待遇。社會裡一般優秀員工都預期薪資會隨著年資和表現有穩定增長空間，然而，根據本方案連續三年計畫所能編列的人事經費額度都維持不變的情況，自然降低了資深社工持續投入的意願。這也帶出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創新行動的另個重大挑戰，政府福利方案委託預算僵固和對方案經費管制過度的問題。
3. **合作夥伴關係的再確認：**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推動方案，雙方一開始會對服務目標、方案策略及執行難題的討論和解決有一定的共識。然而，隨著方案的延續，或是承辦官員變動，雙方對後續目標和做法的差異就會逐漸擴大，這時合作夥伴關係的轉變也成為重大的挑戰。根據本方案的行動經驗，公部門始終將中心視為是市府派遣單位，福氣協會雖可參與目標或作法的部分討論，卻難以體現福氣的自主性，並使福氣協會派駐育成中心的工作人員，歸屬感困惑日深。這種合作的夥伴關係之確認，有賴公部門對非營利組織有更多的信任與支持，才讓非營利組織在行動中發揮協力價值，並有同步成長的機會。否則非營利組織在建立合作關係時，應就合作關係終止做好退場準備，才不會因此失去第三部門的價值。
4. **社工組織間良性的競合關係：**現行社會服務方案委託招標時，委託單位一方面宣稱要與被委託單位建立夥伴關係，一方面卻又想引入多方服務供給者產生競爭效應。競爭雖然有擇優汰劣的功能，卻也容易造成同為助人者的社工組織間的零和競爭。這種從政府面的單方利益結構之招標模式，自會弱化第三部門的整體潛力。因而福利服務方案委託宜放棄單一選擇委託模式，改採符合現代多元利益結構的政府行政發展模式。例如採用一案多

個執行者模式，既有利於移除後進者的進入阻礙，提供服務使用者更多的選擇，也可促進社工組織間發展良性的競合關係。

5. **在不確定中的學習：**走過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的合作歷程，一路上都覺察到彼此體諒和信任的重要性。雖然政府的科層體制運作會趨向規則化和封閉性，非營利組織承接政府方案委託也因其境遇而往往各有盤算；如何在制度和不确定間找到平衡點的重大挑戰，有賴於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兩造間的信任來落實。這些是行動的基礎，同時也是維持的挑戰。感謝台中市社會局對福氣協會的信任，研究者從此創新方案的合作經驗中發現，這樣的信任是以善意為起點，依靠在地的合作夥伴，行動中持續的對話和理解，社會利益多元的分享，以及共同面對矛盾的成熟態度。

## 參考書目

- 王仕圖（2007）。社區型非營利組織資源動員與整合：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例。  
**台灣社會福利學刊**，5(2)，103-137。
- 王增勇（2009）。解嚴後台灣福利運動建制化的過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  
407-417。
- 李景鵬（2008）。**權力政治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吳明儒、王仕圖（2009）。區公所培力社區的創新方案及其成效之研究：以高雄  
市「協力各區開啟社區願景實施及續力計畫」為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3(2)，113-132。
- 紀金山、陳韋庭（2011）。自發行社區組織的發展與資源動員：以雲林縣老人  
長期照顧協會為例。**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1(2)，1-58。
- 徐震 原著/ 莫藜藜主編（2007）**徐震教授論社區工作**。台北：松慧。
- 陳東升（2012）社群治理與社會創新。**臺灣社會學刊**，49，1-40。
- 陶蕃瀛（2004）行動研究：一種增強權能的助人工作方法。**應用心裡研究**，23，  
33-48。
- 葉富春（2004）**利益結構、行政發展及其相互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
- 蕭新煌（2012）社會學家如何看待和引領「社會創新」？**2012 台灣社會學會年  
會暨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台中市：東海大學。
- 劉淑瓊（2008）競爭？選擇？論臺灣社會服務契約委託之市場理性。**東吳社會  
工作學報** 18，67-104。
- 劉淑瓊（2009）非營利組織與政府的互動關係。蕭新煌等主編，**非營利部門：**

組織與運作，223-247，巨流出版社。

劉麗雯（2004）*非營利組織：協調合作的社會福利服務*。台北：雙葉書廊。

Bailey, . & Koney, K. M. (2000). *Strategic alliances among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organizations: From affiliations to consolidation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Galaskiewicz, J. (1979). "The structure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al networks." *Social Forces*, 57(4), 1346-1364.

Galaskiewicz, J., & Krohn, K. (1984). "Positions, roles and dependencies in a community interorganization system."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5(4), 527-550.

Gulati, R., & Gargiulo, M. (1999). "Where do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 come fro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5), 1439-1493.

Jackson, S. (2008). "What is the social in social practice?: comparing experiments in performance.". in Davis, T. C.(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erformance Studies*: Pp.136-1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 M., (2001).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al Policy Environment" in M. Harris & C.Rochester (eds.),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in a Changing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 Perspectives on change and choice*, Pp.213-228. Houn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Palgrave.

Howaldt, J. & Schwarz, M. (2010). *Social Innovation: Concepts, research fields and international trends. International Monitoring (IMO)*.

[http://www.internationalmonitoring.com/fileadmin/Downloads/Trendstudien/IMO%20Trendstudie\\_Howaldt\\_englisch\\_Final%20ds.pdf](http://www.internationalmonitoring.com/fileadmin/Downloads/Trendstudien/IMO%20Trendstudie_Howaldt_englisch_Final%20ds.pdf)

- Howe, D. (2002) "Relating Theory to Practice." in Davies, M. (ed.)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Work*. Pp.81-88. London: Blackwell.
- Pfeffer, J., & Salanick, G. R. (2003). *The external control of organizations: A resource dependence perspectiv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amer, F. G.(原著),包承恩、王永慈(譯) (2000)。社會工作價值與倫理。台北：洪葉。
- Schneider, J. A. (2006) *Social Capital and Welfare Reform: Organizations, Congregations, and Commun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R., (2005).“The Contracting Quandary: Managing local authority-VNPO Relations.” *Local Government Studies* 31(1),69-83.
- Smith, S. R., & Gronbjerg, K.A. (2006).“Scope and Theory of Government-Nonprofit Relations.” in W.W., Powell & R., Steinberg (eds.),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Pp. 221~242.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ingh,J.V., House, R.J. & Tucker.,D.J. (1986).“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Mortality.”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1,587-611.
- Stern, L. W. and Gibelman, M. (1990). “Voluntary social welfare agencies: trends, prospects and issues.” *Families in Society*, 71, 13–23.
- Trevithick, P. (2005) *Social Work Skills: A Practice Handbook*. 2nd ed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 Vass, A. (1996) .”Introduction: the Quest for Quality.” in Antony A. Vass (ed.), *Social Work Competences: Core Knowledge, Value and Skills*, Pp1-7. London: Sage Pub.



## 研究論文

# 志願服務評鑑：以嘉義縣為例<sup>\*</sup>

呂朝賢<sup>\*\*</sup>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鄭春良

嘉義縣精神康扶之友協會理事長

---

收稿日期：2014 年 6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7 月 10 日。

<sup>\*</sup>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sup>\*\*</sup>通訊作者：呂朝賢，[chleu@thu.edu.tw](mailto:chleu@thu.edu.tw)。聯絡電話 04-23590121-36512。

## 中文摘要

自志願服務法頒佈後，各級政府開始對志工運用單位進行績效評鑑，期透過評鑑提升志願服務品質。但由於此一評鑑制度係自由參與並無強制性，經常會有參與評鑑的單位少，只要參加評鑑就能得獎接受表揚的情形，評鑑目的是否能達到、對志願服務的績效區辨能力是否能呈現，令人質疑。

為了解上述現象，本研究擬定了：1.志工運用單位參與複評的影響因素？2.評鑑方式及內容，與實際的志願服務執行績效是否相契合？等 2 個研究問題，並藉由深度訪談方法，以瞭解當前志願服務評鑑的癥結。主要研究發現有 2：

1.組織規模、人力、經費、能力，對評鑑的態度與認同感，係影響志工運用單位參與複評的因素。2.由於評鑑係以書面審閱為主，加上評鑑時間短，且以量化資料為主，忽略了志願服務質性層面的績效，造成運用單位的實質執行績效，無法透過評鑑來充分顯現。

基於上述研究結果，本研究建議志願服務主管機關，應回歸至志願服務法的基本精神—高度自治低度管理；宜降低當前繁瑣的志願服務評鑑方式及內容，改以實地查訪或者巡迴輔導方式，多呈現志願服務的質性成效，如此才能真正地落實志願服務法立法之良善美意。

**關鍵字：**志願服務、績效評鑑、績效指標

# **Volunteering Evaluation: ChiaYi County as an Example**

**Chao-Hsien Leu**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Tung-Hai University

**Chun-Liang Cheng**

Mental Rehabilitation Associations of ChiaYi

## **Abstract**

Since the enactment of Regulations on Encouragement of Volunteer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volunteering in order to promote its quality. Due to the fact that such assessment systems are not mandatory, there exist two situations. First, few local governments are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essments. Second, if they do so, they will get awarded. It's doubtful whether the purposes of these assessments or the ability to distinguish the volunteering can be achieved.

With an eye to analyzing the phenomena mentioned above, the research hypothesize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make assessments? 2. Do the methods and contents about the assessments match the practical performance of volunteering? This research uses "in-depth interviews" to explore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current assessments of volunteering.

There are two major results:

1.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assess the volunteering include the scale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human resources, the finance, the ability, their attitude towards the assessments and the recognition of assessments.
2. Due to the facts that the assessment is the paperwork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ed in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at the neglecting of qualitative

performances , the practical performances of the institutions which utilize the volunteering services fail to be manifest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e relevant institutions return to the basic spirit of Regulations on Encouragement of Volunteering namely, more autonomy and less management. Furthermore, the complicated assessment methods and contents applied currently should be replaced with field examinations or itinerant counseling methods to indicate more qualitative performances of volunteering Only by this way can the good mind of Regulations on Encouragement of Volunteering be fulfilled.

**Keywords: volunteering, performance assessment, assessment indicator**

## 壹、前言

###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

為呼應聯合國發起 2001 年國際志工年，及日益增加的民間志願服務需要與人力，政府於 2001 年頒訂志願服務法，各級政府由中央到地方，對於志願服務的推動邁入全面制式化。從法定經費編列、志願服務發展計畫、志願服務推廣機制及資源整合平台的建立等等，開始推廣與執行，政府對志願服務的推動角色，亦由原來強調「獎勵／補助」的角色，轉變為積極的推動者。其實在 2001 年制訂通過「志願服務法」前，政府已有志願服務的相關法規，例如：臺灣省政府於 1982.07.01 開始實施的「臺灣省推行志願服務實施要點」中，即有志願服務訓練、督導、評鑑與獎勵之規定（第 4 及第 9 條）、1987.12.15 亦頒訂「臺灣省社會福利志願服務工作人員平安保險實施要點」為志願服務人員投保、1990.06.21 所頒訂的「臺灣省推行志願服務方案」更添加了與志工管理有關的相關措施（如：志工實習制度、訓練手冊、志工服務登記制度等等）。然而這些法規行政命令，並未如「志願服務法」般，如此具有全面性、普遍性及強制性，實施作為影響所及範圍亦有其限。

的確，相較於「志願服務法」實施前的志願服務相關行政法規，志願服務法有二大特徵：1.依志願服務法之規定，志工運用單位應對志願服務提供者辦理基礎與特殊等二項教育訓練（志願服務法第 9 條），這意謂志工身份的取得需具備一定的資格條件。2.再者，志工運用單位在運用志工前需提出運用計畫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志願服務法第 7 條），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有對志願服務運用單位督導、服務績效考核等等的法定職權（志願服務法第 19 條）。這 2 個特徵中，尤以後者對於志工運用單位的挑戰最大、引起的爭議最高，亦是

本文關注的議題。

政府基於法令以輔導立場考核運用單位，作為獎勵之依據，本為行政權力，於法有據，但受考核單位（者）對評鑑的功能與定位卻常有爭議。例如：評鑑對志工及志工運用單位的服務品質與士氣是否有所幫助？評鑑計劃與執行評鑑方式是否有其他方式可以取代評鑑指標對法定事項、組織功能、志工管理、服務績效及創新特色等，能否反映實際執行績效以及是否應該另外有加分項目等都值得我們去探討。此些爭議在相似的政府評鑑中，亦常被提出，例如：黃肇新(2010) 內政部「99 年度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表示在諸多與社區有關的評鑑裡，大概就屬內政部的評鑑項目最全面，它除了期待社區展現社區組織如何參與社區化的福利服務之外，也要像業務檢查一般地查閱社區的會務與財務檔案。經常聽到許多參與本項評鑑的社區感嘆為了整理受評的資料，1 個月、2 個月甚至 3 個月以上沒有好好睡覺，顯示評鑑對受評者造成極大壓力。吳明儒(2011)的研究亦指出，全國性社區評鑑實施以來，的確產生激勵社區向前的作用，但是未來的社區評鑑是否能夠繼續只是「少數人」在玩的遊戲呢？所謂「少數人」係指每年只有約 80 個社區得獎，這個數字是全國 6,400 多個社區發展協會的 1.25%。

以上實例說明，以行政為主導的評鑑工作，雖於法有據、依法行政，但長期下來反而造成原本為協助志工運用團隊服務績效提昇的美意，無法實現，甚至傷害了運用單位的創新能力。另外以本研究研究對象（嘉義縣祥和志願服務評鑑）為例，在 2004、2007、2011 等 3 次評鑑結果雖未發現所謂「群聚效應」、「贏者全拿」的現象，但評鑑績優單位卻是當年接受政府委託及補助較多的非營利組織，對於後成立之較小型非營利組織或弱勢團體，彷彿無緣進入績優行列，這種評鑑結果是否符合原初評鑑工作的預期，值得商榷。再者，2013 年全縣參與複評的運用單位，只有 11 隊，占全部運用單位約 10%左右，所有參加

評鑑的隊伍都得獎接受表揚，此種參加就有獎勵的現象，對志願服務品質提升是否有幫助呢？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希望了解志工運用單位參與複評的影響因素為何？評鑑方式及內容是否恰當反應志工運用單位的執行績效？針對評鑑結果，在政策及輔導上，有哪些適宜的機制/措施，以協助提高志願服品質？本研究希望研究結果能對未來評鑑設計有參考之價值，使設計更貼近實際的志願服務運作，並有益於志願服務績效之提昇。

## 二、研究方法

如前所述，本研究是想瞭解志工運用單位參與／不參與志願服務評鑑的理由，及志願服務評鑑指標是否能合宜的反映出志願服務團隊實質的績效。由於這二個待解之研究問題涉及到志願服務計畫執行單位及執行者主觀感受，因此，我們將研究屬性定位為質性研究，我們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藉由訪談運用單位之相關人員，以瞭解運用單位對辦理志願服務績效評鑑之看法與態度。

表1：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務類型	服務年數	受訪日期
A-1	男	48 歲	專科畢業	志工團長	16 年	102.07.06
A-2	女	49 歲	二專畢業	志工督導	15 年	102.08.21
A-3	女	33 歲	大學畢業	志願服務承辦人	5 年	102.9.5
B-1	女	46 歲	大學畢業	志願服務承辦人	4 年	102.11.2
C-1	男	65 歲	專科畢業	總幹事	6 年	102.12.16
D-1	女	52 歲	研究所畢業	總幹事	15 年	103.1.5
E-1	女	62 歲	大學畢業	理事長	6 年	102.11.15

研究訪談對象係以立意取樣擇選，根據前述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我們擇選了3種類型單位：1、得獎單位3個（編號 A、B、C），其中1個為初次得獎者（編號B）。2、未參與評鑑的單位1個（編號E）。3、評鑑指標中具有加分優勢的單位1個（編號D）。簡言之，我們一共選擇了5個志工運用單位，7名受訪者（其中2位是資深志工），透過質性訪談，了解他們對於志願服務評鑑的看法與建議。

## 貳、影響志工運用單位參與複評的因素

嘉義縣志工運用單位評鑑程序計有二階段：首先由運用單位自評，自評分數達80分者，則進入第二階段複評，由縣府聘請專家學者至運用單位實際考評，並依考評成績做獎勵。然而，嘉義縣2013年符合評鑑資格的社政類志工運用單位雖有131個團隊，經嘉義縣志服務推廣中心公告，依法提出必須參加評鑑之志工運用單位，則只有71隊，且正式參加複評的隊伍卻只有11隊，不到全部隊伍的10分之1。以上數據顯示運用單位對評鑑採取觀望態度的比例很高，為什麼這些志工運用單位對志願服務評鑑會採取觀望的態度呢？若就技術性層次來說，因為在參加複評之前，由志工運用單位，可依照評鑑指標項目內各項評分標準自己評分，再將自評分數送給主管單位，自評分數低80分就不需參加複評，此種資格限制給予運用單位不參加複評的藉口，因為依志願服務法，志願服務評鑑只有獎勵沒有罰則，主管機關並沒強制運用單位參加評鑑的法定權責。但我們仍舊好奇為何那麼多單位要採用這一種技術性手段來逃避評鑑呢？主要理由如下：

**1.沒有人力擔負評鑑工作** 誠如本研究受訪者所言「其他接很多政府業務的志工隊，有財團法人的志工隊，這些運用單位，你也知道，財團法人都很久

以前就有了，應該有好幾年了，做了那麼久，越做越大，都有很多人，有人就好辦事，要做電腦的工作是很簡單，不會像我們，沒人懂電腦……」(A1-3/21~24)。這意謂，志工隊人力規模愈大者、資源及技術能力愈豐富者，愈有能力來應付評鑑所需準備的各項評鑑資料。

**2.管理制度的完備度** 延續上述理由，其實愈有能力因應評鑑的志工運用單位，通常亦會有較好的志工運用或管理制度，一如受訪者所言：「像我們協會成立很久，約20年左右，又有志工隊，志工隊素質不錯，還有組長、副組長，志工團長等編制，平時有志工督導會議、幹部會議、年底還有志工大會，在管理上是相當有經驗的」(A2-1/13~15)。有良好的管理制度者，在面對志願服務評鑑時所需付出的成本，相對上會比較低，且會較有自信面對評鑑工作。

**3.志工業務管理人員能力** 前述2個理由雖說明組織是否有意願參與志願服務評鑑，然而更重要的是志工業務實際承辦人的能力與意願。有個受訪者就說：「一般辦理志工業務的人，都是兼任的性質，而且這個人員是承接方案的人員，也就是說，如果今年有接到方案，這個人就有可能在我們單位裡，如果明年沒有接到方案，基於經費考量，這個人就要離開，因此人員常常換來換去，作起事來不熟悉」(D1-4/22~26)。另一個受訪者亦談到「我們的單位也有一二十年歷史，任何事情也都有一套規則可循，而且我們的業務承辦人，對業務也熟悉，因為他已經做很久了，加上我們平常所有活動紀錄資料完整並保留」(A1-1/14~16)。

**4.服務、志工與組織屬性** 志願服務種類多元，有些志工年齡大、工作性質簡單，若要求太多反而不太好，有個受訪單位就談到：「這些長者志工，能服務的都是關懷據點的同性質老人，例如量血壓紀錄等一些簡單的工作，如果要求太多反而對他們有壓力」(D1-1/18~19)。又如許多社區發展協會因為組成人員都是社區裡的人員，如果社區位於鄉村區，成員都以務農為主，對於組織運

作，人事管理，文件製作與保存比較不重視，總認為評鑑是找麻煩的事情，相反的如果是社團法人，會因其成立目的，對政府評常要求行政事項，平常即有規則可循，加上社團法人平常有承接政府委託業務，在文件整理，組織運作比較常態，比較能接受評鑑。

**5.組織資源的豐富度** 一如稍前提及的組織人力一樣，組織對於評鑑所需成本的擔負能力，亦影響該組織是否願意參加評鑑。某個受訪者就說：「我個人反對評鑑，因為我們單位人力比較少，同時資源也比不上其他較大的單位，人力、財力都輸給別人，加上沒有電腦，會使用電腦的人也少，不像其他資源較多的單位，有人、有錢、有場地，我們連場地都要向公所租，每月還要資金。有時收入不夠，還要理監事自行處理」(E1-1/4~7)。另一個受訪者亦談及類似的看法：「評鑑如果只在輔導角度可以接受，但若是用於競爭排名則不認同，因為每個單位資源不同，資源多的單位無論在人力、物力、財力都很好做，資源少的則相對困難」(A3-1/4~6)。易言之，準備評鑑並非完全無成本的，除人力成本外，亦需付出財務、時間及機會成本，若組織無力或僅能勉力支撐，不僅會影響志願服務品質，亦會影響參與評鑑的意願。

**6.對評鑑的公平性與效益的質疑** 有些受訪者亦認為參與志願服務評鑑，只是多付出無謂成本，對組織實質效益低或不符投資報酬，以下引述即為例證：「沒參加初評與複評對我們來講並不會影響我們服務個案的績效與熱情」(E1-2/21~25)。「評鑑結果……獎金好像分 8000、5000、2000 三種和獎牌，雖然有獎勵作用，但和承辦人員所付出的時間與心力差太多，作報告的資料成本就不只這些，最好應該多一點獎金」(A1-2/18~21)。當然亦有受訪者質疑評鑑公平性，右列受訪資料即為例證：「我認為勞民傷財，準備一大堆資料，看半小時就看完，無法證實一年的成果，如果資料造假，沒辦法看出來」(E1-1/11~12)。

## 參、評鑑和績效的關係

「評鑑」在理念上，是為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志工運用單位瞭解志願服務成果和實況，進而能改進志願服務實施方式和提升服務品質的功用。但因每個機構志工團隊之規模及架構差異頗大，加上志願服務的形式多樣化，服務成果不易測量，如果不能擬定一套妥善公允的指標，將對評鑑的公信力造成影響(陳麗欣、魏希聖、王慧琦，2007)。嘉義縣志願服務評鑑，雖然歷年來已執行過3次評鑑，但對於評鑑的公平性與適當性上仍面臨到相同的挑戰，其狀況茲述如下：

**1.資料呈現與正確性不足** 關於此項問題，受訪者 E1 就表達的非常清楚，她認為：「評鑑是勞民傷財，準備一大堆資料，一二十分鐘就看完，無法證實一年的成果，如果資料造假，也沒辦法看出來。有時候一張照片雖然表示你來過這裡服務，但被服務的人有的不希望曝光，.....又如：服務個案時，有去做服務工作，但文書資料沒做紀錄，就變成又沒做」(E1-1/11~17)。另外，因為評鑑一次皆需檢視3年的資料，亦造成資料保不易，正確度有問題，受訪者 C1 就示：「如果只有文件資料，遺失了就全沒了，像上次水災，我們好多資料都重新來過」(C1-5/18~23)。相同的受訪者 A2 亦表示：「這次我們在幫整理資料時，承辦人員要我們把上次評鑑時志工人數和三年前的志工會議紀錄和簽名表一起找出來，天啊!三年前已經給了，我們自己都沒影印氣來，本想說給了，我們就沒事了，哪知承辦業務的人，資料遺失，電腦又沒存檔，承辦人又換了個人，只好再做一份，不知道和原來差多少都不知道」(A2-3/22~28)。

**2.量化指標的限制** 與一般政府評鑑一樣，志願服務評鑑依然著重於量化指標，惟如此不僅無法完全顧及志願服務的本質，對於志願服務實質的效益亦會造成扭曲與誤解(呂朝賢，2002；黃源協，2004)。受訪者 A1 的回答正好

佐證以上的憂慮：「如果我們單位不須要那麼多志工，招募多餘的志工也沒用，況且招募志工還要教育訓練，很累的，除非要儲備志工！否則今年志工夠用沒招募，被扣分數不合理！因此志工人數多少不一定就是有績效，除非是在招募人數比賽」（A1-1/28~32）。

**3.指標的偏頗度** 除了量化指標的限制外，若干指標比較有利於大型組織或與政府有密切合作的組織，亦是受訪單位大感不平之處。受訪者 D1 就談到：「.....專人督導.....對小組組織比較不利，因為錢的問題。其他像配合社會處業務，如果沒接社會處的業務，為什麼要配合，.....提供福利措施，標準在哪裡，是要讓志工去遊覽還是常常聚餐才算福利，這些大組織當然沒什麼問題，可小協會就困擾了」（D1-3/29~34）。

**4.委員檢視時限問題** 這一項與第一項議題雷同，可說是再一次強調因評鑑過程的侷限性，導致對於評鑑結果區辨性及準確度的質疑，誠如受訪者 B1 所言：「在參加複評時，我們送去的文件，委員分三組輪流看我們資料，這些資料看完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我不知道委員要用十五分鐘看三年的資料，如何看完，也不知道他們是怎麼看的，我想應該是看有沒有把表格填完整沒有，否則資料這麼多十五分鐘怎麼夠，怎麼知到文件內的資料是真的還是假的？畢竟那是經過美化的，就像女人化裝過一樣，真假難分辨」（B1-3/13~17）。

## 肆、討論與結語

本文針對為何有志工團隊不參加評鑑，及評鑑是否能反映志工服務績效等 2 個研究問題，做探索式分析。研究結果發現，不參與志願服務的因素計有「沒有人力擔負評鑑工作」等 6 項，「評鑑無法充份反映志工服務績效」的理由則計有「資料呈現與正確性不足」等 4 項。對於上述 10 大癥結，雖然我們並沒有辦

法完全的去解決或避免，例如：若要仔細做志願服務評量，勢必更耗費準備時間，但若要節省審查時間，那就又可能被質疑看不到志願服務團隊的實質績效。不過還是有如下幾個可能作為，是可以改善目前的困境。

首先，最重要的是志願服務「中央主管機關」應重新回到志願服務法訂定時的基本精神：「高度自治低度管理」，讓志工運用單位有更大的自治彈性，如此地方主管機關方可能放開行政的僵固性，讓志工運用單位有更高的自治彈性，如此參加志願服務評鑑的意願當會更高。其次，應該簡化評鑑程序：評鑑雖然從自評、初評、複評三個階段，看似嚴謹，然而在複評階段，只做資料審核與聽取簡報，在時間有限與資料失真的情況下，無法檢視運用單位真正的績效，可以思考合併巡迴輔導時，以實地查核方式了解運用單位執行志願服務業務的績效狀況，因為巡迴輔導的內容，和評鑑的內容大部分相似，而且運用單位實際執行狀況，一目瞭然。第三在評鑑內容與目標上宜多強調鼓勵、創新與品質提昇，而非嚴格的單一良窳準則。若目標放在強調志願服務的多樣性，那麼就不應該有單一的衡量指標，且應該要多以鼓勵代替貶抑，如此方能促進志願服務的多元發展，形塑志願服務的公民價值與生活文化。

## 參考書目

- 呂朝賢(2002)。對我國志願服務法的若干反思與建議。*臺大社會工作學刊* 7:203-241。
- 吳明儒(2011)。社區發展組織—政府不容忽視的民間社會力。見內政部(編)，*100 年度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頁 8-17)。臺北：內政部。
- 黃源協(2004)。祥和計畫經費補助與績優表揚之成效與檢討。*社區發展季刊*93：216-220。
- 黃肇新(2010)。臺灣社區發展與評鑑的下一步。見內政部(編)，*99 年度社區發展工作績效評鑑報告*，(頁 23-25)。臺北：內政部。
- 陳麗欣、魏希聖、王慧琦(2007)。運用德菲法建構臺中市志願服務評鑑指標。*朝陽學報* 12：333-349。